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中共中央局、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
大会的意见 …………………………………………… (1)
（一九二四年一月）
附：国民党之政纲（节选） ……………………………… (2)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 邓中夏 (8)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 (13)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 (17)
（一九二四年二月）
造党 ………………………………………………… 恽代英 (21)
——答陈宗虞君
（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
论劳动运动 ………………………………………… 邓中夏 (26)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列宁不死 ………………………………………… 李大钊 (29)
（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局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
报告 ……………………………………………………… (31)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上海地方报告 ……………………………………………… (35)
（一九二四年五月）

汉口地方报告 …………………………………………………… (40)
（一九二四年五月）
湘区报告 ………………………………………………………… (43)
（一九二四年五月）
附：安源地方报告 …………………………………………… (47)
京区报告 ………………………………………………………… (51)
（一九二四年五月）
山东地方报告 …………………………………………………… (54)
（一九二四年五月）
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 ………………………………… (59)
（一九二四年五月）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 (60)
（一九二四年五月）
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 ………………………………………… (64)
（一九二四年五月）
S.Y. 工作与 C.P. 关系议决案 …………………………… (69)
（一九二四年五月）
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 …………………………… (72)
（一九二四年五月）
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 (75)
（一九二四年五月）
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 ………… 周恩来 (78)
——答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君
（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
革命中学生应持的态度 ………………………………… 萧楚女 (82)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 ……………………………………… 陈独秀 (85)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农村运动 …………………………………… 恽代英（89）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李大钊（93）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 ………………………… 恽代英（99）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104）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107）
——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 …………………………（109）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 ………………………… 高君宇（116）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商团事件的教训 ………………………………… 蔡和森（120）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我们的回答 ……………………………………… 陈独秀（123）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 ………… 瞿秋白（134）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国民党工作的
合作办法 …………………………………………………（142）
（一九二四年九月）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 陈独秀（144）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军事运动与革命 ………………………………… 林育南（149）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 …………………………… 蔡和森（153）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 ………………………… 周恩来（158）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广州通信）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164）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
展开活动的通告 ……………………………………（166）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168）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我们的力量 ………………………………………… 邓中夏（173）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 ………………………… 恽代英（188）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国民党底分析 ……………………………… 陈潭秋（193）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 ……………………………（198）
——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 ……………………… 张太雷（200）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局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 …………（206）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208）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209）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212）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215）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 ……（226）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 ……（239）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 ……（245）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 ……（250）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 ……（254）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 ……（258）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262）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268）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 ……（270）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275）
（一九二五年一月）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 …………………………… 瞿秋白（278）
（一九二五年二月）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 ……………………（296）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 ………………………………（299）
——为孙中山之死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301）
——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
（一九二五年）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 恽代英（303）
（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
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 ……………………… 蔡和森（312）
——国民党淘汰反革命分子的必要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 刘少奇（319）
（一九二五年四月）
怎样布尔什维克化 ………………………………… 任弼时（323）
（一九二五年）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 ……………………（327）
——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 ………………………………………（330）
——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 邓中夏（332）
——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
（一九二五年五月）
工人阶级与政治争斗的决议案 ……………………………（351）
（一九二五年五月）

经济斗争的决议案 ……………………………………… (354)
（一九二五年五月）
组织问题的决议案 ……………………………………… (359)
（一九二五年五月）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 (363)
（一九二五年五月）
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 (365)
（一九二五年五月）
军队的性质和组织 …………………………………… 周恩来 (368)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
告全国民众 …………………………………………… (376)
（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
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对于广东时局宣言 ………………… (381)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
国民革命 …………………………………………… 瞿秋白 (385)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 ……………………… 任弼时 (395)
（一九二五年六月）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宣言 ………………………………… (403)
——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怎样做一个宣传家? ………………………………… 恽代英 (409)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 恽代英 (413)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告工人兵士学生 …………………… (417)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PDG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
联合起来呵！ ………………………………………… (421)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 ………… 瞿秋白 (425)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 ……………………………… 恽代英 (431)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信 ………………………………………… (436)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为廖仲恺遇刺悼唁国民党中央 …………………… (448)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 ………………………………………… (450)
——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
组织与任务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 瞿秋白 (452)
（一九二五年八月）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 陈独秀 (468)
（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 …………… 贺　昌 (475)
（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 瞿秋白 (483)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 …………………… 罗亦农 (490)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 …………………………… (498)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告农民书 …………………… (501)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对反奉战争宣言 …………………… (509)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 ………………… (511)
(一九二五年十月)
组织问题议决案 ………………………………………… (522)
(一九二五年十月)
宣传问题议决案 ………………………………………… (527)
(一九二五年十月)
职工运动议决案 ………………………………………… (531)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 …………………… (534)
(一九二五年十月)
蒙古问题议决案 ………………………………………… (538)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中共中央局报告议决案 ………………………………… (540)
(一九二五年十月)
共青团本届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及其解释 ……… 任弼时 (542)
(一九二五年十月)
显微镜下之醒狮派 ……………………………… 萧楚女 (552)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 …………………………………… (600)
——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毛泽东 (602)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 ………………………… 陈独秀 (609)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共青团中央告孤军社醒狮社诸君及一般

国家主义的青年 …………………………………………… （613）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 毛泽东（616）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 …………………………………… （619）
——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 ……………………… 陈独秀（621）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
告全国民众书 ………………………………………… （626）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 ……………………… 恽代英（628）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土地与农民 ……………………………………… 李大钊（64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 瞿秋白（655）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
影响 ……………………………………………… 毛泽东（663）
（一九二五年冬）

中共中央局、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的意见

（一九二四年一月）

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我们确实有在国民党内竭诚的和国民党合作之必要。在原则上，当此时期我们与国民党并无主义上政策上冲突之实质；在事实上，或因国民党未能了解国民主义的实质，或因彼此感情的疏隔而有所冲突。于前者（特于对外恢复国权，对内民众的政治宣传及为人民利益奋斗的表示），我们决不能让步，但须依据其党纲与主义以委婉诚恳的态度出之，尽量避免使其恐怖或疑忌的态度与术语。于后者，我们须抑制一切感情并抛弃鄙视国民党之旧观念，努力深入其群众，以期达到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之目的。C. P. 与S. Y. 两中局及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因以上情由，并知道幼稚的国民党初次全国大会代表分子非常复杂，不愿以希望过奢，致碍我们合作的初幕。所以只议决左列各项最低限度的主张：

一、对于党纲草案，我们大致赞同；惟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主张是：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

二、对于章程草案，亦大致赞同；惟对于实际的地方组织，我们主张应就当地选人，不得由旅粤或旅沪党人遥领。

三、对于政纲议案，我们宜拥护国际代表的八条意见（附后）。

四、对于中央执行委员选举案，我们同选谭平山同志。

五、对于宣传事业，我们应主张于党的主义政策外，须兼及关于人民利害的每个实际问题。

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议，以便对于上列五项及其他意见，主张一致；更须注意联络国民党之进步分子，使之表同情于我们的主张。

C. P. 中央局

S. Y. 中央局

附：国民党之政纲（节选）

一、中国之现状

（A）辛亥革命之后

辛亥革命的责任在于推翻满清，变半殖民地的中国成独立的国家，造成发展实业之优越环境——那次革命，确有从政治的封建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从手工业经济过渡于资本制度生产之趋向。

然而实际上革命没有胜利。革命政府虽能表现中国平民之民族解放主义，然而竟逼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封建阶级妥协。这种妥协便是革命第一次失败的根源。虽然当时袁世凯并不占优势，而革命却没有能胜利。革命派不能得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尽想避免国内战争，别方面亦因为当时没有有组织，有纪律，知道自己的责任和目的的政党——假使当时有了这种政

党，那就必定能利用袁世凯一派人的弱点而取得胜利。实际上却相反，革命反而被袁世凯利用了去——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底首领，一切封建阶级的反革命的将军武官都属于他一派，而革命派却把政权交给了他。

袁氏帝制逆谋失败之后，政权曾经转移于民权派，然而他们不久便又失败了——仍旧是因为没有有组织有纪律的国民党。

革命累次失败，其结果使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更加厉害。所谓民国政府，实际上完全在军阀手里。他们在半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里，利用政权而与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列强也就借款给他们做军费，日益破毁中国。同时，外国利用中国的财政困难，得以发展他们的资本势力于中国，造成势力范围，攫取政权。

从这一点看起来，就可见中国的内乱有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因为内乱是阻滞中国实业的发展，国内市场上便充牣了外国货。因为此等内乱，中国的实业便停滞不进，在中国境内，尚且不能和外国资本竞争。

因此种种，中国的各种中等阶级非常之苦：小企业家渐渐的破产，小手工业者变成失业游民而流入兵匪，农民无力经营农业，因而廉价出售土地——生活日益昂贵，租税日益加重，这种情形均于全国经济及工业有极坏的影响。

（B）现 在 状 况

辛亥革命之后直到现在，中国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好，而且越弄越坏（这里要指出几件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

这种可怕的状况有什么出路呢？中国的各种党派或个人，

每每也有提议——而且还有外国人。我们简单些归纳一下，看一看各派的主张，是否有真正的正路。

（一）立宪派（研究系等）　宪法的效力全靠有民众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的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不受军阀的摧残。譬如现在的宪法，他自身并不是不好，然而曹锟却绝不管他。况且民众没有组织成真正的民族力量的时候，即使有宪法，也决不能保证中国的主权。立宪派只有要民主宪法的愿望，而没有方法，没有组织，没有勇气真正的为宪法而奋斗。

（二）联省自治派　现在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分割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而已。这种反对中央的斗争，并不是真正自治的奋斗，这是小军阀想分割大军阀的权利罢了。依中国现实状况看来，真正的自治确是必要的，并且也实在合于我们民族底需要和精神，然而只有中国全体独立之后才能办到。中国全体还没有得着自由，就要说一部分的自由，岂不可笑！所以争自治的运动决不能和争民族独立的运动分开的，只有自由的中国里面，才能有自由的省。并且一省里面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都只有在全国的规模里，方才能够得到解决——这更是很显然的。

（三）和平会议派　有人提倡所谓和平会议——中国人也有，外国名字的中国人也有。这种调和的办法是不可能的，因为互相争夺的军阀及其他派别之间，利益绝端矛盾。这些实力派即使能调和统一也不是真的——因为不能得民众拥护，并不是有利于民众的。这种和议的结果，决不会比欧战议和的结果好。国际联盟不过是一句空话——因国际联盟里最主要的几国有互相矛盾的利益。一班帝国主义者拦着欧洲统一的路。中国的统一亦有同样的障碍。当然，国际联盟里的民族界限比中国和议的省界要利害得多——这是不用说的。至于维持各派势力

间之“均势”或“Status quo”[1]那更是乌托邦，因为（一）事实的逻辑上不容一派军阀不攻击别派；（二）军阀养着雇佣军队，便不能不战，不能不掠——而在邻省掠夺确比在本省掠夺容易些。

（四）商人政府派　现在的政府是军阀的，因为他在外国人掌握之中，更使全国民众怨恨不堪。可是若是商人政府而亦为外国人所运用，那就他的命运必定和军阀的差不多。所以，我们虽然不反对商人政府，我们却要求全体平民自己组织独立的政府，不限于商界。应当代表全中国的利益，不要请外国人来帮助，而要靠平民自己的力量。

（五）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雄主义），主张中国要找一个莫索利尼。现在中国社会里的冲突非常之利害，只有一个建筑在大多数民众之上的政党能引导中国平民出这困难的地位。我们看见辛亥革命之后，一切所谓枭雄英杰差不多完全失败了，正因为他们不能代表一个真正政党的意志。有些“伟人”挂着半中国半外国的名字，尽在基督教的青年组织找他们的力量。有些呢，在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大学找他们的力量——与民众绝无关系。或者呢，只看着中国的过去（古代）想模仿着做英雄。只有自己建筑基础于民众的意志上，凝聚这种意志于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里的人，才能真正做中国国民运动的领袖。

从上面说的看来，可见各种提议，虽说都是救中国的法子——都是些空谈，甚至于是恶意的讥消中国而已。

国民党提议的是甚么呢？

国民党的主义，大家都知道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早已宣传提倡。现在国民党的主义一定有明切的详细的党纲定出来——已经在党报上发表。大会上就可以讨论通过。这一党纲的要领如下：

（节录党纲）

我们的目的是如此。

为达这些目的起见，所以国民党改组，根据新的党章——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纪律——然而国民党不但有最终的目的，而且时时刻刻准备实行自己的最小限度的党纲，现在就开始第一步救济中国的办法。国民党请中国所有的正直的政治家来和我们合作，共同奋斗。

国民党现在提出下列几条具体的计划，作为根据，以联合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他一党一人的私利的一切人：

（一）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如租界、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

（二）废止厘金及协定关税。应当由中国自定海关税则。

为发展本国生产起见，中国应当能自己管理税卡，否则不能行保护政策。

（三）召集各省职业团体（如银行界、商会……）及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之会议以筹募集款项偿清外债之方法。

中国所欠之二万万外债，虽然实际上并不算多，却已经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

（四）实行征兵制，严定军官资格，改革任免军官的方法；改善兵士及下级军官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军队中之农业的及职业的教育；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应当分别任用。

（五）关税自管及实行保护政策之后，政府及工业阶级便安置游民土匪，使尽力于对社会有益的劳动。

（六）划分中央及各省的权限，扩大自治权至可能的范围。

（七）恢复全国工会。

（八）严定田赋地税的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的征收，严

惩鱼肉农民的土豪。

（九）教育。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现状”。

PDG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邓　中　夏

自从陈独秀先生在《前锋》提出这句口号之后，似乎有许多人尚未加以注意，于是乎陈先生这句口号也仿佛像“耳边风”轻轻的过去了。

陈先生因欲“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故发此宏愿，主张我们相信的“唯物史观”和胡适之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结成联合战线，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不过他所说联合的范围似乎太狭一点，不能使我们革命派的势力增厚和地盘加大，故我认为有扩充范围之必要，所以作为此文，聊当我向海内各个进步的思想家一个建议。

我以为除掉陈先生所举两者固应联合以外，还应该加增下列各种友军：

（一）行为派的心理学家；

（二）三民主义的政治家；

（三）社会化的文学家；

（四）平民主义的教育家。

我的理由是：

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十五期。

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散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如胡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名义上虽则寄籍哲学，实际上科学乃是他的老家，由他们口口声声拿“科学方法”做夸耀骄矜的无价之宝，便可以证明了。所以我的意思，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像社鼠城狐一样，有所凭借，有所依据。

况且实验主义终是不彻底，终是没有胆子否认心身二元论，终多少脱不掉抽象的哲学家的头巾气。去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们几乎是一个全军覆灭的大败战，其原因即在于此。固然我们联合他们打玄学鬼未尝没有一臂之助，假如纯靠他们，那就除所谓哲学领域以外，尚有其他藏着无数像玄学鬼一样无赖的牛鬼蛇神所在的广大的领域，难道我们便置之不管吗？

况且玄学鬼之敢于飞扬跋扈，实恃别个领域的与党为之声援，如心理学中之“心灵派”，文学中之“浪漫派”……都是他们谊若弟昆的生死伙伴。我们为战略上打算，“剪其羽翼”，“断其手足”，似乎亦是应该并行不悖的事。即就我们方面的战斗力加厚而论，又难道我们把气味相投趋向相近的生力军可以置之不管吗？

现在说行为派的心理学家。此派当以郭任远先生为代表。他们是主张绝对一元论的，他们是不承认“心”之一物存在的；他是说“意识”这样东西，不是主观的实质，是潜在的行为，与外表的行为的根本性质没有两样的；他们是用物观的实验法去替代超绝物质的内省法的。他们不特与往古唯心论的

“心灵派”绝对相反，并且比近世分析“心的现象”的“构造派”，和最近把身心分为二物看待的“机能派”尤为彻底。这是多么可以联合的一支友军呀！

再说到三民主义的政治家。此派当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在这变相殖民地的中国适用而且必要的；民权主义是“直接民权”，使人民真能行使主人翁的职权的；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国营产业，使社会人民皆能得到经济平等的机会的；总之是根据中国目前经济政治状况所需要而可能的。他是用革命的手段，“训政”的方略，企图政治主张实现的。比之投机营利的“立宪派”，苟且偷安的“联省自治派”，无聊无赖的“农村立国派”，想入非非的“无政府派”……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这又是多么可以联合的一支友军呀！

再说到社会化的文学家。可惜此派尚没有健全的代表。现在中国文艺界他们很高傲的标榜什么“为艺术而求艺术”，什么“新浪漫主义”，什么“文学就是目的”，什么“文学是出自内心不为物奴的”，什么“文学是无所为而为的”……。有些是很和柔的标榜“为人生而求艺术”，不过他们的人生，是个人的人生（少爷小姐的人生），绝不是社会的人生。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的文艺界是糟到透顶了。不过我们仍不存悲观，我们也可在其中万中选一的得到一些社会化的作品。我们并看见一些进步的青年作家渐渐儿亦有新的醒觉，或者这个“江河日下”的风气挽转过来亦未可知。假若青年作家能够认清他所处的物质环境和明白他所负的正当使命，痛改前非，极力经营社会化的作品，为社会改造和国民革命的前途尽力，这亦是我们可以联合的一支友军呀！

再说到平民主义的教育家。此派亦无相当的代表。现在中

国的教育，不是教会化，便是贵族化；不是官僚化，便是资本主义化。一般所谓教育家，总只知经营国立的、省立的、官僚立的、教会立的或资本家立的学校教育；他们先前是模仿日本，现在是步趋美国。他们所注意是学校的美观和功课的堆垛，他们所教育的是少爷小姐（现在能够受教育的，至少要有中人之产）；至于“贫无立锥”的劳动者、农民，不管他们人数是不是占全人口之最大多数，不管他们地位是不是社会柱石，不管他们生活是不是困苦颠连到了水平线以下，不管他们是不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生力军，这些都是他们所不注意的。现在也有些青年教育家觉悟从前被人迷惑的错误了，觉悟现在的教育远不如辛亥革命以前有宗旨而于救国有裨益的教育了，颇知改弦更张了。据我所知道的这类觉悟的青年教育家至少有百人以上，如果他们真能实行“到民间去”、“到群众间去”，这又是多么可以联合的一支友军呀！

总而言之：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行为心理学、三民主义、社会化的文学、平民的教育各种思想家，自然各有其大不同之点，但是他们也有约略相同的几点：

根本观念——是唯物的，机械的；

方法——是物观的，实验的；

态度——是进取的，革命的；

效用——是工具的，社会的。

所以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再明显些说，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

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战线不怕延长呀！战期不怕延久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进步的思想家联合起来呵！”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诸位同志们：

兄弟深不愿在本党改造的新运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

兄弟们到广州来，承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绵薄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敬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热诚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的精神。但有少数先进的同志终不免对于我等加入本党致其怀疑者，使此怀疑不能涣然冰释，则于本党改造的新机中，即预伏一种妨害将来发展的危机，此断非吾辈之所愿，想亦非先进诸同志之所愿。用是不能不将我等加入本党的理由，开诚布公的讲出来，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那方在潜萌的危机。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

---

* 这是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刚是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因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诸同志与我们共同担负的。

有一部分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了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的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

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

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所惧我们的才力不胜，不能担当此任，还望先进诸同志不吝指导而匡助之，是我们的欣幸。

总之，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尔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尔其的国民党，于土尔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为

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惟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自今以往，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本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一九二四年二月）

（一）在此次国民党改组以后，为求本党同志与国民党能圆满的合作，以督促国民党切实执行此次全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议定之章程及其他决议案。中央希望全国同志务须明了：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的使命。国民党虽亦曾倡导三民主义，亦曾与反动的军阀势力相抗争，但其内部组织纪律，颇不完密，故使中国的国民革命，不能应民众的需要而早日成功。本党为欲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于本届全国大会已经决议党员加入国民党，从种种方面，督促国民党实践其国民革命的工作。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在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加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他们的党员当中，自然不免有于心性习惯上，未能全改旧日的状态的人，但我们只徐为掖进，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以惹起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制定的。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关于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的附件，载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出版的《团刊》第七期。

他们的反感。即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二）对于国民党此次大会的圆满结果，我们同志不可过于乐观，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统认为他们是所谓“右派”，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无论国民党的旧党员与新党员，他们比较疏远我们，还曾经一二次反对我们的主张，他们不一定对我们有恶意或者是不了解我们的原故，我们不要遽目为右派，把这样的党员目为属于统一的一个派别，因而嫌恶疑忌他们。因为这样，必致惹起他们的反感，促成他们的实际联合。这将不但使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且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些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使国民党不能免左右之分歧。我们应采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

（三）国民党开会时，我们的同志均应按期到会，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这可以表示我们对国民党忠诚的合作亦可以因我们的努力，使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得以圆满的实践出来。但同志们必须注意的，对于国民党员我们仍应设法诱导他们到会或工作；即对国民党不努力的分子，于诱导无效之时，亦不可有嫌恶藐视的态度，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以引起他们的反感。

（四）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或工作详细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收良好之效果。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能尽所

职，引起国民党员都能尽职，使其真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之目的才算达到。

（五）国民党此次议定之宣言书，为国民党精神之所寄托。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此宣言书，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不可听其为数党员仍如以前忽视旧有的党纲一样，使宣言书又成为一种具文，党的活动及中国的政治上不生关系。所以我们须常引起国民党党内党外的人，对于此宣言书的注意。

（六）我们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种机关内，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但我们必须注意下之三点：（1）加入之人，必须选择能干而且适宜于国民党某种工作的同志，使他的工作成效，可以引起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尊重与信任，同时亦可使国民党党务有进步。（2）能力较为薄弱，或不适宜于国民党某项工作的同志，不可轻于使之担任国民党各种职员，以引安置私人与包办的嫌疑，同时亦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3）在时机不相宜时，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以惹起国民党的反感，致妨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

（七）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

（八）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但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

党者，不必轻率加入。轻率加入多数不健全的分子，不仅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且使本党的组织日渐松懈紊乱。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造　党*

——答陈宗虞君

（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

恽　代　英

二十三日信收到了。你说一般留学生在外国学得一份机械脑筋归国，而国内武人专政，工业无从振兴，遂使中国工业人才虽多，终不能有补于国，因此对于蔡元培先生送其子到比利时学工科，北京青年为之鼓舞，你认为不是好的趋向。在这一点，我对你颇表同意。

我不能说中国不需要工业人才，不过我们必须明白承认，在今天这种政局之下，纵然有几多工业人才，终不能找着他们所应做的事。所以结果养了几多工业学生，仍只有用非所学的到学界、政界去做流氓。我所谓“流氓”，不含一点谩骂讥诮的意思，这是这种国民经济下面自然应有的情态。中国非一切事业上轨道，实在没有需用任何种人才的地方，所以一切要等待人家用他的人才，结果非化为流氓不可。

然则最要紧是用政治的力量使一切事业上轨道，所以最要紧是需要政治方面的人才。这所谓政治方面的人才，亦不是需要那些等待人家用他的人才，是需要他能自动的转移政治局面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十一期。

的人才。换一句话说，便是需要能指挥与实行革命的政治家。

说到指挥与实行革命的政治家，我们在什么地方去寻觅呢？中国真政治家便少，有之亦只是我所说等待人家用他的人才而已。中国真革命家亦少，有之则每只以偏急勇悍见长，只是一个打冲锋的勇士，不是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因此中国总找不着一个出头的日子。

我以为要就中国人说呢，孙中山先生恐怕实在要称首屈一指的了。孙中山先生的学说、精神及人格，自然有不少的人与你一样的钦佩，然而他领率的国民党与国民党员，以及他这几年所作的军事活动，亦不少的人与你一样的疑虑訾议的。你的疑虑訾议，我不能尽诿为误解，不过我愿你想，我们为中国革命的前途，除了疑虑訾议以外，究竟亦还有什么积极的意见？

你不曾读《建国方略》，读《孙中山先生十讲》，读各报发表孙中山先生最近的各种演说么？你所疑虑訾议的，孙中山先生何曾不久已自己沉痛指摘出来？他何曾有一分掩饰，有一分回护？他为中国的革命，根据他坚决的信心，奋斗了三十余年了，他现在已经是六十岁的老翁，除了无识的人，谁相信他是为求名或求利？然而他虽然是这样坚苦卓绝的奋斗，一般人不但不肯从积极方面设法帮助他，还只是用他自己所承认不能满意的一些事情，作为讥笑的话柄，我们是应当这样无情的待遇这位老革命家么？

中国的革命，怕不是孙中山先生一个人的事罢？怎样改善一个革命党，怕亦不是可以专依赖或者责备孙中山先生一个人的罢？国民党以前有缺点，这是不必讳饰的事，不过我们若是一个公平的人，亦不应把这件事太看大了。除了国民党，便都没有像国民党那样缺点的大团体了么？什么政党你最满意？或者还说宽一点，什么几百人几千人的团体你最满意？你要知道

啊，俗话说得好："人上一百，种种色色。"凡是大团体总不能像我们理想的那样满意的。我们的批评国民党，未尝不是我们期望太高之过呢。我以为国民党的错误是有的，最大的错误是党的组织不完密，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了解，党员的活动不注意下层的国民运动。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不是国民党已经改组了么？他们不是已经听受了一切社会的劝告，而且把他们的党公开于海内革命的同志，极力谋整顿振刷了么？我们真肯为中国，今天是应当讨论怎样帮助孙中山先生改善国民党，不是仍然专去做那些不负责任的批评。你以为我的话怎样呢？

我希望国民党在中国，要如布尔塞维克党在俄国所站地位一样，这是真的。自然我亦不是希望如你所说的那样的国民党，能站这种地位，我还是希望大家要努力来改善国民党，使他真能担负革命的任务才好。国民党要怎样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呢？不是说他必须要个个党员都怎样成为高尚纯洁的圣人，是说他要成为一个纪律完密、主张明确的党。

中国必须要一个这样的党，中国才有办法；倘若不然，中国所谓改造社会的，将永做不出一点功效。我敢说，现在所谓不党的人，有两种模型：一种便是你，你是"不愿着色彩"的，但你对中国亦全无办法，你只能袖着手批评别人，照这样下去，将来怕只好躲在人家背后，向军阀政客间接谋个生活以终世（假如靠军阀所委的教育官吏或校长，得着一个所谓高尚神圣的教育饭碗，其实亦仍只是间接叨人家的恩泽罢了）。一种便是你所最佩服的王正廷，他是很聪明的，国民党是"乱党"，他们借了分子复杂等话头不肯接近，基督教会是我们的太上政府英国、美国的顺民制造机关，他便不问那些牧师神父如何卑污龌龊，死亦不肯与他脱离。他亦值得你佩服么？他不现在只是曹锟的走狗，他不是办理中国的外交还要到日本去请

训的人么？我愿你还认清楚人啊！这种人亦配说不党，他不是已经将身子完全卖给英国、美国、日本乃至全国唾骂的曹贼了么？

你问杨森在四川战胜了，我作何批评。我的批评很简单：一个没有政治主张的人，无论是谁亦好，他总做不成什么事。杨森只知以武力统一四川，他以为统一了便有办法，然而他不知所谓办法，决不是他所谓提倡教育、振兴实业一套空洞无物的废话。根本说起来，外资压迫不打倒，实业不振兴，民权制度不确立，中国总是有兵匪流氓，亦便总是有战争。无论任何人武力的统一，至多维持到一两年，必然仍会纷扰起来的。这亦是我所以要推重三民主义的缘故。我以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确实不愧为解决中国时局的具体方案。国民党宣传三民主义，引导一切工人、农人、兵士、市民为三民主义而革命，比他眼前的军事运动几十倍的有意义。所以我以为在这一方面，有志改造社会的人，必须用全力帮助他。

你的孤独"老成"的生活，我是不赞成的。你说你想切切实实的干事，果能这样，自然比浮嚣浅薄的人好。但是以你一个人孤立的力量，不协同人家，不提携人家，你能做什么事呢？我们必须靠团体才有力量，必须靠社会，靠党，不然，我们将永远屈服于黑暗势力之下。自然，一个社会或党的中间，一定亦有许多使我们脑疼心烦的事情，然而我要有团体的力量，才可以打倒恶势力，改造恶环境，才可以自救而且救人。你要知道，在恶环境中间，不会能做什么真正的好事。你如相信你曾做了什么好事，一定是你的自欺。最要紧是与人家团结起来，将恶环境改造过。你如能永远保存为一个切实人呢，我实愿你早些决定，加入一种团体，先改造那种团体，再用那种团体去改造环境。这种功夫，最需要切实的人忍耐的向前

去做。

我们必须为中国造一个最有力量的革命党，除了这没有法子救中国。所以你想罢，你对国民党应当怎样呢？你对自己应当怎样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论劳动运动*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邓　中　夏

中国劳动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可说是最近三四年的事。不幸这么一枝刚刚含苞发蕊的劳动之花，却经前年冬间和去年春间几阵狂风骤雨，摧残得零落殆尽了。虽说他的根蒂现在还是孕育滋长着，不免有含苞发蕊以至于尽情开放的一日，但是，无论如何，终不是一日二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了。

中国现在陷于军阀与外力双重压迫之下，不论何人——只要是尚有良心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国民革命"。实行国民革命的方略，经过长期的讨论与考量，不论何人——只要是没有神经病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要"组织民众"。中国的民众，最大部分是农民，其次便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便是劳动者了。所以这些民众都应该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竭力的一齐组织起来。

中国的劳动者的数目，据民国五年农商统计，不过六十一万余人（到现在充其量一百二三十万）。在各民众中所占的数目似乎是很小，似乎势力还远赶不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客观的事实却刚刚与这个结论相反，为什么呢？因为数目虽小，而他在社会里所占据的地位却非常重要，一举手，一投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民国日报》副刊《平民周报》第二号。

足，皆可使社会蒙受极大的影响。你不看吗？香港海员一罢工，可以使欧亚的交通断绝；开滦煤矿一罢工，可以使秦皇岛的轮船都开不出渤海口；京汉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交通隔阻，使军阀胆震心惊。这一类的事实，皆可证明劳动者的势力比任何民众为伟大，为雄厚。凡诚心为争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而实行国民革命的人们，何可不大注意而特注意呢？

这种注意，或者已经成为一般明白事理的革命家的普遍意识，所以在最近的三四年中间，有不少的人从事于劳动运动。不过他们所抱持的见解和所采用的方法，实亦不免于太幼稚太急躁的一句批语。所以几年来的劳动运动皆因此而失败，以至一蹶不振。我们要免除幼稚和急躁这两个弊病，我以为我们抱持的见解和采用的方法都有重新估定的必要。现在就我个人意见，简略说明如下：

第一，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所以“社会革命”、“劳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口号，唱得呱呱的叫。其实这类口号不仅是使压迫阶级见之吐舌而惊，就是劳动阶级亦是闻之掩耳而走。这种高调，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补益哩。原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府状况，以目前而论，实在没有实现那样高远而美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真民主国家，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所以现在凡做劳动运动的人，应把从前那样大而无当的口号暂为收藏起来，把目前切实有用的口号代之，方于实际有益。

第二，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只做两种工作，一是组织工会，一是援助罢工，完完全全是引导劳动者向纯经济的斗争的道路。固然这种工作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不过经济的斗争如

不先得到政治的自由，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等，何能顺利的达到目的？请看这几年内所有的工会解散与罢工失败，哪次不是受了政治的压迫？所以现在有些头脑不佳的人，说："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实在是有损害于劳动解放的。况且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论，我们如从全般着眼，不论任何民众，都应先做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成功了，独立的自由的真民主国成立了，我们的特殊问题才能有相当的解决。所以现在做劳动运动，应视文化之提高和政治之宣传为唯一的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邓中夏文集》刊印。

PDG

列宁不死*

（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李 大 钊

列宁逝世，全人类的损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损失了一个这样重要的朋友，更使我们感伤无已！

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他曾说过："苟能成就世界革命，即使俄罗斯民族蒙莫大的牺牲，所不敢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列宁的精神气魄，何等仁勇！何等悲壮！

这样一位仁慈忠勇献身于全人类的人，在他的生前不知蒙了多少怨谤，被了多少恶名；直到死后，大家才渐渐的认清了他的为人。可见，说出真理者之遭世僇辱，自古已然，而真理之终能昭著于人间，必恒在说出真理者之为举世所谤毁以后，亦几为人类历史上的常例。

列宁为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刊行的《列宁纪念册》。

维持他的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下卷刊印。

PDG

中共中央局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一　组　　织

大会后新增之组织为济南地方会，南京地方会，哈尔滨独立一组，杭州独立一组，成都独立一组。哈尔滨组因受压迫现只有四人，成都因政局变动，同志亦多涣散。解散之组织为水口山地方与常德地方。取消之区为湖北区及上海区、广东区。湖北区取消后，汉口、武昌两地方均直隶中央，惟武昌地方同志极其涣散，至今中央尚未接到地委改选报告；上海区取消后，上海、南京两地方及杭州组均直隶中央；广东区本只广州一地方，亦无设区之必要。将成立之组为香港与青岛，可由中央委任广州济南地方就近指挥。

党内小组织问题[1]，C. P. 及 S. Y. 两大会前后，很引起纠纷，近数月已渐安定，自二月底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发通告以后，此种纠纷现象更完全消灭了。中局现敢保证所谓小组织的结合，确已无此事实，今后同志间绝不可妄启猜疑，致碍党之进行。

---

* 这个报告是陈独秀作的，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

二　宣　传

宣传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应出三期，只出二期；《前锋》月刊应出十期，只出三期；《社会科学讲义》应出五期，只出三期；《向导》尚能按期出版。铁委之《工人周刊》亦未能按期出版。

北京政变时发表之时局主张小册，汉文印六千份，英文三百；去年双十节散发传单五千份；今年“五九”散发传单一万七千份。

关于工人农民兵士宣传的小册，因同志担任起草者均未送来，故至今未能印出。

党报告[2]出过两期，每期五百份。

三　政治运动

自去年七月北京政变[3]后，政局上形成直系与反直系两大势力。自十月曹锟贿选成功后，研究系一部分有反直倾向的即附曹锟，政学系一部分反直的也软化了，段[4]系也有一部分与直系妥协了；只剩下奉张[5]浙卢[6]因地盘关系不便投降直系，大势上尚和广东政府联合在反直的阵地。在直系方面，因本系胜利及曹锟左右亲幸忌妒吴佩孚的缘故，也形成冯王齐[7]联合和吴佩孚之对抗，即吴之旧部鄂萧[8]豫张[9]亦和吴极不融洽，吴佩孚新征服之四川、湖南，内部尚多问题，军事上财政上均不能为吴之助，吴氏在山东之新企图，尚未能完全达到目的。在此形势之下，又加以北京政府财政之奇窘（军费政费共需一万二千八百万元，收入只七百万元，每年入不敷出者一万二千

一百万元，每月约短少一千万元以上），军人索饷之凶猛无情，直系首领曹锟当然没有久握政权之可能。直系倒后，或为吴佩孚拥段和奉浙以图南方之局面，此局面亦不为极短的时期，新的政争即随之而起，因吴与奉张终不能两立。

我们在目前反直的局面之下，固然对于联广东政府的奉浙，表面上宜于缓攻；同时，应提醒国民党国民革命的宣传在奉浙京津尤急于加紧用力，不可误认奉浙真是友军。

我们在国民党的关系，孙中山及其他目前少数左倾分子（国民党中极其重要的人物），尚有意联络我们；其余大部分右倾即不主张和国际帝国主义反抗的分子，则极力明的或暗的排挤我们。我们政策是：（一）向目前的左倾分子宣传，使他们左倾观念坚固不至摇动；（二）向国民党员中工人学生宣传，使之左化；（三）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四）在一般社会做反帝国主义之广遍的宣传，以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此层更是根本政策。

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

四　劳动运动

自“二七”后，重要的产业工人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其未封闭的也只得取守势。自去年“五一”至今年“五一”三十六次罢工中，除水口矿夫及湘潭锰矿运工两个罢工外，其余

大半是手工业工人小规模的罢工。

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的劳动运动议决案是集中我们的力量于铁路、矿工、海员三个运动，且由中局直接指导；路工方面已开始工作，矿工、海员运动，因人才及经济之缺乏尚未能进行。

地方劳动运动，湖南、广东尚能维持前状；已破坏的湖北工团联合会，此时已可开始整理；上海地方亦特设劳动运动委员会着手进行，开会时中央局亦派人参加计划。其详见各地方报告。

山东，在路矿工人运动均为重要，应加派同志前往工作。安源工人中之洪会及合作社两个危机，宜设法救济。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二大以后，张国焘等少数中央委员和工会领导人，对劳动运动和党的工作有不同意见，他们没有通过中央，自己召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指出的就是这种小组织活动。

〔2〕指《中国共产党党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创刊，陈独秀主编。

〔3〕北京政变发生的时间应为一九二三年六月。

〔4〕指段祺瑞。

〔5〕指张作霖。

〔6〕指卢永祥。

〔7〕指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

〔8〕指萧耀南。

〔9〕指张福来。

上海地方报告*

（一九二四年五月）

（A）党内情形

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从全国大会到现在已改选了四次。从前是兼区的，自四月份起撤销了。现在上海地方内部情形，可大略分四项叙述如左：

（一）人数：上海党员中，有有固定职业的，也有没有固定职业的；更或有因别的关系时去时来，所以因党员有一部分属于流动的，而总数遂时增时减。最近以前有党员五十六人，但现在确数只有四十七人，一方面新党员的增加率却也非常迟缓。现党员四十七人中，以职业分述之：学生十三人，工人八人，商人三人，教员、编辑或其他职业的有二十三人。

现在新党员一时实不见增加，其原因大概是：（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惟第一组还很努力吸收同志，其余都消沉濡滞得很。

---

* 这是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

PDG

（二）小组：上海以所有党员，划分五组：第一组在上大有同志十六人；第二组在闸北有同志十人；第三组在西门方面有同志六人；第四组在法界有同志七人；第五组在虹口有同志五人。在最近一月来，惟第一组开了三次会议，第二、三组只开过一次会议，第四、五组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地方委员因轮流参加各小组会议未编入小组。

（三）党费：合计本地方全数党员的党费每月可收一百三十元，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仅三十元。

（B）国 民 运 动

关于国民运动可分三项报告：（一）在民校中之活动；（二）所组织的团体；（三）所参加之运动。

（一）在民校中之活动：执行部方面，如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青年妇女部有我们的同志在内办事，且有任要职者。区党部方面，闸北及南市两处都有我们同志在内主持。淞沪线则有 S. Y. 的同志主持。区分部方面，则有闸北各区及南市之大同职业二区，公共租界之上大、中华书局，法租界之《新建设》杂志社，有的是我们同志所组织，有的有我们同志在内活动。

（二）所组织之团体：有闸北之市民外交协会，南市之市民对外协会及店员联合会。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出对外旬刊一种。店员联合会今已有会员一百六十余人，不日即可正式开成立会。

（三）所参加之运动：加入国土维持会，参加“五一”、“五九”纪念会，发起“五四”、“五五”纪念会。

(C) 工 人 运 动

上海工人为全国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新式机器下的工人比别处特别多，照理自然上海的工人运动应该很可观，但是实际除了几种手工业工人有几个行会外，只有一大批的招牌工会，此外即有一二个工会组织，还是提倡什么劳资妥协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局面呢？上海的工商业发达是外国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展成功的，上海简直是国际共管地，所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最利害。同时上海的流氓也是比什么地方都多(拜老头子的青帮与红帮有十数万人)，并且和帝国主义所设的捕房底巡捕、侦探勾结起来，这些都是工人运动最大阻碍。上海工人比他处（广东、湖南等）更没有组织也是为此。

我们党在上海也算做过几次工人运动（书记部及上二届地方)，但是所做的究竟是极少部分，同时我们所做的工人运动是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众外面的，所以做几次，失败几次，到现在还是等于零，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很大的错误。

现在的情形：

（一）邮差方面

邮差前年为要求加薪组织邮务工会（非我们组织），不久无形消灭。至去年六七月后由我们同志运动组织，经三四月，加入工会有七八十人，进行稍有成绩，但邮局方面也就注意起来，严重监视，同时侦查我们做运动的同志。在这样的时候，那个运动也就不得不停止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去活动过。现在邮差方面仅有 S. Y. 同志五六人，可做我们以后活动的起点。

（二）机器工人方面

我们对于机器工人曾经组织过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还是

前年书记部时组织起来的，做了一年多工夫，加入的人倒有四五百了。但是这个组织很散漫，能召集开会及交费的只有数十人。我们知道这种利害不一致的职业组合要想组织怎样好，实在是不可能的。并且这个组织里面都是广东人，各种工业里的工人广东虽也有不少，但照工人总数看起来，毕竟还是很少数。那广东人因言语的关系，很难和别处工人接近。同时我们也没有人负责去训练他们，所以到现在不过加上四五个 C. P. 兼 S. Y. 同志，并且这四五人连开会和交费也还没有做到。

最近要进行的：

1. 教育方面

我们知道从前的工人运动，都没有使工人自己觉悟，所以这些运动都是外表的，在工人群众以外的，我们现在感觉这些运动，实际上是没有用处。但是照中国现在多数工人的知识程度，现在不能使他们觉悟，那要使他们觉悟，自然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现在我们先将民党办的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努力。已开办的：

（1）杨树浦　学生六七十人，预备分二教室，还可增加多人。此校都是新式大工业底工人。

（2）吴淞　学生四五十人，此校中华铁工厂工人最多，铁路工人也有几人，此外糖厂及杂工。

（3）南市西门内（此校非民党办）　学生五六十人，多是手工业工人，有几个黄包车夫。

（4）上海大学约有二百多人，童工有五分之一。

要进行的：

（1）虹口　虹口住的广东工人很多，都在造船厂、船坞、工部局等处做工，所以工人夜校是很需要的。

（2）浦东　浦东有日华纱厂及英美烟厂，工人二万多人，

此二厂工人曾由我们组织工会，后因罢工失败都消灭，且浦东码头工人也很多，所以也有办补习学校的必要。

2. 改造工团联合会

上海工团联合会虽是几个招牌工会所组成，于工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影响于工人的宣传和组织是很利害的，并且因上海地位的重要，还影响到全国，所以我们不得不竭力想法改组。上海地方已决定在二三月内，组织或恢复十个左右的工会加入改组。

上海处于全国最重要地位，工人至少总有四五十万，就是新式产业下工人，也有二三十万，而工人运动这样没有成绩，这是我们上海同志最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同时我们也要说明：我们同志做运动的经验原来是很幼稚，照目前的情形，就是上海同志个个能努力做事，对于各项工作亦实不够分配。上海是最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而工人群众又是这样庞大复杂，自然决不是少数没有经验的同志所能够做得起来的。我们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同时我们上海也须有一部分同志来学着同做，这是我们上海地方急切的要求，而且是不得不如此的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汉口地方报告*

（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概　　况

自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取消，即改组汉口地方委员会，因汉阳、江岸、徐家棚三处工作均归汉地委管辖，故汉地委的事务，较武汉区委时代，并未减少。近因民党工作开始，并较以前事务更繁，又因地委负责各同志，均有通缉，对于公开活动上，很感困难。

（二）党内组织

汉口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以人数而论，计：

汉口两组共十四人；

徐家棚一组十二人；

江岸一组九人；

汉阳一组八人；

轮驳工会一组七人；

虽共有四十七人[1]，而懂组织与党义的占最少数，同志们

* 这是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

PDG

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党员应尽职责，并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此种弱点固然是同志间的幼稚病，但因为没有开大会的地方，不能使同志有互相观摩砥砺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三）劳动运动

汉口原以劳动运动为主要工作，在武汉区委时汉阳钢铁厂、江岸、徐家棚均组织有工会委员会，计江岸十余组共百余，汉阳约三百人，徐家棚约四五十人，惟江岸工会委员会分子，尽属小工，帮匠也很少，故在工人中能力很薄弱。高级工人其所以没有加入的原因，第一因安徽帮高级工匠反动分子，本地帮即有少数倾向我们的工匠，我们因环境压迫，不敢放心去和他们接洽，俟压力稍减时，还可设法进行。汉阳方面工匠较多，亦因压迫比较和缓，而汉冶萍总工会安源分会，每月拨八十元给汉阳作经常费，人力财力较江岸为好，故能力亦较优。此方工作以工人同志陈春和尽力极多。徐家棚工会委员会原有四十余人亦以工匠为多数，负责分子分两派，一派因李[2]同志在徐工作关系，对李感情颇好人数较多，但观念不甚明了；一派因刘[3]同志在徐工作关系，对刘感情颇好，比较观念明白而人数太少。故此间工作，此时极其停滞，前汉地委决议仍在徐办一所平民学校，请一个有力同志长驻徐埠，负专责进行，惟经费一途，尚无把握。汉口方面“二七”以前工会达二十余个，现在消灭的消灭，即没有消灭的，也不过名存实亡，现在工厂工人组织，只有桥口上的染织工人较有希望。工会委员会，加入分子已达二十余人，以青年工人为多，他如英美烟草工人，数目虽达三千有奇，以女工童工占十分之八九，组织

上很感困难。非工厂工人以人力车夫与运货工人为中枢，运货工人向无团结，人力车与此项工人有密切关系，车夫能够转移运货工人，故人力车夫非常重要。车夫数目约近六千人，原组有车夫工会，为伯高[4]同志主持。自“二七”后，组织破坏，月前由同志们招集十个码头代表会议，到了九个码头，只二十八人，重行改组车夫工会委员会，现已成立，进行上尚称顺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
〔2〕指李书渠。
〔3〕指刘易华。
〔4〕即施洋。

PDG

湘区报告*

（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党　务

总括说来：这半年中，许多固有事业失败了，在失败中，我们的知识却因之增高了。如岳北农会之失败，自修大学及水口山俱乐部之解散，都由于行动过激烈，色彩太显露所致，客观方面固由于军阀势力之不可抗，主观方面，是由同志之不当及执行委员指导之不力。以前我们同志的知识多由书报得来，没有看清中国实际情形，而又色彩显露，致有些同志在社会全不能立脚，以后我们应该注意此两点，不然，怎样知道去改造社会及从何处下手改造社会呢？又以前本党工作几专作经济奋斗，工会之存在完全基于增加工资的运动上面，此后应同时趋重政治争斗。此关于大概的，还有几点，应该分别报告。

A. 小组织问题：去年安源曾因小组织问题向区报告，谓有些同志怀疑本党中尚有小组织存在，其实小组织在两年前，上海曾有此事，已经中局解散，现在并无何项小组织。同志中万不可互相猜疑，应该互相信任，更宜努力工作，从行动上证

* 这是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

明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党员，不要闹无谓的意气。

B. 组织系统与纪律问题：以前往往有别区未经本区同意即在本区行动，亦有本区各地方同志之调动，不报告区委，此实不懂本党之组织及纪律。现接中央通告，以后本区同志往他区及他区同志来本区与本区各地方同志之调动，均应先报告区委决定。

C. 本区党员人数，安源增多，长沙略增，水口山已无形解散，党员应由长地方管辖。安源现有党员六十人，内有候补党员六人；长沙现有党员八十九人，内候补党员七人，在狱者一人，留党察看者一人，不明行止（水口山失败后之一部分）及与党无甚关者约二十人。

（二）政　　治

在此半年中，本区曾经赞助民主革命派之运动及国民革命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之宣传，亦尝组织政治运动委员会，但开会仅两次。本区同志已完全加入国民党，S. Y. 同志加入者，已十分之八。现在中国政治大部分在直系宰制之下，反直派如奉张[1]、津段[2]、浙卢[3]均意存观望，孙中山所领导之军事势力，目下亦难发展，湖南现已在曹吴[4]支配之下，而军人政客尚欲利用省宪以维持其假面具，目下局势，恐无多大变化，赵氏[5]势力尚可维持。本党同志，惟有在国民党中努力工作，从民众中发展国民党之组织，及宣传国民党之党纲及政纲（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以矫正民众的错误观念（如和平、联省、宪法各主张），并引导民众做国民运动。我们之参加国民革命，因为适应中国目前实际情形之政策，同时亦含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因此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

又对于军阀，不必予以同等之攻击，不可落于普遍否认的稚气，当以力求变更现状，为最近之目标，故目前有注全力反对直系之必要。

（三）劳动运动

A. 劳动运动委员会，曾与S.Y.共同组织，但因种种原故，未能按时开会。

B. 手工业工会如缝纫泥木，因财产为总管值年把持，会务毫无发展。

C. 从前未加入工联之工会，现在已加入者，为石印工会。铅印工会，因劳工会关系，尚未加入，不过由工联会暗中主持。

D. 碾谷工会，被政府封禁，并缉拿代表，已无形解散。

E. 水口山工人俱乐部解散，开除工人二千余人，工人在狱者二人，被枪毙者二人。

F. 茶居[6]工会，因生活状况尚优，不能发展，黑铅炼厂因久经歇业，亦已停顿，造币厂俱乐部，现在设法恢复中。

G. 粤汉路，仅在新河办工人子弟学校一所，工会因环境关系，只能维持现状。

H. 人力车工会较好，工人对工会亦有信仰，但所收用费，因开支太大，所存无几。

I. 纱厂自职工俱乐部因甲工系（职员）破坏停顿后，同志潜在活动甚努力，渐渐取得群众信仰。

J. 铜官陶业工会，已开办学捐设学校一所。

K. 工人教育，在长沙仅工联办有学校，工人教育之困

难，在教员难得其人，每不能合工人心理。

（四）会　计

各月收入总数

十二年八	月	一八三·一　元
九	月	二二〇·八　元
十	月	一四四·二五元
十一二	月	一〇三·二　元
十三年一	月	六二·八　元
二	月	三八七·八　元
三	月	六二　　元
		共八一〇·一五元

各月支出总数

十二年八	月	二一〇·三五元
九	月	一八七·二三元
十	月	一八四·〇三元
十一、二	月	一五一·七　元
十三年一	月	一一八·〇五元
二	月	六三·八　元
三	月	七四·二一元
		共九八九·〇七元
两抵不足		一七八·九二元

存中央补助费一九〇元[7]

附：安源地方报告

（一）工会情形：工会各股，以文书股较涣散，工人赌风颇盛，总代表百代表亦不能免，工会禁赌，极感困难。整顿出产问题，由于矿局职员不负责任，也感困难。工会对路矿两局，是取调和的态度，但亦不示弱，对路局多让步，对矿局暗中维持职员中两派（东洋派、西洋派）之势力。工会对内，对上级代表的意见尊重，对下级代表的意见多不理，这是错误的。又工人犯事，每每由俱乐部罚工，因此，工人也不满意。

（二）合作社情形：以前组织不集中，各股各自为政，是无政府的状态。又股本不足，而营业范围太大，价格标准不适宜，每高出市价或比市价更低，价低者被商人贩卖渔利，价高者引起工人怀疑，失去主顾。又营业员多态度直率，也影响于销路。最大的错误，是服物股经理陈枚生欠公款千余元，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人职员毫未发觉，现因此事，大失工人信仰，现在合作社组织已改，较以前有系统，但营业方法，尚待讨论改革。

（三）学校情形：办有六个学校，子弟学校比较好，工人补习班因教员难得适合于工人心理之人才，成绩转劣。以前仅有夜班，因此做夜工者须缺课，现在预备开办日班。又设女子职业学校一所，已在筹办中。

（四）党务：自去年八月后同学已由四十人增加到六十人，组织方面比较有进步，小组会议除俱乐部一组因工作大忙，难于按期开会外，其他各组，都能按时开会。月费去年八月以后亦能按时交纳，以前积欠，尚有未还清者。

（五）洪匪情形：安源洪匪颇发达，工人加入者，已一千余人，此事应由安源同志在工人各种会议中将土匪问题详细提出演讲，说明土匪之原因及其方法之错误与吾人对土匪之态度。即是以教育的方法，纠正工人入匪党的错误，工会并应作广告声明，如有工人犯抢劫者，工会不负保护责任；工会发觉，即捆送官厅究办。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

（甲）同志一律在本党指挥之下，做国民运动之工作。

1. 速组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2. 注意组织各重要县市党部。

3. 湖南国民党，事实上系新造，须注意基础之稳固，故介绍同志须慎重；在最近时间内，有特别注意吸收有觉悟的及有组织和宣传能力之分子之必要。

4. 一切社会运动，如劳动运动，农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外交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概统一于国民党之下；外交后援会，学生会，及平民教育运动，宜避免本党主义色彩将他扩大起来。

5. 办一种出版物，为宣传机关。

6. 国民党对外尚守秘密。

（乙）C.P. 与国民党之关系：

1. C.P. 在国民党中为秘密的组织。

2. C.P. 同志在国民党中宜取得中心地位，但办事宜公诚，态度宜周到，免招包办操纵之嫌疑。

劳动运动进行计划：

一、经济斗争，只在相当时候举行。

二、已成立工会之工厂矿山都须设法创办工人补习教育事业。

三、手工业工会，须特别注意补习教育运动，并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法联络，使得相当的助力。

四、凡有工人群众的地方，须设法创办工人补习教育以为组织工会之初步。

五、湖南劳动运动，宜趋重矿工方面：凡未成立工会之矿山，须有步骤的组织起来……最好能办到公开的合法的组织。

六、凡新成立工会，如基础未定，不可遽令其加入工联；或由工联公开的帮助，免致牵动根本。

农人运动进行计划：

一、一切工作，都建筑于国民运功的意义之上。

二、运动之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不宜自主。即鼓吹佃农的经济斗争，致召中农之反抗。

三、利用旧组织，做平民教育活动……最好推广农村补习教育社的活动。

教育宣传进行计划：

一、小组会议之教育工作，根据《党报》第一号所载中央第一次会议关于教育方法之规定，其纲要如左：

甲、各小组之政治讲演（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各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

乙、各小组之组织原理讲演（以章程为材料）。

丙、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的劳动生活的讨论（以《工人周刊》为材料）。

二、地方执行委员会，每月须召集党员大会一次，讲演时事或主义及本党政策诸问题。

三、推行党之刊物。

四、对外宣传注意立于唯物史观上面之文化运动（如反对

东方文化派，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反对基督教教义及其组织，宣传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及国民运动。

五、参加平民教育活动，以发展农工补习教育，同志宜多去担任平民学校的教员或编辑职务。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指段祺瑞。
〔3〕指卢永祥。
〔4〕指曹锟、吴佩孚。
〔5〕指赵恒惕。
〔6〕即茶楼。
〔7〕原文如此。

PDG

京 区 报 告*

（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党　　务

北京区委，三月八日改组：守和昆孟鸿[1]为委员。区委分工：守委长，和秘书，昆劳动运动，孟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鸿任会计。

北京地方情形比前略好之处：为内部精神之一致；同志皆努力工作；委员会能管理并指挥一切行动。至于组织及训练则还未至于完善。

北京现有党员三十二人（工人同志仅一人）；新加入候补十四人。

唐山现有党员八人（皆工人）；候补二人（系交大学生）。石家庄有党员七人（工人）。

唐山、石家庄皆早已成立地委。惟石家庄现因缺人主持，有等于无。唐山情形颇好。

天津有候补党员四人，党员一人，已成立一组，以树[2]为组长。天津情形很好，S. Y. 地方新成立，市民极活动，纱业工人亦不少，此地颇有发展希望。保定有候补及党员五人，已

---

* 这是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

决定成立小组。此外，山西有候补党员一人；热河一人。全区合计有七十五人。工人占四分一强，余皆学生。

至于政治宣传：《向导》可销八百多份。区委新出一《政治生活》，第一期在京销三千份，重印两千份。现已出至第三期。影响还好。关于反对太戈尔的宣传，除《政治生活》外，又散了几千份传单。李义元案[3]参与中央公园之集会并发散传单。“五一”在工刊上发了一个布告，在京只有一个小集会；但在民党印了四种传单。此外各种政治宣传问题，皆提交民党照办。

二、民党情形

市党部筹备委员会允执行部成立。清查党员千二百余人；现从新登记未完竣。执行部难产之经过，迭经报告，至最近才告成立。

北京小团体林立，然应付得宜，亦不甚成问题。

直隶临时省党部已成立，为我们同志主持，情形最好。河南我们无人。山西缺人主持。三特别区杭同志能主持。

两月中之政治宣传：中俄交涉决裂举行示威运动一次，“五一”、“五四”、“五七”等运动，关于各种政治问题，皆发了传单。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李大钊、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劼。

〔2〕指于树德。

〔3〕李义元为北洋政府士兵。一九二四年四月，他到北京东交民巷附近，准备登城眺望，遭到无理拦阻，引起与康培尔等外国人发生殴斗，被拘禁于使馆界内达一星期之久。随后，英使纠集美、意大使，又无理要求中国政府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公审，并由三国派人陪审。后由大兴县地方法院判李义元四个月零三天拘禁。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各界人士二百余人在中央公园召集国民外交会议，抗议英使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和北洋政府的媚外妥协行径。

山东地方报告*

（一九二四年五月）

自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正式地方会后，党务及一切活动方面，均有发展希望，不意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突有吴案之变[1]，引起当地重大反感，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幸吴案已作结束（以军法判决四年十月徒刑），周围反感渐消，又因民校改组后，进行顺利，于无形中促起本党同志自动的加倍努力，竞争作工，原状已复，兹将一切情形次第报告如下：

1. 本党情形：现住在济南的同志有八人（请假回家二人，病假一人，在狱一人均在内），住青岛的三人，淄川炭矿二人，张店一人，济宁一人，离济者二人。关于开会问题：常月会及小组会，因受吴案影响，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也就是没有房子的原因。关于党费问题：除复同志按月缴特别费三元外，余均四个月未交了。

2. 民校情形：自全国大会后，即筹备改组，最近已成立了临时省党部及济南、青岛的两个临时市党部了。由市党部临时委员共同省党部临时委员办理登记及组织各区分部的事情。现在济南方面划为五区，每区皆有四个区分部以上，人数至多者三十余人，至少二十人，十人，七八人不等，统计将近百

* 这是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

人。至于工作情形，却是与组织并行的，最近的市民运动——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并且在“五四”的那一天由各校学生提议恢复学生联合会，现已推定筹备九人（有民党七人）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预计不久可正式成立。现在官府对民党，因熊炳琦位置不稳以及调换警厅之际，他们对于这些事，也就无暇顾及了。所以民党的活动——如集会散传单等事，差不多是一个半公开的形势。至于其他政党（如省议员），一因党派分歧，组织散漫，一因捧高拥熊东西奔走，因为民党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就不来为仇了。只有青岛有一部分人（其为首者为王静一）单独的反对王乐平个人。青岛方面民党虽有根基，而王乐平不在那里，急切极难发展。至于民校对于本党之态度，分新旧两派，旧的（所谓老资格者）现在对我们感情尚好。新的更是不成问题，简直可说是无所不从，因为我们的势力战胜故也。新加入的党员差不多皆拿我们来作标榜的。现在我们的同志（连 S. Y. 在内），对于国民运动及学生运动所表现的东西，完全以全力纳入民校工作了。至于劳动运动，事实上属于我们自己去办，因为他们和门外汉差不多。现在我们在内努力的结果，很得一般人的信任。最近五月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除“五五”纪念性质稍差外，余皆由民党名义发的传单，并且参与演说者，亦以国民党名义。最近的市民大会皆是民党主动，在市面上却没引起人们的反感，也就是民党在工作上下了工夫！

3. 劳动运动（一）青岛方面：四月有铁总委员为四方工会被开除的四人善后事，赴青埠一次，决定留二人在青埠活动，并由铁总供给其生活费，余二人拟在别处找工作。但最近又接到该地报告云：该四人拟组一商店（工友集资），假此为

活动机关。现在青岛一带如水道部、电灯部、港工……对于该四人极信仰，尤其是沧口至青岛一带之纱厂工友——二万余人，亦信仰其圣诞会及郭某之个人，所以亦有组织的希望。现在青岛恩[2]同志为该四人的秘书，在该会代表会与铁总委员开会时通过的。按现在四方全场工友，自开除四人后，路局压迫日甚一日，以前在厂自由开会，现在如稍一偷闲，被监工人看见，即重罚不贷。现在该厂工作的比较，按路局方面报告，较以前增加两倍之多。所以路局认为压迫手段是对的，愈加压迫了。在工友方面的精神，比较以前觉悟了许多，因为以前太骄傲了。（二）张店方面因受四方此次影响，不得不暂趋于消极，在这消极期间，未免有了错误的地方，铁总委员到该地审查后，来济南责成我负其指导错误之责。遂由我函指该会秘书尤超玄（已介绍为候补 C. P.）到济，改正其错误如下：1. 开会统系及组织皆不完备。2. 该会对于青年工人太重用了（因为实际上的权不在青工手里）。3. 反对工会空气太盛，须设法制服其反动分子，并限期速将此三种改正。现在已得该地报告，认为极大之错误了。（三）济南胶济车房——二百余人，亦因四方风潮，以致将成立之会而未成。现在内之重要分子，就是张店首先发起会的人——赵秀实经路局拨在此地为司机领班，颇得人们的信仰，将来对于全路统一组织，一定是很得力的地方。（四）淄川炭矿，促成工会原因，已报告中央，现在该会已发展至千余人，会费皆能缴齐，其会长为顾炽——浙江人，是一个智识阶级——工业专门毕业，现充该矿画图员，对于我们感情却也很好，但其主张太右了。现在本党决定责成该地同志麟宪二人在该矿扩充民校区分部。（五）济南理发会，进行颇顺利，关于一切市民运动皆参加，并且在济南方面发起了第一次的“五一”纪念

会。会员已发展至二千余人，地面扩充七八县的范围。惟经济一层，因救恤费需用太多，经济无甚基础。（六）济南刷印工人，最近加入民校甚多——十四五人，其活动人物，为C.P.同志一人，S.Y.同志数人。五月一日假理发开一纪念会，开会时并提议组织一俱乐部，决定于七日开成立会，基本会员有六七十人。

4. 学生运动（一）济南方面：因S.Y.沉寂了数月，只可以民校为学生运动中心，现在多数学生在民党中对我们信仰颇好，所以对于学生的事，皆纳入民校作了。（二）青岛方面：由恩同志负责，S.Y.学生同志发展至十七八人，因该地文化不甚发达，又因高洪恩新到青岛甚厉害，所以对五月的几个纪念日，也无甚大动作。（三）青州方面：有三个中等学校——十中，四师，甲种，学生精神尚活泼，该地民校之平民学会甚发达，会员有五十人。最近该地已成立了S.Y.支部了，现在已发展至十数人，最近可有二十余人之希望。该支部之同志已完全加入平民学会，一切活动皆以平民学会名义去作。现在他决定的工作：1. 反对基督教。2. 在学生会活动。3. 到各通俗演讲所演讲，并按期轮流到乡间去演讲。4. 在本校刊物作宣传的文章。中有两个行将毕业的学生，决意要作劳动运动，现在介绍他到张店工会参观过一次。（四）济宁方面：有两个中等学校——七中及中西中学（德国的教会学校），现由候补党员郭同志，在该地作民校活动，并组织平民学会分会，会员已有二十余人。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在济南向银行筹款时被捕。在反动派到处搜捕下，济南的多数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致使党在此地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

〔2〕即邓恩铭。

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

（一九二四年五月）

此次召集扩大执行委员会，有三个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我们在国民党中和在国民党外，做种种复杂的工作，即在比我们强大的党，也很容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何况是我们这毫无经验的党。因此，我们越发感觉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便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

第二个意义是：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

第三个意义是：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党及 S. Y. 在此项工作上都做了种种错误，不可不急于救正。

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是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召集的，全国同志对于他的一切议决案都要即刻努力执行；同时，如有疑义及实施方法，也可向中央局充分讨论。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四年五月）

国民党于第一次大会之后，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渐渐的形成起来，大半是因为我们党员积极的参加工作。然而在这种国民革命的运动里保存阶级斗争的成分却亦因此而更难了。京汉罢工失败后一年多以来，中国的产业工人，尤其是路工和矿工，已经重新倾向自己的阶级组织，要在比以前更扩大的基础上恢复工会。同时国民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并且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劳动平民的利益，将来当然不能一致，他们的阶级性每易趋于妥协，也很难必其能为中国民族完全独立奋斗到底。既如此，国民党内——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让步问题——便发现两派的力量。共产党自然在孙中山及现时愿意实行已通过之“宣言”里的政纲的一派方面。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

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

这并不是说我们立刻要求机械式的开除右派，也不是对于右派之人身的攻击与冲突。我们乃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我们便能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种种集会的时候。

同时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

为达这些目的起见，我们应当了解下列几项，以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方针：

一、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他既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决不能同等的代表各部分的利益，只有反帝国主义和民权主义可以做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斗争的共同政纲。可是也因为这一共同点（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参看《党报》第二期附录《三民主义之意义》），并不能十分联络党员，使他们永久觉得党是他们特殊利益之保护者。同时也因为这一共同点不限于一阶级的性质，虽能影响到中国极大多数的群众，却不容易吸收在这党的组织里。

国民党的性质既然是如此，所以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的有规划的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决不能先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而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亦不能认机械式的组织与宣传鼓动是同等重要的。应当对于国民党证明：一个政党的扩大，只能在经常不断的普遍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宣传及行动的过程里，再则，要不徒托空言，而实际上在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实行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实行赞助工人组织。我们如此的进行

国民党工作，同时就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的最好方法。要达这一目的，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每次不要放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机会，使国民党真正形成代表那次大会（宣言）的国民党。无论怎么样好的组织系统不能代替这种宣传的。

当然，我们当赞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引进思想上接近国民党的分子，然而这不能作为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唯一主要工作；这种工作在国民党正在国内战争中之南方，与国民党当取得同情以备响应南方解放运动之北方，亦不能有同样重要的分量——宣传更重要于组织。

二、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产业工人，尤其是路工及矿工，要他们赞助国民党左翼，我们的政策应当结合他们于经济的阶级组织（即工会）里，再指导他们去帮助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每逢国民党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政府有所行动或表示都加以赞助。这种赞助甚至于可以为国民党的军事利益起见而罢工。同时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右派思想在工人里的影响——这与我们反对其他小资产阶级及反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一切党派是一样的。别一方面我们应当要求国民党赞助工会反对外国的及本国的资本家苛待工人。

三、为帮助国民党取得中部及北部人民的同情起见，我们应当使国民党抛弃反对北方政府为唯一要义的宣传政策——这种政策其结果往往客观上反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并且使南北意见及地方主义格外深入——我们应当使国民党的宣传政策注重反对帝国主义，而指斥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

四、应当使国民党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自己的军队及仇敌的军队都要注意；尤其要注重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的军队。

五、为扩大革命战线起见，必需使国民党注意去调查研究国民党势力与北部及中部的帝国主义报纸上所谓“土匪”的势力相结合及宣传的可能问题。

六、为使国民革命运动深入起见，为拥护广东政府起见，要使南方农民参加国内战争，我们应当要求国民党实行废除额外苛税并禁止大地主对于贫苦佃农之过分的剥削。此外还要武装沿战线的农民——直接与北方军队相接触的农民。第一种方法若能实行，这第二种方法便使农民无形之中直接参加南方的解放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中国无产阶级至今还是全国人民中很少的成分。可是中国最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化的速度，在欧洲大战时以及大战后头几年里很有些增进的现象——因此在几个大都市里及几种职业里产业的工人增多起来。虽然地方辽阔，交通不便，力量不能集中，而在数量上，单是纺织业、矿工、路工、航路上的工人，至少有六十万。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

二、产业无产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必定要和他的组织力同时生长，因此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因此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应当注意铁路工人、矿工及海员。

甲、造船业、铁路、河海运输及矿业里，外国资本的势力最大。组织这些工人，是反抗外国资本势力、反抗帝国主义最真切有力的方法。

乙、将来反抗帝国主义斗争里，铁路、河海运输及煤业工人势力，必定有极重大的甚至于有决定胜负的意义。组织这些工人便是保证将来的胜利。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

这些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产业无产阶级聚集在大生产里，有近代的高等技术，有共同的利益，同样受大资本家尤其是极大的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各方面看来都是工会运动最好的材料——我们必需努力去在他们之间工作。这种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

三、组织之形式

甲、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努力去组织大工会。这种大工会的基本组织就是工会小组，这种小组应按照每个工厂内的各部分去组织（人数无定，如过多不便开会时，小组得分组十人团，但不能误认十人团为基本组织）。全厂各小组代表大会（按每十人举一代表，每小组不足十人时也得举一代表），便是高一级机关，各厂委员会由各该厂小组代表大会选举组织之，至于每一企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全体之大会所选出之总会。我们的党应当特别注意下级的小组，这些小组的性质，足以决定全工会的战斗力。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吸引这一企业（工场，或铁路的制造厂）里尚未加入组织的工人，来出席这种小组的大会——这是宣传工会组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军警压迫很重的地方，也必须教导工人去召集多数人的大会，就算集会几分钟，也是好的，只要趁工厂或官府方面还没有觉察，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干涉镇压的时候，就散会。为召集这种集会起见，应利用种种很明显的压迫事实——譬如工人被殴打，被无理的待遇，以及无理的开除——不管他是不是已经加入组织的工人——都可以做这种集会的理由。在这种集会上，小组的干事会应当预先预备议决案，这种议决案，在几分钟便可以说明，假使议决案能在大会通过，那就可以做更广泛的工会宣传和鼓动。这种工会小组，渐渐建筑基础，留意群众的心理，不要太冒险——使已有的成绩完全抛弃，应当让步的时候，亦可以让步，然而时时刻刻不断的利用种种小机会向前进

行——如此，小组便能渐渐扩大，为着本工厂一切工人的屈辱而发起反抗，他的影响便不限于小组内的工人，而且普遍深入全工厂。

乙、不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应当先组织互助会俱乐部、合作社、普通教育学校或技术教育学校等。这种种机关里，必须先有了可能，才可以开始组织工会小组。工会小组的第一次胜利，在每一企业（矿坑、工场、铁路制造厂、轮船等）里，拥护本企业工人的利益，而能得第一次的成功——那就必定有开展组织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

四、工人的经济组织——工会是独立的，这就是说：要做矿工海员，或铁路工会的会员，只要他是矿工，是海员，或是铁路工人就够了——只要他是一个生产企业里做工的。党籍问题、国籍问题、帮口问题，不应当对于加入工会或在工会里的地位发生影响（党及工会应在工人中打破地域和帮口观念）。工会的责任是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扩大他们的眼界，使日常的斗争问题，都和工人最切身的利益联结起来。譬如工资、工作时间（每日的时数、每星期或每月的日数）、每星期的休息，人道的待遇等，这样日常的争斗，应发展而且能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

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成真正的阶级组织，真正的阶级斗争的学校，亦只有这样，我们的党和工会运动才能有思想上的联结。至于党与工会的组织上的联结，那就应当经过工会里的共产党小组，这种党的小组，直接受党的某一机关指导。

五、国民党也和其余的政党一样，都是要想取得政权的——必定想影响北部及中部的铁路工人及矿工的工会运动，国民党这种工作的成败，要看我们党的行为怎样，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

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各国的先例很多，不仅止此，在中国的情状看来，更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力量减杀。

我们的党，对于国民党的最好的帮助，在工会运动方面并不是帮助他设立国民党的铁路工会及矿工工会，或者使已成的工会全体加入国民党，这可以使工会沉溺在国民党里而失去阶级的性质。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最好的帮助，却是先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于每次用得着的时候，指挥这些工会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

此外，国民党还有许多手工厂的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及工商业的职员，可以做很广泛的行动的基础。我们党的能力现在很有限，很不容易在这几种民众里有很大的工作；而且这许多民众里，大致都适宜于用国民党的宣传。一方面不妨碍阶级斗争，一方面帮助国民党组织店员及手工业工会，对于巩固及扩大国民革命运动很有意义。

关于这些工会的组织形式，大概可以说，手工业组织应当依职业为标准；店员可以以地域为标准——假使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店员联合会之下组织各种分部（烟草部、衣服部、鞋业部等）。

六、我们的党必须进行海员工会里的工作——这是运输业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经过国民党整理海员工会使成一有组织的群众工会。同时我们应当在海员里发展党的小组，只有共产党的工作有相当的成效时，海员工会方能成为无产阶级组织。

七、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种

产业工人，尤其集中在上海。我们的党在纺织工人里曾经进行组织，都失败了。当然是因为种种困难的情形，不能进行工会的工作，第一便是大多数是女工。然而纺织业内的屡次罢工，往往有很激烈很一致的行动，可见我们底工作的基础已经有了。

八、为执行这种工会运动里的职任起见，我们底党应当有下列的办法：

（甲）中央委员会工农部内应特设一工会运动委员会，指导上述的各种运动，并负切实调查劳动状况之责任做成统计。

（乙）每一地方委员会之工农部，亦应特设一工会运动委员会专管工会运动，执行中央工农部的命令。负工会运动责任的地方委员应当和当地各工会里的共产党小组发生经常的联结关系，供给他们以定期出版物、传单等，指挥他们。

（丙）因为中国地域很大，路工、矿工散处各地，所以必须特派巡行各路矿的人员，使中央机关熟悉一切消息，同时便做工会运动的指导员。地方工会运动委员和中央的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每月或每次工作的成绩须向中央报告。遇必要时中央得召集全国或某区域之工会运动委员和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开工会运动讨论会，审查过去成绩，并规划以后进行的方法。

（丁）中央机关报里，工会运动也要占第一等的地位。

（戊）各地宣传部应当常常注意当地工会运动里的需要。

（己）我们的党应当竭力介绍同志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经过这种国民党的工人部影响到阶级斗争的发展而筑成统一的工人战线。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S. Y. 工作与 C. P. 关系议决案*

（一九二四年五月）

我们的青年运动，在过去的经验上看出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 S. Y. 的工作和党的工作未能分开。这个缺点之原因：（一）是同志们忽视了青年运动本身在社会改造上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在第三次党之大会以前未规定候补党员制度，各地方委员会对于倾向本党或办事有能力而意志尚未坚定者，虽年长亦只令加入 S. Y.，以为候补察看地步，遂使 S. Y. 组织不明显，实在是党的错误。此种错误并及全国地方，在安源及长沙尤为显著。（三）是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敷分配，并且因上述第二原因有些地方只有 S. Y. 组织而无 C. P. 组织，S. Y. 之中又有许多成年团员，遂不得不令 S. Y. 担任党的工作。其结果，一方面因为工作相同，使 S. Y. 日渐党化，于党的工作统一及直接指导上发生障碍，政治运动方面与工会运动方面都是如此（譬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组织）；一方面因为 S. Y. 容纳多数成年分子，缺乏青年情绪，不能代表青年本身利益，因此与青年群众隔离。

我们已看出这个缺点，及其所必至之危机，不得不采行左列救济诸策：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

一、S. Y. 各地方应速吸收二十岁以内的青年，下届全国大会应修定年龄，至多不得过二十五岁。

二、已过 S. Y. 法定年龄的团员，应由 C. P. 地方执行委员会会同 S. Y. 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此项团员，于三个月内尽量加入 C. P. 退出 S. Y. 。

三、C. P. 同志在 S. Y. 担任职务者，须经 C. P. 之认可，其既经担任 S. Y. 之工作，非特别需要时，经 C. P. 中央或地方委员会之指派，不得兼任 C. P. 工作。

四、S. Y. 应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例如在工人中做青年工人教育、宣传、娱乐、体育及其他关于青年工人本身利益之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工会及其他工人运动（在青年工人之中应注意去宣传阶级组织，已经有工会的地方可在工会中组织青年部，S. Y. 并且应当为青年工人组织体育会及娱乐部等）。在农民中做青年农民教育娱乐等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农会及其他农民运动（因为工人农民的运动是 C. P. 的工作，不是 S. Y. 的工作）。学生多在青年时代，学生运动可由 S. Y. 专任之（至于一时的政治示威宣传，乃属一般的市民运动，各地方 S. Y. 应在 C. P. 指导之下参加之）。

五、在目前最短之过渡期间，如有特殊情由于事实上必需 S. Y. 兼任工会农会及其他工人农民运动者，此项工作必须受 C. P. 之直接指导。

六、S. Y. 应以青年本身运动为中心工作，参加政治运动次之，参加国民党组织工作更次之。

七、S. Y. 现在工作大部分是学生运动，此后 S. Y. 必需渐次动员全体团员，做普通的平民教育运动，尤其注意乡村，以图扩大 S. Y. 与群众接触及宣传之机会，此项运动为 S. Y. 目前重要工作之一。

此外，S. Y. 因客观情形，既为共产主义的团体，不能集引学生及手工业的青年群众（他们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心理不能集中到 S. Y. 旗帜之下），所以应以 S. Y. 为中心，就各地方情势，组织各种公开的普通青年团体，以便扩大青年运动，以便 S. Y. 得与各地的青年群众接触合作。至相当时期，更宜联合各地方各种青年团体，成一个全国的统一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我们的党，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总职任及对于幼稚的产业无产阶级之训练和集合其群众的职任，要求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在宣传和鼓动方面是如此，在党务组织方面亦是如此。

我们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里工作，而这一政党的性质——根本上便有组织形式上的浮动性，对于我们自己的党也就有大影响——因此我们自己的党更要有非常之明显的组织形式。

二、产业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北部及中部之铁路矿山，大工厂的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表示阶级的觉悟——我们的党在这些工人里便有扩大自己的基础之前提。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中国人民普通都在发展民族的感情，然工人更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必一定要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及民权运动的斗争里，工人阶级虽然可以得着初步的权利，而不能得着阶级的解放，即以民族解放论，工人阶级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

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因此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愈发达，则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必愈扩大。民族解放运动中渗入此阶级的性质，这个运动才能格外深入，才能增加他的革命性质。我们的职任，便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同时这就是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的方法。假使上面的原则，我们的党不能充分了解，那就会失去我们党的基础，而且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亦没有正确的观察。

因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唯一组织。此次扩大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们的党及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如此，认为以前我们虽然没有阻滞工人进党，却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因为我们的党过分严守，闭关主义，便使许多工人同志留在S. Y. 之中——其实照他们的年龄，已经不能在 S. Y. 了。为着使工人容易进党起见，所以照章只规定三个月的候补制度，努力去征求铁路、矿山、工厂里的工人。应当立刻从 S. Y. 之中把二十八岁以上的工人收入我们的党。

为履行种种职任起见，党的组织应当采取下列的形式及办法：

（甲）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管理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之兼职得互换之）。地方委员会对于在当地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负指导的责任——凡在国民党工作之同志都应由地委指派。为

增进某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

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

（乙）小组的工作除教育党员征求新党员外，还应当常常在工人群众里做宣传的工作。必须按照章程，凡有可能时从地域的组织进于产业的组织，学校及工商企业都在内。

中央的各部之中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为运动起见，中央的各部得从任何机关里征调最有力的同志。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且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种研究会不要纯粹由智识阶级分子组织。中央工农部应当添一两个工人办事，进行工会的宣传并指导各地方实行组织工会小组（基本队）——在上海以及其他城市无产阶级之中，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工作之处。

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再则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划。所以中央必须特别设一个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以七人组织之，其中四人必需在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只对中央全体大会报告，遇有必要时，更可以向全国大会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应当是真正工作的集合体，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第三次大会的国民运动议决案里曾经说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

中国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而政治上便是一种官僚军阀任意凌虐农民的景象，因此，农民经济破产得不堪言状，而农民变成失业游民的速度非常之快（民国三年有五千九百万农户，民国七年只剩了四千三百万户；民国三年只有荒地三亿五千万亩，民国七年便增加到五亿五千万亩）。

农民破产的速度既然如此之高，城市里的苦力工人便大大增加，竞争剧烈，工资低落；别一方面，军阀都利用他们来做炮灰（兵士），同时便造成掠夺乡民的独立的武装失业农民（所谓土匪）。

二、帝国主义是这种现象的罪魁——和其余一切中国劳动平民受苦的现象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应当对中国人民负责的。帝国主义经常的惹起中国政治上的纠纷破裂，贿买军阀，用财政经济上的压力扼制中国的生产力——交通、矿业、工业及输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三号。

入输出的国际贸易关系都是如此，于是运输那些欧美没有销路货物到中国来，使中国的生产不能发展，尤其是农民的手工业受他的影响而崩坏。

三、我们底党知道这种种因果，使国内行政的分裂叫农民的利益范围不出一县，至多不过一省。所以应当指导农民对切身利害的地方性质问题的奋斗，同时我们亦就应当渐渐的做全国问题解释，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制度的必要。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的同意（农民会），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的主张（乡村自治会）。

四、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租。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工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五、国民党政府的领域之内，除上述的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借贷之苦。

六、为实行上述的种种宣传起见，应当有下列的办法：

（甲）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做总的政治宣传的时候，特别预备对农民的通告，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口号。应当开始选派宣传员到乡村里去。

（乙）地方机关应当常常注意地方范围内的农民问题，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宣传口号——无论哪一种农民运动起事的时

候，立刻应当响应，特别为这种问题发传单，派人到当地去指导。

（丙）要求国民党做经常的有规划的农民宣传，印送鼓动农民的图画（花纸画片）、幻灯等；广东应当出一种农民周报，沿战线□乡村里可以张贴“壁上新闻”。

七、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小的C. P. 小组织。除此之外，必须印发关于兵士利益的出版物，最好是这种出版物上有我们队里的同志，记载军界生活的新闻消息。这种出版物，不必一定是定期的，再则应当时时向兵士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

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划的宣传，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要求国民党做这件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

——答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君

（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

周　恩　来

近两月来，《先声报》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文章，我现在总起来作一次解答罢。

第一，瑞图、樵甫、威重三君所共同反对的是瑞图君所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奋斗，而他们同时又保着他那不明了半共产主义者的丑态，便未免过于滑稽”。共产主义者为做他共产主义所能解释，亦正三民主义所解释的国民革命工作而加入国民党，滑稽何谓？共产主义者是兼信合于共产运动在中国的第一步革命工作的三民主义，有何不明了，有何“半”字可加？瑞图君真是“甘心盲目”、“发昏”、“骂人”！你还是主张“全民革命”的人，试问“全民革命”能离开无产阶级么？因为觉悟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必然地要信仰共产主义，便拒绝他们加入“全民革命”队中，则你只有专找那必然要信资本主义而口中讳言资本主义的有产阶级为伍了。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

第二，我之所谓决不是三民主义所能左右，也不是共产主义所能改变的，乃是说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分子合作，便是没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自然不会没有的——这个实际依然存在，故说不是主义所能左右改变。而三君竟误解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则谁也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应受三民主义所左右所改变——”，“既不是三民主义所能左右……就应该从实际有利益方面着手，暂时不要谈主义”，“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是为三民主义所左右，是共产主义的改变”。谁左右了谁，谁改变了谁，这要看实际情形始能决定。假使今日之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加入国民党后，抛弃共产主义不信，或忽视了无产阶级的最后敌人——有产阶级——不管，而后方得谓三民主义左右改变了共产主义者，但仍与共产主义无涉。实际是如此么？三君虽愿意我们上此圈套，我们却决不“甘心盲目”、“发了昏”、“走错了路”。至“不要谈主义”，是樵甫君说的。为要解决政治经济纠纷，时时会有主义名词出现，不过共产主义是包括政治经济全部的改革工作就是了。若要不谈主义，除非不想解决政治经济纠纷。樵甫君连一个主义如何发生的常识都无，还来讨论主义，算了罢！

第三，瑞图君问我“既谈三民主义不足济将来阶级斗争之穷，又何不直接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与威重君所说“但共产主义的主张明明是‘阶级革命’，明明是‘打破私有制度’，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周君是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国民革命’呢”为一话的两面。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

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

第四，填写信奉三民主义志愿书的事，三君也都大惊小怪，认为大不了的事。其实你们只须问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后，是否真心干国民革命。假使你们找不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现时没有干国民革命的证据，你们便无理由谩骂我们“发了昏”、“违背良心行动”、“被人家强迫”，“一时发昏”去填志愿书，因为三民主义原是指导全国民党人从事国民革命工作的。离开“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在现时何所依附？我们讲信实，只是问干不干。若是说信了三民主义，便不许信将来政治经济组织还须经一度改变，信了便违背了绝对服从之律，则谈爱国主义的胡国伟君，持极端国家主义的曾琦君，更绝对不可信将来世界会有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了，因为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多是背道而驰的学说。但他们偶在文字言谈中露出此意，我以为尚是他们受经济压迫的自觉之征呢。

第五，樵甫君谓“凡有革命性的党派和个人都可联合在同一战线上，但不可混合”。这原是与曾琦君同一鼻孔出气的主张，不值得同志林蔚一辩。只我要告诉你的是：国与国的军事共同行动，因言语、国籍的不同，只能做到统一主帅；党与党的革命或政治的共同行动却可做到加入。党与国原不是纯然一物不可类附，况加入国民党的并不是共产党，乃是共产主义者呢。若论党史，则英国共产党人之加入工党，英国工党包含有数个政党，美国共产党人之加入劳动党，土耳其共产党人之加入国民党，何一而非你们所谓的“混合”？樵甫君，请你多知

道点这类你所谓“党人史中的笑话”罢。且加入之利有：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消弥某些部分人的目前部分利益的争执；训练统一，步骤一致，不复有时同时否的阻碍；号令集中，指挥自如，易于杀敌。除这些外，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这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特负的使命了。威重君说我们应“立刻退出第三国际的地位”，何其见之小啊！

这些都是从我在《赤光》第五期上所反复说的“事实不可假借，一部分事实不能代表全体，死脑子不能理会流动的事实”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辩证出来的，请你们要仔细理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刊印。

PDG

革命中学生应持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萧　楚　女

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除了革命没有第二条生路可走。大家都知道中国今后的革命必须建筑在民众的基础上。大家都知道在目前能负这个使命而且负到民众间去的，只有我们青年学生。然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于一般民众，究应持一个如何的态度呢？

我们要晓得中国的民众，在他们底生活上，他们并不是还没有感觉着革命的必要，而且他们也并不是不能去干革命。他们目下所差的，只是还没有了解革命可以予他们生活上以切实的幸福之保证。我们所应从事的，便是在怎么样使他们得到这个了解——换句话说，便是怎么样使他们信仰他们所望的好生活，只有革命能够给他。要做成这个功夫，那就须把革命弄得处处都在他们底生活上去着想。我们革命，要是为他们而革命。革命的中心，要是民众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从前一般革命党，都只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革命运动，都只是在那里发泄他们那知识阶级的不平。他们尽管抽象地引了许多学说，论那什么宪法、民权、共和，实际上一点儿不与一般民众底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他们就从兴中会时代一直闹到最近的国民党改组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三十五期。

以前，总不能在民众中间得到真实的地盘。所以他们底革命，革来革去总还是个不成功，而反惹得人民嫌恶。人民所需要的，只是“和平与面包”。真的革命，只是个“胃的问题”。我们今后应该切实地钻入民众间去，研究他们底实际痛苦是些什么？他们所希望的何在？什么东西才是他们所以感觉着必需革命的？恽代英说：“倘若我们能有一个切实的方法——可以马上把一切物价减低下来的——提供于民众之前，以为革命的保证，则民众之乐于革命，勇于进前，当较我们过之百倍”。并云：“民众所望的只是这一类生活上的切实东西，他们所以至今还眼巴巴地希望着‘真命天子’那个奇迹，也无非是为了他可以给他们以马上可以兑现的好的生活”！这话，实在是一个“中国底革命哲学”之结论。我们倘若每个人——每个做革命的酵母的青年，都集注精神于这个态度上，切切实实一步一步地做去——一面为学校中的青年运动，以吸合更多的同此见解之同志；一面为农工运动，去使一般民众肯定他们底命运与革命的必然关系，则中国的革命，实在只是个有把握的十年八年便可成功的事。中外古今的历史都曾教训过我们，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革命，不是这样地起于人民底实际要求，不是这样地成功于人民底生活迫切？我们只抱着这个原则好了！无论在校内校外，我们只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便得。自然关于社会改革之学理的方面，我们还是不可便尔丢去——但我们总当一反从前那种不问那为革命之中心的人民如何茫然，如何勿需，而只唱自己的二簧的态度。我们现在应该去顺着民众唱那为他们所能领会的小调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总是应该的。现在国民党底三民主义，在他底政纲中

是业已具体地表示着了——民族、民权、民生，是我们从事于革命的立脚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整理耕地、改良农村组织，那更是针对人民需要的实际问题。站在这样的一个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旗子之下，认定了这样的一些社会问题，去切实地以民众为中心，对于民众表示着“我是为他们而革命”，而且还叫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亦只是为自己而革命——我不是一个革命的知识者，我只是一个革命的“你们民众底仆人”；这便是我们革命中青年在今日所应持的唯一态度！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陈　独　秀

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中，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对此最重大的意义，实有了解的必要。可是现在尤其是将来实际动作时，都会竟不了解而陷于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必得详细解释一下。

第一，就国民党的主义上讲：此时任何政党党纲，都论列到社会的经济政策，可是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前造端时即注意到民生问题，这是受了德法两国劳动运动的影响，而后进的中国国民党遂有此特色——和民族民权并列的民生主义。什么是民生主义？简单说，就是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生计问题，不是说解决全民生计问题。因为全民中富有的部分，当然不劳国民党锦上添花为他们来主张民生主义，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乃为着劳动平民雪中送炭，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的生计，国民政府之经济政策及农工立法，尚在将来，眼前急需的经济组织（工会农会）及日常生活之改善，乃解决劳动平民生计之最小限度，国民党对于此类最小限度的劳动运动若不实行援助，则民生主义的理论及保护农工利益之党纲条文，便都是不兑现的支票。各种主义的党派，对于劳动运动之性质与内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七十一期。

PDG

容及劳资间的关系，虽不同途，而于最小限度之经济组织及日常生活改善，则殊无二致。若并此最小限度而否认之，则已无劳动运动之可言，这是军阀阶级的主张，提倡民生主义的国民党当然不能如此。若恐怕参加此等最小限度之实际运动有赤化的嫌疑，这便和军阀官僚们把一切工会运动及罢工都当做社会主义或过激运动是同样的无常识了！

第二，就国民党的组织分子上讲：有人以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若出力援助劳动阶级，岂不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合作的同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错，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正为他是合作的党，便不能只代表哪一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应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应该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必如此，才有各阶级合作之可能。国民党若恐怕援助劳动阶级，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资产阶级之同情，但是不援助劳动阶级，不怕违背劳动阶级的利益，失了劳动阶级之同情吗？国民党若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利益，若只珍重资产阶级之同情，那便是一个单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不是什么各阶级合作的党了。要他合作，却不顾及他的利益，现代的劳动阶级未必还是这样可以愚弄的罢！国民党既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应该的。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有拥护之道，就是应该站在民族及民权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站在“反民生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详言之即是：破坏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一是外人制我工商业死命的协定关税和外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第二是军阀官僚之战争及厘金等苛税阻碍工商业。因此，国民党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惟有厉行民族主义反抗掠夺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者，和厉行民权主义反抗紊乱中国政治及财政的官僚军阀。若不努力于此等奋斗，转向穷苦的劳动平民，要他们多做点工

少拿点钱，以弥补资产阶级被外人及军阀官僚所掠夺的利益，此种“杀穷人起家”的办法，不但不合天理人情，而且在此半殖民地状况的中国，即尽杀穷人也不能起家，因为劳动平民无论如何牺牲，比起资产阶级所受外人之掠夺及军阀之损害，不过九牛之一毛。因此，我敢说：国民党若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简直没有理由。何况他是各阶级合作的党，不是单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更不是和绅士们相依为命的陈炯明。我曾在《国民党与资产阶级》一文中，说明国民党的革命是于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益的，劝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国民党，因此有班朋友们指责我，说我轻蔑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其实我在那篇文中并未如此说，因为我始终希望中国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此时他的组织分子上也实际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这班朋友们不愿意人轻蔑国民党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很对的，可是若同时恐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倒现出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来，这却不对了。我们现在所用“各阶级合作”这个名词，应该要知道这名词有两个重要的解释：（一）是各阶级合作，不是各阶级合并，因为阶级是不能合并的；（二）是国民革命之政治的合作，不是劳资妥协之经济的合作，因劳资两阶级在经济上没有能够合作之共同点。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若不将这两个合作之意义解释清楚，在实际工作上必发生无穷的纠纷与困难。

第三，就国民党革命的战斗力上讲：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在埃及、印度、爪哇、菲律滨等国民革命运动中，劳资两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更是眼前的明证。中国又何独不然！由工人农民群

众，而商联会与学生会，而总商会与教育会，这三层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总商会所代表的，又应该分资本家和财阀两派，中国此时财阀的力量更大过资本家，若新旧交通系，若京沪银行业者，若香港广州的富商，都属于财阀派。他们是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军阀官僚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们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国民党，固然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而也应该看清财阀、资本家、小有产者（学生、小商、小农、小手工业家等）、工人农民这四个阶级当中，哪个阶级能够供给他更多的革命战斗力。国民党若是看轻了工人农民，若是恐怕参加劳动运动得罪了财阀和资本家，若是觉得财阀和资本家不但比起劳动者是绅士，而且比小有产者更有力量，若是相信财阀和资本家能帮助国民党成功，一味交欢他们，因此便不敢和劳动阶级接近；如此，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力必然要衰弱下去，革命的色彩也必然要淡薄下去。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党，不用说，他的党纲，他的行政，都应该努力于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对内对外的战斗；但同时，万不可忘了更有革命战斗力的是更向下层的阶级，尤其是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更万不可牺牲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来维持资产阶级之利益。因为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运动，中国之国民之解放运动，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总观察上，在估量国民革命运动全战斗力上，都知道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不应该为任何次重大的意义而牺牲他。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六大以前》刊印。

PDG

农村运动*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恽代英

什么人最便于做农村运动？——假期回乡的学生们，与乡村的小学教师。

（一）要在乡村的人做乡村的事——所以回乡，或在乡间做事的人最好。

（二）要本乡的人做本乡的事——所以本乡学生假期回乡的最好。

（三）要乡村中比较重视的人做本乡的事——所以读书人或教师最好。

为什么要做农村运动？——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觉悟了，才能督促而夹持革命的势力。

（一）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是民众的一大部分。

（二）农民终岁勤苦耕作甚至不能供养妻子儿女，所以他们最应当渴望革命。

（三）农民倘能为他们的利益而渴望革命，他自能运动兵士（兵士便只是他们的父兄子弟），督促他们使不致懦怯，夹持他们使不致卖民众，以完成革命的工作。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三十七期。

PDG

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主因——农民不知渴望革命，甚至厌恶革命。

（一）工人是有势力，然而人数少了。

（二）资产家与知识阶级每是怯懦而自私的，所以他们不愿革命，或不愿为民众利益而不妥协。

（三）游民兵匪比较勇悍，然而为自己利害，亦易于卖民众。

农民不知渴望革命，是宣传的材料与方法不合当。

（一）只知用讲演、演剧或办学校等方法，不肯与农民为个别的亲密的谈话，或给以实际帮助。

（二）不顾乡村风俗习惯，每以态度言语等细故，惹起农民的反感。

（三）不顾农民心理，专好说些打破迷信、改革礼俗的逆耳之言。

（四）不顾农民兴趣与知识程度，说些宽泛的大事或枯燥的理论。

（五）不娴熟农民的语言，用了许多他们不易了解的名词与成语。

（六）不了解农民真正的痛苦与要求，说的话搔不着痒处，所以不能激发他们。

今天的农村运动最大的意义——不是鼓吹宣传任何事情，亦不要鼓吹宣传任何事情。

（一）联络农民的感情——这是宣传农民最重要的条件。与三五家作朋友，帮助他们或他们的子弟、写信、写契约、教书、教唱歌、教拳术、教体操、讲故事、自由谈话等。

（二）研究宣传农民最合当的方法——从与他们对谈中，学习他们的名词与成语，研究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知识程度等，以决定农村宣传最合宜的语言与态度。

（三）研究宣传农民最合当的材料——详细而切实的研究农民真正的痛苦与要求，以谋发现农村运动最有力的口号。

注意农民——特别注意青年农民！

普通农民似乎是无革命性的，这是由于：

（一）农民无相当的教育，每为安分等邪说所迷惑，以为反抗压迫是罪恶。

（二）农民自己无团结，又无外界援助，故不自信有反抗的力量，而谓各种苦痛为天命。

（三）成年农民感情薄弱，且受痛苦压迫既经多次，渐麻木不知感觉。

所以用教育或游戏体育等事，将血气旺盛而初受压迫的青年农民团结起来加以训练，这是我们运动成年农民的链锁，而且亦是我们农村革命的主力军。

今天到乡村去，决不要说革命、反抗，乃至一切新奇可怕的名词。去结交农民！去团结农民！去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农民！

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

暑假农村运动成绩表（见下）

<table>
<tr><td rowspan="2">所交结的农民人数姓名</td><td>成年</td><td></td></tr>
<tr><td>青年</td><td></td></tr>
<tr><td colspan="2">最有效的联络方法之心得</td><td></td></tr>
</table>

续表

农村运动态度上应注意各点之心得	
学习农民言语的心得（农民土语请用国语解释）	
农民的问题应注意他们对于各种苦痛来源的解释，及已经或希望用何种方法抵抗。	农民对于自身生活以为苦抑以为乐？ 农民是否感百物昂贵抑希望彼之生产物涨价？ 农民是否感税捐繁重抑仅地主有此感觉？ 农民是否感受派款派公债痛苦抑仅地主有此感觉？ 农民是否感佃租苛重对地主憎恨反感？ 农民是否感受拉夫痛苦？ 农民借款时是否感受高利痛苦？ 农民是否感受典当业或代当业高利痛苦？ 农民是否感土地资本缺乏的痛苦？ 农民是否感自身与子弟不能受教育的痛苦？ 农民是否感无相当娱乐事业的痛苦？ 农产物生产量是否逐年减少？ 农民是否感受官吏压迫？ 农民是否感受劣绅压迫？ 农民是否感受收买农产品行商之剥削？ 农民是否感受兵匪的痛苦？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李　大　钊

同志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

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此中国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国民运动应该是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又反对中国军阀。首先，我们谈谈外国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然后，再谈谈国民运动的发展。

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到极点。我来谈谈几个最重大的事件。

一、张家口的卡门事件。美国商人卡门同美国驻张家口领事勾结，企图从该城为中国投机商走私运出六万银元。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必须对他进行搜查。卡门抗拒搜查并开了枪。

*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举行了三十一次会议。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做了这篇报告。

中国士兵则开枪还击，致使卡门受了致命伤。于是，美国大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结果，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五万元，并惩罚了一些官员。

二、汉口纺织工人事件。英国纺织厂约有三百来名工人因组织工会被解雇，三名工人代表被捕。被解雇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被英国军队驱散。冲突进一步扩大，有许多工人受伤。接着，英国军舰也出动了，威胁要轰击城市。三十三名纺织工人被捕，其中三名领导者被英国驻汉口领事判处监禁五个月，其他人被判处监禁两个月。

三、法国金法郎事件。由于义和团起义，中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为一亿五千四百七十万九千五百八十二两。因法国法郎贬值，法国政府要求中国用黄金，而不用纸币法郎交付欠款，这样便形成了五千五百万两的差额。法国人已争取到北京政府对此事的同意。原来反对这样做的议会，因得到政府贿赂，现在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四、旅顺口和大连。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已从沙皇俄国转到了日本手中。一九二三年租借期满，但日本拒绝归还这两个城市，因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一条规定了重行租借。

五、临城事件。这一事件最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特性。去年，有一群土匪，为给北京政府制造外交上的麻烦，在临城袭击列车，劫走了一百名中国人和二十名外国人。英、美、日、法、意等国大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情况特别紧张，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乘机取得对中国铁路、航运和财政的控制权。外交团要求：1. 赔偿每个被劫持的外国人八千七百元；2. 组织由外国军官指挥的护路队；3. 撤销山东督军、驻军司令、铁路警长等人的职务。这些要求激起了人民

的抗议，但总统曹锟为取得外国列强的承认，竟满足了这些要求。

六、棉花出口。外交使团强迫中国政府撤销出口棉花的禁令。北京政府无视华商抗议，竟同意了这一要求。

七、烟草消费税。英美烟草公司利用中国烟叶在中国制造卷烟免交消费税，因而中国人民每年损失二亿元。各省当局打算征收消费税，但北京政府因该公司抗议，禁止征收。

八、广州的关税。广州国民党政府为使广州的关税收入不致被北京政府侵吞，开始自行征税。为了对此事进行报复，英国派了二十艘军舰去广州，要求取消关税。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和人民的示威，这一要求未获满足。

九、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帝国主义列强已达成协议，要建立一支由十一艘英舰、十艘日舰、八艘美舰、六艘法舰及两艘意舰组成的长江联合舰队。目前，列强仍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同意此事。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实。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北京政府完全被他们所控制。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汉同志签订了条约，帝国主义者们并未停止其挑拨离间的活动。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行径不断增加的同时，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国民运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同志正在领导这一运动。起初，国民党人只力求借助武装力量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但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打倒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由集中的政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

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派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改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二百名代表，其中我党同志占百分之二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由于我党党员和左派的共同努力，而得到贯彻。"左派"同"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防他们反对我们。我党的一位同志发表了声明[1]，阐明我们对真正的国民革命所抱的观点。孙中山也发言专门谈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代表大会奠定了建立集中组织的基础。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我党同志占八分之一，在候补委员里占十七分之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对内政策方面：

1. 普遍选举制；

2. 集会、出版、言论和信仰自由；

3. 用外国列强交还租界地收入消除盗匪活动；

4. 制定劳工法和保障劳工团体；

5. 改良农村组织，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6. 交通运输由国家经营管理。

对外政策方面：

1. 取消同外国签定的有关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及外人在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条约；

2. 不承认不负责任的北京政府所欠的外债。

代表大会之后，国民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国民党员分赴

各地。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在各处积极进行工作，在南方是开展合法工作，在北方则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南方的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

五月一日汉口举行了纪念施洋同志的大会，施洋同志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被枪杀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和天津市举行了游行。广州有一万多人参加游行，孙中山还发表了演说。当北方政府在外交使团的压力下拒绝同苏俄缔约时，国民党在北京组织了游行。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而且还宣布了戒严。这一切都证明国民党开始领导群众了。

但很快反动势力就抬头了。北方政府慑于国民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开始对其采取镇压手段。五月间，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破获，因此有五人被捕，其中三人是我党同志。他们后来被吴佩孚枪决。随后，北京很快又有五人被捕，其中有我党北方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张国焘。被捕者囚禁在军事监狱，但未向他们提出任何公诉。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我党同志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不久前，国民党发表了反对反动派的宣言。我们的秘密工作在继续进行。

最后，我想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派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势力而受到极大阻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

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李大钊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声明。

PDG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

恽　代　英

在共产党员经过长期辩论，决定了加入国民党以后，国民党内部于是发生了容受或者排斥共产党员的问题。为了这个问题，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有人提议禁止党员跨党，想以强迫脱离共产党的条件消极的阻难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到了现在，又有些人责难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占据了国民党的重要地位。为了排斥共产党，甚至于印刷传单，秘密开会，凶殴党员，闹得像煞有介事的样子。

对于这一件事，我愿意发表以下的意见：

第一，国民党倘若认定了他自身对于国民革命的使命，倘若认定了他自身应当提携全国进步的民众以从事于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今天革命势力还很薄弱的时候，正应当多向各方面活动联络，本不应当有排斥共产党不使加入合作的道理。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交谊如何，今日诚无从断言，然而便令将来或者两方面有不能合作之一日，这究竟是将来的事，在国民革命未成功以前，便闹什么分家问题，未免太早得很。

第二，国民党倘若定要排斥共产党人，亦不是绝对不可以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四十一期。

PDG

的，不过至少国民党为了这样，更要自己认清楚自身的使命，更要加重些自己的担子。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为什么革命？为谋广东军政界地盘的扩张而革命么？为拥戴孙中山先生个人而革命么？倘若是这样，那便与南北一般不顾民众利益的军阀有什么区别？我们只知道三民主义是为全国民众谋利益的，孙中山先生与他所统率的国民党，是为全国民众的利益而奋斗的。然而现在一般排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居然会说出共产党员要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妥协，这是破坏国民党。然则自认国民党是对帝国主义妥协，对军阀妥协的政党么？果然如此，那便与头发党、马蜂党有何区别？拿这样立脚点来排斥共产党，那便无异自己证明他们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什么都闹不清楚了。

第三，国民党纵然要排斥共产党，亦只好就这些确实已经名隶共产党籍的人使他退出国民党，至于对于那些明明是纯粹国民党而略略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乃至那些明明是纯粹国民党而仅仅主张容纳共产党合作的人，没有因为排斥共产党的原故一并加以反对排斥的道理。然而现在那些主张排斥共产党的人，把一切反对他们的人都指为共产党，又立一些共产派、准共产派的奇异名目，欲为一网打尽之意。因此，不但一般思想比较清醒进步的青年都被目为应排斥的共产党员，不但邵力子先生被指为什么共产党的副委员长，便是与孙中山先生多年患难相从的汪精卫、胡汉民先生等亦曾被指为共产党。这显然可见所谓排斥共产党不过是他们威胁异己的一个武器，根本便是要扫灭国民党中一切比较进步的势力罢了。

第四，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由是很显然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时代什么产业状况之下都可以实现的。他们的大师马克思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学者，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大生

产业发达以后必然的趋势，然而亦只有大生产业发达以后才能够达到此境地。共产主义并不像一般唯心派的乌托邦论者，他们并不相信在中国未能打倒外资，发达自国产业以前，有任何方法实现他们的主张，所以他们因为热心祈求他们主张的实现，还是不能不希望外资的早早打倒，自国产业的早早发达。因此，他们认定了眼前最大的急务，是尽力与国民党合作，而且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势力于全中国民众。这中间虽然动机是与纯粹国民党不同，然而他们对于国民革命期望心的真诚，恐怕不是那些靠国民党招牌以自营利益、自植势力的浪人政客等所可望其项背罢！

第五，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并不曾禁他们跨党，亦并不曾要求他们将党解散，那便他们这些议案与纯粹国民党员在党内另有小组织的完全不同。而且，便就国民党员所获得他们的议案印成小册子的而言，他们并没有一句话要引导国民党做不应当做的事情，他们无非告诫他们的党员要谦慎和平的与国民党员相合作，应多做切实工夫，少作无谓争执。像这样的话，亦可称为是破坏国民党的证据么？他们为促成革命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不能不尽力使国民党的内容更充实更进步，然而这样都居然会不见谅于少数国民党员，他们不但认这是破坏国民党，而且在他们在南方大学秘密开会时所发的传单，更在小册子原文以外自己加上一些煽惑一般国民党员的话头，又写上许多“注意”、“大注意”，似乎表示共产党人要督促国民党实践国民革命的工作，要设法与国民党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通通是大逆不道的样子。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还是一句骗人的话呢，还是真有这个决心？倘若真有这个决心，会怕人家督促自己做这种工作吗？会以为人家有这种督促是侮蔑了自己吗？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

第六，共产党人需要与一种国民革命的势力相联合，他不能不注意到十余年为国民革命支柱奋斗的国民党；然而他不能笼统的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国民党的明达领袖，确实是真诚勇猛为他们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他们的言论行为都表示着他们坚忍不挠的精神；然而一谈到他们党的活动，却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这样的原因是很易知的。有少数老资格的党员，因为他们思想与年龄一同老大了，所以他们失却了少年时的革命精神，不知不觉的倾向于苟且妥协的方面；而另外一般偶然归到南方势力下的政客官僚，他们本来做梦都不知道革命是一回什么事情，在他们的脑中，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只是一个骗人幌子，实际只是与头发马蜂等党一样是争饭碗的东西。他们这样的人与这样的思想占据了国民党内部，于是实际上国民党几乎没有法子与那些私党分别了。然而这是不足以污损国民党的。孙中山先生等百年如一日的少年精神，曾经屡次为要刷新国民党内部而改组国民党，这一点令一般共产党人明白国民党终究有代表国民革命势力的可能，所以终究认定了有他们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完成孙中山先生等志愿的必要。他们加入国民党，是根据于他们的要促成国民革命。那便国民党只要一天还真有志于国民革命，在他们自身方面，终是要加入的。实在说，只要国民党一天不变成完全像头发马蜂等私党，共产党终不肯放弃国民党方面的工作的。你便明白的排斥他们出去，他们为了促成国民革命，终究不免要秘密的参加进来。他们总要帮助国民党，督促国民党，早些完成国民革命

的工作。除非国民党真个不做国民革命的工作，把广州一隅自认为与奉张[1]浙卢[2]一例的事了，然后共产党才会死心，设法另谋创造国民革命的势力。

所以本于上列的各种理论，可知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他们的加入国民党而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这是不足奇异的事情。为国民党计，倘若是真心要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呢，在今天没有惧怕或者嫉忌共产党人的理由。共产党在今天，任便有什么神通，他们只能做成国民革命。然而利用他们帮助与督促的力量，国民党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正可以早期完成，何至于因为他们的帮助与督促，反会有什么亡党之痛呢？

然而在根本并不要革命的那一部分国民党员，他们的思想方式完全是两样的。

他们自己不作革命事业，人家要求帮助他们时，他们说这不是亡党了么？于是不但共产党人来帮助他们谓之为亡党，便是纯粹的然而进步的国民党员来了，亦谓亡党。醒醒罢！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存在的。倘若国民党根本忘了国民革命的使命，这才是亡党呢！我们还是祝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指卢永祥。

PDG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诸同志：

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

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应作之事如左：

（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右派重要的错误是：

（A）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

（B）反对中俄协定，并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

之敌；

(C) 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

(D) 纵容江门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

(E) 排斥共产派。

(二) 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 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四) 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五) 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项组织，必须个人加入，加入时，必填写入会愿书，万不可团体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数量之增多，而应注意质量之明确，当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此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但此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接到此通告，应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此项通告对外严守秘密。

委员长　T. S. Chen[1]

秘　书　T. T. Mao[2]

一九二四、七、二十一

PDG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2〕即毛泽东。

PDG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适当努力，只有是暴露其实在性质及关系于国民之前，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的战乱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奴服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唯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一对时局宣言，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此项文件，现已在印刷之中，不日即可寄发各地。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至活动态度，应一律依本通告及宣言所指示；此外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党纪律论。

委员长　T. S. Chen[1]

秘　书　T. T. Mao[2]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2〕即毛泽东。

PDG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

然而短视而又懒惰的国民，总喜欢在国民革命以外，费尽气力试用各种药不对症的方法，考验的结果，至今只有空言和平免战，结局仍旧移家逃难丧失生命财产，别无办法！

在直皖、直奉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安福派及奉张完全失势，在表面上似乎是中国政治上进步的现象，实际上却不然，因为打倒安福派与奉张并非由于人民的力量，乃是由于另一部分军阀曹吴背后挟着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当时国人迷信曹吴，以为借重他们而国民自己不费气力便可以达到统一和平的希望。殊不知世界上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军阀曹锟、吴佩孚和帝国主义的英美勾结为患的局面之下，只有去统一和平更远。因此，我们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全国革命分子结成联合战线，继续民主的革命战争，以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军阀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唯一的道路。

曹锟、吴佩孚眼见国民很容易被他们欺骗，得了政权以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

后，反动的局面日益严重起来：迫压北京知识阶级；以武力及阴谋扰乱川、湘、闽、粤；惨杀京汉罢工工人；驱逐他们自己所利用为傀儡总统的黎元洪；至此，直系军阀之罪才为国民所认识。此时，国民依旧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找不出第二个像以前所崇拜的吴佩孚，遂转而出于消极否认及国会南迁等懦弱无能的办法，即避开革命的办法。因此，我们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由国民党或人民团体出来号召一个国民会议，开始以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来解决一切对外对内的政治问题。

直系军阀，腐败政党外交系及帝国主义者，都看破中国国民懦弱无能，遂敢于沆瀣一气，进行中外古今所稀有之公开的贿选。曹锟贿选成功将近一年以来的成绩是：

（一）承认列强临城案的要求，以为列强承认贿选之交换条件；

（二）力谋承认威海卫案、金佛郎案、宜阳丸案，以取得帝国主义者的援助；

（三）利用赵恒惕、杨森吞噬湖南四川，暗助周荫人、陈炯明扰乱闽、粤；

（四）因袒护贿选议员，命捕安徽全省学校学生数百人，并累及其家属；

（五）向外商进行津赤、烟潍、沧石三路借款；

（六）在天津购买意大利军械，价值五百五十万元；

（七）吴佩孚派人强提胶济路款，以充由广东降北之海军军饷，并滥提盐款，强截捐税，种烟贩烟；

（八）解散胶济铁路工会，并逮捕及开除工人多名；

（九）因拥护曹党私人北洋大学校校长冯熙运，直隶省长派出保安队，包围学校，驱逐学生，逮捕学生代表；

（十）曹锟的妾舅任意殴伤铁路人员，曹锟的卫队任意打

死警察；

（十一）在汉口、郑州、石家庄逮捕工人杨德甫、孙云鹏等七人，在北京逮捕张国焘等五人，均未宣布罪名；

（十二）禁止学生着白色衣白布靴走过新华门，禁止北京戏馆唱演《捉放曹》、《打鼓骂曹》、《徐母骂曹》等戏；

（十三）接受日本公使的照会，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五七”、“五九”开会纪念国耻；

（十四）容纳列强干涉中国商标之要求，商标公报用英文，商标局聘外人为顾问，对于李义元、陈魁元[1]及英舰炮击万县等案之丧权辱国；

（十五）办理德发债票案，国库损失至少三千万元，收回前存伦敦拟付德债之款，悉作军用；

（十六）重禁京沪所出多种新书新报；

（十七）为办金佛郎案，纵令王克敏迫孙宝琦去职；

（十八）向美国购运大批军火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又购德国军火三百五十大箱；

（十九）力持以造路名义攫取各国退回的庚子赔款；

（二十）纵令齐燮元兴师攻浙。

此次齐燮元兴师攻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说简单的齐卢[2]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其战争之实际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

我们不可迷信中国的军阀真有独立作战之可能——倘有此可能，已应有一个军阀主义的独立国家。每次内战都有国际帝国主义争斗的背景。国际帝国主义者，欧战后以英美法日四国为其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关系：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只须保守其既得权利已足惊人；与英争霸欧洲大陆的法国现时工业状

况，中国虽还不是他必以死力争的市场，然而也不是可以忘情的肥肉；在中国竞争最烈的乃是欧战中骤然膨胀的美日两个帝国主义者。因为种种的关系，法国与日本站在一边，英国与美国站在一边。日本是帝国主义中之最幼稚者，还有结托中国统治阶级以政治的支配达到经济的侵略之必要；美国是侵略中国之后至者，全中国已没有他回旋的隙地，所以也必须援助一派军阀，树立他在中国政治的势力，以倾覆他在中国经济的敌人——日本。华盛顿会议美国给日本第一次大打击，直皖、奉直战争，美国给日本第二次大打击，自此以后，美日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我们当已看出。此次直系兴师攻浙，乃是美国给日本第三次总结束的打击。

贿选前（去年五月），美公使曾到保定府和曹锟接洽最高问题；贿选前（六月），美总统哈丁表示美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的意见；贿选成时，美使首先称贺；列强为曹政府以武力制止广东政府分取关余时，美国最出力；直系爪牙赵恒惕将失长沙时，以炮舰拒谭[3]助赵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天津给吴佩孚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厦门给直系军队的也是美国；和齐燮元进行导淮借款的也是美国；美国扶助直系是不可掩的事实，此次助直兴师统一中国（不只是对浙），乃是结束一切可与日本接近之政治的势力。

这次战争的爆发是与美国国务卿休士赴伦敦所订关于处置中国之密约（见本月五日路透电）有直接关系；而于英国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广东商团以图推翻孙中山之举尤足证明。我们再看战前直与反直两方之财政与军火的准备：英美赞助曹吴解决德发债票外，英福公司与吴佩孚订定的道济借款为百五十万镑，美公使替该国商人与吴佩孚做成的军火买卖为步枪一万支子弹二千万颗，机关枪二百五十架，而吴佩孚的飞机队完全由

美国人替他组织与训练，并且与苏齐进行导淮借款。日法军火之输入奉浙，最近张作霖向法商订购快枪三千支，子弹六百万发及其他军用品若干，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奉浙飞机队之发展显然法国人为之主持，故上次法飞行家杜氏来华，备受奉浙之优待而遭齐燮元严厉之反对。至于张作霖与日本之秘密交涉，也不下于曹吴与英美。到张作霖与日本订约，任其在满洲取得三十年租借权，以换得军火与财政之援助；而齐燮元于宣战时更向美国宣言下沪后任美国在沪设立无线电台。故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乃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

在开战的两方：直方于数省人民水灾待救不遑中，大兴排除异己之师，残害人民，自然是此次战乱之罪魁祸首；浙方虽宣布讨曹而非反直，实际上当然是反直战争。反直战争，在目前政治现象上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事势，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救国卫民的战争，其理由：（一）在逻辑上，只有反国际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争，可以全称肯定他是为国为民，至若“反直即是为国为民”，我们实未能加以承认；（二）军阀自身的性质与环境，在客观上亦无由实现他为国为民的余地；（三）在他们政治的行为上，一向连为国为民的倾向也没有，出兵宣言中虽然抬出抽象的正义与民意，直军讨伐安福奉张时，更说得词严义正，自来口说无凭。所以此次战争，我们只能承认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只能承认是帝国主义与军阀重苦吾人民之较前更大的惨杀。

因此，我们可推定此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我们对于前者固深恶痛绝，对于后者又岂能欢

迎！无论前者后者，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惨痛都是有加无已，内部战争屠戮人民牺牲人民的惨痛也都是有加无已。第三，假若双方势均力敌胜负不分或直系形势大有不利时，则野心勃勃的美国帝国主义必然发起干涉中国内政，以图达到共管目的，其形式必然是勒令双方听命于列强强制的和平会议之下，组织买办式的商人阶级与军阀阶级暂时混合统一的政府，而根本剿灭广州和全国一切革命的进步势力。然而即使成功这样的局面，也是暂时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与各军阀之间不久仍要因利害冲突而争斗，不过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便要因此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

所以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一天，即军阀与战争的惨痛存在一天。我们要解除这种惨痛，固然不是空言哀求和平息战可以得到，也不是依赖何派军阀战胜可以得到，更不是希望阴谋构成中国内乱以达到其垄断或共管目的的帝国主义之干涉可以得到。人民若希望此次任何一派军阀之胜利，只有蹈直皖、直奉战时希望吴佩孚得胜之覆辙；若希望什么“友邦”出面干涉，只有步印度、安南之后尘！我们对于双方军阀不能存丝毫希望，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尤不可存丝毫希望，这种希望不仅可耻无效，而且要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凄惨更加危亡。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全国被压迫的人民！你们看呀：外国帝国主义刚刚构成这次内战，同时他们在华盛顿与伦敦之间便发起（由美国发起）干涉中国内政，采取强制号召各势力派和平会议的方式来亡中国。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呀！亡国的惨祸是由这次外国帝国主义构成的内

战临头了！你们尚可希望军阀给你们以“正义”，帝国主义给你们以“和平”么？起来！起来！

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屠杀人民供外国帝国主义利用的一切军阀！

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陈魁元有误。当时报刊上与李义元案并提的有陈国贤、刘魁元、陈贵元三案。一九二四年二月，陈国贤被控在丰台指挥工兵打伤英国人贝赛尔，英国大使到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由英员到军事审判处观审；六月审判中贝赛尔不能认明陈国贤，判陈打人罪不能成立。一九二四年四月，英人威德比违章漏税，强行登车离开，北洋政府税警刘魁元等前往阻拦，被威德比打伤；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英使援李义元案来严惩凶犯，并准我国派人观审。一九二四年六月，汉口浅田一二洋行日人打伤贫民陈贵元等三人，日本领事不严惩凶手，引起中国人民的抗议。

〔2〕指卢永祥。

〔3〕指谭延闿。

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高　君　宇

中国军阀的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利用。

直皖战争的时候，站在直系背后的是美国，站在皖系背后的是日本；直奉的战争所表现的国际关系，亦系美国与日本的对垒。帝国主义之所以各扶助一派军阀，并不是有深惠特爱于某一派军阀，乃是要借所扶助的军阀之胜利与发展，造成外国在华优越的地位。果然，两次直系战胜之后，日本在华势力大受打击，美国的势力却如春草着雨的一般猛烈发展起来。这次江浙战争，我们又可看出帝国主义正在玩这样惯用的而且比前更毒辣的把戏！

这次江浙战争，不仅是江浙两军阀的战争，而且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帝国主义站在直系军阀背后的，自然仍是老主顾美国；站在反直系军阀背后的亦仍是日本。同时，因列强现下国际利害的关系，对于这次战争，英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日是依同美国扶助直系，法国是依同日本扶助奉张[1]浙卢[2]。以价值三百万元的军械供给直系的是美国，与苏齐[3]进行导淮借款以助直系战费的亦是美国，在洛阳替直系设飞行机械厂是美国人博治亚，对江浙战争袒护苏齐的又是美国机关大陆报；美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

国帝国主义是明目张胆的帮助直系战争！在日法一边，亦有不少帮助反直系的证据泄露于外。最近法国各运一船军械与奉张浙卢，现在奉张又有向法人订购飞机之举，同时奉天方面飞机师大部是法国人，浙江方面的则是与法国有深远关系的俄国白党分子。单举最近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无日不在各扶植一派军阀，供以金钱军械及战事人才，以从事不断的战乱。帝国主义者制造，再加上军阀们的地盘竞争，这军阀的战乱自然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了。这次江浙战争，不过是这样产生的战乱的一种罢了！

这次战争的初步结果，如果江苏军阀胜了浙江军阀，美国自是要助直系军阀统一中国，造成新银行团的宰制；如果浙江军阀胜了江苏军阀，则是日法助段[4]张统一中国，造成安福再霸的天下。但是现在的美国，不至如直皖、直奉战时那样迷信吴佩孚统一的能力罢？日法更不敢那样希望曾败于直系的张段罢？最近列强对华的政策，大概可于下列电文中看出：

路透社五日华盛顿电：莫斯科消息，俄外交部之罗斯坦氏今日称，俄国现注重中国之事务，不欲恝然置之。吾人现有充分理由怀疑当美国务卿休士氏驻伦敦时，列强已有关于中国之协定，此举筹议已久，惟美国直至中俄协定告成后始决定意见。吾人现信美国已放弃开放门户政策，决计在华划分利益区域：南方属英，云南属法，满洲属日（记者按：华北当然是美国的范围）。日本参加协定一层，尚未明了，惟满洲之某项动作，可表明列强已许日本占领该地。罗氏又称俄国现拟反对列强之计划。罗氏否认中俄条约中含有秘密条款。

美国这几年的政策，是帮助直系统一中国，建设所谓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造美国独霸之局。现据上电观之，是美国此政策已有变更，改门户开放为瓜分；也可见列强不一定各自信

独占之局可以马上造成，因要改取共同分割的政策了。所以他们对于此次战争，必不信任和忍耐静待已派军阀之完全胜利，要借战乱来干涉中国政治。此种倾向，英国方面尤为热心，可于下列二电文见之：

（一）九日伦敦电：每日电闻报外交记者探悉，伦敦与华盛顿间现正对于列强联合的行动，以恢复中国和平与秩序之问题。众料此种时局，当可得英相麦克唐纳尔之立即注意。

（二）又同日伦敦电：每日电闻报宣称，某有力方面现正努力提议，邀集中国战争各派势力开和平会议，解决中国内政上的困难，并为中国建设一"不集权的联邦政府"。此次计划希冀成一十分稳固的政府，俾银行团得以投资改造中国。（译《大陆报》）

据上二电看来，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已显然是要借口此次战争，来造成实际管理中国的局面。其号召的方式，又是上年何东爵士玩过的把戏！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内争来图实现他们灭亡中国的阴谋，自然不是一下子突骨露锋就拿了出来，必然要利用一些亡国奴心理的中国人，也必然要经过一些纡曲可欺骗中国人的方式。但是眼前已有一件事实，就是帝国主义利用此次战争要扩充上海租界。且看京电：

（一）英、美、法、日、义五使，因淞沪划作中立区域（记者按：实际就是扩张上海租界），沪外商及领团来电坚持，已向外部强硬要求，并云如不允行，各国届时为保卫侨民计只有强力实行。外部遣秘书询使团中立区范围，据称租界及附近，又吴淞黄浦口水陆三十里为限。（八日）

（二）使团根据沪侨请愿，拟乘机推广租界，以华民争入租界不能容纳为理由，将开使团会议，再向外部提出。（九日）

爱国的人民们！帝国主义一方面扶植军阀，造成中国定期

的屠杀与战争；一方面又利用和借口中国之混乱，以加增其奴役我民族的地位；这是世上何等可愤恨的事情！我们受屠杀战祸的人民，不但要拿此次战争做眼前的材料，使我们了解军阀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祸害，他们存在一天，中国就一天不得和平。而且要觉悟，一切哀求的方式是不能损及他们的毫毛，只有是我们组织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把他们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同胞们！中国除了国民革命之外，还有第二条救解的道路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指卢永祥。
〔3〕指齐燮元。
〔4〕指段祺瑞。

PDG

商团事件的教训*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蔡 和 森

这次广州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组织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在广州各机关之职员；领袖这次叛乱的是陈廉伯、陈恭受诸买办；公开的袒护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武装调停”廉价拍卖革命政府的是范石生、廖行超诸军阀；而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之间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

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以把持广州兵政、市政、财政诸权利，这是自从设立广东政府以来公然不可讳言的事实。这次事变的罪魁陈廉伯不仅是汇丰银行的买办，而且是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广州市党部之职员。这次主张罢市反抗孙中山最力的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及西关各大商店的经理职员以及陈恭受等，莫不尽是国民党右派的党员，至于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辈之属于右派更不待说。所以这次一面是英国帝国主义打击中国革命运动，一面是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

国民党右派之必然的趋于反革命，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

外国帝国主义要根本破坏中国的革命，单从外部施以压迫还是不够，必须培养一支反革命的势力于革命党的内部，这支势力便是国民党的右派。

所以这次事变的教训：第一是证明国民党右派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第二是证明雇佣一些军阀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过早的设立革命政府之失策。

全部政权的取得是革命党必要的目的，但在革命形势还没成熟以前——即本身在民众间的势力还没成熟以前，是不宜于亟亟掌理一部分的政权或建立偏安一隅的革命政府。不幸中山先生竟然采用了这种过早的政策，由是显然暴露下列各弊害：（一）广东政权之取得，并不由于革命势力之完成，而是由于利用根本与革命相反的军阀、财阀的势力，所以广东政府不仅不是革命的工具，适足成为雇佣军阀、交通系政客、买办阶级以及升官发财的右派之狐城鼠社；（二）党员对于政权的争夺早已根本毁坏了革命的目标与精神；（三）雇佣军阀以养寇纵敌为长久敲诈军饷之法宝，军役不停，苛税繁重，因而引起人民对于革命之反感与不信任；（四）全力用于毫无结果的军事行动上面，党务以是在民众间的发展完全因而停止；（五）苟安于香港英国政府的炮舰政策之下，不仅不敢发展国民革命的宣传，而且时常要受内外勾结的威胁，如这次商团事件便是证明。

这种不幸的政策不仅可使革命完全破产，而且危及于中山先生个人之生命与人格。军阀的工作是拥兵敲钱，右派的工作是争权夺位，而老头子[1]的工作却是打前敌当炮火！军阀是利用革命做买卖，反革命的右派是利用政权做生意，而老头子遂常常的被强迫而成为他们的商品！

我们为挽救革命的破产计，为爱惜中山先生个人计，都希

望中山先生在受了这次奇耻大辱的教训后，不仅要毅然决然与英国帝国主义宣战，而且要毅然决然抛弃以前不幸的错误政策，澄清党内右派反革命的法西斯蒂！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陈独秀。

PDG

我们的回答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陈 独 秀

我们因为有促进中国国民党的必要，而以个人的资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似乎于国民党革命的倾向只有进无退，然而正因此惹起了党中一部分党员之误会、攻击。他们不但是口里攻击，还用白纸黑字写出，我们遂不得不简单回答几句，以免社会上有人在误会上又加以误会。我们在此处仅仅是答复他们的攻击，至于他们自己的言行，是否真算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他们党中是否有更反动的反革命的言动，则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以内，所以不必提及。

我们在答复之先，须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根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指责国民党任何党员，开除国民党任何党员，这都是正当应有之事；乃并不依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具体的指责国民党党员某某个人，而竟抽象的笼统攻击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并且因此攻击到在国民党之外的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根本错误。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

话！若主张不肯脱离共产党的人便不许加入国民党，则虽另再召集一次国民党全国大会，取消前次大会准许共产党党员跨党的决议便得，何苦以有用的光阴与经费，发行许多印刷品，不是攻击帝国主义与军阀而是攻击我们！

以上是提出他们对待我们的根本错误，以下是分别回答他们的攻击。

一切道路传说、报纸记载及个人的谈话与书信且不涉及，现在只取《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这三种印刷品为他们负责的言论。

他们共同的唯一口号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他们所谓破坏国民党的证据、铁证，都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七号团刊所载《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中，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各种工作中我们同志应努力工作"，"使其（指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这类文句，如果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议决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分》的导言上说："国民党主张凡赞成革命的都应一律欢迎入党；共产派则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以成就他们的势力。"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哪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他们已否忘记了国民党宣言上"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

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他又说：“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主张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共产派则主张劳资斗争，惟恐国民党对劳工运动有调和的倾向。”劳资斗争是社会进化上一种不可免的革命现象，主张劳资调和是一种和缓革命的政策，无人能够相信不革命的调和政策可以平均地权，可以限制资本，世界上哪有这样好说话的大地主与资本家？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后再运用政权以实现三民主义；共产派则处处宣传，叫已觉悟革命的分子往田间去。”国民党固然应该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试问这武力要建筑在什么基础上面？若建筑在已有的军队上面，退一百步说，即令能用他取得政权，也断然没有能够运用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试看现在的广州政府实际上能管理军政财政吗？广州一切政治有一件能根据国民党的主义或政策吗？若要建筑在“国民革命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的原则上面，“往田间去”这个口号，当然不违背国民党的大会宣言。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共产派则主张民族自决，首先就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国民党大会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

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据此宣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却实不是单单自求解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且郑重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做那导言的人，如果真是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确有细心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若是自己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哪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那导言最终又说：“总括他的意义，可以看出以下四个要点：

（1）一面说赞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一面又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

（2）其中措辞，未免有些污辱纯粹国民党党员的人格；

（3）他们集合许多人们，成立一个共产党，但对于政党道德未免太不讲究；

（4）他们破坏国民党的步骤，第一多拉无产阶级入党，以建筑他们将来的基础，第二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三即或革命成功，纯粹国民党员已无能为力了。”

关于第一点，所谓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不知所指何事？若是指反对帝国主义使国民党伤了列强的感情，以后不能安住租界不能亡命外国，则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回答，且亦不必回答，因为国民党大会宣言上早已回答了，国民党孙总理最近又代我们回答道：“中国欲免为印度埃及之续，必国民合力铲除为革命成功大障碍之帝国主义。”若是指我们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是破坏国民党的左军；我们不相信任何派军阀真能为国民革命的左军，退一百步说，即全说是左军，也只是一时军事的联合，决不是主义上政见上的妥协。若说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即是全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那么朱执信便是

第一个会使国民党岌岌不可终日的人。

关于第二点，我们更不知其何所指。

关于第三点，是他们明白反对共产国际的支部在中国存在，此层前面已经说过。

关于第四点，第一步骤所谓多拉无产阶级入党，若指拉入共产党，此事和国民党无关；若指拉入国民党是破坏国民党，此事我们可以认错，并且在此处可以切实声明以后不拉无产阶级入国民党，免得有破坏国民党的嫌疑。然而这一来，国民党成了什么阶级的党？所谓第二步骤，我们简直不能理解，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既然不过是国民党的左派，为什么必须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能成立？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此时疾视共产党的，应该只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国民党还不必如此。第三步骤所谓革命成功，自是指国民革命；既然是纯粹国民党员，他们唯一的工作与目的，自然正是国民革命成功，此外，还有何事是他们应该为力的呢？

《民权旬刊》及《护党特刊》中，其谩骂及和上项导言之意见相同者，兹不论及，所论及的只是他们特殊的意见。

“旬刊”上说：“吾间闻共产党员之宣言矣，‘国民党者共产党之过程也’。”国民党是何种性质，共产党是何种性质，我们不相信真有这种无知的共产党员说出“国民党是共产党之过程’这样昏话！他说：“吾又尝见共产党之行动矣，有所宣传必以共产为言论，有所进作，无必□共产为张本。”共产党的宣传进作，自应不离共产，这都是共产党的事，与他党无涉。他又比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上有三种不同之点，其比论

的错误此处不必论，不同之点并不只此三种，此处也不必论，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之不同，此何待论；此处所讨论非两党主义主张不同问题，乃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否破坏国民党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此次大家所纷纷争论的，还丝毫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不同的冲突，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主张不同而冲突，此义不明，决不能了解此次争论的真相。

《护党特刊》第一号上，主张“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不然便麻烦极了。在这些议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未曾研究过各国革命前后的历史，无论是俄是法，当时革命的何止一党；各国的革命党，恒有左右中央政见不同，本党和青年组织各别，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若怕麻烦，那便是旧式会党简单的头脑，二十世纪进步的革命党决不是这样。他们说：“在一个党里，怎么好谈两种的主义！”我们说：诚然，在国民党里，当然只能谈三民主义。他们说：“我们只信服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其他主义，我们不必去做。”我们说：诚然，诚然，我们只希望国民党员不但信服而且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主义，国民党党员当然没有必须去做的理由。他们说：“他们要谈他们的主义，不妨在党外去谈。”我们说：诚然，诚然，诚然，只要不是疯癫，决不会有人在甲党内谈乙党的主义。他们说：“没有大元帅的命令，怎么好停止军事行动，何况是阻止他。”我们说：国民党应否集全力于军事行动，乃党中重要的政策问题；若要“以党治国”，不是要“以大元帅个人治国”，则大元帅的命令便应随党的政策而决定，党的政策不应随大元帅的命令而决定。他们说：“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为什么缘故不要妥协。”我们说：民

国元年和袁世凯妥协的结果如何？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观念，确想把本党逐渐变为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说：不能把中国国民党属于中国共产党，也和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国民党是一样。他们说："苏俄常常运动帝国主义者通商或承认，也曾向中国宣布白党的罪恶，并要请中国驱逐旧俄的使领，拿这种种举动比较总理的吊电或对外宣言，谁是谁非？"我们说：国家的通商外交行动，和依赖外力解决国内问题绝对不同；苏俄只要求中国不承认驻中国的旧俄使领，取缔中国境内的白党，而未尝请求中国干涉在俄国境内的事；苏俄只于革命成功旧党势力灭亡之后，向一切外国办理国家的外交及通商，而未尝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想借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倾覆旧俄政府；试问中国革命政府统一中国时，不和外国通商吗？不要外国承认吗？仍要各国承认前政府的使领吗？宣布旧政府的罪恶，宣布帝国主义者援助旧政府之罪恶，都是应该的，至于希望帝国主义者否认旧政府而表同情于我们的革命政府，那便万分不应该了，因为国内的事应由自力解决之，无论是非善恶，都不能容帝国主义者左右于其间！况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意义上，国外的帝国主义者，比国内军阀政府是我们更大的仇敌。他们说："本党联络段芝泉[1]、张雨亭[2]和卢子嘉[3]们，与容纳他们的精神毫没有一致。"我们以为这几句话是再侮辱国民党不过的了，我们不愿回答，我们要求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加以评判！他们说："本党的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地说，主张改良。他们别有怀抱，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大喊奋斗！奋斗！我们实在不忍！"我们说：既然要谈民生主义，当然以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重要标准。宣言明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

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他们竟指斥主张劳动者奋斗是别有怀抱，不知道他们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不幸的事实，也是历史上必然的事实，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正是要消弭阶级；但是，若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意思；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过那非人的生活而不必起来奋斗的意思。“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句话，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如何才能够达到改良之目的，乃是一个问题，由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或是由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我们以为劳资两方面的利益绝对冲突，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希望大地主或是资本家一旦大发善心，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劳动者让步，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权交给民党。民党不革命，如何能得着政权！劳动者不奋斗，如何能改良非人的生活？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够改良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主张劳动者奋斗，却明说：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地说，主张改良；试问这样的主张改良，是不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而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这未免太忍了吧！他们说：“本党主张与苏俄联络，……因为他们凭空造谣，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他们矫称接了密令，拿本党的名义做了一次苏俄的留声机。”我们说：为什么要联络苏俄，自然建立在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同情上面，既然言此，为苏俄说几句公道话，也是中国革命党正正堂堂的应有态度，用不着以做留声机自贬。至于什么“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什么“矫称接了密令”这些怪话，希望他们以后不可这样凭空造谣！他们说：“他们

（指青年团）对于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为什么不受本党的指挥，而受共产党的指挥呢?”我们说：青年团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青年团体，不是国民党所组织的，这个决议案又是在青年团议决的，不是在国民党议决的，自应说受共产党指挥，如何能说受国民党指挥呢！这类团体组织系统及管辖权限，他们也应该弄清楚！他们说：“这‘不必要的冲突’的话，便含有必要的冲突的意思在话外。”我们说：诚然，若有人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和军阀妥协，主张不为农夫工人利益奋斗，以及其他主张有背宣言的反革命言论行动，我们都应该与之冲突，这正是国民革命进行上、国民党进步上必要的冲突。

他们攻击我们的总口号虽然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而归纳他们所举的证据，明眼人当知道实际争点完全和他所呼号的口号不符，乃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我们的主张不同：

我们的主张	他们的主张
（1）为农夫工人奋斗而拥护其利益	（1）反对为工人农民争利益的奋斗
（2）建设革命力量于农民工人等一切民众，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2）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尊重蒙古民族自决权	（3）反对蒙古民族自决
（4）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对国内军阀比重	（4）反对北政府，同时可与对帝国主义妥协
（5）不与任何军阀妥协	（5）与一派军阀妥协
（6）反帝国主义的苏俄是中国好友	（6）和北政府订立中俄协定的苏俄是国民党仇敌

以上实际的争点，没有一件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

的三民主义之争，更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实在是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左派代表的是民众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

他们解决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他们的本怀。

他们为什么希望他们退出，这很容易明白，现在世界上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莫不极力排除革命的共产派，恐怕共产派搅乱他们妥协和平的好梦。我们明白普告天下：凡是一个真革命党都不会想到取消别个革命党；凡是一个真革命党人，都没有自己退出一个革命党的权利；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分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分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除若是反革命非革命分子或违背党纲的人！

此外我们还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声明一下，即是他们借所谓京汉路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张德惠的话来攻击我们。京汉路不幸被曹吴[4]摧残以来，不但总工会的职员入狱的入狱，走散的走散，即各站分会的组织都早不存在了，张德惠竟自称代理总工会委员长，不知他们何所依据？张德惠是长辛店一个工人，他攻击我们，乃是他侵吞京汉恤金数五百元受我们责问的反响；他攻击我们之点，前后都有事实证明，我们在此不必空言与辩。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各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造谣诬蔑各国的共产党无所不至，中国的军阀官僚也正在用这个方法离间工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不要这样！

根据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
《向导》第八十三期刊印。

注　释

〔1〕即段祺瑞。

〔2〕即张作霖。

〔3〕即卢永祥。

〔4〕指曹锟、吴佩孚。

PDG

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瞿 秋 白

这次扣械风潮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从前广州政府对于列强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实质上也和奉张[1]、浙卢[2]、湘赵[3]差不多的一个所谓独立的地方政府罢了。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一方面右派抵拒国民党革命化的势力虽然紧张起来，别方面却正因国民党中渗入了左派革命分子，无论左派还怎样微弱，始终已经不是从前的国民党。广州政府之下左派最初的能力虽不过指挥群众运动，稍稍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气势；然而广州政府本身接近苏俄的事实，却大足以使英国恐慌。所以从广州关余问题直到沙面罢工，虽然主观方面看来，广州政府不能算得有力的有决心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而客观上对于英帝国主义虽还不可怕，却已经是一个讨厌东西了。

何以说国民党政府还算不得有力的有决心的反帝国主义政府呢？因为实际上广州政府不是整个儿的。广州政府并且不能算是国民党的——他的成立和存在完全靠国民党首领孙中山先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五期。

生与南方各色各派小军阀的应付；所以实权并不在国民党而在军人。各军擅收税捐，自蓄饷械，大多数只想造成个人的羽翼。这次运械问题中便有滇军廖范[4]等与商团勾结的事实。械运到时，商团曾经想贿买李福林，偷卸上岸。

何以说客观上始终英国帝国主义看着广州政府是一种反帝国主义力量呢？沙面罢工风潮便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国民党左派分子的指导坚持，着实使英帝国主义受些打击。国民党右派及中派虽然用种种方法回避公开的赞助罢工，然而普通党员中的左派，曾经求得市党部的名义，做很热烈的宣传。于是英国方面便分两路进行：一路，勾结右派调和派；一路，趁商团运械暗中与以赞助，又自向政府告发，以挑拨商团起而推翻政府。

于是商团事件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如今政局动摇的危象，还很显著，其形势已经逼到如此分明；即孙中山若不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反革命到底，则广州政府势将被逼迫而完全失其反帝国主义性成为国民党首领主持之非国民党政府——这本是帝国主义的目的。

沙面罢工将了的时候，领事团与罢工者双方的争持，已经只剩得一点：就是巡捕的复职问题。国民党及政府方面的右派居然暗示领事团，说巡捕复职之后，管理他们的权始终在领事方面，何必现时坚持不准复职呢。同时吴铁城、伍朝枢、马超俊等，竟说领事方面斥革巡捕之后他们担保收用这些巡捕，另编特别警备队。这种破坏罢工的方法可以算得巧妙极了。而且他们对于英法巡捕，很有些歧视。因为马超俊个人与英租界巡捕头有关系些，等到工人察觉这种现象，绝对不信任马、伍等的时候，马、伍没有办法，便趁着商团扣械事件，拿商团威吓工人，并且假借中山名义高压工人。于是实际上马超俊、伍朝

枢等右派分子适成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手里的绝妙工具。

沙面罢工就此了结。可是刚刚要上工那一天，商团事件已经吵得非常热闹，满城是明天开始罢市的谣言。英法领事便突然翻脸不准工人上工，要想和商团互相呼应，两面夹攻政府——帝国主义的阴谋显然可见。

因此可以说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

广州罢市之前，佛山方面有陈恭受的指导，已经先行罢市，要求无条件发还枪械——当地土豪所组织之民团都有武装，威胁小商，使不敢开门。当地的政府军队竟不能有丝毫处置，迹近故意放纵。于是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即左派）极端主张严厉对付，要在政府方面，趁商团预备未周，后援尚无确实担保时，先行挑战。政府方面，不但有军官学校四处，共二千人，而且有农民工人之赞助——当时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工人代表会都起而斥责妥协派为反革命所利用，要求解除买办商团之武装而武装平民——工人与农民，其中市郊农民的农团军原有三千支枪，工人则可以以扣留的军械立刻武装起来。这种要求当然受国民党中革命派的最热烈的赞助，革命派说，现时商团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北通曹吴[5]，东连陈炯明。因扣械案发生之后，必然赶紧请援于两方；所以虽然罢市谣传很甚，而始终迟迟六七日不发，便是有意等援兵。假使等到东江或英国方面有所动作，国民党就只有束手待毙了。因此，应当趁早挑战，就有人提议派人到佛山组织市民大会，工人都愿意拼死奋斗。若商团方面敢于殴杀示威运动者，便可以立即强迫商团缴械而武装工人。革命派又提议由国民党发一宣言，以为宣传的

方针，内容应当说："商团军纯粹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商民尤其是店员，不应当受帝国主义的雇用。农工阶级屡次受商团的摧残，必然要赞助政府。一切国民的最正当的主张便是不但扣械不能发还，而且要解除商团现有的武装。凡是罢市赞助陈廉伯买办的，国民都认为民贼。"

可是实际上佛山虽然开市民大会，而国民党中并没有命令军队采果决手段；右派的军人在示威运动时名为保护市民工人，事实上却举枪禁止工人通过商团团部的地方——竟是保护商团。革命派所提议的宣言及武装宣传方法，都不曾采用。过了几天，忽然发现国民党中央的告商人书，说得不痛不痒，仿佛政府得罪了商人似的。最后，才勉强召集市民大会于广州；然而武装宣传不实行，党员不能积极在群众中及市民中根据革命派所拟之宣言活动，偶然的一次市民大会，劳动群众虽然能表现他们的奋斗精神，却事实上没有预备好。于此便发见国民党中派诸首领不能负指导群众，组织群众的重任；并且没有政治的眼光，不能当得革命的领袖——劳动群众愿意赞助他们，他们却怕群众，不敢接受这种赞助，因而不能指导群众，预备决心和反革命奋斗到底。

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恭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这是罢市之前的形势。当时的斗争，简直已经明显着从党外的反映到党内的局面。我们若分析出这一方面的情势，对于以后政潮的变迁便可一目了然。

右派国民党员陈廉伯、陈恭受等是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

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其间有许许多多游移分子，如政府中之右派军人，主张调和的官僚，无异乎帝国主义间接的工具；幻想维持政权而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的中派诸要人，便间接而又间接的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动派的气焰。这几派的斗争便成功这一次的政潮。

广州市民大会之后一天便罢市了。当时右派诸叛徒的策略，第一便是放出"共产即在目前"的谣言；第二用什么"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名义发出政纲，否认三民主义的意义，主张不党主义；第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命令他们驱逐县长，宣布独立。武装商团差不多完全改换便装，到处检查不罢市的商铺；在团的不用说，不在团的便用强迫手段，再不成，便故意捣乱：譬如聚着三五人，带着手枪到不肯罢市的茶店或铺家故意寻事或假作互打；再则收买中央银行纸币持向不肯罢市的店家强迫使用。他们自己尽发反对政府的传单，而国民党所散传单以及其他团体攻击商团的传单，他们便以强力制止商家不准阅看；甚至西关一带之政府布告，也随贴随扯，不准市民观看，常用武力驱散看众又派人殴打派报工人，不准市民阅报。总之完完全全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法西斯蒂的暴力政策。因此许多小商人虽然不愿罢市，也不得不罢；然而至多不过全市十分之六罢了市。后来因为劳动市民的反对，政府的查办，剩得只有少数大商铺插起外国国旗闭着大门。商团军就专保护这些各国商铺，反抵中国政府，以罢市勒索枪械——这是当时显然的景象。所堪注意的是这"外国军队"——商团军的首领，却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陈廉伯。可是政府方面的军队中间也有外国买办的奸细，竭力主张调和，不肯尽力镇压商团，而托名于"和平调解"。伍朝枢在第一天便想调停，以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想和假借中国商民名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军订城下之盟。

所谓商会，以至于善堂也四方八面的找汪精卫等以及各总司令出来说话，有以二十万元“供献”政府，由政府“依法”发还枪械的传说。国民党右派的这种行动可以说是最巧妙的反对政府的手段。他们表面上说是怕帝国主义直接来干涉，所以应当如此，实际上却是不用帝国主义费力而由他们赶紧代为履行其政策。市民的劳动界都非常愤慨，声言如果真正赞助革命政府，只有解除商团武装之一法。并且各举代表会集于省长公署，组织平粜委员会，预备收管食粮以及重要的公共消费品，使商团不能以罢市要挟，尤其要使他们不能以饿死平民的手段胁迫革命政府妥协。当时农民自卫军及工人代表会都曾积极预备。那时候，冒充工人首领的马超俊，惟恐革命派果断实行，亟亟自夸可以一手办成管理食粮事务，可是工人群众因为他屡次压迫欺骗恐吓工人，到这时已经绝不信仰他。结果管理食粮队，预备武装保卫民食队仍然由革命派完全预备妥当。当时提议须急速进行：一面实行收管米粮作持久之计，一面即刻解除商团武装，肃清政府及党内的反革命派。然而国民党最高党部中派诸要人始终找不出这样一个决心，迁延复迁延，坐令商团和英国海军及右派军人勾结妥当，于是局势便突然大变。

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居然以武装调停的威风提出六个条件，要政府受五十万元发还枪械。——这无异是将三十年来国民革命的首领孙中山廉价出售于商团。同时英国领事通知政府说，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命令，若政府对商团开火，驻广州的英国海军便将立即攻打政府。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陈廉伯、范石生等对于中山政府可以说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亦就是国民党自己的右派党员及军人对于革命政府的大蹂躏。

当时革命派的主张是：商团枪械完全没收，分发真正之政府军队及广州之农民及工人自卫军。买办阶级之武装队不准存

在，另编平民警备军，以劳动平民为根本。此外更主张取消一切杂捐，统一财政——使作乱及反革命的军人无所凭借，并且真正减少贫民的负担。再则，便是民选市长，使当时广州市民间、商民间的分化，都有政治上的表现。

当时商团之中早已有了分化：一部分勾结李福林的，如河南商人便没有罢市，大名鼎鼎的药铺老板李朗如也没有“参加反抗政府的行动。”一部分已经勾结好廖、范及英国帝国主义，如邓介石等，愿意出五十万元收买广州政府，愿意使陈廉伯通电“悔过”，以保留即刻继续活动之可能；一部分主张陈廉伯“无过可悔”以为五十万元太多，应当无条件发还枪械，即刻以激烈手段对付政府。于是乎右派分子如孙科等，便以为政府方面不应组织工团军，不应倡议管理食粮等政策，应急急与邓介石等妥协，允许履行条件后从速发还枪械。然而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上（八月三十一日），早已宣布范、廖之反革命行为，不服从政府命令，并且声明绝对否认允许调解条件。此后各劳动平民团体，尤其是在“九七”纪念日市民大会上，都很急激的要求解除商团武装，否认允许条件。因此，右派的政策既与中山的声明相左，又与民众的要求大相违背——当时的政府若真有决心，很可以立刻武装平民以卫广州，预备作战，实行减捐民选。可是中山声明只管声明，而中派要人竟别出心裁想出这样解决的方案：“最好暂时瞒住真消息，与商团之最接近政府者联络，再设法使商团‘就范’改组，使实际上得着同样的结果，而表面上不露痕迹。”于是这政潮的结果便成奇突的现象：

趁着旧市长去职新市长未选出以前，李福林竟做了市长，李朗如竟做了公安局长。表面上是这一部分商团代表因与政府妥协而取得政权；实际上他们有了政权——一切改组商团民选

市长等条例便在他们手里；这种妥协实在有利于反革命派。最要注意的便是胡汉民先生上台做省长，廖仲恺一面声明自己非共产党员，一面仿佛引咎辞去省长。这一方面便已经确实是政府向反革命的妥协。农民自卫军及工团军的枪械一直没有发出来。而枪械“依手续发还，改组商团”等消息，广州各报尽着宣传，仿佛是故意反对中山先生的声明，而受中派某要人之指使似的。然因为左派及群众的反对，不时又散布“政府要求三百万军饷，商械中长枪已经用于北伐军，令兵工厂赶造偿还”等消息以乱观听，似乎又想实现中山的声明似的。这都是中派态度动摇不定的反映。由上看来，那想不露痕迹偷偷摸摸实行自己的政策——即避开革命的道路而想利用商团之一部分的中派，毕竟要受商团的利用，毕竟要丧失自己的政策，结局不过是仍旧承袭右派的衣钵！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的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哪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单想用暗度陈仓方法去回避革命，无论口头上怎样拼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指卢永祥。
〔3〕指赵恒惕。
〔4〕指廖行超、范石生。
〔5〕指曹锟、吴佩孚。

PDG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国民党工作的合作办法

（一九二四年九月）

C. P. 与 S. Y. 关于民校[1]工作之合作，尚未切实规定，兹经 C. P. 中央和 S. Y. 中央决定下列办法，望各地方切实遵照执行：

（一）各地民校工作，S. Y. 地方应直接受 C. P. 地委或区委之指导；其无 C. P. 地方者，由 S. Y. 中央依据 C. P. 中央通告指导之。

（二）各地 C. P. 和 S. Y. 在民校工作之同志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 C. P. 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之，但党团开会时，S. Y. 地委或区委须派一人出席。

（三）我们在民校工作之重要点，为宣传左派政治主张（以《向导》之所指示为准），造成左派地位，对右派之反动行为及言论，务必不懈的加以攻击，此种工作不限于本地有无右派分子，即使本地民校工作完全在我们之手而无一右派分子，亦应同样的积极的进行此种工作，因为必如此才能造成真正左派。

（四）左右派的分化要在行动与争辩中才能看出，左派的地位也要在行动中才能造成与巩固，所以在民校的每一集会（如区分部地方大会等）中，我们务必提出些实际的政治问题

(如《向导》八十一期后之各种实际问题),充分的做左派的政治宣传。

(五)要有左派倾向的分子,才介绍入民校,要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 C. P. 或 S. Y.;民校中之左倾分子,除忠实的工人外,不宜勉强拉入 C. P. 或 S. Y.。

(六)我们在民校的地位为左派,胡汉民等为中派,孙科以至叶楚伧等为右派。我们对于中派的态度,亦应照《向导》之所指示而批评之。

(七)务极力推销《向导》于民校中的左派分子及中立分子。

C. 中 T. S. Chen[2]

S. 中 Freeman Yuin[3](代)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国民党。

〔2〕即陈独秀。

〔3〕即恽代英。

PDG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陈　独　秀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都有就理论上事实上仔细研究并发表意见的必要，慎勿固执“主张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便是破坏国民党”的偏见，硬闭起眼睛不理！

反对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的人，他们所持最有力的理论是：革命党须有军事行动，也须有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这种理论，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形式的逻辑，至于国民党本身状况及其在中国所遭遇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画符念咒又恐怕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我们有何方法能得着和军阀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说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论，想用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打倒他，不待军事专家，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第二，广州政府现有的军队内容又是怎样？完全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我敢说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并且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五期。

也还没有相当数量质量的革命党人能在这些军队中宣传活动，能左右这些军队的群众。建立在这些军队力量上的军事行动，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军阀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掳掠搜刮，连陈炯明、赵恒惕也不曾打倒，而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所谓军事行动（北伐包含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1]系奉张[2]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因滇军勾结商团而妥协是国民党的耻辱，然而因为要做军事行动，便不得不容忍这班反动的军队。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反动的西南将领不可与之革命，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实力，便不得不和他们联合。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段系奉张都是革命党所应讨伐的军阀，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声势，便不得不称他们为友军。这些耻辱的行动，这些错误的政策，都是军事行动所必然产生的。因为此时的国民党除了采用这些政策，本来没有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之可能。然而采用这些政策来做军事行动，不但这些军事行动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为滇军西南将领段系奉张自身便都是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样的军事行动，且可以使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宣传完全无效。

应否放弃广州政府和应否停止军事行动，是两件事不可分开的一个问题。因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

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既没有革命

的军队，又没有强大的革命党。因此，在名义上在极少数政府首领的愿望上，是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这反革命的军队官僚与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因此，政府中极少数首领仅仅是有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权能支配所属的军力财政用在革命的意义上。并没有实权能制止革命政府所万不应做万不忍做的事：开赌、拉夫，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警察、商团压迫工人农民，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官吏和帝国主义者的爪牙商团勾结妥协。这些都是广州政府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若仍要保持广州政府，对内，不但上述各种可痛的状况必然继续下去，而且反革命的军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实现；对外，永远不能抛弃和西南将领及北方一部分军阀妥协的政策。如此，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将使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在全国民众中丧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国民党的力量与注意，事实上必然集中到关于保持这块领土的一切应付，没有余力可以计及全国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即在领土内，亦以军警官吏之横暴，取消了党的宣传效力。本以为有一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而结果实得其反。

总而言之，在原则上，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一个革命党做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并且极热忱的希望中国国民党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实际情形上，我们一方面观察得国民党的内容，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一

方面我们观察得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力量及国内军阀的力量，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他们，那更是此路不通！

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圣神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

因此，我们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走这条新路，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分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不断的为这些大民众之自身利益而奋斗，使这些大民众都认识国民党的确是为民众利益而革命的党，的确和军阀派及其他官僚的政党不同。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真实力量。

这样本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变动，反动的右派，在他们自身的利害上当然要反对这种变动，即畏难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赞成这变动之勇气与决心。然而这个变动确是中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革命的领袖们若是看清了这个需要的事实，便应该拿出革命的责任心克服他们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头脑，都被军阀战争及局部政情之琐屑应付具体问题占领了，没有考虑全国革命所需要的事实之余地，诚然

是国民党的不幸。然而我们相信终有大家回过头来考虑这个事实之一日。如此，我们只好改日再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2〕指张作霖。

PDG

军事运动与革命*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

林　育　南

现在有许多有志之士，他们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但他们一说到革命，脑筋里就充满了军事运动的观念。他们的意思似乎除了军事运动就无所谓革命，换言之，革命就是“流血”的军事行动。实在，这是错误了。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革命”，是要靠被压迫的群众的力量，将旧的支配阶级及制度从根本推翻，重新建设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这乃是近代社会进化的“革命”，而不是古代“王者”、“英雄”等少数人利用武力“改朝换代”的“以暴易暴”的所谓“革命”。这是一个根本重要的观念，倘不明白这个观念，则所谓“革命”，在根本上就弄错了。

我们所说的革命：第一，要被压迫的群众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的要求；第二，要觉悟的群众团结其力量；第三，要有指挥革命的群众党——有了这三个条件，才是革命群众的本身势力充实，这时候才谈得上武装民众，才能运用武力来推翻统治阶级的政府和一切旧势力；同时保卫新的革命政府，扑灭反革命的势力。

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要的革命的军队，是要有阶级觉悟，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四十九期。

卫护本阶级利益，信奉革命主义的军队。现在为生活及升官发财之故而应募投军的雇佣军队，虽一时为我们所用，然而他们根本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为自利而投军，惟利是视，今天可以为我们革命之用，明天亦可以为敌人收买作反革命之用。他们遇有抢掠发财的机会，随时都可以饱载肥吞的如鸟兽散了。这种军队是如何的危险？我们还能希望他们为革命而不顾危难、不畏穷苦，死心的作战吗？

由上两层说法，我们对于军事运动就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军事运动的时期问题；二是我们军事运动的对象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说，必要备具了上述三个条件，才能作军事运动。倘若群众没有阶级觉悟，没有革命要求，我们革命的力量从何发生？群众没有团结，革命的力量从何雄厚？没有指挥革命的群众的党，革命的力量从何运用？如此，我们要军队有何用处？就有了军队，如何能革命？退一百步说，假定就把旧政府推倒了，试问推倒了之后，又怎样办？就我们中国的现状看来，我们的革命运动离军事行动尚远，我们目前的急务不是在军事运动，而是在向被压迫的民众宣传，教他们知道是什么人压迫他们，他们受压迫的原因和解除压迫的方法。再就是教他们团结起来，坚强革命的势力。这即是说，我们要向民众宣传，要组织民众，要训练民众。再就是我们要组织指挥民众革命的群众的大党，以促强并运用革命的势力。我们必要把这三件事做得有相当的程度，然后才可作军事运动，才可预备军事行动。总之，军事运动是革命势力将要成就的时候的事，革命将待爆发，接着于是有乘机而起的直接的军事行动。在中国目前我们不努力于上列三事，而从事于军事运动，此乃不明白中国情势，不明白革命步骤的错误行为。我们还要知道，这种行为不但无益于革命，而且对于革命运动反有障碍，因为革命的势力

要集中，革命的步骤要一致。预备未足，时机未至，而妄作军事运动，是破坏革命势力的集中和步骤的一致；再则革命势力未充实而遽行军事运动，势必大遭反革命的压迫和破坏，致使新生的革命势力受无谓之摧残，而社会亦蒙无意义之扰乱，反损害革命之锐气而失社会之同情。

再就第二个问题说，我们军事运动的对象，不是这些现成的雇佣的军队和土匪及无业的游民。我已说了雇佣军队是为生活及升官发财而来，我们可为革命用，同时亦可为反革命用，实际上还是反革命于他们有利，结果他们必是为反革命所用的。土匪游民他们很难得有阶级觉悟，他们没有直接感受政治经济的压迫，他们只有满足生活的欲望，所以没有革命的要求，更没有建设新制度的思想。我们的军事运动的对象，应当要是最受政治经济直接压迫和掠夺的痛苦的下层农工阶级。他们受统治阶级的痛苦最深，最容易有阶级觉悟，最有革命的要求和建设新制度的思想。所以他们是革命的先锋，他们才是我们军事运动的真正的唯一的对象。我们应该先向他们宣传、训练，团结他们的势力，教他们能为革命而牺牲奋斗；到相当的时候，教他们武装起来。那时，他们才真是革命的队伍，他们才真正能够打倒旧势力，扑灭反革命，保护革命的成功。

倘若我所说的是错么？我想，辛亥革命是应该成功的了。然而事实不然。这便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有军事行动，没有革命的群众；他们（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只有军事运动，没有群众运动。结果，军事行动造出许多军阀，遍地兵匪，酿出十几年来的大乱，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教训么？再看俄国的十月革命，多数派以前只是尽力向民众宣传他们的主义和政策，团结农工阶级，到革命行动时，他们就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马上就把旧政府推倒，接着就扑压反革命的白党和反抗各帝国主义

者雄厚的武力压迫。在四面楚歌，内忧外患，饥寒穷困的万分艰难局势之中，革命先锋的红卫军孤军死战至四五年之久，而卒能完成俄国社会革命的使命，使红旗树立大陆，震撼全球。他们倘若不是有无产阶级武装的军队，靠雇佣军队，岂能成功？同时，他们若无有觉悟的农工群众的团结，没有指挥革命的群众党（多数党），而仅靠军事行动，又岂能成功？

观此，军事运动与革命的关系，我们应该完全明白了。我的结论是：中国革命运动，此时还是宣传组织群众的时期，不应该作军事运动，而且军事运动应以农工群众为对象，不应该运动雇佣军队和土匪游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蔡　和　森

这次战争与北京政变的结果，必然要完成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所谓和平会议，已是毫无疑义的。这种和平会议是日美两派帝国主义和直与反直两派军阀势均力敌互相妥协以宰制中国国家及四万万人民的成功（如果不是势均力敌，便是一派统一中国，用不着什么和平会议），也是毫无疑义的。所以现在问题是到了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身上。中山先生对于军阀而实在是帝国主义在京津之间召集的和平会议采取什么态度呢？这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革命本身的生死问题，稍一不慎，即要陷于绝境。

中山先生肯亲身去参加他们所号召的和平会议或委员制的政府吗？那末不仅是要上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当，而且无异是向人民宣告自己是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工具处于同等地位。所以在原则上与策略上，中山先生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而且要在积极方面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阴谋，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工具——祸国殃民应受国民裁判之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权限。

或谓联合反直讨曹[1]北伐的事实，中山既已行之于前，现

在曹吴倒，反直派起来号召和平会议，中山怎好拒绝参加而不分享其成？我们早已说过，即使反直成功，其结果也完全是军阀与帝国主义的；中山先生现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断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产，然后再尝一次广州七总裁的味道，结果不仅是终遭军阀的排挤，而且要被帝国主义玩弄奚落，迫到哭笑不能的时候而下台。这样的去分享其成，岂不是自行入瓮。所谓北伐讨曹，本报早已认为根本错误，结果只有徒为军阀与帝国主义摇旗呐喊而丧失自己革命的旗帜与号召。曹吴倒后的北京，又是谁家的天下，这在事实，岂不甚明？在此时若还顾惜北伐政策的错误，再接着错误下去，我想中山先生决不出此。

有人说，事情决不如此简单，中山先生既北伐讨曹于前，即使现在已觉其失当，也不得不与反直军阀敷衍周旋；以中山之明，亲身去受当是不会的，但派人持条件而赴军阀的和平会议亦未尝不可。不然，国民党徒徒站在外面反对他们的和平会议，岂不是反使人民误信军阀与帝国主义是爱和平，而国民党反不爱和平吗？

上面的说话，实际包含两个问题：第一，孙中山应否派代表北去与军阀敷衍周旋；第二，国民党是否应有条件的赴军阀和平会议之号召，抑自行在广州召集人民的和平会议，以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抗。

第一个问题，我们亦绝对以为不可，其理由有三：（一）派代表与军阀敷衍周旋，仍无异是承认军阀及其后面的帝国主义有主宰中国号召人民及革命势力之权威；（二）这样便是成功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预定阴谋；（三）前年中山派四代表驻沪与各势力派接洽和平统一之经验，徒使自己革命的面目蒙混，革命的宣传工作停顿。一言包括，这种举动是损革命以益

军阀。

第二个问题，在理论上与政策上，国民党现在本应自行在广州召集人民的和平会议，以打破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是十分必要而毫无疑义的。可是在事实上怎样呢？事实上，这个政策是要党的势力已经发展于全国民众中才能做到。吾人于此真不得不太息恨痛于白费气力的军事行动之误党误国！假使改组大会后，国民党能以七分气力用于全国党务及宣传工作之发展，我相信这种人民的和平会议一定召集得成功，国民党在全国政治上与革命上的地位至少也要比现在高十倍。又使最近二月不把全副力量用于毫无意义的北伐，对于军阀战争与必然附随而来的列强阴谋有所准备与宣传，这种人民的和平会议亦有几分成功之可能。可是中山先生这两个月的气力更白费了，所以现在剩下的出路只有两途：一是俯首帖耳恭听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号召；一是毅然蹶起号召民众反抗军阀与帝国主义继续宰制中国之阴谋。前一途无论中山先生亲自北去或派代表与之周旋，都是绝境上面又加绝境，损失上面又加损失；后一途虽一时见不到偌大效果，然却是亡羊补牢收之桑榆的必要政策。

但是现在右派的态度怎样呢？（一）广州公安局对于北京政变的布告是“和平统一，迎刃而解，西南护法，已底完成”；（二）住在香港的所谓民党揭“推倒曹吴，欢送大元帅北上”的旗帜游街，并燃放爆竹志庆；（三）孙科在奉天语西人云：吴佩孚失败，武力统一之说，自此可息，此后当谋和平统一之策，由自治各省联合成国。又云乃父与奉张[2]同一意思，不久孙张段等各省重要人物，当在京津间会商大计。最初当为军政时代，其次为军民两政时代，以养成国人政治之才，最后乃为人民选举议员，实行知政时代。又云中国重要人物之意见，

皆以十年来之议院政治为不适用，此后当使各省和平自治，以谋实业、教育、司法上之进步，对外一时不撤销治外法权。此次战事，不但打破武力统一之主张，且将革除非法国会与其所订宪法。中国今日并无政府，亦无国会、无宪法，正可从头做起云云。孙科又谓其父孙文现认惟有军人狄克推多方能解决中国时局，故段祺瑞实为收拾时局之适宜人物，中国革命后采行宪制太早，故与国势不甚适宜云（见二十七八两日的《新闻报》）。

国民党右派这种态度，实在令人难堪！这次北京的政变与附随而来的所谓和平会议，在觉悟的革命党看来，不仅不能予吾人以丝毫可喜之冲动，而且为两派北洋军阀与两派帝国主义互相妥协联合向中国人民与革命党下最后的制裁之危机；谁知这种危机降临，倒还是右派首领向军阀投机向帝国主义放盘的买卖。呜呼！幸亏孙科先生说得出口："乃父与奉张同一意思"，"惟有军人狄克推多能解决中国时局"，"此后……对外一时不撤废治外法权"！

附和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右派，固已不必深责；我们所最惋惜的却是中山先生二十五日嘉勉冯玉祥"戡乱安民，举国属望，此后筹维，须谋根本至计，永奠和平"的通电之失当。替中山主张发这个通电的左右，至少也可说他们对于中山先生的忠实以及对于政治的常识，尚远不如徐树铮之于段祺瑞，因为徐树铮尚看到冯玉祥控制的北京形势，比以前吴佩孚控制的形势没有两样，所以他公然在港宣言段祺瑞不能与冯玉祥合作。

既往不咎，我们现在只有希望中山先生趁快发一根本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合作的和平会议之宣言：一以打断右派在外面

招摇放盘的无耻勾当；一以开始代表人民利益反抗宰制四万万人民的阴谋之革命工作。

根据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版的
《向导》第八十九期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
〔2〕指张作霖。

PDG

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广州通信）

周　恩　来

（一）广东政府　我们从广东政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阀挟持，向帝国主义英吉利、洋行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并且时时有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事实出现。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他们驻扎的地方多是广东富庶之区，而滇军各首领每年汇回云南款项据银行人说常不下千万。对于东江战争，驱湘军为前锋，胜则归功于已，败则卸过他人。北伐事起，阳示赞成，阴则借口陈炯明将图反攻，按兵不动，好保持他们已占有的富庶防地。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动身北伐时下令废除一切苛捐，而饷源在握的各军长不但不能遵令取消，且更借北伐巧立名目，加抽各种捐税。滇军军阀如是，粤军、桂军、湘军等军阀亦莫不如是。政府号令不得他们同意，虽令亦不能行。反之，他们的主张虽违政府号令，政府亦必须屈从。例如扣械事件的调停，粤滇两军阀均想借此与商人接近，见好商人，然后从中剥夺。结果因滇军力大，许崇智敌不过范石生、廖行超，范廖遂以五十万将中山卖了。中山知被卖后，气愤不过，但他的左右却竭力怂恿他忍气吞声地接受范廖等私定和约。中山在表面上是接受了这个怂恿，然而心实未甘。故五十万的敲

捐，中山曾宣言不要，百余吨枪械，中山几次传令缓发，范石生借故索枪，想从中渔利，中山亦曾令蒋介石扣留不发。中山这种敢为的勇气，国民党左派是极力赞助的，只惜包围中山左右的，大都皆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因之中山彻底的主张遂常被他们阻挠，不得遂行其志。于是五十万的敲捐，终于由大本营秘书厅以领枪一支缴洋五十元的变通方式发表。枪械缓发，范廖等竟指使商团代表通电痛骂政府无信，而范石生自己所要敲诈的枪械，亦终于听他强索而去。并且商团代表骂了政府后，愈骂愈起劲，外而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和陈炯明军阀，内而利用李福林、李朗如为他们保镖以实现商人政府的局势亦愈迫愈紧，第二次罢市的通牒遂于双十节前一日发出。政府在此时本已退至无可再退之境，然因不敢反抗李福林等的威迫和前此已曾因被迫允许还械的宿约，五千支枪械乃于双十节早晨由黄埔运回广州发还商团。商团看出政府软弱畏怯的破绽，当日便摆出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军阀合用的工具之气势，向徒手的市民巡行队肆行屠杀，尤其加倍地屠杀巡行队中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军官学生。趁火打劫的福军——政府的军队，亦复加入摧残，为所欲为。屠杀后四日中的广州状况完全是一商团和军阀横行的反动局势。在这时候，国民党右中两派合作的广州政府，已知他们的地位是快要被陈炯明和买办阶级受着英国帝国主义指挥而合作的商人政府袭取去了，再不进攻只有灭亡，但他们却又没有勇气去图进攻。然而革命的左派，领着革命的工农群众受着极大的摧残和压迫却万分忍耐不住了，他们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因为广州已为反革命势力所笼罩，号称革命的政府若再希图妥协苟安下去，不但所有的设施将益较从前为反动，国民革命亦将在广东完全破产，工农阶级

的解放运动更会被摧残到底。不生则死，中山虽远在韶关，亦看出了这个姑息养奸的反动局势除进攻外无别道，于是最后的决死战才由中山指定的革命委员会发号施令地动作起来。同时中山更觉悟到，自他到韶关后的广州政府妥协自私完全违背党的宣言及他的意旨做事，故在愤怒中曾有否认非革命的广州政府之决定。不意进攻商团的战争一开，眼灵手快的滇军军阀立刻觉悟到，商团得势、陈炯明转瞬归来，便会排斥客军的危险和枪械与其存商团手中莫如收为己有的妥当，唯利是图的李福林亦看出趁火打劫之利，较受商团拥戴的为可靠而切实，于是阵势中便立地加增了两派刽子手。自然我们也承认滇军军阀和福军之攻打商团，甚至于乘机抢劫，广州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统都无法禁止的。不过事后任军阀自缴商团枪械之不足，犹复以每支枪外再缴百元军饷的敲捐号令开军阀敛钱之路，以广州新旧城归范军驻防、西关归廖军驻防、河南归福军驻防的分配，授滇军军阀以广州的实权，这不能不说是广州政府之自愿了。不仅如此，便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由某要人起草了一篇宣言，省长公署复发起了一个市民善后委员会，都百二十分地企图与市民中上层人物妥协，而忘掉市民中下层的工农阶级与小商人的真正痛苦和正在受着反革命派压迫的情状。切实说来，他们只看到这个幸存的广州政府的地位问题，却忘记自己已完全处于滇军军阀特别是范石生（范的幕下有右派人为之计划一切）的指挥下了。

（二）反对帝国主义　这样的广州政府我们本不应因为中山发表了几篇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而忽略他们怠工和退让的实际情况，然而群众却常常因此受了蒙蔽。说起中山所以发表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宣言的缘故，要点是在中山看了帝国主义列强实与中国国民革命不能两立：白鹅潭的

十六只外舰示威既已开其端，沙面苛例发表后各国领事态度更是目无广州政府，及至英领事因第一次罢市而下威吓的哀的美敦书，帝国主义的强横态度更表现得十分露骨。

尽管中山发表那样坚决的宣言，尽管广州反帝国主义声浪那样高，然而事实上广州政府却伴着那篇宣言取消英国帝国主义走狗二陈[1]的通缉令，并发还其家产，决定退还英国帝国主义工具商团的枪械，任买办商人所拥护的李福林为市长，任商痞李朗如为公安局长，凡此种种简直是向英国帝国主义绝大的让步。然而英国帝国主义岂能因此便停止推翻中山政府的阴谋！援助陈炯明，援助买办阶级和商团以建设他指挥下的商人政府，这是香港政府得意之笔。纵然商团一时溃散了，但四乡与商团同性质的民团仍在；纵然二陈及商团代表一时逃走了，但买办阶级依然存在；纵然陈炯明一时未能打入广州，但帝国主义可利用的军阀，原不只陈炯明一派。现时广州滇军军阀与买办阶级的复行勾结，李福林与民团的关系，又使英国帝国主义注意到这些可用的工具。且最近英国已由本国开来七只军舰，直泊广州，这不仅足以助长他的工具——军阀与买办阶级之声势，且直回应到九月初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工党政府的宣言。目下英工党政府塌台，保守党政府将要继起，是其对广东政府的推翻计策将更要努力进行无疑。

英国帝国主义向广东进攻愈甚，广东反革命与革命的阵势自也分化愈亟。不革命的右派国民党在其经济地位上说，在其个人利害上说，他们是永不会反对帝国主义的。但革命的左派却看得非常明显，广东政府若不向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进攻，终久会被英国帝国主义推翻的。故他们主张与帝国主义决裂非常坚决。在中山对于海关问题，也是主张以力取之，只是见困于妥协派和右派的不革命空气，恐终难见诸实行。

（三）反对军阀　至于反对军阀，更是国民党所至难措辞的问题。明知奉张[2]浙卢[3]便是胜了，也未必有利于中山，更不会有利于革命派。但终因反直系联合的口号宣传许久，机会主义的色彩终舍不得除去，故于江浙战事方起，便大倡北伐，以谋响应。实则北伐之无望与北伐之难能，在中山看得极其明了，故以党的名义发表之北伐宣言，明明白白说出希望曹吴[4]倒后，不再有军阀政治出现，此次倒军阀，实际上便是倒帝国主义。依此以例今日北方各军阀推倒曹吴的局势，国民党当然只有发挥根本铲除军阀制度及帝国主义的精神，左派一本中山宣言，如是主张。但热衷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却已离了革命的立场，认为千载一时之机，想从军阀的分赃会议中得到革命的代价。所以现在国民党中的投机空气，几乎又与“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民国元年相仿佛。我们退一步言，将来军阀和帝国主义暗中主宰的元老会议，中山亦可加入发言，看看他们究竟的勾当。然这种加入的目的必应是为革命做宣传，是要在他们的会场上提出国民党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以鼓动全国人民之革命工作，以暴露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假面具，决不如投机派之所梦想，是要乘机分得一份政权而与一丘之貉的军阀及帝国主义者去合作。

（四）结论　我们从上述的广东政治现象中，很明显地看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而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

假使国民党要使他的宣言完全实施起来，中派分子必须打破他们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免除不革命的耻辱和妥协的色彩，实行反对一切军阀，一切帝

国主义。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将广东政府从军阀挟持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希望明达而革命的国民党人都要认定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

根据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刊印。

注　释

〔1〕指陈廉伯、陈恭受。
〔2〕指张作霖。
〔3〕指卢永祥。
〔4〕指曹锟、吴佩孚。

PDG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们：

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说过。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兹特再行通告各负责同志，自后务于此点特别矫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

（一）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

（二）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

（三）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各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

（四）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五）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

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

（六）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的述明各项工作之全部。

委员长 T. S. Chen[1]

秘 书 T. T. Mao[2]

一九二四、十一、一

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六日附及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2〕即毛泽东。

PDG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展开活动的通告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我们对于孙中山到北方出席军阀会议，不根本反对，只督促其在赴会前根据彼党政纲，发表政治主张，在会议中代表人民要求利益，此项政策，前函业已通知，各地谅已收到。此时孙中山已到上海，日内即赴津京，其宣言已在各报上发表。此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彼此次北去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两面之包围，结果恐甚危险。兹中局议决，再发一次宣言，向中山提出政治的具体主张；同时，各地方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国民党宣言有此主张）促成会”，进行左列各事：

一、大致根据本党宣言所列的具体要求（得就各地方实际情形，稍加以增省），即时向孙中山要求提出军阀会议。

二、即时根据此等要求，设法在当地报纸上宣传，在街市上，在乡村中向民众游行演讲，促起大的示威运动。

三、国民会议及预备会如果实现时，此促成会即须负支配选举及监督会议的责任。

各人民团体，各应出若干代表，可按当地情形决定。所说人民团体，当不以国民党宣言所指几种为限。

国民党现拟派特别宣传员分赴各省，解释彼党此次宣言及办理国民会议之准备，彼等到时，倘是我们的同志，自无问题，即不是同志，亦须与之合作，惟不可为他们所支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

此次北京政变之后，在国内政象上，一方面表现出反直派在北方之胜利，将回复到直皖、奉直战前安福、交通执政的局面，一方面表现出直系在中部仍保有其地位；同时，在外交上，一方面表现出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能独力挟曹吴[1]攫取全中国，一方面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没有挟段（祺瑞）张（作霖）统一中国之可能。

二

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之企图，约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是所谓瓜分政策，由帝国主义的列强协议在华势力范围之划定，华盛顿会议以前，均属此时期；第二时期是所谓共管政策，由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协力共同宰制中国，自华盛顿会议至今年七月伦敦会议，均属此时期。这两种政策，均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间在华利害之冲突不能成为事实，遂进入第三时期，即现在之分立政策。

这种分立政策，和第一时期不同者，只是不取列强间协定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

形式及表面上避去瓜分之名，而实际上乃是帝国主义者各在其势力范围内——日本在北方，英国在中部，法比在其他方面——集中当地军阀之力，由经济的支配权力，进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机关，实行分裂中国。

独有后到的美国，一面因为其国内经济力特别优裕——余资余货——之故，一面因为在中国尚未有独占的势力范围，遂极力鼓吹什么“在华开国际会议讨论施行于中国之一种道威斯计划”，以图寻得相当的机会与工具——游移于英日帝国主义之外的军阀，达到其以经济力宰制全中国之野心。

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此时不得不大声疾呼，警醒国民，勿固执从前的预料与恐怖，以为帝国主义者宰制我们只有瓜分与共管两个死板方式，应该觉察他们希图宰制我们的别有新而更毒的方式：分立或道威斯计划。前者比后者更有实现之可能，其危险更迫在目前。此种政治的分立，即是国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计划之实现。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

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更应极力反对军阀们拿什么各省军民长官会议来代替此会，执行此会职权。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备国民会议，

我们更应号召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的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

此临时国民政府（一）为挽救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危机而成立，自应不妥协的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势力；同时，也应杜绝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划之阴谋。（二）依赖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帝国主义尚无确定关系的武力之拥护而存在，至少也应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方能得农工兵等民众的同情。

四

此临时政府如果成立，本党当然不能妄想他是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还不是中派；然而我们却准备赞助他，只要他确能防止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或共管之阴谋，只要他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他不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之机会。

五

为全民族的解放，为被压迫的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本党将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本党认定拥护这些要求，是一切人民及其代表之责任，尤其是国民党之责任。要求如下：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

（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唯一关键。

（三）全国非战时的常备军，均以旅长为最高级军职，废除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总司令、检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军长、师长等军职；因为这是杜绝军阀势力集中盗国乱政之重要关键。

（四）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用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以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

（五）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制，工厂卫生改良，工人补习教育之设施，工人死伤保险法之规定，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设劳动平民之住屋。

（八）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损失及救济北方水灾。

（九）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

（十）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

（十一）增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征收遗

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此等大宗税收，不但足以补偿废止旧税——厘金、牙税、盐税、米税、田赋附加税及其他各种正杂捐税——之损失，并可用为补助退伍兵士、失业贫民及推广教育之经费。

（十二）为保障知识阶级之失业及青年失学计，国家预算中，不得将教育经费移作别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庚子赔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费优待小学教员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吴佩孚。

PDG

我们的力量*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邓 中 夏

一

中国自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之后，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新式工业经济日益发达，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在这当中也就随之日益发展而长成壮大了。

在初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原不过只欲销售商品和采得原料，本不欲中国新式机器工业有大规模的增进与发达——因这会引起殖民地的工业对宗主国的工业剧烈之竞争对抗，以至于排斥的。所以那时帝国主义只容忍中国本国的“商业资本”之存在，至于本国的“工业资本”，那是他们所引为隐忧、引为大患而在所必斥的。

本国的商业资本家虽渐渐学会组织生产，发展了所谓“家庭工业”（如商店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其织腊帽手套等）和“工厂手工业”（如手机的小工场等），这些小小生产因与帝国主义无多大的妨害，亦为它们相当的容让。

但是，自从鸦片之战以来，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压迫实在太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二期。

猛了，使得中国不能不起一种“自强御侮”的反感。那时帝国主义间亦有互相倾轧的裂痕，中国政府得利用这些机会购入机器以制炮造舰，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的“军用工业”。

再则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侵略，除掉投货，还要投资，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故当时铁路投资为各帝国主义者所垂涎欲滴，争先恐后的。此外，它们还有采取煤铁和商品输入内地的需要。故借款官营，中国得以兴修铁路及开掘矿山。于是又成就了中国的“交通工业”、“煤矿工业”。

随后因机器既已输入，又引起中国本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而兴工制造；并且外国资本利用中国劳力的低廉，原料取携的便利，运输周折的免除，海关定税的减轻，亦宜于在华设厂制造；因此而本国资本的和外国资本的各业制造工厂也就如云而起了。于是终于成就了中国的“制造工业”。

中国的工业是在这些原因上发展起来的。虽先为帝国主义所不能容忍，然而终究为投货、投资、攘夺富源种种矛盾冲突中，而不得不使中国建立相当的工业。谁知工业化的速度是与无产阶级之长成壮大成正比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公然因三四十年来工业之进展而组成一个雄厚而伟大的队伍，掉转头来便向帝国主义举行背叛，举行反攻。这哪里是他们始料所及的事哩。

现在且把我们的力量，先来检查一下。

二

首检查我们的总人数。

说到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无穷困难的，就是没有精确而完备的统计可资依据。现在只好把比较可靠的略为说说。

PDG

先前我们说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六十一万人，这是根据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估量而定的。可是民国七年到现在又是六年了，这六年之间，工厂增加不少，故我们有时鼓着勇气大胆猜度说：总加至八十万人了。其实这是错的：农商部统计所指六十一万人完全是制造工厂工人，而铁路工、矿工、海员、市政工、码头工、车辆劳动者、农业工人以及政府直辖的造币厂、造船厂、兵工厂等工人和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均不包括在内。

据我们最近的考订，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一百八十五万余人。（手工业工人当然不在其内，合手工业工人总人数据农商部民国四年的统计，是一千余万人）。兹分述于下：

制造工厂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因其时南方护法军兴，故川、湘、粤、桂、滇、黔六省无从调查，所以缺而不全。我们现在还是根据民国四年的统计较为完全。该统计民国四年填注的制造工厂工人总数是六十四万八千五百二十四人。民国四年以后，工厂增多无数，现在总人数当然还有增加。

铁路工人

交通部民国八年的统计，所有国有各路人员总共是七万三千六百五十一人（外有建筑人员二千二百七十四人未算在内）。现将非工人如会计处九百四十人；车务处的管理员、巡查员等一百六十人，站长六百三十八人，副站长、电报生、车站司事等二千二百七十二人；机务处视察员、段长、工厂工头三百九十七人；养路工程处视察员等七百零七人，共五千一百一十四人除外，加上建筑人员，铁路工人实数总共是七万一千八百一十一人。但有数点须注意的：（一）这里数目仅限国有铁路而言，其余省有的江宁路、民有的潮汕路等和外国建筑的如南满

路、滇越路等尚不在内。（二）就是这数目恐有不尽确实之处，就中如机务处工匠（即铁路附设工厂的工匠），据该表细数长辛店机器厂工人仅填七百四十五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三千人以上的数目相差太远；又该表江岸机器厂工人仅填三百七十二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二千人上下的数目又相差太远。以此类推，其他各项数目当亦有不尽确实的。（三）铁路附设工厂和修路有采用包工制，这些包工，路局是无法按名注册的。所以铁路工人如果一人不漏，当然还有增加。

矿山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是以工数计算，探矿采矿工数总共是四千二百九十八万余人。工数是以一人一日为一工，然而究竟不好从工数推定工人人数。现在是根据该统计民国四年填注的人数为准。探矿工人数是一万六千七百一十一人，采矿工人数是五十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四人，合计总人数是五十三万零八百八十五人。矿山采用包工制的尤多，这些包工亦未计算在内。

海员

无统计可查。因为远洋轮船固然完全为帝国主义者所有，就是沿海及内河轮船亦百分之九十五六是帝国主义者所有，我们何从调查呢？中国远洋轮船只中国邮船公司一家有三艘，现在已卖去了。中国沿海及内河轮船亦只招商局、三北公司、宁绍公司三家有数十艘，可惜都无从调查。据深悉海员情形的人说，外国轮船航行远洋的，华籍海员，宁波人约四万以上，广东人约六万以上。假使此话若确，那么加上沿海及内河的海员，总人数当有十五万人。

市政工人

指邮差、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清道夫而言，然而均无调查统计表可考。惟邮差一项，交通部民国十年总计，全

国邮局共为二千四百所。邮局有管理局，一、二、三等邮局暨邮务支局五等之分，我们假定邮局最低数为五人，那么全国邮差总人数当是一万二千人。码头工、车辆劳动者（人力车在内）这两项如果有统计可查，其数目之大，当更使我们吃惊。

农业工人

指用新式机器的农场工人而言，现在亦无从考查。惟据海关册机械类输入农业机器额逐年均有增加，虽然一部分是用之于各省农事试验场及农业学校，其他一部分确为农业资本家用于垦荒及种田，可推知中国农业工人当亦有一个相当的数目。

政府直辖工厂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合计是三万一千八百一十二人。除交通部所管辖之各铁路附设工厂一万零一百七十二人已算入上面铁路工人项下之外，尚余总人数为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人。此外由各省政府设立的工厂工人还不算在内。

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

这种工厂自然完全为外国资本家所有，本国资本家扯洋旗的亦有一点在内。可惜无从调查。惟自“马关条约”订立以后，外商在华设厂逐年增加，据《最近支那经济》所调查，民国二年其数已达一百六十六家。民国二年到现在已是十一年了，所增必多无疑。兹举一例证明，如该书所列的纱厂民国二年共是十家，但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民国十年所调查，外商纱厂已达三十六家。又举一例证明，欧战期间，日人在山东、津浦增厂甚多，单就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已为一百三十九家。并且外商工厂，资本皆极雄厚，规模亦皆宏大，其所用的工人往往比华商工厂多。我们姑且假定外商工厂工人总人数只有华商工厂总人数之一半，那么亦当为三十二万余人。

列表于下：

类别		人数	类别		人数
制造工厂工人	织染	三〇二，六六六人	矿山工人		五三〇，八八五人
	机械及器具	一六，三六一人	市政工人	邮差	约一二，〇〇〇人
	化学	一一九，七八九人		电灯	
	饮食物	一五一，六七七人		电话	
	杂工厂	三五，〇八五人		电报	
	特别工厂	一三，〇六三人		自来水	
	计	六四八，七二五人		清洁夫	
				计	一二，〇〇〇人
运输工人	铁路	七一，八一一人	农业工人		
	海员	约一五〇，〇〇〇人	政府直辖工厂工人		二一，六四〇人
	码头工				
	车辆劳动者		外国工厂工人		约三二四，三六二人
	计	三七一，八一一人			
总计		一，八五九，四二三人			

三

再检查我们的组织。

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组织还是很幼稚的，但是我们开首组织还不到三年，以这样短的时间，公然能够组织二十七万余人，在向无组织习性的中国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惊的事。虽然自京汉路“二七”失败以后，各地不免受了些重大的打击和连带的影响，然而大部分还仍旧存在，不过存在的形式，有

些是公开有些是秘密罢了。兹分述于后：

（一）铁路——铁路运动是一九二一年才开始进行的。不到一年，京汉路组织一万三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每站满五十人以上成一分工会，计全路有十六分工会。此路有一特色，就是全路工人概行组织在一个总工会之下。不幸“二七”失败，受打击不小，现在只能秘密的存在一部分罢了。京奉路最先组织的是唐山，其次是山海关，再其次是天津、丰台，现共组织有八千余人，并有成立总工会之进行。津浦路最先组织的为浦镇、浦口，随后蔓延至徐州、泰安、济南、德州、天津，共组织有三千五百余人。京绥路全路概行组织起来了，共有七千余人，微有欠缺的就是机务、车务，大厂分成三部分，尚未统一。正太路全路完全组织，共二千余人，有一总工会。道清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焦作煤矿工人亦有不少加入，原拟附入京汉路总工会之内，后因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不果。陇海路先亦全路完全组织了，因有监工工头参入其中，任工会高级职员，后来这些工贼出卖工人的事实层见叠出，工人愤，遂分裂，现尚保存一千余人。粤汉北段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株萍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附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胶济路组织二千九百余人，以四方大厂为中心，青岛港工亦加入在内。粤汉路南段组织一千四百人。广九路组织一千三百余人。广三路组织三百余人。沪宁、沪杭两路因帝国主义防范厉害及工人工资较优，虽有组织，系员司、监工、工头、工人共同组织的，惟最近有四百余纯粹工人秘密另组之进行。南满路最近组织四百人。中东路俄工早已完全组织了，华工组织的已有六百余人。全国铁路工人已于今年一月在北京举行各路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共计全国路工已经组织的为四万四千八百余人。

（二）海员——海员以广东人、宁波人为最多。大概从上海以南至欧美各国，粤籍海员约占五分之三，甬籍海员约占五分之二；从上海以北至天津以及长江一带，几全为甬籍海员，粤籍海员甚少。先前甬籍海员有小组织，名叫“焱盈社”、“保安水手公所”等；粤籍海员亦有小组织，名叫“联益社”、“群义社”等。此外还有“关帝会”、“同心会”种种名目。人数少则五百，多至数千。然而这些组织不离同乡主义和秘密结社的性质，故无甚大用。颇有新式意义的组织，要算是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据说前年大罢工后，会员增至四万五千人。其组织稍差，近因与印度、日本、菲列宾、爪哇以及西欧各国运输工人颇有联络故，感观所激，已有改进之动机。

（三）矿工——中国矿山虽多，惟有全部组织的，只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安源组织有一万二千余人；水口山原组织三千余人，惟去年遭赵恒惕惨杀后，归于停顿了。其余只山东之淄博，直隶之开滦，湖北之大冶，河南之焦作，颇有一部分之组织。淄博约为六千人，开滦约为四千人，大冶约为一千人，焦作约为二百人。合计全国矿工已有组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人。

（四）湖南——城市工人依产业组织而公开存在的，只有湖南。除粤汉株萍路工和安源水口山矿工已见上外，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纺纱厂，以及机械、电气、印刷、陶器、辗谷、泥木、缝纫、理发、人力车、笔业组成工会十五个；并共同组织一“湖南工团联合会”。合计组织人数二万六千余人。

（五）武汉——武汉新式产业工人约十余万人，在全国中居第二位。当时已组织的，除京汉、粤汉路工和大冶矿工外，还有铜铁、水电、造船、造币厂、煤油栈、染织、棉花、香烟、缝纫、皮鞋、蛋厂、洗衣、电话、牛皮业、人力车、轮

驳、调剂、杂货共有工会二十个，并组织一个“工团联合会”，合计人数三万二千三百人。惟因京汉路大罢工失败的连带影响，亦一部分归停顿了。

（六）上海——上海原为中国工业第一位发达的地方，然而劳动组合却比其他各劳业区落后。其原因有二：一、帝国主义防范周密压迫残酷；二、劳动界失业众多，生活恐慌；因此，故工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前。上海劳动运动最盛时代，要算一九二二年之下季。那时浦东纺织工组织了一万余人，烟草工组织了八千余人。华洋两界金银业工组织了一千余人，但不久而皆因罢工先后摧残殆尽。此后虽有二三十个工会，多半是一块空招牌罢了；就中只南洋烟草职工会有七千人，机器工会有三千人，粤侨工界联合会八百人，机器工人俱乐部五百人，算是有群众。最近新生的劳动组合，颇有雨后春笋之观，虽多系混合制而非产业制，然已有组织的不下五千余人。总共约一万六千三百人。

（七）粤港——广州和香港工会数目共有二百以上之多，广州原来新式工业甚少，工会多至如此，则他们的组织未脱旧式“行会”性质可知。在政治上比较自由之地，而不利用时机作统一的劳动组合运动，当地有觉悟的工友不能不负其责，该处组织，虽旧虽软弱无力，可是所有工业及手工业工人概行组织起来了。组织人数总共约五万余人。

（八）其他各地——济南组织八千余人，太原组织三千余人，重庆组织六千余人，成都组织一千余人，天津组织五百余人，九江组织二百余人，青岛组织二百余人，大连组织三百余人。合计约三万余人。

列表于下：

铁路	四四，八〇〇人	武汉	三二，三〇〇人
海员	四五，〇〇〇人	上海	一六，三〇〇人
矿工	二六，二〇〇人	粤港	五〇，〇〇〇人
湖南	二六，〇〇〇人	其他各地	三〇，〇〇〇人
总计			二七〇，六〇〇人

四

我们的总人数和组织既如上述，由此，我们现在的力量固然可以征验，就是我们将来的力量亦不难推测了。至于我们力量的试验与表现，在此数年内已经有许多战斗的事实（他日再详述之）可以证明；我们不敢夸张我们的力量已可与欧美产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絜长比短，然而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比较起来，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罢。

不幸自去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以后，不仅是同情者对于我们的力量加以意外的轻视，就是笃信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家亦抱持过分的怀疑。那时我在《中国青年》一节《论工人运动》的短文里，曾这样说："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军的地位。"又这样说："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这些话便是对他们说的。我并且指明："不幸京汉路失败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我又大声直呼："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

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不外两点理论，兹分别指出及纠正于下：

（一）从数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幼稚，他们并没有举出实际的数目，仅持一种形式的理论说：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这种理论用之于产业先进国是对的，用之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似是而非了。何以呢？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本国的和外国的之分。有少数地方虽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比外国的资产阶级强壮，但是多数地方却反而是外国的资产阶级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或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均势了。中国外国的资产阶级，虽现在无确实的调查可断定他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我们至少可推测其必为均势。“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不用说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强壮了，就以“工业资本”举数例来讲：

一、如铁业。中国铁的产额最近几年（一九一八年）约共三十五万五千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的铁矿，总共产额是三十三万六千五百六十一吨，外人在铁业中简直占全数。二、如煤业。中国煤的产额最近几年约共二千万吨，而日本之奉天抚顺，山东淄川以及中英“合办”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就有九百九十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三吨，外人在煤业中，几乎占一半。三、如纺织业。一九二一年底，全国共有纱锭三百二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枚，计华商一百三十四万枚，日商八十六万七千枚，英商二十五万九千枚，其余未开车者一百三十万枚，外人在纺织业中亦占一半。四、又如烟草业。中国烟草业

之三雄：一为英美合办之英美烟公司，一为日本之东亚烟草股份公司，一为华人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在上海、汉口、奉天三处均设立工厂，东亚在营口、天津、上海三处亦设立工厂，南洋只在香港、上海二处设立工厂，可见外人在烟草业中又几乎是垄断独登了。由此种种例证，我们说中国工业资本本国的和外国的处在均势的地位，总不算近于夸张罢。既是如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那么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是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看上面第二段所列举工人的总数目便可见得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了。

（二）从质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其理论是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心理，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还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有国家觉悟的是少数；有阶级觉悟的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种理论近乎说哲学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以心理来解释社会现象，今姑退一步假定心理是可能解释的，然而亦应有平时心理和战时心理之分。无产阶级平时心理尽管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尽管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然而一到战时（罢工），他们的眼里却清清楚楚认识资本主义了，他们的心理却完完全全表示出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了。如以平时心理来断定无产阶级质量之幼稚，我们同样以平时心理来检查资产阶级是如何？上海新兴的资本家不是办了什么同乡会吗？不是仿刻什么“太上感应篇”、“袁了凡四训”赠送亲友吗？不是还有佞佛茹素的吗？这些是否可说他们已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但是资本家一到战时（应付工人罢工）却和工人一样的将阶级的意识与觉悟表示得显露无余，压迫工人甚至残杀工人起来了。

我们考查工人心理最好是把罢工条件来做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罢工次数是四十一次，提出的条件是九十七项，其内容如下：一、要求增加或维持工资三十七项；二、反对管理规则十五项；三、承认工会十一项；四、给假休息十项；五、养老抚恤金六项；六、恢复革工五项；七、反对工头五项；八、响应他处五项；九、减少工作时间三项。试问这九十七项之中除反对工头五项似为对人问题而近于所谓宗法社会思想者以外，其余的哪一项不是具体表现阶级的意识和觉悟？原来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他被压迫被掠夺的地位反应出来的，他的觉悟程度是随他的反抗的争斗之经验而发展的，断乎不能因其有宗法社会心理而能阻止他的觉悟。所以以心理断定他的质量幼稚是不对的，况乎是拿了平时心理而非战时心理。

五

老实说罢，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一）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何以呢？兹分别言之："商业资本"是贩卖洋货及代办原料出口，固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而独立存在；"银行资本"（即官僚资本）是买卖公债及政治投资，又与军阀有深厚之关系，而并受外国资本之操纵；试问他们能革命吗？"工业资本"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的动机，然而终因顾虑目前之利益，亦不过只有动机罢了；即或有时动机见诸行为，亦不能坚持到底，终出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之一途。这是事实，去

年上海资产阶级不曾发电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吗？后来又如何？又不曾做什么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吗？现在又如何？这些和平的运动尚且如此，若采用革命的手段，并进行革命到底，他们哪里有此大胆和魄力呢？（二）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何以呢？亦分别言之：手工工业家和小商人因竞争而致企业之崩坏，生活之不安，往往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比大资产阶级为猛进为坚决，如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比总商会急进，便是一例。可惜他们终因资本微小，而且组织亦甚为歧纷，不能集中其势力，是其大病。农民（雇农除外）因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种种原因亦驱使他们有加入革命之可能。如广东、湖南、陕西、直隶、江西、山东等省往往发生抗税罢租运动及组织农会，最近广东甚至成立农民自卫军，可见他们可以革命了。可惜他们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也是其病。智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智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褎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便是其证。可惜他们本来没有经济的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并且他们因经济条件之限制，使他们富有浪漫、自由、无政府种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亦是其大病。

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

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恽　代　英

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有些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中亦逐渐起了左右派的分化。究竟什么是共产党呢？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究竟有什么关系？

对于共产党，向例是有许多可笑的谣言的。有人说他要均产公妻，有人说他要没收一切大的小的财产，有人说不出他是个什么东西，只闭着眼睛胡乱咒骂。其实这都不过因为上了那些为私人经济利益而害怕共产党的人的当而已。简单的说，共产党便是代表贫苦农工利益，而做经济与政治奋斗的党。他努力要他们联合，他努力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这便是说，他们要明白自己是在一个被压迫阶级中间，所以他们应当为自己阶级的解放而奋斗。这是什么可恐怖的事呢？贫苦农工是不是人类？他们是不是天生成应当居于被压迫阶级的？他们是不是应当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以谋自己阶级的解放？压迫贫苦农工的人自然不高兴他们这样做的，他们自然要说这是“悖逆”，这是“造反”。但是，倘若我们不是压迫贫苦农工的人的奴隶婢妾，为什么要跟着他们这样的乱嚷？

中国的共产党究竟主张些什么，究竟做些什么，就他们屡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五十七期。

次的宣言与所提倡的各种运动观之，都是很可以了解的。他们的论调，对于富贵利达的人们，总不十分的那样好听。他们不肯恭顺统治的帝国主义，不肯恭维在野的军阀，不肯原谅压迫劳工的资本家，而且亦不肯奉承那些政治界很活动的伪革命者。这样惹人讨厌的东西，是无怪乎有许多人都不以为然的。这正是他们代表被压迫阶级的本色，他们要真无愧于为一个共产党，自然亦不敢避免这些人与他们的奴隶婢妾的讨厌。

国民党为什么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合作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让我先解释国民党究竟是什么。自然有人可以说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个人的私党，亦有人可以说国民党是这十几年中奔走南北，做官吏、当议员的一些所谓“老党员”的私党；不过就我们说呢，却不肯承认这些话。我们认定国民党是代表被压迫民族全体的利益，但是他亦把代表被压迫的贫苦农工的利益，包括在他所负责任的范围之内。中国的国民党，不是曾经提倡全民政治么？不是特别揭橥民生主义么？这证明中国国民党并不忽视贫苦农工的利益。所以容纳共产党员的加入合作，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这道理亦是很显然的。在这种殖民地经济状况之下，中国的农工阶级，第一层受外国资本阶级的重压，第二层受本国军阀官僚的苛待，第三层受一般土豪痞绅的零割细宰。在这个时候，怎样为这些农工阶级觅个出路呢？国民党既是讲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既是讲民权主义，反抗军阀官僚压迫的；既是讲民生主义，反抗土豪痞绅压迫的；他的成功，总可以有利于一般农工阶级。纵然国民党多少不免有些容让本国资产阶级之倾向，然而在今天大敌当前，农工阶级与资产阶级都一样有为自身的利益而赞助国民党的必要。农工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害，自然是不能相互容让

的，但是现在还不是最后解决的时候；我们若不是存心要阿谀资产阶级，亦不应当恐怖农工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的未来的战争。

为什么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便发生了国民党中间左右派的分化呢？左右派的分化，是国民党自身的一种进化，是国民党改组以后大大的吸收了一般革命性的青年分子的自然结果，共产党员的加入，不过促成这种活动而已。中国国民党以前是不是真个代表了被压迫民族全体的利益，特别是他是否把代表被压迫的贫苦农工的利益，包括在他所负责任的范围之内？这有四万万人的眼睛望着，用不着我们多说。我们常听见孙中山先生感叹国民党员不了解他的主义，我们在一般人民的口中，除了听见他们佩服孙先生个人以外，实在找不出他们怎样区分国民党与别的私人党派。这对于中国是怎样大的损失呢？共产党员与一些绝对非共产党员的青年国民党员，为中国的缘故，担负起改造国民党，扫除一切党内堕落妥协而反革命的分子的责任，这便是今天国民党中之所谓左派。

有人说，国民党左派便是共产党，共产党员希冀国民党中有这种左派，是要破坏国民党，把他们吸收到共产党里面。我敢保证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说一切真能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官僚、反抗土豪痞绅等压迫的，真正的而且行动的三民主义的信徒，是国民党左派。这种左派，果然便是共产党么？然则除了这，还有什么是国民党。我们说虚伪的而且反动的根本不了解三民主义的是国民党右派，未必只有这才是真正的国民党么？国民党左派真个代表被压迫民族全体的利益，把代表被压迫的贫苦农工的利益，包括在他所负责任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与专注重贫苦农工利益的共产党显然不同，国民党右派很畏憎这种左派的发生，于是咬定了一切左派都是共产

党，咬定了左派的发生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我看倘若国民党中不发生左派，一切革命的青年分子，或者反会从国民党中逃到别的地方去呢。革命的青年分子，是为了三民主义而来的，不是为了帮助做官吏议员的“老党员”吆喝而来的，他们需要构成一个国民党左派，这正是国民党的进步。然而居然有人会怕揭穿了他们垄断假冒的国民党真面孔，竟指这是要破坏国民党。

有人说，国民党将要发生左派与否，这是国民党自身的事情，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促成左右派的分化？我们纵然相信左派的意见是对的，然而我们真个在国民党中间分了左右派，岂不中了共产党的暗算？要答复这样问题，须回复到为什么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为要把农工阶级从三层压迫之下解救出来，所以他们现在赞助国民党，他们的利益是国民党中能够有真正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左派，他们的损失是国民党被那些虚伪反动根本不了解三民主义的右派垄断了。他们为农工阶级的利益，为什么不应当促成国民党左右派分化？国民党员为全民族的利益，乃至于为三民主义的本身，为什么怕在国民党中分了左右派呢？国民党的改造，是共产党关心的；然而倘若只让共产党关心国民党的改造，国民党自身不赶快造成有力的左派，以自己扫除党内的右派势力，那不能说不是国民党员的羞耻。不愿意共产党员越俎代庖么？那便国民党左派更要一百二十分的努力才好。

有人说，既然国民党中间有了右派，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国民党员？我们有这多精力与右派奋斗，何不自己跳在国民党外面来，自己造一个纯洁的独立的新的国民党呢？为什么？国民党不是几个右派的私党。他们有几十万已经团结了的群众，这些群众都是为三民主义而赞助国民党的，他们并与右派没有什

么固定的关系。我们有了这好努力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努力，而定要造一个新党呢？人上了几万几十万，什么地方都可以产生右派思想的，各国政党分左右派，都是很寻常的事。我们纵然造一个新党，不仍是要与那中间要发生的右派奋斗么？我们必须以党造国，所以要改造国家，首先要改造党。今天与国民党右派的奋斗，便是改造党的必要的步骤。革命的青年，为什么怕这样的奋斗，而使国民党数十万的群众永远为少数右派领袖所愚弄欺骗呢？我们是战斗的武士，我们正需要一个用武的地方。所以，国民党越是有左派，我们越是要加入国民党，越是要死守住国民党，越是要不顾一切困难，结合成有力的国民党左派，为了改造国民党，为了改造中国而奋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国民党底分析*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陈　潭　秋

一　国民党的前身

国民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其组成分子为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及同盟会，同盟会实为国民党底骨干。

同盟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东京），其组成分子为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此三会各有其特点，而其合并为同盟会，则又因其有一共同之目标。试略述之：（1）兴中会为孙中山等所组织。孙为广东人，最先感受列强之侵略，同时感觉满清政府之不振，遂有排满思想，此即孙氏倡民族主义之动机。广州与欧西通商最早，广州商民及南洋华侨，渐形成商业的资产阶级，而有取得政权的要求，是为孙氏倡民权主义之动力。孙氏自身遍游欧西各国，为社会主义思潮所鼓荡，是为孙氏提民生主义之发端。孙氏三民主义在兴中会已植其基。（2）华兴会为黄兴、宋教仁等所组织。黄、宋系湘人，湘省在洪杨变乱中为南北冲要地，屡经战乱，反清保清的观念，在湘省人民均有较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五十九期。

深刻的印象。黄、宋排满的思想，即是沿袭反清的印象而发生的。清末失政，国困民穷，易使人发生刷新政治的思想，所以华兴会之成立，亦含有政治改革之元素。他们个人地位之降落，非革命不足振拔，亦引起他们的革命思想。（3）光复会为章太炎、徐锡麟等所组织。章等专攻汉学，承继明末遗老之光复思想，而有光复会之组织。所以这纯粹是复仇——反清复明——思想之组合体。

三个团体虽各有特点，而“排满”为其共同之目标，故三会有联合之可能。“排满”是当时清政府所不容的，三派分子皆因受压迫而东渡，而同盟会之组织遂以产生。而三民主义，亦正式定为同盟会之纲领。

自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知革命工作还未完成。然华兴、光复两派，以为目的已达，可以终止革命工作，遂与北洋派妥协，而谋夺取一部分政权，将同盟会改为公开的政党组织。未几与统一共和党等四团体合并而成国民党。

二　国民党改组以前的经过——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

国民党成立后，一般非革命分子想借议会政策掌握政权，故在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因是引起袁世凯之忌妒，遂联合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而成立进步党，与之对抗，并极力破坏国民党，使之内部分裂（如刘揆一之叛党）。国民党受种种压迫摧残，各省民党督军均被裁撤，同时宋案发生，遂有癸丑湖口之役——二次革命。彼时孙中山号召党徒，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仍持妥协态度，主张静候时机。黄兴死后，黄之部下多依附于岑春煊而成为政学系。中华革命党因政

策错误，以十余年之努力未得若何效果。欧战后，国内劳动运动蜂起，孙中山感受革命新势力的影响，遂有改组之动机，他们于一九二三年发表宣言和党纲，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始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

三　国民党历年来之教训

国民党最初取用议会政策，滥收党员，竞争选举，而于党底根本问题——组织和训练——毫未加以注意。故在议会中虽能占得绝对多数，而一经压迫，全国解体。这是第一次的错误。

国民党鉴于议会政策之失败，遂改用军事行动，想借武力打倒敌人。国民党本身并无可靠军队，故其军事行动，不过是收买退伍军人，勾结各地土匪，以图暴动，争夺地盘。对于党的主要工作——组织和宣传——仍未尽丝毫力量，党底内部完全是一盘散沙，而其所标举的三民主义，不但民众毫不了解，即党员自身亦多不明其真谛。当国民党努力军事行动的时候，其饷械之供给与各方之勾结，均以陈其美一人为主干。迨陈氏被刺，国民党之军事行动，自不能不因此失其活动。这是第二次的错误。

军事行动这条路走不通，于是改换途径，联美联日，想借帝国主义者帮助，以殄灭敌人。帝国主义者是决不愿中国资产阶级兴起的，当然不得给以援助，所以国民党联外的政策，又归失败。这是第三次的错误。

国民党至此时，仍未知从党底基础上用功夫，汲汲于想夺取政权，于是又走上了第四条错路——与军阀妥协，利用甲派军阀以倒乙派军阀。此时党内握有兵柄的党员，也多是与军阀

的行径一样，致中国的政局，终只能成为军阀嬗递的局面，这是第四次的错误。

四 国民党改组和党内现在的派别

国民党自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将三民主义加以切实的解释，重定了党底意义。自改组后，全国各地党部均注重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党底内部亦较前紧密得多，民众对于党也渐能了解和同情。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有了新生命了。但因党员底阶级性不同，党内形成左、中、右三派。

国民党本是各阶级联合组织的政党。因各阶级底经济背景不同，故其阶级性也必然不同，所以党内分出派别，是必然的现象。这并不是各阶级主观上故意分出来的。现在根据各阶级底经济背景，确定其阶级性，更依其阶级性分析其派别：（1）左派——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他们是被剥削的阶级，其经济地位是最低级的，其阶级最富于革命性。这一派党员，大半是改组后加入的，完全接收党底宣言和政纲，竭力做党底切实工作，反对军事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主张用民众底力量以实现国民革命，不与任何反动势力妥协。（2）中派——代表知识阶级、工商业家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其经济地位不固定的，其阶级性因之也是动摇的，所以最富于妥协性。这一派多系旧党员，多系旧党员中所谓元老派（大半是知识阶级），人数较右派少。他们也能看清革命的正当途径，他们也觉察了以前的错误，但终因其无固定的阶级性，又因实力太差，所以不得不屈服于右派包围之下，时与反动势力妥协。（3）右派——代表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大商人（如华侨等）、地主、军人、政客及洋行买办等。其经济地位虽不免

有时被剥削，但同时他们是居于剥削者的地位，其阶级最富于反革命性。这一派党员，多系旧党员中所谓太子派。他们大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的军阀以图存。他们忘不了军事行动，利用军阀以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等传统的政策，他们时常利用恶势力，故做出反革命的行动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

——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同志们：

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S. Y. 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此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如左：

（一）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个名称无论如何各地必须一致，促进会、后援会等名称，务设法改正。

（二）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促成会，如广东有两个促成会，湖南促成会之外又有后援会，都绝对的必须合并。若因鄙视商界或国民党右派不肯忍耐和他们对于此项运动之合作，便是很大的错误。至于大商阶级所号召的什么和平统一促成会等组织，民众不但不应加入，且须极力加以攻击。

（三）促成会当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分，必须竭力邀请他们加入，万万不可使促成会仅仅是个C. 与S. 变相的团体。

（四）在促成会工作的C. 及S. 同志须合组一党团，直接受C. 地委指挥。

（五）促成会对内对外的宣传，根本应该说人民自身要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不可在任何地方，任

何时机都宣传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使民众过于倚赖中山而轻视了自己。

（六）各地促成会及其所包含之团体，应立即分别通电指摘段祺瑞最近的反动政策，并宣告所有善后会议的议决案，人民均认为无效。

（七）向他处促成会鼓吹由上海促成会召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的必要；但实行时期须候C. 中局审定。

（八）我们此时不但要集合已有的社会各团体于促成会，并且须乘此时机努力使与我们有关系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内容充实起来，的确有些群众，不是空招牌的团体，并应乘机组织新团体，如教职员联合会、公私机关职员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

（九）各地促成会也应该注意地方争斗，鼓吹省长及县长民选。

C. P. 中央局 T. S. Chen[1]
S. Y. 中央局 Y. N. Lin[2]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2〕即林育南。

PDG

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张　太　雷

一

智识阶级，因为他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并且统治阶级需要他做压迫他阶级的工具，他很有钻到统治阶级里去的机会——所以常常是一个反革命的。不过青年学生，他是青年，总比较富有革命性一点，其中往往有少数参加革命运动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在历史上，青年学生尽力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先例很多，俄国的学生在俄国的农民和工人中很做了一些宣传和组织的工夫，而尤其殖民地上的青年学生，格外地趋向于革命。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殖民地上的小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掠已渐次贫困，以致青年学生在学校里读书常觉得经济的压迫；而一方面又因为本国的经济不发展，青年学生对于他们将来卒业后的社会地位不由得不起恐慌——有这些原由，足使殖民地上的学生渐趋于革命的道路。不过不管他是殖民地的学生或资本主义国的学生，终归是智识阶级，这阶级终是摇动的，如果有机会去依附统治阶级，他们就立刻揭下了他们的革命面具。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学生，和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学生领袖；或因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而满足，或

因防卫自身优越地位，而甘做反革命运动。这是个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应当记住的。

证之各国先例，在无产阶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青年学生常常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他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去呼醒他们起来奋斗和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中国无产阶级运动正在起头，并且中国农民的觉悟还很少，所以能够得到一班中国智识阶级来做“往民间去”的运动，如俄国智识阶级以前做的一样，对于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大有裨益。

二

凡成为一个革命运动，必是能脱离一切旧的因袭的社会观念。所以我们在学生中第一步的宣传工夫，就是要扫除学生的旧社会观念。这种工夫在五四学生运动中曾经做了一些，但是可惜这种功夫只做了一点，没有能普遍，就终止了；在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对旧社会思想的攻击，几乎完全停顿，一切新出版物都换了战斗方面。因此，如果我们要学生革命化，必须重做一番新工夫。尤其在现时，有一班提倡东方文化者，他们是妨害青年脱离旧思想的更厉害的障碍。我们要攻击他们这种东方精神文明和西方物质文明的对峙区别，我们应指出“精神”没有独立的可能，而是跟着物质的；应指出世界文化是整个的，虽然东方的主义现时与西方的不同，然而西方的是更进步的，而东方的文化是一天一天的进步，要赶上西方的以趋于世界文化的一致前进；所以保守这种东方文化，阻止东方文化这种进步的趋向，乃是反革命的。我们要给中国青年学生一种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要使他们知道世界是整个的，

是进步的。

有一班青年他能脱离中国的旧思想，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性，仍旧不能走到革命的一方面来，虽然他们有革命的热忱，然事与愿违，常常做的是反革命的事业。我们应当指出社会的改革和人类的进化，是靠人们集合的努力，个人的行动，非但是于事无济，并且往往有相反的结果，以免青年脱离了旧思想又走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脱离旧思想的学生，更容易走到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我们应当说明这种自由主义的虚伪和现时他在欧美各国的破产，而在中国更没有立足的可能。基督教的宣传，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是最危险的东西。虽然在中国以前革命的青年做过了一些反基督教宣传工夫而给他一种打击，中国青年学生仍旧多受他的影响。只有继续的有系统的宣传，指出教会帝国主义侵掠的背景和基督教现在在欧美的破产，才能打破彼在中国青年中的势力。

只有把青年的一切旧思想和迷信都打破了，才能把我们的革命主义灌输给他们，使他们到革命的旗子下面来。我们在每一种攻击之中，我们须给青年学生明白我们所主张的革命主义是什么，使不致无所适从。只有以各种他们能见得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义，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们的主义。

三

现今中国目前的政治运动，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运动；所以我们有极力引导中国学生参加这运动的必要。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和现时各殖民地上的国民运动，看见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常常积极地参加这种运动，并且他们是这运动不

可少的分子；他们并且是常居领导这种运动的地位。

我们领导他们做国民运动，要使他们知道没有农民工人的参加，国民运动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有指示给他们怎样到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宣传和组织的责任。近工业区域的学生应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以帮助失学的成年工人和青年工人。一切游艺会、体育运动会和政治讨论，学生应邀请工人参加，以增长他们的政治兴趣和建立学生和工人间的团结。工人罢工的，学生能代找外面的声援和实际捐款帮助罢工者，将使相互间的关系亲密，因此在国民运动中可得合同进行的可能。暑假中学生组织乡间的旅行，应到农民中用戏剧演说等做一种唤醒他们的工夫。对于农村间的运动，我们尤当注重于初级师范的学生，他们大半是将来农村小学的教师；所以他们在农民中很有接近的机会，尤其是他们对于青年农民的影响。

要学生做国民运动，首先还是要学生自己有群众的组织。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生会的群众据说有六十万，虽然没有好的组织，总算是有群众。而自从“五四”以后的学生会就毫无群众可言（除掉一二处以外）。所以现在最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把学生会实在的组织在群众的基础上。学生会的组织，并须注意到各内地的中小学校，这是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

学生会常常只能在一种运动时有些群众参加，而等到这运动过后，即失了实际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空的团体，一切活动亦都停止了。这原由固然很多，而其中最要的就是学生会没有一种事业，使他引起学生群众的兴趣来参加。

学生会报是一种对于学生的宣传品，更是一种团结学生的工具。除了政治的批评和关系思想理论文章之外，尤应注重于

学生日常的生活，如此才能引起学生对于会报的兴趣。并应极力鼓励和引诱学生在会报发表意见，这是领导学生参加学生会活动的最好步骤。

学生会应时常举行演讲大会。演讲会一定要于事前有极好的预备，讲题应选择能惹起学生兴趣和切实际的，并在演讲完后，听讲者得自由发问。演讲会完后，并应布置一些游戏。

学生会应把体育运动事业，当作自己的工作。普通这种工作的领导，都在教会的青年会手中，这是一件最可担心的事，不知中国多少青年因此而受教会的影响！

俱乐部、音乐会、戏剧团等等，都是引诱学生集合到学生会来的妙法。

以上都是对于如何能使学生集合于学生会中而参加他的活动，我们应注意并极力提倡。我们知道如果学生会没有群众，他没有力量去参加国民运动，并且在学生中的宣传亦难于收效，因为学生会是对于学生最接近，而且是最有机会宣传学生的机关。

四

当现时资本主义到了他的末期的时候，当他猛烈地趋向于崩溃的时候，非特一方面在殖民地上和新被征服的中欧各国，使一般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无产阶级化，并且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国——包括英美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亦渐次摇动，呈一种不安分的现象，这都是资本主义的狂妄的极端集中的结果。这种智识阶级的渐次无产阶级化，因而趋于革命的道路上来的现象，已经惹起世界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之

注意。因为即使不能使这般无产阶级化的智识阶级来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可以使他不到反革命旗子下去。

根据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出版的
《中国青年》第六十二期刊印。

中共中央局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一）现时北方的政局段派势力已有日益扩张排斥其他反直各派之倾向，然段在此种困难时期，既欲召集善后会议，此种善后会议固然能为军阀及接近军阀之所谓名流所组成且不得不请国民党人到会。中国社会团体大抵尚弱，劳动群众之组织尤甚，决无在现时即自行召集人民的会议以与段之善后会议对抗之可能。政治局根据此两方面之事实，认为共产党对于善后会议，当采取下列之策略：

（A）共产党在群众之前，当曝段氏政策之真相：段氏之善后会议纯以团结安福系军阀以图继续军事行动摧残其反对派之军阀为目的，此种政策不但将使国内重现极反动之政局，且使帝国主义又有所以借口而施行干涉。同时，段氏且欲借善后会议以取得合法政府之资格而受帝国主义国家之承认。共产党当使民众向段政府要求，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此等代表的人数当占善后会议人数三分之二。此种参加即以阻止段氏计划为目的，并使段氏立即召集国民会议。

（B）因须选举人民代表，故当要求在北京召集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大会。

（C）凡尚无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处须立即组织（尤其是工

人农民的区域)，使民众咸认为真正人民的组织。

(D) 预备一切，以便段氏拒绝人民要求召集其段氏式之善后会议时，群众能举行示威、抗议、罢工等表示反对。

(E) 开始建议于各国民会议促成会请其选举代表到北京开联合大会，每一国民会议促成会派代表约自五人至十五人。

(二) 政治局以为国民党领袖之消极抵抗政策——即既不公开反对善后会议，亦不参加——实为国民党改组前之旧病之遗毒。以前国民党之所以不能成为群众的党之原因，正在其不做政治宣传；故共产党当使国民党部及对国民党表同情之群众赞成上述之各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要求——即主张参加，批评善后会议，催开国民会议。

中 央 局

一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大会听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的报告之后，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第五次大会对于“联合战线”及“工农政府”的解释尤为详尽，一方面可以防止以后各国共产党右派对于这两种重要的策略之机会主义的曲解，他方面亦可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左稚病，如此才能确实领导各国共产党获得社会民主党下的与无党派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以联合防御现时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的猛攻并进而推倒之。

大会对于国际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专责成。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PDG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欧洲之所谓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不得不使社会民主派及劳动官僚（劳动党）执政的时期，业已结束，英美重新发现反动派的政府，欧洲反动潮流昂进，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更加猛进，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内发现极厉害的经济危机的很好的证据。

二、最近英美政府的更迭，法意反动潮流的增高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出，所谓小协约国，简直已成帝国主义的附庸，绝无疑义。英国保守党上台和美国共和党执政之后，埃史笃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内，对于农民工人的镇压政策便格外厉害起来。波兰及埃史笃尼亚之资本主义法庭杀戮共产党员，巴尔干半岛上预备对共产党作总袭击，这种现象，都是号称“独立”的小国家，对于自己的新主人（保守党和共和党等）均贡礼，那些新主人正要吸这些国内劳农革命首领的血哩。

三、英国保守党上台之后，立刻便对埃及人民作武装的攻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PDG

杀，以及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威吓，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的开始。

四、英国九个月的所谓劳动党政府——他的首领便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首领，麦克唐纳尔——对于工人执行资本家的政策，对于东方民族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既没有能蒙蔽国内的阶级矛盾，亦没有能缓和殖民地的反抗，完全没有满足资产阶级的希望；却正相反，使国内的阶级冲突更厉害，殖民地民族更加毒恨帝国主义。

五、劳动党九个月的对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直到他后来因为英国贵族借口伪造的季诺维埃夫的信而攻击下台，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人运动大显左倾，群众之中对于苏联的同情确见增长。

六、英美想以道威斯计划变德国成殖民地，指定最靠得住的地方以便美国投资，想剥削德国工人以偿英法的战债，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想销售德国货品于苏联，向苏联进攻——这些新计划，使欧美反动潮流增高，各国资本都对工人进攻。

七、世界无产阶级对抗这种反动潮流，应当有世界的职工运动的统一。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赤色职工国际，现时的职任，就是要统一世界的职工运动，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抗资本的进攻。要实行这一重大的职任，必须先有共产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统一意见，普通而论，共产党内亦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亲密结合地进行职工运动，无产阶级的前锋才能坚持自己的地位，以求反守为攻，而且使无产阶级群众脱离卖阶级的工贼和职工官僚的恶影响。

虽然亚姆斯德丹黄色职工国际及国际的社会民主派，尤其是德国，竭力破坏工会的统一，然而英法等国工会中的少数革命派的运动渐渐兴盛，他偶和苏联的革命工会日相联合——这

种现象可以保证统一职工运动的胜利——就是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原则及策略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第四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前次战争刚刚结束，虽然直系军阀自上至下地瓦解了，而胜利的反直系军阀非但没有一派军阀能代直系而统治中国，并且他们中间的冲突形势又日露险恶了！第二次战争又有立即爆发之可能。

前次战争的结果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优势，给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使日英美帝国主义间在远东的冲突又形加紧，近日英美日的备战所以日益积极。这种英美日间的冲突加紧，更使他们有利用中国军阀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之趋势，于是更促进现在对抗的军阀之间的战争。

在这种国内军阀势力摇动之中及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剧烈冲突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如潮涌而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动之开始。

现时在中国军阀政治崩溃的过程中，这种民众运动怎样才能使军阀不再巩固他的势力延长他的崩溃过程，怎样才能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之实施于中国，这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真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

我们知道中国现时国民运动得到一个时期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发展的机会，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因为自从一九二三年中世界资产阶级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形势波及中国以来，就是从“二七”，帝国主义及他的工具中国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势力取进攻的策略以来，中国的国民运动非但不因为他们的进攻而低落反而日益增高，这种中国国民运动的逐渐高涨等到北京政变后反动的束缚略加放松时，就得到一个猛烈的发展的机会了。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在事实上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以来，虽在最重压迫之下，但仍旧是继续高涨而做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国民运动的发展是成为正比例的：阶级斗争足以促进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亦足以增厉阶级斗争，这是在广东过去一年来的经验可以证明，并且在现时亦证明给我们看。国民运动现时正高涨而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现时在工人运动中各地都发现工贼，并且黄色工会亦开始萌芽，这是表现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方法更形厉害。所以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一般党的政治活动（其实党的这种政治活动是为发展工人运动，是使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工人经济组织可以发展）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说本党不应注意职工运动而只应注重政治活动，而是说这两种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因为他们是互相影响而促进工人阶级

的组织与发展。

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虽然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能防止在某一时期中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本党党员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扩大执行委员会时立即纠正同志这种错误，并且自后逐渐使本党对于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于正轨。

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形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

大会并望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

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二）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PDG

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阶级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1]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

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三）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并有了一万五千万以上的银行资本，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外货外资），另一部

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自己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各种工业）之危险，比此时的军阀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尤其在广东，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

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因为近来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这些争斗中，如沙面罢市及商团事件，都表现出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这样对垒的形式，在商团事件中，尤表现得十分明显，并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形式。

直系军阀倒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受一大打击，同时中国的军阀已在分裂崩溃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渐渐起来，虽然还幼稚，而要求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普遍全国，参加此运动的是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大商买办阶级及工业资本家，只向军阀政府请求加入国民会议，而不愿与下层阶级合作参加此促成运动，并且他们和军阀都已感觉得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对于他们的危险，而谋有以抑压之。因此，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四）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及其“左”倾右倾之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中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到了第三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三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第三次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后，我们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们疏忽了第三次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

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这种错误，以实际工作中得力的同志为尤甚；（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怀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本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这些错误，都指摘出来，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这些错误与危险，不但现在仍旧存在，即不存在而将来也再会发生，所以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全国大会重要的职务。

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

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或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他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这个革命的

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如督军制、雇佣军队制、政权分裂、农民屈伏于官绅、人民无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的奴隶中国（强迫实行不平等条约，支配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管理中国交通，剥削中国劳动力，外侨享受种种特权，军队军舰驻在中国为其外交的后援，设立教育机关教堂及新闻愚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五）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

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

冲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失策，并附和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左[2]派之间，操纵取利。在我们党的扩大会议后，我们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以抵御其进攻，同时并指摘中派之游移。自此右派不但攻击我们，甚至利用帝国主义者陷害我们，或联合社会上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和我们对抗，他们承认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还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我们的指摘，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然他们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数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及本案决定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左列几项新的决定：

（1）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2）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

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3）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4）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5）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6）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

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我们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或改良的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原铅印本为“各被压迫阶级”，后修改为“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

〔2〕原文如此。从文意看“左”字似为“右”字。

PDG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中国职工运动的过去状况及其现在的趋势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直接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间接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但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者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所以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决定中国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努力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但同时决不要忘了自己的独立工作——职工运动。

中国的职工运动一开始便几乎完全在共产党指导之下，那时的斗争虽然还在一种原始状态里，然而一方面已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始，别方面已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新起的生力军。随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民族运动的进展，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到职工运动。"二七"事变之后，中国职工运动显然已经经过两个时期，如今已到第三时期了。

"二七"以前，中国最初期的职工运动曾经因欧战期及欧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势力稍稍减弱而取得一种初时的高潮的形势。“二七”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在中国北部得势才很明显地、很强暴地压迫职工运动，几乎消灭所有公开的工会；同时欧战后的世界经济恐慌流入中国（尤其是纺织业），使本来已是供过于求的中国工人，几乎取纯粹的退守态度，就是南方的职工运动也几乎完全依附民族运动——这是“二七”以后的第一时期。（一九二三年“二七”以后，一九二四年二月第一次铁路代表大会以前）

当直系军阀尚能维持均势而江浙工业区勉强恢复经济上的稳定状态的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大约表面上只有局部的变化：北方铁路工人，曾经在军阀高压之下秘密进行全国的联合——可是这种尝试，只能勉强维系各路路工领袖分子之间的关系，工会组织只有山东胶济路出现一次，然而不久公开的活动仍旧被禁止了。并且接着五月间京汉路又受军阀的第二次重大打击（铁路总工会及汉口职工运动的重要职员被捕）；同时，湖南水口山矿工俱乐部也被军阀摧残了。上海方面丝厂工人、纺织工人、烟业工人以及长江一带的手工业工人，曾经屡起屡仆地开始斗争，亦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束缚，还没有能巩固职工运动的基础。可是，南方的职工运动却在这一时期有相当的发展——原来民族运动的国民党——处于英美直系压迫之下，屡试其纯粹军事行动而不成——开始倾向于求劳动群众的赞助，广东方面的职工运动便很得了些公开的发展机会（沙面罢工等）。国民党的改组，不但影响南方的职工运动，并且上述的北部铁路工人及江浙工业工人的运动，也和它有些关系。不但如此，国民党已经开始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合作——素受国民党影响的海员工会，便得公开的参加世界运输工人会议，加入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结合。职工运动在这一时期，确有由退守的

地位渐进于进取的趋势——这是“二七”以后的第二时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以后，十月北京政变以前）

总之，这两期的情势，便是在“二七”严重的打击之后，工人阶级力求反守为攻的趋势。一方面，军阀、帝国主义者中间的矛盾冲突，别方面，民族解放运动乘机发展，工人阶级也就趁着这种趋势而求进攻。因此工人阶级与民族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实际上的结合。

虽然如此，民族运动既然因为工人阶级的参加而大增其革命性，帝国主义及军阀便格外要扑灭职工运动，高压的手段和强暴的政策便也日益厉害起来（广东的商团，上海的外国政府，北方的直系军阀）。再则，民族运动的进展，亦就一部分是中国经济里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认识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也就竭力想利用职工运动，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民族运动的附属品，更有那反动的竟要使他成为官僚军阀的工具（国民党的右派在各地都勾结各种派别的“工贼”以抵制纯粹的阶级斗争派的共产党）。“二七”以后的职工运动，一方面遇着外部的更厉害的镇压政策，别方面发见内部的专想利用工人阶级的“工贼”，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它的发现和民族运动的进展很有关系——直接的是资产阶级奸细破坏职工运动，间接的是帝国主义及军阀减弱民族运动中的革命力量。

北京政变之后，职工运动又有开始一新时期的可能。直系军阀势力衰败后，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国民党想利用的军事势力，所谓国民军，可以说已经侵入北方。因此，政局略有左倾的现象——国民会议的召集，临时政府亦不能不声言赞成，并且有公布劳动法的拟议。而且全国国民会议的高潮里，国民党以及工人阶级自己都要求工会参加讨论国是的会议。所

以，至少在国民军领域内可以公开组织工会，便是其他地方，也可以有公开工会的可能。可是这期职工运动公开的可能愈多，工人势力膨胀的机会愈多，帝国主义的力谋摧残也愈急，军阀及资产阶级奸细（“工贼”）的力谋破坏或利用的方式也愈复杂——这是最近——“二七”后第三时期的职工运动大概的趋势。

（二）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之关系

照上述的职工运动过去状况及现在趋势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而且实行上也在于能适应民族运动进展中职工运动易于发展，同时亦易于受民族主义者之利用的情形，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进展，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

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进行职工运动，往往容易混乱阶级的观点，而发生种种弊病。去年五月共产党扩大中央会议以前，职工运动差不多与民族运动混在一起，有些地方如广东的职工运动完全拿到国民党里，而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由此所发生的结果，一方面破坏了自己阶级的独立工作，别方面因此发现少数工人（即加入国民党者）之官僚化。同时，共产党在职工运动的原始时期，本来只做经过少数特殊工人以组织工会的工作，到了和国民党接触，往往以少数特殊工人的接洽而使职工运动方面只是将就国民党的政策，而真正的工人群众便不免对共产党员发生怀疑。因此，在民族革命运动时期，尤其是与国民党合作时期，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A）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而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

（B）为在国民党中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起见，到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不过国民党组织尚未达到的工人区域内，非必要时，不必急急为国民党组织党部。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危险，还不在于工人加入国民党，却在于共产党在真正工人群众中没有势力及没有独立的职工运动。所以在此等区域里应当以切实组织工会及阶级的宣传为第一要务。但是遇着国民党来着手组织时，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格外加紧我们在工人群众里的工作，以竖立我们的势力，另一方面还要将低层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党部，以免国民党联络少数上层工人，欺骗工人群众。

（C）至于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并须组织工厂小组（或工会小组），取得群众信仰以备彻底改组这种工会。尤其在工人与企业家发生经济冲突时，我们应利用此种冲突，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指出国民党的本性，使之趋向于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D）民族革命运动的时期中进行职工运动，须普遍地防止官僚化、机会主义化和工团主义的左倾的幼稚病。民族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各有其出发点，我们应向工人群众明白

解释。所以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民族革命，应根据工人阶级自身的、具体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决不应笼统地抽象地宣传三民主义或孙中山个人。

（三）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

民族革命运动时期中职工运动里，尤其在现时工会有公开的可能的时候，不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非常注意，便是普通的工会里也很容易发现各种反动派：军阀官僚的奸细、工头等——国民党右派现在有集中这些反共产派于自己之手的阴谋。反动派在国民党有政权的地方往往受国民党的军阀官僚的利用，假借官僚的政权，行些市惠政策而蒙蔽群众，把持工会。他们竭力排斥共产派，往往因此而有分裂工会的倾向（如利用同乡帮口等观念或组织）。我们的策略应当：（A）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尤其是要使群众能自动的来力争，勿使群众觉着工会的恢复完全是国民党或所谓“进步的”军阀的恩惠；在反动政权之下的地方，公开工会的宣传，也同样要努力进行。总之，工人阶级初步的政治权利——群众的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的要求，我们应当认为现时亟须提出的口号。（B）主张工会的统一——我们决不在已有别派有群众的工会之处分立同样的共产派工会，而且要加入这种工会工作，为各种具体的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以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仰，而暴露反动派的真相。（C）职工运动中我们应当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过高的口号既不但不能真正引起群众自动的斗争，而且容易受反动派的中伤，在失败后借口归罪于我们。（D）工人阶级固然可以赞助资产

阶级性的民族革命运动，然而不论企业家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私人或国家，进步的或反动的，工人对于他们在经济斗争里是一样的关系——便是劳动对抗资本的形势。所以职工运动遇着那种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我们应当指导工人对他们绝不让步地斗争，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斗争的攻势，并且我们应当利用民族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联络，而得步进步地向资本进攻。此种阶级斗争的进行，必然能打倒工会各种反动派，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因为他们在这种地方必然显出他们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真相。

（四）职工运动中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取得指导的地位，但是向来我们的工作，往往偏于技术方面，纯粹的工会书记的工作。现在必须立即开始切实的党的工作：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宣传上的政治教育在现时已经非常重要，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解释中国政治状况及时局变化的意义（根据本党政治机关报及各该地本党党部的议决案），详细说明国民党及民族革命的意义，国民党右中左三派的性质及其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系；阐明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相互关系及职工运动的阶级性，在每个经济斗争中应当指出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说明工人阶级须有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及策略，以具体的事实证明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共产党；浅显地解释工人阶级及职工运动的世界性及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社会革命的关系。此等宣传当有经常的机关及计划。至于党的组织，则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可缓的工

作，因为工人群众中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应当赶紧组织工厂及铁路等处的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负有指导工会工作或组织工厂小组的责任，担任普遍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工人党员的训练等的工作。我们在职工运动中，必须充分有上述的宣传与工作，才算是共产党的职工运动，而免得工会主义运动的危险。

（五）职工运动的组织问题

自从“二七”以后职工运动有复兴的趋势时候到如今，虽然中间本党中央扩大会议（去年五月）曾经指出以前组织工会方法的不完善，并且决定从事于“工厂小组”的工作，然而进行的成绩极少。现在的时势，职工运动得更多的公开的可能，应当赶紧着手实行工厂小组的工作，庶几能真正深入群众，方才能保证我们对于工会反动派的胜利，而确立我们职工运动的基础。

一切反动形势之下固然可以先组织工人互助会、俱乐部等灰色组织，以进行职工运动，但是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努力以工厂小组的方法去组织工会，现时虽有公开的可能，一切工会仍旧应当由工厂小组组织起来。这种工会方能在群众中有深切的关系及巩固的基础，不至于像以前一样，遇着反动潮流便完全瓦解。

工厂小组，在每一工厂或作坊中，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组织起来。一俟发展，就依据工厂工作部分，而分为若干小组。小组人数不定（只限于某一工作部分），倘人数过多不便开会，可组织十人团，而每组可由十人团的代表选举三人组织小组干事会（小组人数少的只要组长一人）。全厂各小组代表

大会，为厂中最高机关，选举若干人（人数按情形而定）组织某工厂委员会。再由各厂代表选举若干人组织某企业或地方工会。不过在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小组应绝对的秘密，并且在反动派之工会里边最适用这种组织。

小组为基本组织，这个意义是因为工厂工作部分相同，便有同一的利害的缘故。故小组决非十人团可比，而十人团又决非基本单位组织，因工厂基本单位是依工作部分而分，决不以人为单位（如纱厂之细纱间、弹花间、打包间、磅纱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打铁部……等，这各间各部都是工厂的基本单位）。我们若忽视了以上的意义，便容易将十人团认为基本组织，或是将小组当作十人团。

小组为严重压迫之下的一种秘密组织，也就是我们职工运动发展的原动力，他的职能如下：（一）小组是潜伏于一工作部分的组织，不但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了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组织；（二）小组是一工作部分的核心，在未有工厂委员会之前，便是工厂的核心，负有组织工厂委员会的责任，随时做广泛的组织工会的宣传和鼓动，并利用工厂压迫工人的事实，引导全厂工人起来反抗，以集合群众而扩大组织；（三）工厂临时发生冲突及其他行动，在未有工厂委员会时，小组应积极参与来指挥全厂工人而奋斗，但在工厂委员会之下的小组，则听委员会之命令而活动；（四）小组在工厂里，引导部分或全厂的工人奋斗，而能得着胜利，在组织上定能有发展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五）工厂小组，发展到二组以上，就可起来组织工厂委员会。

小组不但是训练工人的单位，也就是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

量的养成所，其训练的方法：（一）每一星期或两星期开会一次；（二）告诉开会的形式和召集会议的方法，使每个组员能在工厂中开会，或召集其他工人开会，或发生冲突时的临时会；（三）应取本工厂发生的事件为讨论材料，指示他们活动和反抗[1]的方法；（四）会议时各组员应有报告，而加以批评或讨论，借此来训练组员成为健全分子；（五）灌输劳动常识（注意阶级的意义及阶级斗争的方式，最好取浅近的事实作比喻，力避抽象的理论）；（六）每次小组会应做含有批评的时事报告，以灌输政治常识，引起他们对政治注意。

（六）职工运动的具体计划

在第四次大会后，本党职工运动的重要工作：

（一）产业工人的运动

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最大的产业除了铁路、矿山、海运、纺织外，其余尚在幼稚时代。这类产业工人是本党的基础，我们要特别注重的。

铁路工会运动，自遭“二七”失败后，即到了消沉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中只成立了一个铁路总工会，而实际上没有获得真正群众的基础。以后铁路总工会的责任：（1）应派人到各路进行下层组织；（2）应利用各种机会恢复原有之被封各路工会；（3）应在未曾组织之沪杭、沪宁、中东、南满各路速进行组织；（4）各路须努力发展本党的组织而成为各路工会的中心；（5）为使总工会与各路发生密切关系，应不时派人巡行各路并随时指导其工作。

矿工运动在扩大会议后，在山东虽着手进行，但因此处同志运动方法错误，也没多大发展，如唐山、湖北、奉天、山

西、湖南几个大矿区均没有进行，固然因经济人才的限制，但本党对于以上数十万产业工人当不能随便放弃，在第四次大会后当着手进行。

海员运动，在香港、上海虽说初步进行，实际地没有深入海员群众中，在以前我们想完全借国民党来整理海员工会的政策，已不成功了。现在应一面由我们直接的去活动，活动的方法：(1) 在海员工会进行本党的组织，以冀由上层改造海员工会；(2) 在海员工会下面之各帮公所及寄宿舍俱乐部去进行工会小组及党的组织；(3) 连络未加入工会及公所之海员组织俱乐部这一类的团体；(4) 派人到海船上去活动。以上工作进行到相当程度时，须连络起来改造现在之海员工会，而成为产业的斗争的工会。

纺织工人，在产业上亦占重要地位，单就数量上看来，亦不可忽视。本党在最近时已渐渐的注重这种工人的组织，并且各地着手进行起来了，各地组织进行到相当程度时，须联络组织全国产业的工会。

（二）各工业区的工作

上海、汉口、天津是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区域，我们对于这几区的工人，能完全组织在本党指挥之下，则本党职工运动的基础更稳固了。以后对于这几区职工运动应特别注意。其次青岛、无锡、南通、大连等也应注意。

（三）大城市手工业工人的运动

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手工业工人在全国工人成分上，实占大多数，尤其是各大城市之手工业工人，对于职工运动上更有关系，故以后对各大城市之手工业工人，我们应以相当的力量去组织及宣传。

（四）妇女劳动及青年工人

中国虽说是新式工业落后的国家，若就工人中妇女劳动日见增加的趋势看来，差不多和欧洲情形相同。而中国妇女又沉留于宗法社会，在职工运动发展上，实有很大的阻碍。我们要解决这种困难，必与妇女部协同进行。

青年工人在职工运动中，占重要地位。并且是最勇敢而最有革命性的，就以前中国职工运动看来，青年工人差不多处在中心地位，以后不但对于青年工人须特别注意，并在本党指挥之下职工运动里应帮助青年团进行青年工人运动。

（五）合作社

合作社（生产的、消费的、金融的）也是劳动运动中最要紧的工作，他是经济利益之下团结工人、引导工人从事经济的斗争的一种方式。我们同志应该在各大产业区及手工业地方努力启发此项运动。我们的合作社工作是立足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应力避小资产阶级改良的观念的渲染，这是要注意的。

为执行以上职工运动的职任起见，我们的党应当有下列的办法：

一、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导上述的各种运动，并负切实调查劳动状况之责任做成统计。

二、每地方之工农部，亦应特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专管职工运动，执行中央工农部的命令，负职工运动责任的地方委员应当和当地各工会里的共产党支部发生经常的联络关系，不仅供给他们以定期出版物、传单等指挥他们，并且要参加支部或小组会，作切实的训练。

三、中国地域很大，中央为明了全国实际情形，随时特派巡行员，并同时便做职工运动的指导员。地方工农部将每月或每次工作的成绩须向中央报告。遇必要时中央得召集全国或某区域之职工运动委员开职工运动讨论会，审查过去成绩，并规

划以后进行的方法。

四、中央机关报里，职工运动也要占第一等地位。

五、中央工农部及地方工农部应编辑极浅近的各种小册子。

六、各地宣传部应常常注意当地职工运动里的需要。

七、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而筑成统一的工人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原铅印本为“指示他们活动和反动的方法”，后修改为“……活动和反抗的方法”。

PDG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

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二、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债……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三、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借贷之苦。”

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

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

四、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此后，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争斗之可能，更因国内客观条件而日多。我们的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既然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我们对于农民，便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便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例如农民协会每为地主阶级勾结右派军阀官吏所压迫或捣毁，最近广州之市长选举，竟将二十余万负担市政费的市郊农民除外。

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可是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也可发现我们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三）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

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五、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以工农阶级势力影响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

在农民运动中，我们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何为中派，何为左派。我们并须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策略。这种宣传在广东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失败、反共产的鼓动散布于乡村而与大地主结合之后，更为必要。

六、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一）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应在此种结

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第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第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第三可使国民党的政策左倾；第四国民党政府如不能满足农民这种要求，可使农民对于国民党加以深切地认识。（四）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皆应求国民党与以物质的帮助。

七、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

土匪与农民之关系亦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广东已知之事实言之：（一）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以适当的联络；（二）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对于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三）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

八、在南方日益发展之农民运动经验，我们应利用之向各

地工作。以后凡本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及我们工会运动所及之地方（如沿铁路、沿矿山及各大城市四郊等）——尤其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务宜利用在广东所得之经验和本议决案之种种方法，尽可能地进行。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

九、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然而青年运动的发展应由青年自己担负，因为他们自身是青年，有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所以容易了解自身的需要，对于青年工作容易发生兴趣。因此在各国做青年运动的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这是为青年运动发展起见，青年运动的发展当然是发展共产党指导下的一般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此地我们要明白在许多地方，组织工作是与政治工作常相关连的，所以绝对的固守着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的原则，对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会有妨碍的。总之，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

C. P. 与 S. Y. 的扩大会议的议决案上都明白决定 C. P. 与 S. Y. 间的关系，但是始终没有能实现，而 S. Y. 不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其原因是因为 S. Y. 始终没有懂得自己的工作是哪些，自己团体的性质是怎样，S. Y. 的团员有许多是超过年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PDG

龄的，而所做的工作是与 C. P. 没有一点分别。在工人运动中是做一般组织工人的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只是用学生做一时的群众政治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代替党做工作；同时 C. P. 也没懂得青年运动，以致没有指导和帮助 S. Y. 工作，而有时且妨害之。这一种现象，非但使青年运动不能发展，并且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虞。这是要根本改过。C. P. 的以后应尽力帮助 S. Y. 工作，如派 C. P. 同志担任 S. Y. 重要工作及帮助 S. Y. 训练或教育团员等。

C. P. 与 S. Y. 应发生亲密的关系，这是很重要而且必须的，但这又不是死条文规定所能达到。可以达到的方法是要两个中央在实际工作上发生密切的关系。C. P. 与 S. Y. 之关系的具体办法，第四次大会赞成以少年国际关于此项之五条规定为根据，由 S. Y. 第三次大会斟酌规定之。至于 S. Y. 青年化一层也是很重要的，C. P. 对此也应尽力负帮助与指导之责。怎样能使 S. Y. 青年化，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S. Y. 分子的青年化固然可用机械式的办法尽量把超过年龄的团员送入 C. P.，并且以后不再介绍超过年龄的入团。然而中心的问题还在 S. Y. 怎样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 S. Y. 组织。

目前 S. Y. 的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有三方面：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

一、青年工人运动　一般 S. Y. 同志都知道这是 S. Y. 最重要的工作，S. Y. 大会与中央亦是同样的主张，然而至今没有一点成绩，是因为对于一切议决案没有懂得以致未能切实进行。所以在 S. Y. 第三次大会对于青年工人运动应有具体的进行方针指示 S. Y. 中央，而中央能依照切实去进行。

中国青年工人运动，在一般讲起来，还刚进组织的时期，而主要尚在宣传的时期。如何使我们的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是 S. Y. 目前最重要而唯一的问题。

要使我们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我们就须组织俱乐部、学校……等机关以与青年工人接触而得从事宣传。在无工会或有工会而不受 C. P. 指导的地方，S. Y. 应利用此种青年机关援助 C. P. 组织工会或获得领导地位。S. Y. 是代表青年工人的，由这种青年工人机关，拥护青年工人的特殊的经济利益，并在工会内要求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须有同等的地位，并使工会能提出青年工人的特殊的利益。同时又须调查青年工人的状况，以期得到一个明了的观念，再来定更适当的宣传、组织和教育的方针。

平民教育的运动，现在有发达的趋势，这是我们 S. Y. 应当极端注意的。因为这是 S. Y. 与青年工人接触的最好的机关，在这里面，S. Y. 可以对他们宣传并可以增加他们的智识，使他们一天一天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尽量吸收青年工人加入 S. Y.，是 S. Y. 最重要的职务。

二、青年农民运动　这种运动目前还是一种调查与宣传的工作。乡村教育是 S. Y. 最要注意的，如何使 S. Y. 学生分子散布到各地乡村学校中去当教师，以与青年农民有触接与宣传的机会，又须极力吸收小学的教师去负这种责任。在已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应利用这种组织做青年农民的宣传并可着手做组织的工夫。S. Y. 应协助 C. P. 组织农会。

三、学生运动　S. Y. 的学生运动在过去都是用学生做一种一时的群众的政治运动。待政治运动终止之后，学生运动就无形停顿或消灭。所以学生运动的无进步，是由于 S. Y. 大部分同志不明白学生运动之意义与重要，以致学生运动策略多有

错误。

学生在目前政治运动中，是重要的推动力，所以学生须参加这种群众的政治运动。然而始终这不能算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S. Y. 在学生中的工作应有长期的宣传，根据于他们的状况的宣传，和引导他们为自己利益而奋斗。一时的群众运动是S. Y. 对学生宣传的最好机会。这样 S. Y. 才能得到学生的拥护，能指导他们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出力，能引导他们做一般的政治活动。

S. Y. 在各国都自然要做政治活动的，而在中国的状况之下尤其是紧要的，但是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活动中须服从C. P. 的指导，不然，将使运动不能统一进行。

中国 S. Y. 除掉资本制度发展国下的 S. Y. 所担任的职务——在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宣传及青年工人经济奋斗的指导——以外，尚有领导中国一般的被压迫青年的解放运动，这种青年运动是国民革命性的，因为中国目前的解放运动是国民革命性的，而这种青年运动是一般的国民运动的一部分。

因为 S. Y. 要指导这种一般的被压迫的青年运动，所以S. Y. 应注意于这班青年中的宣传与组织（如青年俱乐部及会社等）。在中国现时已有此种青年团体之成立，如新学生社、非基督教同盟等。在各地这种青年团体发展时及青年运动扩大时，有联合各地青年团体成为一种非政党的全国青年的联合，以便指导中国青年运动。所以 S. Y. 的职任，应是在各地组织这种青年团体，并在已成立的青年团体中达到指导的地位，使

S. Y. 在将来联合的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本党妇女运动应以下列各项为原则：

1. 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但同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中，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

2. 我们深知现代妇女所以至于被奴属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同时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因此，本党当努力在一般妇女运动中说明此种关系。

3. 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的宰割。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

二、在中国未解放的妇女，本无经济地位可言，她们的阶级观念更不明了，但是我们在幼稚的中国妇女运动中也可找出她们因家庭经济背景之不同而生出各异的倾向。第一，立足半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封建半资产阶级观念上的贵族妇女运动在中国开始得最早，她们大概以女子参政号召，仅注意于上层妇女运动。我们对她们一方应指正其错误，一方应予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第二，受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中国妇女运动遂亦同样地发生买办阶级化的教会妇女运动。她们的中心思想在建设屈伏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所谓幸福小家庭和做一些不彻底的妇女慈善事业。于此，我们应为促醒其觉悟计，予以严重而又诚恳的批评。第三，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自从“五四”以来在社会上已时起时伏，尤其近一年来在国民党妇女运动中，最近在国民会议运动中，我们更明显地看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特别是女学生，已渐渐有倾向革命之可能。我们妇女同志除努力参加外，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于革命化。第四，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极其幼稚，但三四年来女工风潮发生之多已表示出她们实具有了原始的阶级争斗能力。对于这种运动，我们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

三、为发展本党妇女运动计，应有下列的三项入手办法：

1. 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因为在宗法社会关系未曾打破的中国，女党员担任妇女运动确有许多便利。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

2. 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一日一日地力图发展。

3. 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妇女党员关于妇女运动之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

四、本党妇女部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之下，只能秘密存在。然一般妇女运动是公开的运动，故非另有公开团体不能与妇女群众发生直接关系。依现在社会状况，本党妇女部有下列

两种团体可以居中活动：

1. 国民党妇女部　凡国民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本党须设法使女党员在该党妇女部中工作，以便施展本党妇女运动的计划。其由本党党员主持之国民党党部，其妇女部更应受本党指挥。

2. 无党的妇女团体之组织　有党派关系的妇女团体每易使一般妇女怀疑畏惧，不敢接近，故单靠国民党妇女部做公开的活动还是不够。因此，吸收妇女中进步分子组织无党的妇女团体在客观上十分必要。在最近一月，本党利用国民会议运动的机会发起组织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各地颇生影响，许多进步的智识界妇女和女工群众都已集中到这种组织之下。我们应勿失时机地利用现在已成立的和应向各地推广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以进行妇女的独立组织并图达到全国的妇女组织之目的。又在一般的妇女组织运动中，我们更宜注意女学校的组织运动。

至于各地工农妇女运动应与本党各地工农部协商进行。上海、汉口、天津、山东，为女工集中地，应特别注意女工运动，深入女工群众之中。女工运动的入手方法，或办平民女校，或组织女工俱乐部，依当时当地情形决定之。在广东，农村妇女运动已有比较的可能。此后凡本党开始农民运动之地方，即宜注意做农村妇女运动的准备工夫。

五、为图本党妇女运动宣传工作之发展，本党应有一妇女定期刊物之筹办。此刊物内容应注重妇女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此外，在本党各种机关报上亦应为妇女运动作宣传文字和理论解释。在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应注重口头宣传的广大作用。并且在民族运动阶级争斗整个历程中，我们应努力指明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足以妨碍妇女运动与民族

运动、劳动运动的密切关联。

妇女运动中最适用的口号应是："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教育平等"（一切教育机关为女子开放），"男女职业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反对大家庭制度"，"打破奴隶女性的礼教"，"反抗良妻贤母主义的女子教育"，"女子应有财产权与承继权"，"女子应有参政权"，"男女工资平等"，"赞助劳工妇女"，"保护母性（生产期前后休息六星期不扣薪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

第四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

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固然，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尤其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和鼓吹，《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党报》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大会后竟因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决议文的稍欠明了，同时复为防止党中左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同时左倾的幼稚观念也遂因右倾的扩大而存在。中间虽经一九二四年扩大中央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会议之纠正，但实际上在党内、在党外毕竟没有做多少宣传与解释的工夫，故一般同志对民族革命策略上的认识，常常表现其非左倾即右倾的机会主义的色彩。这种倾向都是殖民地运动中所最难免的一偏之见，极需要我们努力予以纠正。

今后本党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

（二）

大会审核过去党的宣传工作有下列三要点可以批评：

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因此，遂影响到我们党员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常常有批评本党或更有不满意或误解本党政策的奇怪议论发生——这是在《新建设》、《新民国》、《评论之评论》、《觉悟》和《平民》上可以常常看到的。

二、本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如“二七”工潮后京汉路的工人组织全体瓦解，各处工会运动中我们党的基础极其微小，是可以此证明的。即在安源，我们工友党员固不在少数，但无产阶级的文化在群众中的实施是在最近数月才进行。

三、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智

识分子中，我们党员常以只能得其同情的错误观念，很少注意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致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中间尚很少发生影响。其实，殖民地运动中的智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

（三）

根据上述的缺陷，大会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尽特具体地规定下列诸办法：

一、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中央宣传部下应有一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

二、《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三、在我们党的力量上说，现时尚不能发行许多定期刊物，故集中我们力量办《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以扩大我们宣传范围，实为我们目前急要之图。

四、《中国工人》应成为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须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

五、《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

六、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

七、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

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

八、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并且在有些支部，宣读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

九、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

十、在职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我们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如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的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然后筹划的方案方不至难于施行。如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皆可视各地之需要择宜设办，但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智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在重要工业区于可能时并应发行定期刊物。

十一、在智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中央于此，应指导各地于可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

十二、各地方不应忽略了利用每个群众集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1. 大会一方面大体核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而别一方面又承认该议决案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实行，在中央然，在地方亦然。除开客观的原因（经济与人力之缺乏，军阀之压迫，许多负责任的同志们之被捕），妨碍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之实行外，我们更要指出别一个原因，就是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们对于该议决案之实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党员对之未有充分了解。

2. 大会以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同时最近在中国之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上和我党对于这个运动之积极的参加，实要求我们与劳动群众和革命的智识分子——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之关系日紧一日。因此，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智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3. 在南方反对商团奋斗的经验上，在北方的国内战争在上海工人罢工（居然得到工人的援助，表现出阶级之真正的团结）的经验上，且屡次在南部和中部，各省之佃户和贫农之反对地主和富农的运动上——在这些经验上，都足证明群众奋斗程度之增高，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并且反对地主和本国的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在这些事实的前面，中国共产党之责任，是应该使这种自然的过程转变为中国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吾党欲达此目的，则要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

4. 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在这些地方已具备对于共产主义的工作和对于我们党的组织之前提。因为在这些地方纯粹工业工人的数量很多，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

5. 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办事人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至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有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

6. 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大会

以为下列的二条是必要的：

一、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二、现在有些地方吸收党员的方法，如广东有使之经过十人团，各地有使之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入党，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应即更改。因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

7. 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 S. Y. 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8. 大会指出中央对于指导地方组织之不力，所以特别在组织问题方面，认为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部，应当使之适合于每一时候的实际要求之原则上面。

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大会修改扩大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为：

“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书记兼宣传部，第二人担任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担任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之兼职得互换之）。为增进每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

9. 我们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之机关。无论在党的支部内，工农群众内，或一般革命分子的组织内，这传布印刷品的工作都很重要。必须借着传布印刷品的方法，使我们与已加入职工会、互助会、俱乐部……的工人之关系密切。我们的印刷品，应当经

常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在各地各省传布印刷品机关之设立，无论该地有我们的组织与否，这的确是给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一九二五年一月）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支部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遇必要时，得由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其参加地方大会，但无表决权）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四条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地方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反时，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

*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第二章　组　　织

第五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如各支部所在地尚无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

第六条　一地方有三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二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七条　各区有二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之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

理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支部干事或书记任期三月，区及地方委员支部干事或书记辞职时，须得上级机关之许可。

第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

第十一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　　议

第十二条　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支部书记或干事联席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各代表表决权以其所代表人数计算。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

第十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

临时会议或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三分一之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百人以上者得派二人，二百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百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出席。

第十五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七条　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

第四章　纪　　律

第十八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九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服从之。

第二十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一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会议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二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支部均须执行及宣

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党纲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四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产阶级之国家的政务官。

第二十五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六条 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

第二十七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和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联续三次不到会；

（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不守纪律经各级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露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八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　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但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地方斟酌情形核减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上至一百元者缴百分之五；在一百元以上至二百元者缴百分之十；二百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 S. Y. 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九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十二日）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去年——一九二四年——的今日，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永不能忘记的一日，因为这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列宁离开我们而去世的一日。

自马克思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首领列宁还更伟大，列宁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来，他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上去。他手创了一个领导俄罗斯工农阶级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政党——俄国共产党，他把俄罗斯的沙尔、贵族、资产阶级、地主、神父……等一般压迫工农阶级的魔王根本扑灭了，他把大俄罗斯民族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锁链完全打断了，他并且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不但如此，他并且替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创设了一个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联合在这一个国际之下，进行指导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作。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现在全世界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完全成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要想脱离此种奴隶地位，只有联合起来根本消灭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

中国的工农群众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所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比任何地方更要厉害。最近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备战及其工具军阀的私斗日趋险恶，在此种趋势之下，中国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有立即变成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之危险。我们要根本避免此种危险，我们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

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你们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我们在列宁逝世一周纪念日子里，应该高呼着：

打倒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

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

列宁主义最后的胜利万岁！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工人们，农民们，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当国内战争正烈之时，曾向你们表示过自己的主张和态度。

直系军阀虽然一时倾覆，而现在又图重新保持其力量，把国内战争延长不息。在别一方面，反直系——奉系、安福部、最反动的段祺瑞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虽然将北京政权抓住了，但是他们不仅不能统一中国，消灭军阀战争，并且他们自己仍旧要着军阀的老把戏，争权夺地，无有息时。他们所给与人民的，不过是教工人及无数穷苦的农民更为遭殃，更为受苦！

无论直系或反直系军阀的背后，都站立着列强的阴谋，他们为着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断的援助军阀战争以与中国人民为敌。英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治外法权，在租界里面给失意军阀齐燮元等以机会，教他组织势力，继续战争。但是当另一派军阀匿居租界有所动作时，他们便把他捉住并逐出国外。这两种行动，在表面上虽然不一样，但是其目的都是要加紧中国的内乱，都是要利用军阀，以达到他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美国的军舰早已停泊在南京，近又从菲律宾调动大批海军向我们的海岸进迫。每一个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机关报，总是天天高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喊什么有积极对华政策之必要，公然地号召列强用武力干涉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次国内的战争中，比较别国更会利用机会，然而也就因此引起与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加冲突。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图借口中国人民的愿望，要他的敌人（英美各国）对于他有所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者又重新要立在为中国人民“保护者”的地位，如以前在欧洲大战、袁世凯时代和凡尔赛会议时代一样。日本为掩饰自己强盗的行为和趋向，已开始宣传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和“亚洲人的亚洲”之口号。

工农们，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起来，努力对世界帝国主义迎头痛击，努力打消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世界帝国主义者确实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将中国人民沦到万劫不复的地位！

中国人民应当知道，世界帝国主义者以美国为领导，去年秋季在伦敦曾经共同筹划了一个反对欧洲和亚洲人民的阴谋。他们所定的道威斯计划是什么东西？就是一方面要把德国变成英美的殖民地，而别一方面要把德国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一销场，好教英美的银行家和工业家更加发财致富。为着要强迫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人民及苏俄购买这些商品，英美帝国主义者，不顾忌一切罪恶和残忍行为，非达到此目的不已。

在欧美我们已看出反动的现象，世界的反动势力正在聚集向劳农的国家苏俄进攻。列强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绝不能静听着他们的商品不能自由地输入苏俄，一定要把苏俄陷于奴隶的地位。他们更不愿意丢却这么一个好市场的中国！他们老喊着要保全中国的市场，他们一定要成为中国财富的主人，一定要陷中国人民为他们的奴隶！

为着要达到这目的，所以要供给中国军阀以金钱火药，所

以美国要扩充太平洋的海军，所以英国要在新加坡建筑军港，所以他们都派军舰到我们的海岸和扬子江及西江等内河来。

为着要掩饰自己的贪欲，帝国主义者更说他们自己爱和平，主张和平主义，最近期中战争是不可能的，应当创造世界永久的和平……这些好听的话。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家现在更加不知羞耻地说什么列强间邦交和睦，什么对中国人民怀着善意……等鬼话。当帝国主义者说这些谎话的时候，完全不看看列强军费之如何增加，军舰、飞机、军事工业之如何扩充，大家对于快要燃发的战争之如何准备。

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在这些事实之前，世界帝国主义努力扩充军备，努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及那些被金钱收买的各国的学者尽力寻找杀人的武器之时，东方的人民是如何危险！东方人民自卫的武器，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小玩意儿，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将我们的国土变为荒漠，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变为坟墓——这一种危险就在眼前啊！

但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暴动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将这些武器拿到手里，同时东方被压迫的民众起来反对自己的军阀，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国家，向外国帝国主义施以最后的总攻击，那末，世界帝国主义之破坏力量也可转变为反对自身的工具。

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总机关——共产国际，已经组织了无数万的工人立在社会革命的红旗之下。共产国际下的红色农民国际，也已经聚集了无数万的农民环绕着红旗，世界工农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武备并排生长，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劳农与资本统治之最后的争斗日见逼近了。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责任上，很诚恳地向中国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

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为不断地向群众解释用什么方法，中国人民才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何才能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是自己唯一的责任。

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见膨胀起来。全国各城市里面的群众现正努力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差不多都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学生现正组织这种机关，并且高叫着消灭一切军阀阴谋，反对段祺瑞所要召集的军阀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个善后会议，如段祺瑞所预料的，将成为段氏固结已派军阀的工具，借此工具以对付别派军阀，而引起将来无穷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的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中国共产党不仅尽力向群众解释军阀愚弄国家之巨大的危险和帝国主义者扩张军备对于我们是如何的可怕，并且要使中国民众知道国内军阀不给人民召集国民会议及组织群众的保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则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所加于我们的危险将更为扩充。

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无数万中国民众的命运真不能再静听军阀们的愚弄了！革命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中日长一日，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锁链已经开始摇

动。英美所扶植的直系势力之崩坏是民族革命运动进展的机会，但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又谋重新制服民众的运动。他们正在那里预备最严酷的反动，我们应当明白现在时机之迫切啊！

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我们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

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你们赶快组织起来，赶快制止军阀的阴谋，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最大多数的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你们赶快组织大示威运动反对外舰驶入中国内地，要求外兵不得驻扎在我们的领土以内，取消一切领事裁判权！要使中国不陷于奴隶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国劳苦群众的努力，完全靠着全世界劳农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奋斗！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

推翻国内的军阀！

国民会议万岁！

中国劳动群众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全世界劳农反对资本主义的同盟万岁！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一九二五年一月）

各国帝国主义者为要得着中国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他们各勾结中国的一部分军阀，以谋铲除对手方所勾结的军阀，在最近江浙、奉直战争的中间，这已是众目昭彰的事了。英美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吴佩孚、齐燮元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代办人段祺瑞政府，利用善后会议以固结一般接近于他的军阀，这使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恢复了欧战时期他在中国所有的地位。这是英美帝国主义所嫉妒的。他们为要使日本不能侵害到他们所已经得着的政治经济的利益，一定要用各种方法引诱而且逼迫段祺瑞等倾向到他们一方面。再不然，他们便会鼓动别的军阀，重新造成各种方式的内争。各国帝国主义者亦许为要决定中国最后的运命，在太平洋上，不久会造成功欧战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屠杀。

这样的时局，使全中国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青年们，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青年，所受的恶劣影响，尤为重大。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农民、工人都日益贫乏，一般家庭的经济地位都日益堕落，每一次战争扰乱，更引起无数破产失业的事情，使人们的生活都摇动而不安定。许多无产阶级的青年，因为家庭的窘困，在很年幼而未受相当教育的时候，

为他们父兄所强迫，便要到外面自寻生活。这种青年的谋生能力薄弱，社会上又处处都是人浮于事，于是工商雇主乐得以很低廉的工资，很恶劣的待遇，雇用他们，使作长时期的工作，以博取最大量的剩余价值。在一般小产阶级中间，父兄亦已经没有庇荫子弟的能力，他们不能供给子弟的教育费用，使受完全的教育，甚至于没有力量送子弟进中小学校。中国一天不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战争扰乱要仍旧延长下去，青年们将要沉沦于更痛苦更悲惨的运命。

吴佩孚、齐燮元等失败之时，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势力，已经得着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但是，因为还有许多被压迫的人民未能觉悟，还有许多觉悟分子未能团结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还没有力量防止一切反动的潮流，终于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上的势力，一天天强大巩固。我们对于这，自然用不着存一丝一毫的悲观。帝国主义还要在中国制造无穷尽的战争扰乱，每一次战争扰乱，固然要增加中国人民许多痛苦，然而他亦重新使他们的势力失其平衡，我们的革命势力可以得着大的发展。我们要根本灭绝这种战争扰乱的种子，我们应利用每一次战争扰乱，使他变成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机会。

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考究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仰帝国主义余沥的大商买办阶级，与军阀一样是属于反革命的。软弱而不固定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亦不能担负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责任。中国的革命虽说是一切被压迫人民所应当要求的，然而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不妥协的站在第一道火线上面，为他们自己，而且为全中国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只须看近来无产阶级势力的发展，是如何的使帝国主义与军阀恐怖不安，便知道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致这些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死命。一切要拔救自己的青年，我们必须自己联合起来，而且尽

力所能的扶植扩大全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以完成我们的革命运动。我们没有徘徊犹豫的余地了！只有这，是我们唯一无二的拔救自己的法子。

我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无产阶级青年，以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利益，决定要努力扶植扩大无产阶级的势力，以从事中国的革命运动。在我们的第三次全国大会中间，我们决议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合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的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中国的无产阶级青年，以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们起来啊！我们越是能使帝国主义与军阀恐怖，我们便越有力量为我自己，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中国革命运动万岁！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根据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六十九期刊印。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

瞿　秋　白

（一）孙中山政治上的长成

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屈服于满洲贵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同时，亦就是受英、法、俄、日等资本国家侵略的中国。从一八六六到一九二五[1]（从清同治丙寅到民国乙丑），六十年中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远东史。在这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因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外债的增加，赔款的勒索，路矿实业权利的攫取，领土、租界、港口的割让——不知道经过多少变更，六十年前的中国与六十年后的中国，在经济上简直是完全两样的国家。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也因此经过巨大的变更，士大夫的“世家”已经完全消灭；买办阶级已经大半变成所谓“中国”的体面商人；小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之中，已经一部分变成现代的无产阶级。中国国际关系上的变更，日日促进中国社会里的阶级分化；统治者、压迫者已经掉换了十好几次；各帝国主义者对远东侵略的形势转变了种种花样，可是有一件事是至今还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号。在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各节都加了小标题，并作了文字校订。

没有改换的：便是中国民族——大多数的平民始终还是受着压迫和剥削；六十年中所变更的只是压迫者的人和压迫的方法，而中国民众的受压迫和受剥削这件事实，是没有变更的；不但没有变更，而且剥削的范围更大了，压迫的程度更深了。因此，这六十年中中国平民的倾向革命、需要革命，也是没有变更的一件事实。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一天天的增加起来，中国平民的革命运动也一天天的扩大而且深入。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和小农、小手工业的经济，遇见了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都崩溃下去，发生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于是历史的舞台上，一个一个的发现新的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六十年中一步步的进化，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家——孙中山也就在这过程里逐渐的生长出来。

总之，最近六十年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尤其是民族革命的中国，而孙中山的历史使命，便是完成这一民族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到侵略中国的一时期，已经进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受列强经济、政治、文化上种种侵略而要反抗，受资本主义化而发生经济发展的趋势，无论如何，只要要求这种发展的成功，便不能不实行革命，而且首先便是民族革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阻碍中国发展还不仅在于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民权主义，根本上便与帝国主义势力不相容，更不用说中国大多数平民的生计的改善，中山先生所称为民生主义的了。六十年前的中国早已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在发展经济，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中国民族加入世界史的最重大的责任；换一方面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必然先引起中国人的这种民族自觉。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孙中山出生直到现在，中国民

族的历史职任，一直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孙中山现在死了，这一民族革命离他的成功还遥远得很；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引导之下，已经经过好几个阶段，而得到了他的正当的道路：因为要反抗列强，然后知道非颠覆满清政府不可，非建立共和不可，非为大多数中国平民争生活之改善不可；最后非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被压迫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和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这一条中国革命运动所已经经过的道路，中国民族自觉的深入和前进，在现时看来是很明了的；然而从中山开始自己事业的初年的中国思想，进步到现在的国民革命的口号，中国平民群众及孙中山不知道经过几多困苦的经验，几多迷误的方法，几多重大的失败——这是一条荆棘的路。“反抗列强”是多么简单的“爱国”主义，四五十年前与中山同时的“政治家”、“士大夫”何尝不知道。然而只有孙中山寻着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的答案——革命。为什么？因为孙中山感觉上代表中国的平民阶级，认识中国平民阶级的历史职任。所以只有中山能随着革命运动的经验，寻找着中国民族革命的道路。

（二）康梁保皇党之国家主义与下等平民之民族革命

中国的革命运动既然是民族革命，反抗列强的民族革命，那么，第一个问题，便是谁是中国的民族？这一问题，似乎问得很奇怪。可是在四五十年前，连“汉人才是中国民族”这一粗浅的答案，都不是公认的。当时，满清的官吏，所谓维新派的分子也谋反抗列强，也极力想“谋富强”。中国人那时的民族自觉是很模糊的，只想以全国对待外国，便算是爱国主义：

中国是朝廷，中国的人民都是自己的；那带着枪炮兵轮的外国人才是侵略中国的。所以在孙中山的少年时代，已经是“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有之……”（孙中山《与李鸿章书》）。这种“朝廷”的革新政策，不能说不是中国民族自觉的第一步。满洲政府在当时似乎足以代表中国民族以反抗列强。不但孙中山当时是如此想，中国一般人民都是如此的想。必须要满洲政府几十次事实上证明他实在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满洲贵族自私自利的政府，而且是列强的奴才，那时中国平民再进而有革命的觉悟，想到要颠覆满洲贵族。这一革命的觉悟，据《孙文学说》的中山自叙，直到庚子之役，方在民间开始传播，而前此差不多倡排满革命者，大家都目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然而孙中山却在上书李鸿章前十年（上李鸿章书时在甲午），即乙酉（一八八五）中法之战的时候，已经开始革命运动。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目标，本在于反对那压迫剥削中国的最强大的仇敌——列强帝国主义；前此三四十年时曾希望满洲政府革新富强，到此方才打破这种幻想。既然这样，要反抗列强，便必须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所有中国人——汉人便都能负起这种革命的使命么？中国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对满洲贵族的，一方面亦就是反抗列强的——这种民族革命里“民族”的意义，似乎是指全体的汉人的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抽象的全体的民族，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满清政府时代的中国社会，显然分着士大夫和平民的阶级。经济上固然农、工、商三类人之中还包含着许多阶级，而在社会上士的一阶级是政府的雇佣奴才，他在经济未发展、工业未出现以前，帮着满洲贵族统治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所以要推翻满清政府，必须要以平民做

领导阶级，革命运动中方才有主力军，方才能得到胜利。《孙文学说》上说：

“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至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然美洲各地华侨多设立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于是中国革命运动发见了这“民族老革命党”，辛亥以前的革命，差不多大半以会党为中枢——这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士绅阶级的态度是怎样呢？当时所谓保皇党的康梁派可以代表他们；他们只要利用狭义的爱国主义或所谓国家主义蒙蔽民众，想借此逼迫满洲贵族而和他们平分政权，保存自己统治阶级的地位，所以倡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谋富强的主张。这时，在当初谋富强以抗列强的总口号之下，显然已经发现阶级的分化：一方面民党以下层阶级为社会基础，从事于革命运动；别方面皇党以士绅阶级为后盾，而进行立宪运动。康梁派机关报的《新民丛报》，便竭力攻击民党的联络会党，及主张民生主义：他们的论调，不外说“利用下等社会，必无所成而徒荼毒一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之后，无资产之下等握

权，秩序不得恢复，而外力侵人，国遂永沦。”（见《朱执信集》）

在这两层反对意见里已经显然可见梁启超等代表士绅阶级的说话。本来士绅阶级不但不肯革命，而且摧残革命，帮助反动势力，名说也要变法维新，要谋富强，而又反对下等社会握权，反对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反对改善下等社会的生活。所以康梁派不肯革命，以为满洲政府能代表中国民族，又曾倡国家主义以抵制民族主义。这种国家主义在当时就等于宣传“忠君爱国”，即使真能变法维新，当然仍旧是满洲贵族和中国士绅阶级联合而压迫平民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大多数人民仍旧受着压迫和剥削；而在反抗这种压迫的革命过程中，士绅阶级当然会反过去求助于外人。所以要回答：“谁是中国民族？谁是民族革命里的领袖阶级”的问题，到此便非常明显了：“只有中国平民是中国民族的代表，只有中国平民是民族革命中的领袖阶级。”

（三）辛亥革命前之阶级分化

中国革命运动实际上在辛亥以前，一直是以“下等社会”——平民阶级为中枢的，而孙中山的同盟会，也是以代表“下等社会”的会党做实力的基础。尤其是当时平均地权的口号，孙中山要借此组织并集中“下等社会”的力量于革命的标语。孙中山以“平民的感觉”觉到“上等社会”的奴才性和卖国性，本能地知觉中国革命事业必须以平民为中枢，才能成功，因为只有平民真正要反抗列强，真正受满清的压迫，只有平民真正要求革命，真正要求从专制政体及列强侵略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力趋于“中国民族的经济发展”。总之，孙中山在

组织革命运动的初年，便早已知道：真正的中国民族代表是中国的平民——所谓“下等社会”，只有他们能负担真正民族革命的职任。

虽然如此，革命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反映着中国经济各种力量——阶级的斗争。辛亥革命的结果，革命的平民阶级竟完全失败，而反革命的军阀阶级却起而代替满洲贵族——压迫平民并做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中国的反抗列强，本不仅是平民的需要：满洲贵族、士绅阶级以及平民阶级——或所谓第三阶级及农民阶级，在民族自觉的初期，本有反抗“外国”的共同倾向。不过在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各阶级在总的反抗列强的倾向里，渐渐暴露各阶级自己的本性，各阶级都想利用这一反抗运动专图自己的利益。我已经说过，就是最早“富国强兵”的口号，也未始不是民族自觉的一种表现，不过这一口号实际上只代表满洲贵族治者阶级的利益。一切采用火器制造兵舰等的“新政”，未始不是反抗列强的一种运动，不过这种改革只利于当时的政府。满洲贵族自私自利的政策，却要蒙着爱国排外的假面具，所以等到这种最初期的“新政”，一方面既不足以抵抗外力的侵入，别方面又刚刚加重人民的负担，反而增加革命潮流的“恶势”。那时，满洲贵族——尤其是在庚子之役之后，只有倒到列强的怀中，努力媚外，以求自存。士绅阶级便乘机进而要求立宪。当康梁政变失败之后，士绅阶级那种“得君行道”的革新运动，并不因之而停止，并不因这种极明显的失败而悔悟，并不因此而完全站到平民阶级方面来。这是因为士绅阶级的梦想，一直在于居中调和满洲贵族与中国平民的斗争，实际上便是欺罔民众，使与满洲贵族妥协，而结果必然是使革命流产。代表士绅阶级的“改良派”的策略，总是造作许

多“君主立宪”等的幻想，使民众暂时躲避“困难的”革命道路。当时革命派的职任，便在于暴露这种“改良派”——康梁派的罪恶，暴露他们口号的虚罔，打消“改良派”所造成的种种幻想，而使民众自己深信革命之必要。孙中山先生和民党那时的策略正是如此。可是满清政府客观上也帮助革命的进行不少——历史的和平的立宪运动，一直到一九一〇年各省咨议局请颁布宪法前后三次的入京请愿为止，无不受清廷的打击。九年预备立宪的欺人之谈，更使民众深信除革命外别无出路。

于是辛亥革命便一发而不可遏止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只是颠覆满清贵族的民族革命，这次革命的唯一胜利只是推倒一腐朽不堪的满清政府。然而就只这一点胜利，也还完全靠平民阶级做中枢，士绅阶级在这革命里只有反动的作用。士绅阶级在革命前竭力阻遏革命，在革命后又竭力破坏革命；只要看康梁派在辛亥前主张保皇，在辛亥后联袁世凯而排斥民党，便可以了然。

（四）辛亥的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革命的胜利

可是所谓平民，也还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种种阶级，在革命前分化还没有明显，而且共同的仇敌未去，所以内部的斗争没有表现出来。同盟会中可以兼收并蓄的包容种种不同的成分，也就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组织，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日多，于是游民的无产阶级数量日增，这是大多数当时的平民——小资产阶级中最流动最革命的一部分，实是革命运动的中枢，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虽然在革命组织里，形式上不能做原动力，诚如中山先生所言（《孙文学

说》），然而这不过是形式上的事，以社会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这部分平民确是革命中的发难者。其次，便是半欧化的知识阶级及军官——这部分人，因为满清旧社会的崩溃，已经客观上没有插足士绅阶级的可能，而且受着新式的教育，应当能代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意识，所以也是革命中的重要部分。可是知识阶级本身绝不会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其中的分子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平民而加入革命，也可以代表大商阶级，更可以混入军阀阶级——绝非靠得住的革命力量。再其次，便是大商阶级。在前清末年，这种大商阶级（或所谓工商界）有两个来源：一、是士绅式的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初期"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中必然发现的现象，他们"代表"着人民争立宪，其实是清廷路矿、邮电的新政中，这些"洋务官僚"，靠着官署积累资本，到此已自有阶级利益，只想借立宪运动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实行"提倡实业"等的"爱国"目的；二、侨商及买办阶级，这部分是因为与帝国主义接触，而来做外国资本与中国原料、或外国货物与中国市场间的中间人，因而积累资本，渐渐有独立投资于工业的倾向，所以比较的赞助革命——因为清廷的压迫及外国的侵略，无处不阻碍这种工业发展。士绅式的官僚式的资产阶级与侨商的买办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微有不同，然而他们对于"维新"或"革命"的希望，根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尤其与游民的无产阶级，有阶级利益的冲突。最后，便是最大多数的城市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及农民。这是数量上最大的群众。他们的政治要求，应当是很民权主义的政纲，他们的经济利益，不但和列强帝国主义相冲突，并且和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是相竞争的。可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总是动摇不定的，必须有一领导他的阶级，充分的去帮助他发展自己的革命

性而遏止他的反动性，然后才能彻底的忠于革命。否则，他便容易受大资产阶级的欺罔，倒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去，而受人家的利用。

所谓“平民”——辛亥以前可以概括的与满洲贵族及士大夫相对待的——实际上含着这许多不同的成分；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分化得日益明显出来。然则这所谓“平民”之中等到革命爆发之后，政治上积极行动的是哪几个阶级呢？上述的各阶级中，只有两个阶级是在政治上积极行动的：一、大资产阶级（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这两部分虽然在革命前政纲上不甚相同，然而满清既倒之后，政治上的合作和联盟，对于他们是极自然的事）。二、游民的无产阶级（所谓会党，所谓土匪，根本上不脱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可是因为破产失业最受苦痛，他们那种暴动的反抗性是很厉害的）。当时工业的无产阶级数量上还极少，而且政治上还没有成一觉悟的自动的力量，可以说还没有“组成阶级”——所以自然没有能起而领导革命——引导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辛亥革命时，只看见大资产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是经济上有组织有团结力的阶级，只有他能领导革命；游民无产阶级便不同，虽然革命性很强，然而他自身便是一盘散沙，只能有极模糊的社会理想，只能顺着革命潮流随处发起无组织的暴动。这种阶级自然不能引导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实现胜利的革命。于是不久便使大资产阶级攫得革命运动的指导权，镇压游民无产阶级的暴动，和反动派妥协，而终至于使革命完全失败。平民中之阶级分化，在这种革命时期，最显而易见。

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的革命口号——“平均地权”，

虽然在国民党自己并未努力去宣传和实行，可是所谓最下等的“下等社会”（尤其是长江下游的会党），各地失业的穷而无告的游民农民，往往奋起暴动；当时即使没有很明显的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有不少地方，所谓“土匪”都染着革命潮流，高呼均分财产的口号，有些地方，并且有小农的暴动。恐怖的空气——“匪类”、“暴乱”、“暴民专制”的骂声，可以不绝地在各城市的“绅商界”里看得出听得见的。这样的情形，至多不过三四个月，随后竟完全消沉了。游民无产阶级，当然梦想也想不到现代的社会主义；可是他们的要求，最早在革命以前，实在代表大部分饥寒交迫的小农小商。不过游民无产阶级的均产主义，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性的；他们内部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只会有宗法社会式的“头目制度”，夹杂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们对于富人的嫉恨，实际上并不适合他们取消贫富不均的理想，而终究是代表各个想自己变成富人的意识。所以即使游民的无产阶级暴动成功，或是真正成了一种实力，也很容易受头目的卖，而完全丧失其革命性，简直变成军阀官僚。譬如革命初年江苏的徐老虎（宝山），便是最明显的例。

经过这种革命的潮流之后，马上便开始资产阶级的反动期。当时许多城市里，商会都大大的活动起来，并且编练“商团”维持秩序，大商阶级亟想取得政权，是当时很明显的事实。“商人”那时的政治活动，对于满清的地方官，对于当地的士绅阶级，确有些革命的作用；可是因为他的阶级利益，决不会和游民无产阶级联合引导当地的小农小商，彻底的去实行革命，却只会受着了游民的恐吓，反而去和士绅阶级妥协，以“维持秩序”。不但如此，中国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差不多纯是商业资本，经济力还很薄弱，政治上的积极性也很有限，不

能独立的取得政权，于是因为要“维持秩序、保障私产”，便不能不假手于新旧军阀：各地“绅商”对于革命初期的都督或军政长，都是竭力奉迎，要借他们的武装，拥护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渐渐造成革命后的新式封建诸侯——督军。到此，资产阶级大半仍旧退回受治阶级的地位，于是革命便完全失败。

读者或者以为上述的过程，只是当时的地方现象，并不能概括全国范围的政治变化。其实从南京临时政府，而袁世凯、宋教仁以至二次革命的过程，只是上述的社会阶级之相对关系的反映。辛亥革命的时候，一方面是反动的满清贵族和士绅阶级——袁世凯等清室的新军军阀；别方面是革命的平民各阶级——孙中山及民党，互相斗争的局势。士绅阶级及军阀，虽然在群众排满的口号之下，不得不形式上转移于“革命”方面，而实际上是想以此转移“革命”于自己手里，造成自己代替满清而为治者阶级的地位。革命方面势力的涣散既如上述，而且大资产阶级亟亟乎要维持秩序，而想和新起的军阀妥协——这样局势之下自然是真正的平民，真正的“下等社会”重受压迫而失败——孙中山所以不得不让袁世凯。社会阶级之中，那侨商资产阶级赞成革命于前，而想谋与反动派妥协于后；这种阶级分化反映到民党方面来，便形成民党中的右派——宋教仁及黄兴等。右派于孙中山让袁世凯之后，还是主张责任内阁；一直到袁世凯解除民党武装，大借款成功，右派还是梦想妥协。右派的主张，完全代表这种“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怕骚乱，想和平，反对下等社会，求与军阀妥协——有一件最好的证据，便是宋教仁等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的新党纲：（一）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五）维持国际和平。

请看，同盟会时代的“国有土地平均地权”的党纲，变成了极模糊的“注重民生”四字。当时主张与袁世凯议和让位的是这些右派；主张改政纲而容纳一班士绅阶级的，亦是这些右派。民党内部右派的胜利，便是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反动和妥协的明证。可是，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被右派格而不行，“下等社会”受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能进行革命，总之，大资产阶级战胜真正平民之后，不久，军阀的政权因此便大稳固，更用不着资产阶级对他妥协了，何况帝国主义者趁此竭力帮助，于是他们——军阀便一转而压迫及于资产阶级自身，于是民党连右派也受压迫和贿买，二次革命便完全被镇压下去。此后，资产阶级更不容“下等社会”抬头了；不但袁世凯称民党为乱党，一班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都认民党为乱党了。

孙中山却始终代表真正的平民，一直反对妥协，主张讨伐袁世凯，只因受右派牵制，终至于失败。辛亥革命里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袖革命的阶级，所以失败；然而孙中山和中国的平民从此更觉悟革命的职任。帝国主义固然趁此更加扩张他的势力，利用国内各派的军阀互争而从中取利，指使他们压迫中国的平民，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平民——小商人小农等也越益明了自己的敌人，不仅是满清贵族，而是帝国主义，而是一切种种的妥协派，大资产阶级。

（五）孙中山镇压买办阶级与联共联俄政策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反动政局，直到现在，根本上并没有变更：满清贵族已推翻了，然而代替他而统治中国的仍旧是反动的军阀阶级和士绅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至今没有成

功。民族革命的主体——中国平民，经过了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绅式的资产阶级结合了军阀阶级，侨商中的买办阶级也早已退出革命的战线，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纯粹是反动的。只剩得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全国的小农、小商人，客观上十分需要彻底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可是主观上没有政治上的积极能力。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本来只有破坏的爆发的反抗能力，在革命的过程中，不但不能做指导阶级，而且这种阶级的内部崩裂和个人主义，反而成就军阀阶级的反动力量——兵匪的蔓延扰乱，是一切军阀统治的根本。而民族革命的对象——列强帝国主义，不但没有丝毫损丧，反而利用国内军阀的互争和反动，用尽种种的方法扩张自己的势力。

既然如此，民族革命的职任还没有尽，民族革命的力量却已经自就崩坏，那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及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众的革命运动，便只能利用各派军阀及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互争，做军事上的应付。护法以来的南北战争，客观上确能削弱北洋军阀和凭借这种军阀的各国帝国主义之势力；然而这种斗争的社会基础是间接的，大多数民众并不能赞助这种斗争。革命之中而没有革命的阶级做他的社会基础，积极的参加和领导，这种革命当然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在这一时期，只看见革命营垒的内部崩溃——右派的民党，妥协的投降的反动的分子随时随处发现，只看见辛亥以前多少有些革命性的社会阶级一天一天的反动。

虽然如此，帝国主义自己的发展，日益倾向于灭亡，他内部的矛盾不得不爆发；欧洲大战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在殖民地上大大的削弱，中国这时也能偷着机会稍稍发展自己的工业。于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上了历史的

舞台。五四运动本身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民族自觉的一大进步。随后中国无产阶级——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海员以及其他工人的罢工运动，组织工会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都大大的开展出来。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Class－hegemon）。所以此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便能有群众的、广大的范围；渐渐的将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了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便明白的感觉到革命的主要阶级是大多数的贫苦的平民，尤其是农民，所以革命口号是“平均地权”；他在革命过程里，很正确的找着革命中的同盟者——“下等社会”的会党。他的革命主张，经过好几十次的失败，经过了辛亥革命后右派背叛革命的大失败之后，始终不变，孙中山是代表中国平民的民族革命的首领，所以虽然在反动潮流很利害的时期，平民各阶级都不能积极革命，孙中山却没有一刻妥协，没有一刻忘掉革命。如今革命战线之中新发现了无产阶级，他当然加入民族革命，而且是强有力的生力军；于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便很明显的是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民族革命中的联合战线形成，革命的高潮重新兴起，民族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在孙中山指导之下，决然改组，容纳中国工人的政党——共产党加入。这便是孙中山对于“谁能执行民族革命谁是中国民族”的问题之事实上的第二次的答案。

同时，反动派方面的情形也已经大大的改变。假使辛亥以前，满洲贵族及士绅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反动派，孙中山要以农民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联盟反抗他们，那么，辛亥

革命以后，农工阶级及一切平民的仇敌却是军阀阶级及买办阶级。这十几年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前清时代增加了许多，他们不但利用形式上的中国中央政府，攫取权利，而且直接指使一种买办阶级组织的武装力量——如广州买办陈廉伯的商团，实行反革命。这种买办阶级到处表现他们的反动性。孙中山指导之下的广州革命政府毅然决然的扑灭这种外国雇佣的“商团”。这便是孙中山第二次对于“民族革命中应当反对的反动势力是谁”的答案。

再则，中国革命运动，虽然根本上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革命，然而在辛亥以前形式上似乎只是反对满清的革命。一直要等到革命之后，各帝国主义屡次的帮助反动军阀及买办阶级，甚至于要直接以兵力攻打革命政府，经过了几十年的苦经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再明白的宣言“今后的革命，目的要在推翻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发见于孙中山政府对外宣言的一句话，实是因为最近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他们的利益，完全与帝国主义相反，他们的要求反映到革命运动上去，使隐藏在革命内的最终目的彻底显露出来。于是全国民众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便充实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内容。

孙中山的末年，正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初初开辟新的道路的时候，已经有真正能代表中国民族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彻底革命的阶级，此后足以领导大多数农民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平民——游民无产阶级，积极的实行革命，反对一切士绅阶级、买办阶级的反动势力，扼制资产阶级性的妥协政策，直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之军阀买办阶级。孙中山的伟大，正因为他在四十年来能随着社会内革命势力的增长而日益进于明显的不妥协的革命政纲。

不但如此，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对象，既是世界的帝国主义，他能够并且应当在国际范围中找着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往往有共和、民主、人道、正义的口头禅，尤其是那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尽着欺罔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因此，革命前各国往往有遵守所谓国际公法而保护中国的政治犯的。

当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曾有联日的政策，然而不久便证实帝国主义者即使在辛亥之前优容中国的革命党，也仅仅在于自利自私的见解，想趁革命爆发而未胜利的时候，更进一步的攫取中国权利，等这种局面造成之后，他们便转而力助军阀等的反动势力了。孙中山对于这一点，曾经在《陈英士[2]致黄克强[3]书》后附注着说："……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中国在这最近十年之中方才明切的看见帝国主义之用心，方才明白觉到中国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上说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是"众人的奴隶"。这些主人，"以不平等条约束缚中国的列强"，如何能做中国革命的同盟军！中国人既是"奴隶"，还得找"奴隶"做朋友。所以中国民族革命的同盟军，当然是各国无产阶级，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尤其是已经革命胜利的苏联农工阶级。

因此，孙中山——中国革命运动的代表之最后遗嘱，尚且郑重的声明中国革命运动有与苏联及一切弱小民族联合之必要。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半世纪以来，从模糊的"富国强兵"的口号，进化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会党的军事暴动，进化到劳工农民之联盟；从联日政策，进化

到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这一条困苦的道路，正反映在孙中山的生平和事业里呵！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孙中山出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2〕即陈其美。
〔3〕即黄兴。

PDG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自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侵略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经济及手工工业经济之破坏遂随之日甚一日，因此全国农工大群众，在客观上都早有了民族运动的要求。最近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方式，不但垄断中国的商业、航业、矿业、金融、海关等，更进一步纷纷在中国设厂制造并垦种土地，直接压迫中国的工人农民，直接排挤中国的工业，在事实上逼得中国的工人农民及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自然有了民族自卫的觉悟，这就是现在中国民众一致奋起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之唯一真因。这个民族运动，明明是由于客观的事实逼得中国的工人农民及爱国的知识阶级等广大民众，为自己生存计不得不出此一途。为民族自由而战的中山先生，他的民族运动之主张与战略，完全是随着这些事实上的要求而发展的，决不是因为有了中山先生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〇七期。

民族运动之主张与战略才有这些事实发生。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促起中国民族运动的这些事实存在一天，就是没有了中山先生，这个运动也是一天不会停止的。

在这方兴的民族运动中，失了一个有力的领袖，自然是很大的损失，然而这也不成大的问题。因为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国民党仍旧存在。这个党，尤其是其中革命分子，必然遵守大会宣言，必然遵守中山先生的遗嘱，依照中山先生的主张与战略——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帝国主义——领导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和中山先生生时无异。

中国民族是被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所以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及被压迫的民族自由运动互相联结的。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初步与关键，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点在中山先生的遗嘱中都郑重指出。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始终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

我们并且要求全国民众，因为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之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

全中国的民众呵！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

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

——为孙中山之死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革命尚未成功，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遽尔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此哀耗，不胜悲悼！中国共产党对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临终之政治的遗嘱及其毕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之革命事业表示极深之敬意，并希望贵中央执行委员会承继此伟大的革命遗产，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到底！

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山先生的肉体虽然死了，中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和他手创的国民党决不会如一般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们的预料，随着中山之死而濒于危殆。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将更有力。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然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团结一致。这种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真正担保和完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〇七期。

PDG

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

中国共产党敢以上述的敬意与信念致于贵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前，希望贵党于中山先生死后更增加勇气忠实的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阶级热烈的愿与贵党协力奋斗到底，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国际下的一切友党皆将与贵党以恳挚之同情和援助。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

（一九二五年）

中山死后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工作：1. 是借追悼会做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紧的是根据中山遗言（已由上海书店汇印出来了）做反帝及废约宣传；2. 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主张即下全体党员动员令，公开的征求党员。在此次征求党员运动中，我们的同志应特别努力，因为在中山死时由我们征收的党员，都可望与左派接近，乘此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此时我们在国民党中还是极少数，倘不能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不独第二次选举要失败，即平时亦无法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因此扩充左派党员之数量，是我们目前在国民党中工作内最紧要的政策。为实现此政策计，有必要时，亦可在工人区域发起国民党的组织，至于国民党右派有可能而且将要到工人区域去组织的地方，我们更须先去组织，占据机关，方不致使右派侵入，惟同时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工人群众中，须加紧宣传民族争斗虽然重要而不能代替阶级争斗的理由，并须宣传民族的党和阶级的党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众不至民族主义化。

各地同志对于上列二事——反帝废约之宣传及扩充左派——均须即时努力进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

恽　代　英

读来函及所寄《四明日报》副刊各文，我相信你的见解比“醒狮”诸君要进步。你承认社会主义、世界主义，说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是准备演化，准备变迁的。你赞成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主张不妨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同时进行世界革命，千方百计和各强国的无产阶级相联合，以谋打倒帝国主义。你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确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凡是受他压迫吃他苦楚的都应结成联合战线。各强国无产阶级固应联成一线，弱小民族是全个民族都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所以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你亦明白承认苏俄现在曾经用全国力量暗助各国无产阶级，以达到世界革命之目的。这些进步的意见，决非“醒狮”诸君眼光不出中国“士大夫”范围的所可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问题，若非很客气的存而不论，便亦许学那些“反共产大同盟”的先生们的态度，暗骂有你这种思想的人是亲俄卖国。你说“醒狮”所提倡的有时未免带“旧国家主义”色彩，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不同，这句话我亦相信。

然而我究竟相信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仍旧与“醒狮”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七十三期。

诸君的“旧国家主义”不免有同样的错误。

第一点，我很奇怪的，便是你们同那些无知的“反共产大同盟”诸先生一样，总要假定中国在今天有什么人主张“即刻”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根据你们自己的假定，唠唠叨叨的反驳了一大篇理由。其实这不是大笑话吗？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说明今日当前最要的事务，只有国民革命。我们常常用各种方法引导全国各阶级从事于国民革命，而且尽力于改进与扩大国民党的工作。我们正是因为如你所说的：要从列强势力压迫之下，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应当联合起来，以打倒列强压迫的意思。假令因为世界革命的结果，帝国主义不待我们打倒而自己崩坏下来，国外无产阶级势力膨胀，因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得着援助，能压倒我们的新兴资产阶级，这样，中国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一阶段，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假令帝国主义自己并不崩坏，中国并未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先打倒帝国主义而欲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有不知人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中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较俄国少几倍，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吗？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就无产阶级革命，却断言中国一定不能成就这种革命，这是如何无理由的事。我们所以主张今日最要的事是国民革命，并不是说中国在无论如何情形之下均无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我们只是因为不能坐待世界革命，坐待帝国主义的自己崩坏，所以要先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是还不够的，而且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亦可以参加这种运动。所以我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希望为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联合起来。

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你说：中国机器尚未发达，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从极富与极贫中间还有许多中产阶级，中国的贫人和富人尚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为抵抗帝国主义，中国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不必自相携贰，生把贫富分成两橛，减少战斗的力量，甚至抵消战斗的力量。你这些话，完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虽然是不自觉的）。我们丝毫不让步的反对国家主义，正因为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我们为打倒帝国主义，固然要联合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但我们并不因此便放松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而且我们相信革命的实力究竟在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我们为要使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尤其要注重无产阶级自己利益的争斗。你说“生之欲望”决定人类的行为，这是不错的。无产阶级必须为“生之欲望”才能踊跃参加革命；换一句话说，便是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解除自己的经济压迫）而参加革命。既然如此，我们要无产阶级牺牲了眼前很明显的自己的利益，不进行阶级争斗，而希望他们热心于为那抽象的“国家”，这不与那些唯心派的空想家一样荒唐吗？无论唯心派怎样嘴硬，两千年的历史，许多读书明理的“士大夫”的实例，都证明经济（便等于你说的生之欲望）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注意，我们并未说他是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们便是为国民革命，亦必须由经济争斗以引导一般人到

政治争斗上面，对于无产阶级尤须由阶级争斗以引导之到民族解放运动。

再就你所谓“生之欲望”来观察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大商买办阶级的“生之欲望”，在依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粤海关事件各地银行公会通电劝阻孙中山动用关款，广州商团事件陈廉伯企图打倒广州政府，这都是显明的事例。幼稚工业资本家与地主“生之欲望”，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摇动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在内）的“生之欲望”，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你虽证明了因法律失效、军阀捣乱、外人横行等原因，全国各阶级都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必要；然而在一般除了危险的国民革命以外，还有比较容易满足他们的“生之欲望”的人们，究竟是不肯参加国民革命的。我们便就国民革命说，对于那些另有他法满足“生之欲望”的各阶级，究竟是希望不多的；我们最注意是顺着无产阶级的“生之欲望”努力参加他们的阶级争斗，以博得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同情。我们相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有时还可以减少那些上层阶级怕革命危险的心理，使他们比较易于参加国民革命；但是我们因为认定了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便令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争斗，像曾琦所说的失了部分士商阶级的同情，我们亦决不懊悔。为什么我们要牺牲革命主力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博取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呢？

中国有一百万以上的产业工人，他们都是在中外公私资本家的压迫之下，他们的报酬待遇还不如欧美工人。这样的情

形，如何说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工人与资本家并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呢？你生怕中国有了阶级争斗，要减少或抵消战斗的力量，其实没在阶级争斗，有些上层阶级始终并不曾用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利益，反助外国资本主义为虐，对本国无产阶级倒戈相向呢？即如你举宁波海员受欧美海员排斥，令人站在宁波东门街把他们身受苦楚普告宁波人，并且希望宁波商家能够自办商船，免得他们再在外国商船吃苦，你以这为阶级本位说不如国家本位说合乎实际之证据；然而我请问你，宁波商人若非有力自办商船而且自办商船可以得利，他曾因为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一个“同胞”的受苦楚，便发生自办商船的事么？上海日本纱厂四万余工人的挣扎，曾不能动中国资产阶级乃至“醒狮”诸君之一念，他们本来便怕革命，更不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发生同仇敌忾的心理，他们本没有战斗力，如何会因阶级争斗而减少或抵消什么战斗力呢？我们要引导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争斗（争斗的对象，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设厂的外国资产阶级），用这来号召无产阶级，用这来得着一般无产阶级的同情，使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用这来随时打倒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压迫，以求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之发展。一个真正热心国民革命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无产阶级屈服于不革命的上层阶级压迫之下，使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真意义，而且使他们革命的势力不能自由发展呢？

论到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我虽不疑你是有意代表资产阶级，发表这样天花乱坠的空想来欺骗无产阶级，然而我终不能不好笑你这种唯心的乌托邦式的幻梦。你说：国民革命成功以后，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决不像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决不能结成联合战线，形成一

个阶级。你以为那时我们主张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他们必无力反抗。你真太看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了！你要知道假定照你所说的在世界革命的机缘未熟时，中国先成就了国民革命，那时国外资本主义的祸根并未铲除，那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利用中国的资本家做工具，以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假定照你所说，我们在革命以前及以后，都应尽量防止阶级争斗，那便无产阶级只有在人家愚弄欺骗之中，他们自己阶级的力量不得发展。在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互相勾结以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必无法反抗。至于说到这些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呢，他们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并不见得便不觊觎政权，在外国资本家来勾结他们的时候，尤未必不心花撩乱。你只消看前一两年美国舒尔曼等吊中国买办阶级的膀子，便居然会发生商人政府之说，去年英国帝国主义利用买办陈廉伯等，便居然发生广州商团谋叛之事，可知这些脑满肠肥之辈并不见得便不像今日军阀官僚一样的可怕。我们相信倘若世界革命成功，根本铲除了这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那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或真无所凭借而不能逞其恶毒。要是不然，纵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本不过是一般行尸走肉，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亦会唆使他们结成联合战线，以为妨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阶级力量。你说什么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亦许你真个有这种“节制资本”的好意思；不过若是那时无产阶级并不曾强大起来，并不能为你作有力的后盾，以防遏资产阶级的反动，那便我相信资产阶级的反动是一定要来的，无论你有什么良法美意，终只有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反动之下。每个相信“节制资本”的人，而反对阶级争斗恐怖无产阶级势力的强大，那不是存心欺骗无产阶级，便一定他是

昧于事理的空想家。

你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既曾努力于国民革命，至少可以争得普通选举权，这更是笑话。你以为世界上的革命，曾经有不靠无产阶级的努力，专门由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便是“醒狮”诸君所谓士商阶级）的努力做成功的么？便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性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仍是靠的无产阶级的参加，不过那时无产阶级自身没有阶级的觉悟，完全受了资产阶级的利用，所以自己并不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得着一点什么。倘若照你们的意思，在今天亦不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要他们有阶级争斗的事情，教他们只是闭着眼睛跟着所谓“士商阶级”走；这样，他们在革命以后，必然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无产阶级若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资产阶级为什么一定要给普通选举权给他们？资产阶级不好意思不这样做吗？他们已经做了无数量的不好意思的事，一直到今天，那个主张德谟克拉西的胡适之先生都还有脸皮提出以解说文字为选举标准的意见，轻轻的想剥夺至少百分之十的人民的选举权。你敢担保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纵然无产阶级中无为自己利益奋斗的实力，胡适之先生以及还有许多不如他的“士商阶级”，都会进步到不好意思不给无产阶级以普通选举权吗？

更有味的，你说中国智识阶级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你甚至于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这真叫我为中国的智识阶级惭愧。我总不明白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中国文化与民族性的特点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原来你承认中国智识阶级有这样优美的品性，便假定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不过我问你，几千年来的文人词客，在皇帝脚下做奴才，在达官门前做清客，专门靠为富贵人家做寿序、墓志铭“打秋风”过日子的，这都不是“中

国”的智识阶级么？或者他们虽然是“中国”的智识阶级，然而他们这种肉麻的行为，却不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么？康有为、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张謇、胡适、黄炎培、郭秉文，都是中国智识阶级的模型，我不知他们看了你所谓“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数语，是不是会愧死！你说现在国内思想界无不以社会主义为归宿，这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地方？两千年中国读书人无不以仁义道德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卑鄙龌龊的行为；现在段祺瑞、吴佩孚、卢永祥、唐继尧，无不以废督裁兵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割据扰乱的事实。这般智识阶级纵然把社会主义当“南无阿弥陀佛”一样，每天念一千遍，若他们不愿见阶级争斗，不愿见无产阶级这势力的强大，他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做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有机会的时候，还会直接变做外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呢！你说中国智识阶级未曾受资产阶级的豢养，这更不成问题。只要中国资产阶级长大起来，他们自然要豢养智识阶级，智识阶级自然亦要受他们的豢养。中国的智识阶级向来是奉承统治阶级，而且是曲学阿世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的。远之则秦散千金而天下之士斗，近之则陈炯明的一千一百元买得张东荪发许多丧心病狂的论调，你还怕这般“有奶便是娘”的先生们，因为什么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而不受资产阶级的豢养么？你说为智识阶级本身，无宁赞成产业国营，因为这个“国”天然是智识阶级发展才能的地方；你这说话，站在智识阶级方面看自然是不错的，而且亦许“醒狮”诸君同你都正在作这个迷梦，心想拿智识阶级来同时驾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谋实现“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野心呢！（“醒狮”诸君的主张虽比你更反动，我料想总还在这种迷梦之中，总还不至于“已经”死心塌地专为资产阶级效劳役罢？）

不过智识阶级是没有经济地位的，他若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使无产阶级势力强大，他决不能有力量抵抗资产阶级的反动。智识阶级亦许能掌握政权，然而这决不是智识阶级自身的力量，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忠心为资产阶级作工具，所以资产阶级给以经济上的助力。那种梦想“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先生，亦许做了资产阶级的工具而至死不悟呢！

你的文中间还有许多应当批评的地方，但因为篇幅限制，而且最重要的几点已经在此篇中讨论过了，所以不再一一缕述。总而言之，我并不相信凡今日言国家主义的都是有意为资产阶级作走狗，来欺骗蹂躏无产阶级。不过我相信国家主义在客观上所生的结果，一定是于无产阶级大不利的，而且他妨害国民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使我们无法抵抗国民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反动。我愿你将我所说的仔细考虑一番，毅然取下你的国家主义的招牌，像你从前毅然取下你的改良主义的招牌一样；我亦是希望“醒狮”派中进步的分子仔细考虑我所说的话，毅然取下国家主义的招牌，与我们一同努力于有阶级性、世界性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只要不是被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所障蔽，决不会说劳苦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比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还不值得注意。我们今天应当决定志向，假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是帮助无产阶级呢？还是帮助资产阶级呢？我以为不但为将来的社会革命，我们应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相信为了国民革命而防止阶级争斗，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祝你打破你的迷梦与空想，不摇动的站在我们的方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六大以前》刊印。

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

——国民党淘汰反革命分子的必要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蔡　和　森

自中山北上及其逝世后，冯自由派在北京所做之种种反革命罪恶行为，本报北京通信记者曾屡举以告国人。最近上海《民国日报》广州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严整党律，监察委员会亦已议复决开除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党籍。本月十三日上海市全体党员追悼大会时，党众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此举，全场热烈的表示满意。有一人欲起而为马素辩护，马素二字还未说完即被众殴走。可见冯自由派罪恶贯盈，早已不容于众。中央执行委员会此举可谓大快人心。顾冯自由派之反动并非始于今日，当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时，彼辈即起而反对，一直闹到如今，反革命的毒气随着革命潮流之高涨而散布全国。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决不是一部分“老党员”知识落伍的问题，乃是民族运动中阶级争斗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民族运动的生死。现在我们不妨把冯自由派一年以来反革命运动的真相，从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的外翳中解剖出来。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一一期。

一　反革命势力的渊源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之下，从封建制度转变到资本制度的过渡期中发生出来的。自外国资本在广东设立洋行商馆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即以商馆洋行的经纪做媒介，渐渐发展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这种资本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的私生子，所以它的形态极不完全。质言之，国际资本主义不任中国发生自己的工业资本，不过由经纪买办们私生一种高利借贷和商业的资本罢了。由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还未发生革命运动之前，即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别一方面，封建社会的上层阶级与封建社会的下层阶级，他们之间的利害是互相冲突的。农民群众不堪外国帝国主义的掠夺，自然而然激成过排外的大暴动（如义和团之役）；而贵族、官僚、军阀和大地主却早已与民众分离而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既在中国产生一个反革命的私生子（买办阶级），又在中国抓住了封建的上层阶级（贵族、军阀、大地主）做工具，所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异常迂回，异常困难。

二　中山主义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发源于海外的留学生与华侨之中，这是人人知道的。这种海外的革命运动，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当然还是离不了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对象。所谓留学生大半是大地主和贵族子弟，所谓侨商与内地的买办阶级也

脱离不了关系。他们何以要革命呢？只是因为他们比较在内地的人们多尝了一点大开胃口的资本主义和有利于富有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味道：他们羡慕外国资产阶级之富强，他们眼红外国资本家大地主之大规模的榨取劳动群众的利益；他们习见外国资本民主政治之新式统治方法，比较旧的更有效力、更有利于特权阶级，所以他们也踊跃的起来赞助中山，附和革命。他们参加革命的倾向，开始便不知不觉的投合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企图夺取国家政权做他们自己阶级的武器，抬高他们的特权，扩张他们的国民经济基础。

以上两种分子，形成国民党改组前支配中国革命运动方针的上层势力。

但中山主义并不完全建立在以上两种势力上面，因为他承继郑成功、洪秀全等的遗传，洞悉下流社会劳动群众的革命势力，所以他最初便自觉的把他的革命运动凭立在洪门会匪之上。所谓洪门会匪便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压溃的劳苦群众。这些劳苦群众为什么赞助中山参加革命呢？他们参加革命的倾向，亦自始即不知不觉为这样一种愿望所驱使：想得借革命以推翻压迫他们的上层势力，把他们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阶级的掠夺中解放出来，而改变一切旧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由此，中山于民族民权之外，又形成了他的民生主义，以为引导劳苦群众参加革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当然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落后的社会关系之反映。

但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的党员中自来即不行运。中山常说从他革命的党员，自来只知采取他民族主义中推翻满清之一点，至于民权民生完全置之脑后。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乃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阶级本能之表现。因为他们怀抱

的目的多半不是什么民权，但是自己阶级的特权；更不是什么民主，但是自己要获得与欧美“先进”的企业家同样的经济地位。所以中山的党徒自始至终只有最少数人并信他的三民主义，而不是为着自己的一民主义去革命。

三 老党员之叛逆与改组

辛亥革命后，政权仍操于满清遗孽之手。于是这些从中山革命的先生们和侨商们一天一天的失望，一天一天的不愿继续革命，并且一天一天的叛逆而趋于反革命（当然不是全体，但是大多数）。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觉得由革命的方法已不能达到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一民主义，所以只有趋于叛逆与反革命之一途。袁世凯当权即有投降者，至段、曹[1]当权而投降者更一年一年的递增；和平的叛逆日趋日盛，不久遂酿成功陈炯明武装的叛逆。

陈炯明的叛逆，是国民党“老党员”反革命之最明显的模型。他的叛逆决不是因为个人间不和的问题（如外传与胡展堂[2]不和等），实含有重大的社会阶级的意义，因为他的反革命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基础，完全建立在一部分从前赞助中山革命的南洋华侨资产阶级与广东买办阶级大地主上面。

这位伟大的天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他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一天一天的深悟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私生子——买办阶级、侨商、大地主及其代表人物之所谓“老党员”，再也不能革命并且再也不愿革命了；他公然宣言华侨以前是革命的，现在是反革命的；他深悟只有把这个被那些先生们叛逆而且行将弄死的革命运动变成为工农群众的运动，并与苏俄领导的世界革命携手并进，中国革命前途才有希望，于是毅然决定改组中

国国民党。一面将他抽象的三民主义弄实在起来——变成为民众要求的具体政纲，以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一面结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与其领袖苏俄缔成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至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伟大的意义。他的毕生事业亦至此才大放光明，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欢呼与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及一切进步分子的热诚拥戴。

四 改组后反革命的内容

国民党改组，工农阶级随着它的先锋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革命，于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突起变化。具体化的新政策、新方针显然向反抗帝国主义和不利于其附属物——买办阶级、大地主之方向进行；升官发财的狗洞亦不免为新政纲所堵塞。新政纲甚至规定：只有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才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样一来，便激起欲效忠于帝国主义而保持其买办阶级大地主的特权之冯自由派的反革命运动。

我们只看冯自由派的大本营设在香港——买办阶级的中心（香港《大光报》为其机关报），便可理解他们行为的性质了。其实一年以来冯自由派反革命的行为并没什么奇怪。他们现在反革命的欲求和他们从前附和革命的欲求，原来是一个东西：他们始终是要投合于资本帝国主义，升官发财，以扩大自己阶级的特权；革命不革命，不过是达到这种目的之手段。新政纲不仅违反他们这种目的，而且根本打破他们这种目的，他们如何不反革命呢？

他们反革命的内容：第一、反共产反苏俄；第二、开除共产派；第三、反对罢工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第四、各派老民党大团结。第一个口号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诏示他们的幻术，想以此鼓动无知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恐怖，起来打破西方共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减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危机。第二个口号一面是反对中国工农阶级最自觉的先锋（因为劳苦群众前此虽然也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无知无识，一听富有阶级分子利用践踏，现在他们有极自觉的先锋领导他们一面为民族革命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又为其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奋斗，然则那欲保持富有阶级特权的冯自由派如何不要求开除共产派?），一面是要国民党撕破实现群众要求的具体化的新政纲，退回于从前抽象空洞的地位，以便利他们效忠于帝国主义。第三是他们一面要破坏国民革命的新主力军，一面要破坏工人阶级本身的势力，使其对于中外掠夺者不能发生抵抗。第四更是他们要根本毁灭革命，把国民党这块招牌完全交给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唐继尧、唐绍仪、陈廉伯等去做卖国罔民的勾当。

五　阶级争斗与肃清内部之必要

国民党自始即是多阶级的党，所以自始即包含阶级利益的冲突。阶级的分化，随着革命潮流而促进；所以革命的潮流愈高，阶级争斗亦愈甚。民族运动中阶级争斗是必不可免的，所以党内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亦必不可免。从另一方面说，革命派对于这种争斗若是不让步不妥协，则这种争斗不仅不为革命之害，反而是革命进行的推动力。

若谓多阶级的党应容纳反革命派同时并存，这将是一种极

不幸的历史的误会。国民党纵然自始即是多阶级的党，但从今以后决不应容纳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和大地主的代理人依然留在党内拆坏革命的墙脚。我们应高声说：凡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分子没有留在国民党的权利。

国民党改组后，国民革命运动已进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冯自由派的反革命也进到了相当的高度。中山在日，所谓猛虎在山，当然还镇压得下来。现在没有中山了，若还容纳反革命派于党内，则中山毕生奋斗之事业与其晚年振作之伟绩，势非尽毁于彼辈之手不止。所以为忠实承继中山主义巩固党的统一及完成国民革命计，只有肃清内部，淘汰一切反革命分子是唯一的前提和担保。

没有中山了，我们十二分的希望国民党统一，但必须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怎样才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才是不违背中山主义的统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曹锟。
〔2〕即胡汉民。

PDG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一九二五年四月）

刘　少　奇

中国的工人运动，自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罢工失败后，所有各处的工会，除广东以外，差不多都被封闭，或无形消灭了。一直到今年二月七日，仍是继续这种情形。但是在这种全国工人运动极沉寂的时期里面，独有一个安源路矿工会，偏偏不是这样，偏偏还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

“二七”失败以后，全国空气十分恶劣，安源工会也经过很多的危险：资本家时时想法来破坏，甚至勾结军阀，贿买官厅，豢养工贼……从种种方面设法来破坏工人的组织。安源工会眼见全国工会的失败，立取守势，并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以防资本家之进攻；一方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结果，因为工人能够服从指挥，一致奋斗，资本家的破坏手段着着失败，工人反能更加团结坚固，声势日大。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没有被资本家取消已得的利益，并还争得不少的胜利条件：如矿局每月津贴工会教育经费一千元，每日工资在一元以上之工人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学徒每年考查成绩一次，以后矿局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工会同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四期。

意，路局按月送给工会长期免票三张，年节、中秋、端阳工人回家者咸用半票，矿局增加工人或添补工人尽先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等，都是“二七”后所争得的利益。此外还争得各种小的部分的利益，不计其数。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创办了不少的事业。如设立工人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处，工人图书馆一所，有工人子弟学生七百余人，工人补习学生六百余人。又办有消费合作社二所，资本二万元。建筑大讲演厅一所，能坐听众二千人，购买房产三栋，并有化妆讲演，各种游艺。又组织有青年部，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现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子弟读书不要钱，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部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此外工会订购有各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等，工人处处都可看到的。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各种大的会议及示威运动，仍是继续公开的举行，并无一时停顿。如两次“五一”纪念，均举行大游街。一万三千会员，个个加入。罢工胜利纪念，“二七”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纪念，黄、庞[1]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均有数千人之公开集会，游行讲演，及扮演新戏等。此外如学校之游艺会，成绩展览会，及各例定代表大会等时常举行。每次游行及集会，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多的力。如以经济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

处失业工人者近二千元；援助株洲、长沙被水灾的难民千余元；又尽力联络各处工友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湖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并每月缴纳各总工会联合会之月费百五十元。

“二七”失败以后，全国各处的工会都被军阀解散，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工会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做出那样光明的事业呢？军阀、资本家为什么不用军队去压迫他解散他呢？资本家的破坏手段，为什么次次失败呢？这是我要替安源工友告诉全国各处工友的。

安源工友其所以在“二七”失败后能做到这样好的原因，就是工友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看清环境。“二七”失败后，军阀、资本家向工人进攻，安源工会在那时候能够立取守势，叫工人团结内部不要乱动，不要骄傲，莫假敌人以破坏之机；又能乘着资本家与军阀勾结未深，资本家内部党派分歧之际，拿拢地方绅商，制止资本家之破坏手段。资本家之诡计无从施展，工人反能借资本家破坏工会之口实，提出种种要求。资本家内部党派分歧，彼此都想凭借工人势力，推倒异己，巩固自己地位。结果，工人得利用其党派取得种种实际的利益，而自己不为任何派别利用。此为阶级争斗的手段，巧妙复杂，除“二七”以前所用之硬的方法外，还有软的方法，也可以对付资本家致胜。

安源，市镇甚小，工人集中，每当工会危急之际，个个工人无不拼命保护工会。常自动的做侦探，把口子，四处逡巡，日夜不息，满市只见工人密布，如何尽力维护工会，如何向资本家示威恐吓。如有工贼，工人即群起提至工会，加以惩戒，或在工人寄宿舍禁止其自由行动。所有各军警部门及重要机关，与邮政、电报、电话等交通机关均有工人暗中把守。如此

在一小市镇之中，万余工人全体动员出发，资本家稍有动作，工人即刻知道，如是资本家的秘密不能保守，行动不能自由，工贼的破坏无从下手。在工会方面，一切秘密反能保守，行动反能自由，工会能够知己知彼，所以百战百胜。资本家彼此消息不能互通，更不知道工会的消息，所以百战百败。如果资本家以军队包围工人，工人即包围工厂，包围资本家、职员等，要死即行大家死在一块，资本家终有投鼠忌器之忧，不敢与工人流血。又工人每当工会危急时，内部意见及扯皮打架等事即刻完全消灭，一心对外。资本家当这种时候，意见就更加分歧，互相倾轧。故安源工人能够齐心、奋斗，所以能打破一切障碍，拥护自己的工会日见坚固发展。

安源工友办得这样好，我们无不羡慕。但原因不过就是工友能够齐心、奋斗，与看清环境取决阶级争斗的手段而已。我相信，无论哪处的工友只要能够齐心、奋斗，并能服从指挥，看清环境，也一定能够致胜，能够办得安源工会那样好或还要更好。工友们！注意！注意学安源工友的战术——齐心、奋斗、看清环境决定自己战斗的方式！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注　释

〔1〕指黄爱、庞人铨。

PDG

怎样布尔什维克化*

（一九二五年）

任　弼　时

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提出“少年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今年本团第三次大会亦提出“学习列宁主义”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形式虽不同，然其实质则一。本团的决议就说，本团以后的发展应仿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学习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经验，按照列宁指示我们斗争方法的原则，以扩张增加我们进攻的实力。

但是我们要知道，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使团员大家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或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也不是要团员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如果只以这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那就容易使我们团体变成学院式的组织，或是不落实际而与群众隔离的团体了。倘若这样，不独不能接近群众而为群众的利益奋斗，反足为群众自觉与奋斗的障碍。然则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如何？

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

*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改团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本文是他根据大会决议精神写的文章，原载《中学校刊》一九二五年三、四月份合刊。

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要使团体能群众化，当然要注意组织问题，因为我们要接近群众，须纯视组织上的结构是否合于与群众接近的需要。布尔什维克的党与团同第二国际以及一切自称所谓工党的不同之根本点，就是前者确是要引导群众去作政治的奋斗，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主张革命而不妥协。它把接近与引导群众的工作，视为达到目的的根本条件，所以它在组织上务求其能与群众接近。支部组织乃为接近群众的基本组织方法，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团体组织上与其他假称革命政党在组织上不同的地方。换言之，其他自称革命政党，并没有引导群众，并没有为无产阶级谋解放的诚心。它们主张的隔离群众，不过是暗助资产阶级寿命之延长而已。改良组织，务求其能接近群众，乃为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一步工作。

所谓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的意思，就是警告一般忽视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有许多同志常常以为自己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或者他们平常研究主义，只顾皮毛，并没有了解内容的真义，即如本团同志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左”倾或右倾，近来南京同志反郭拥胡[1]的投机倾向，长沙同志反对基督教学生参加运动会的“左”倾幼稚病等，都是使我们隔离群众，都是在主义上缺乏正确认识之表现。布尔什维克者若有必须让步的地方，并不完全反对让步，但是让步总要求其对于我们工作的本身没有妨碍，而且利于以后的发展。列宁曾说，我们要会让步，但是让步时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使我们的工作因此陷于恐慌的地位。俄国十月革命后与德国单独签定布列斯特媾和条约，亦即让步而得胜利结果之

一例。我们运用政策，须求与主义根本不相冲突，且要善于利用时机以定进攻与退让，如此方可以代表群众，为群众的领导者。所以，求主义上正确的认识，免除过左过右及妥协的倾向，乃为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二步工作。

所谓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意义，表示同志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我们常见有许多同志说：某国的是那样，某地方是那样，所以我们不妨照例去做。从各地报告中亦见到各地工作，往往计划大而实行少。这都是不按实际情形做事的弊病。这样，不是使计划永为不能实行之空谈，就是乱用经验致使工作实际上不能进展，甚至因此而生出许多意外之危险。还有许多同志只顾主义的原则，如封建社会崩坏，资本主义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产生，阶级斗争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现象等，而不注意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形。与同志谈话时，只说这是马克思或列宁说的，他们是有研究的，这断不至错误。一旦与非同志讨论或争辩时，便被他人责为不顾中国情形的空想家而无辞可答。这都是不顾实际环境，脑筋简单的结果。现在国内国家主义盛倡一时，他们的宣传比我们更努力，故他们现在是我们有力量的敌人，各地的同志应开始作反对的宣传。然要求反对之有力量，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否则，对于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危险。各地以后对于各部工作进行的计划，以及采用经验时，亦务求其合乎环境而能实行，抱“宁缺勿泛”的切实主义。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为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三步工作。

同志们！“学习列宁主义”，“获得青年群众”，都是本团所提出的口号，这些口号的实质，就是要布尔什维克化。现在我

们敌人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增长，对于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须加倍努力实行才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郭指郭秉文，当时任南京东南大学校长；胡指胡敦复，当时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免去郭秉文的东南大学校长职务，任命胡敦复为东南大学校长。这一人事更迭，反映了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东南大学的许多教职员和学生不了解这一政治背景，也介入了这场斗争，一部分反郭拥胡，另一部分反胡拥郭，相持了几个月，后由蒋维乔代理东南大学校长。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

——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

C. P. 及C. Y. 两中局兹拟定关于国民党工作最近应努力进行之事如左：

一、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并决定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

A. 用国民党名义，令各区分部组织讲演队，每星期出外讲演，宣传国民革命。

B. 刊物及演说，均劝人加入国民党。

C. 印刷请填写姓名地址加入国民党的纸条子，附载当地国民党党部的通讯处，以便愿加入者之接洽。

D. 各处县市党部应即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省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

二、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

A. 选我们的同志及民党左倾的分子，组织宣传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我们的同志做政治报告，并报告党内左右派的争执及右派的反动行为：如冯自由、彭养光、凌毅、马

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俱乐部，投降段张[1]；李烈钧、石青阳、谢持、居正等勾结联治派唐继尧破坏广东政府；马素、邓家彦、周颂西到处宣传苏俄是红色帝国主义；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时，右派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的名义散放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上海全市党员大会电促广东将领反对唐继尧，石克士等竟通电否认等。

B. 区分部开会，均令致函上级党部，派宣传委员出席。

三、各地同志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宣传时，应注意左列数点：

A. 说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只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仇敌，小资产阶级分子无恐怖之必要，革命的国民党更无反对之理由，不要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当，帮助他们反对共产党。

B. 根据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演讲，攻击国家主义是要阻止阶级争斗，妨害下层阶级势力（革命的主力）之发展，及离间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这两层都违背中山先生革命策略。

C. 攻击国民党最流行的“家人父子的政党观”——这是最妨害民党分子认识主义和党的纪律的。

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本月十号在广州开全体会议，C. P. 中央已决定意见七条，各地应即用电报或快邮向此次中委会议表示此意见中（一）（二）（四）等条的主张。

C. P. 中央总书记　T. S. Chen[2]

C. Y. 中央总书记　太　雷[3]

一九二五、五、五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张作霖。

〔2〕即陈独秀。

〔3〕即张太雷。

PDG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

——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同志们：

此次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号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号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左列二事：

（一）各地应即邀当地 C. Y. 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如在上海杀伤纱厂工人，东京侮辱中国国旗，在北京、武昌指挥中国军阀摧残中国学生国耻纪念运动，在山东、在上海侵夺中国渔业，霸占旅大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

（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并可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至少其已经自行停闭之上海纱厂永远不再开工。

中央总书记　T. S. Chen[1]

一九二五、五、十九

PDG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释

〔1〕即陈独秀。

PDG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

（一九二五年五月）

邓　中　夏

自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过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正是中国劳动运动发生第一次高潮的时候，所以那一次大会，影响所及，更使中国劳动运动更激成奔腾澎湃的怒潮，震撼一世，莫之与惊了。不幸九个月后，京汉“二七”惨变发生，而劳动运动为之一落，全国工人阶级几乎全取纯粹的退守态度。随后虽随时因利乘便，企图改守为攻，究因外界的强暴压迫太甚，终未能恢复旧观。去年北京政变以后，直系军阀势力颠覆，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帝国主义者亦因政局之变化，而相互间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时，劳动运动确已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又有开始第二次高潮的可能。现在上海纱厂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以及北方铁路工会之恢复，南方海员新斗争的准备，都是这第二次高潮潮信的预告。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集之不容缓，已是明明白白的不用说了。这个第二次大会，确实是一个中国最神圣、最光荣、超越一切的会议，比之军阀分赃丑声四播的什么善后会议，真是有一朵金花和一团狗屎之别了。我们在这第二次大会

里面，自然要把这三年中间一切丰富的经验，大家检查一下，同时我们亦应该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精密确定的规定与指导。

鄙人不敏，且把我个人的见解，写在后面，贡献于大会之前。

（一）组 织 问 题

在我们这次大会第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用说是“组织问题”。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是最少数，我们工人是最大多数，但是我们向资本家反抗奋斗，往往是我们失败，资本家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旁的原因固然有，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组织，或者组织不好。

这是有许许多多的实例可以证明的。虽然也有没有组织偶然战胜资本家的事件，但是确系侥幸得来，不足为法；因为乌合之众，虽然有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吓得资本家手足无措，不得不容让屈服，但这种“纸老虎”，以之吓“暴出河”的资本家有时或能生效，若以之吓“老精怪”的资本家那就碰上钉子要倒霉了。上海洋资本家开设的工厂，所有罢工，十次就有九次失败，就是因此。所以我们人数虽众，我们如不紧紧的组织起来，组织得像军队一样，那么向资本家作战，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组织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了。

这里分三段来说明。

（一）组织的性质与作用——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我们的组织，决不是什么同乡的组织，也不是什么帮口的组织，他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是同一阶

级，便应该不分籍贯、性别、老少都组织在一起。因为同一阶级的人，所受的痛苦是一致的，要求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并且这个组织是一个斗争的组织，显明些说，它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向资本家作战的组织。只有我们的组织发展与坚固，才能战胜资本家，才能使我们的利益之获得并保障。我们并且要从此种组织去促进我们所有工友更深切的觉悟力，去训练我们所有工友更勇决的奋斗力，在另一方面，故这种组织又是教育工人群众的。

（二）组织法的原则——组织法的原则有两种：一种是“产业组合”。什么叫做产业组合呢？比方一条铁路，是一个产业，所有机务处、车务处、工务处、养路处等等，都属于这一个产业。在这铁路产业底下做工的人，不论是在哪一处，开车升火也好，打旗挂钩帮扎也好，修车擦车也好，火车上卖茶的也好，车站上帮运的也好；总而言之，都要组织在一个铁路工会里，这就叫做产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一种是“职业组合”。什么叫做职业组合呢？比方机器匠是同一个职业，于是各个产业中把机器匠这一部分的工人，分了出来，不论是在哪一个工厂，铁路上的机器匠也好，轮船上的机器匠也好，纱厂里的机器匠也好，自来水厂的机器匠也好，造船厂的机器匠也好；总而言之，都组织在一个机器工会里，这就叫做职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

我们现在把两种组织法的得失来比较一下。（一）产业组合可以使工人团体的势力扩大而统一，因为他是以产业机关为本位的，并且是以产业类别而有全国组织的。反之，职业组合则完全相反，因其每一产业机关里的职业，少者数种，多者数十种，那么以职业来区分，不是每一产业机关要组织数个或数十个工会吗？虽有以职业谋全国组织者，但是新式产业发达的

结果，资本家的营盘（产业机关）是整个的，我们却由整个中划分出来，零零碎碎的结合，这不是破坏工人的营盘吗？何能损坏资本家势力之毫末。（二）产业组合可以致资本家的死命。比方罢工，假如是一个产业机关全体工人一致动作，资本家把它没法。反之，职业组合又与之相反。比方一个厂，有一部分罢工，有一部分不罢，资本家便可以操纵于其间，消极哩，不理；积极哩，开除。即或不罢的一部分工人后来也起而援助，同情罢工，但是晚了，资本家已布置妥贴，施以小计，便可把我们的战线破坏无余了。（三）产业组合可以消除工人间之等级。因为厂中有熟练工与不熟练工之分，然而产业组合则不分熟练与不熟练，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组织在一起，所以不致再有等级发生。反之，职业组合却恰恰相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他们两者的工钱与地位是不同的，自然发生熟练工瞧不起不熟练工的坏现象。不熟练工依然是工人本色，依然谨守阶级战线，而熟练工却变成了工人中的“贵族”了，却离去工人地位而附属于资本家甚或为资本家的走狗了。

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既如上述。但是职业组合在目前在有些地方亦有相当的用处。如手工业中就可采用他（裁缝店、理发铺、泥水作……等）。因为手工业的小工厂作坊采用职业组合，是没有害处的。并且可借此去改善那些“行会制度”、“公所制度”，引导它们从原始组合到阶级组合来。总结一句话，新式工业是绝对宜于采用产业组合的，若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合。若新式工业里亦用职业组合，直接是破坏产业工人整个的势力，间接是帮助资本家，那是我们要彻首彻尾的觉悟的。凡新式工业中之已采用职业组合者，要赶快改变过来才是。

（三）组织的系统——一个军队，三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才便于指挥，才能够和敌人作战。资产阶级便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敌人，他们一天不倒，我们一天受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和他们作战。我们亦是一个阶级的军队呀！假使我们的组织系统，不与军队相仿，那么何从指挥呢？何从指挥去和资产阶级作战呢？我们因受不了暴虐的待遇，无情的压迫，天天高叫“打倒资本家”，如果组织不严明，不是放空炮吗？

工会组织的系统应该是这样：“支部”设一“干事会”；干事会之上有“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之上有工会“执行委员会”，便成为某个产业机关的工会。再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支部”为基本组织，也叫做基本单位。依工作部分而分（如纱厂之粗纱间、细纱间、摇纱间、打包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等）。支部之下，可组织若干小组。人数不必拘定，少则五人，多则十人，均可（类似十人团）。由各支部下之小组代表大会（他是该支部之最高机关）选举三人组织支部的“干事会”，执行某一间或某一部的各项公务。由各支部代表大会（他是一厂的最高机关）选举五人或七人组织某厂“工厂委员会”，执行这一厂的各项公务。再由各厂代表大会选举七人或九人组织某产业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执行这一个产业机关的各项公务。更进一步，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代表，召集全国大会，选举若干人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全国某产业的各项公务。

这里对于“支部”的作用须得解释一番。“支部”这样东

西他在组织上是有严重的意义，我们不可忽略看过的。因为新式产业的工厂里每一工作处是他的单位，我们就在每一工作处组织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便是工厂的核心。其职能有数种：（一）“支部”是工会的基础。只有支部组织好，然后上层构造的工会才不至于发生动摇；我们看见许多工会或是软弱无力，甚至逐渐解体，就因没有做建立基础——组织支部这一步工夫哩。（二）“支部”是训练工友的养成所。全体大会因客观情形之限制，是不容易开的，所以使个个工友都得着训练的机会，只有支部有可能，因为每日同在一处，人数也不甚多，所以开会是轻而易举的。（三）支部是便于战斗的武器。发生大罢工，固然要靠各支部羁勒部伍以听工会之指挥；如发生小事件，此小事件又仅限于某一工作部分（如管工打人或开除一二人等事件），那就犯不着小题大做，举行全厂大罢工。只由支部当工友入厂的时候，向工友说明事实，并决定本工作处举行若干时的罢工或怠工，这种威力是可制服资本家的。这种手续也不要多少预备，只数分钟便可以实现。所以“支部”在组织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在工会公开的地方应该进行，就在严重压迫的地方亦极其适用。因为在严重压迫之下，工会即令不能进行，然而支部是潜伏于一工作份的小组织，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非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

关于组织的系统，我们还有两点要说：

一是“地方组合”，就是不论你是哪一个产业的工会，只要是在一个地域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地方的“工团联合会”。二是“全国组合”，就是不论你是哪一种产业的总工会或哪一地方的工团联合会，只要是在一个国境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业的“全国总工会”。

工人阶级要有地方组合和全国组合的理由，是很明白的。“团结即力”是我们唯一的信条。我们团结，不能存狭隘的眼光，以为只团结某一个产业机关的工友就满足了，我们还要扩而大之，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因为资产阶级是整个的，我们工人阶级亦是整个的，我们如要推翻整个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须有整个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才有可能。你不看见资产阶级方面的组织吗？不仅一个公司的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还有地方的全国的世界的组织。比方上海，纱业一项，日商华商各有“纱业联合会”，其余类推。此外各业联合组织的，外商华商各有“总商会”，各国联合组织的，又有所谓“万国商会”。工友们！试想：他们这样的严密组织，用这样严密组织压迫我们，我们已是难以抵抗，况且他们还有国家、政府、法庭、警察、军队，种种的组织，来重重压迫我们，我们如不有大规模的统一组织，以与之对抗，以与之搏战，试问我们工人阶级哪能战胜资本家而得到解放之路呢？

我们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至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法及章程，我此地不能细说了。

（二）经济斗争问题

其次，我们这次大会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经济斗争问题”。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工人阶级的经济问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彻底解决，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确信

而无疑的。但是我们在此时亦应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为经济生活的改善而奋斗，奋斗到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根本推翻为止。

我们现在提出经济斗争的几个大的目标来：

（一）八小时工作制——四十年来，欧美工人阶级即为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至欧战后，资产阶级为缓和无产阶级革命，曾在所谓“国际联盟”里，规定各国皆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独日本与中国说是有特别情形，规定十小时工作制。什么特别情形呢？真是日本中国工人的身体比欧美工人格外强健些，可以做十小时工作吗？不是的。不过因为中国、日本工人的组织没有强盛，革命的潮流没有高涨，他们以为可欺，这就是所谓特别情形罢。可恶呵！不仅八小时工作制不能行，就是十小时工作制又何曾做到。请看国内工厂普通不是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吗？甚至还有十八小时的工作哩。而且都是整天的站立着作工。

孩童与妊妇亦然。一个人做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其疲倦辛苦为何如？无怪工人要得脚肿病、肺结核病了。无怪工人死亡率要逐年增进了。至于工人因工作时间无教育、无娱乐，犹算小事。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第一要事，就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二）最低度的工资——中国工资至不齐一，大概的标准是这样：粗工：纱厂每月平均九元，钢铁及机器十五元。精工：纱厂每月平均十六元，钢铁及机器二十五元。女工童工，其工资更为低下。由此可知中国工资比世界任何国家为少。以日本资本家所办的纱厂做个例：在日本国内的纱厂工资，平均男工日币一元五十四钱六厘，女工一元二十二钱五厘。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工资，平均四十九钱五厘，女工四十六钱一厘。日本一工可在中国雇佣三工有零。中国工资如此之低下，何怪洋

资本家不在华遍地设厂呢？当此百物腾贵，十年以来，物价均超重过数倍以上，然而工资并未增加，独身工人所得工资已有不能糊口之虞，若五口之家更何能免号寒啼饥之苦。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就是要各地斟酌生活程度，规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率来，资本家雇用工人，工资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此数。

（三）反对一切虐待——中国境内不论是洋商的或华商的工厂，厂家对于工人待遇异常残酷，克扣、罚工、非刑拷打、开除……种种暴虐行为，罄竹难书。工人的身体既遭荼毒，工人的人格亦被侮辱，言之伤心，思之下泪。工人出卖劳力而吃饭，竟受此惨无天日之虐待，真奴隶牛马之不如。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反对一切虐待，务要将厂中不合理之管理苛章与无人道之管工人员，尽行撤废及驱除。

（四）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资本家之喜用女工和童工，自然是因为他们工资极低，可以多得利润；体力较弱，可以任意欺负。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苦况，除掉受男工一般的苦楚以外，还有其他不可计数的痛苦。工资比男子成年工为低，而工时却是一样，此外女工遭管工之调戏侮辱，妊妇之无休息时间，不准携儿入厂哺乳；以及童工做笨重工及危险工，不仅妨害身体发育，而且危及生命安全。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中，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亦为必要。做同样的工作，必加至同样的工资，其厂中并应为女工、童工设置特别之设备与教育娱乐等机关。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只能作六小时工作，工资仍旧。

（五）劳动保险——劳动保险的范围，有健康保险、残废保险、失业保险、老年恤金、死亡恤金及遗族恤金等种种。试问中国工厂有实行者否？我们经济斗争，对此点亦宜注意，应限令资本家对于工人因工作上及其他故障，不能做工的时候，

给以经济上的补助，以维持工人本身的疗治和生活，并减少工人家属生活的困难。此项保险金或抚恤金皆应由资本家完全负担。

以上为我们经济斗争之较大事项，其他暂缺不录。但是我们怎样去达到这些要求呢？据历来的经验与教训，磕头请愿是无半点效果的，惟有靠我们的组织力，利用时机实行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才能强制资本家屈服承认而执行。

至于互相援助的方法，则第一次大会“罢工援助案”所定者虽然简约，还可供参考。兹撮录于后：

“（一）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通讯义务（按：此项条文现在当然要全改）。

（二）凡某地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干下列各事：（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受该处东家之雇请；（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丙）派人帮忙办理事务；（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

末了，我们须得郑重一说的，就是一个经济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斗争。我们千万不可专为经济斗争的狭隘意义所囿，而忘记了政治斗争。须知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绝对之关联，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绝对没有解决之可能。所以我们须把经济斗争接连着政治斗争乃有意义。这是我们不可一时忘记的。

（三）争自由运动问题

再其次，我们这次大会里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应该是“争

自由运动问题”了。

我们工人没有自由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中国的临时约法，明明规定“凡是中华人民”的种种自由权，我们工人却被驱逐于“中华人民”范围之外，是不能享受的。你看，商人可以组织商会，银行界可以组织银行公会，教育界可以组织教育会……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组织会，只有工人不可组织工会，不是禁止，便是封闭。又看，官厅的小官僚可以罢官，学校的教职员可以罢课，甚至警察也可以罢岗……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罢，只有工人不可以罢工，不是捕人镇压，便是派兵打散。此外如开会、言论、出版，都是一样，只有工人没有自由。不但如此，他们还定了什么罢工刑律，什么治安警察法，以及什么取缔工会的种种条例，惟恐其不多，惟恐其不密。重重网罗，啼笑皆罪，你看压迫阶级是何等毒辣横暴呀！

我们历年来所受不自由的痛苦不少了，我们自“二七”以后更感觉着自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因为没有自由，便不能使工会发展；没有工会，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工人阶级所急切需要而不可少的东西，简直和菽粟水火一般。

有些朋友，以为去年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吴佩孚倒了，我们的敌人去掉了，我们从此可以自由了，北方不是逐渐恢复了工会吗？各处罢工的运动不是多半得了胜利吗？”其实这不过是这些朋友久困复苏后一种直觉的快感，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是怎样呢？直系军阀的势力诚然颠覆了，杀我们的刽子手吴佩孚诚然倒了，但是我们在此时能够稍为发展，不过是继承的军阀尚有剧烈的冲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亦发生新的变化，而国民革命势力亦有相当的增进的原故。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安福军阀段祺瑞，以及其他新兴的军阀，能够好过于吴

佩乎吗？帝国主义相互间在中国政治上的政策尽管冲突，而对于民族革命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势力之伸张，是他们所能容忍的吗？我们真自由了些吗？请看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奉系军阀的爪牙（上海警察厅）是如何帮助外人压迫同胞？英美帝国主义的报纸和巡捕房是如何帮日本压迫中国人？工友们！我们仍旧没有自由呵！我们仍然要继续"二七"争自由的壮举而奋斗而牺牲。我们争自由的大目标是三个：

（一）组织工会的自由；

（二）集会言论的自由；

（三）同盟罢工的自由。

我们怎样去争得这些自由呢？我们这次大会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我以为下列几项是必要的：

（一）定"二七"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二七"之役虽是京汉路为成立他的总工会而起，然而他确是争自由的开始，确是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壮举。应规定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全国各地应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方面追悼为我们争自由的死者，一方面提出争得自由的呼声向政府严重警告。

（二）要求政府废除罢工刑律及治安警察法。可以联合各界表同情的人士共做。北京曾发生了过"废止治安警察法运动"，我们要连络各地各界做此项运动，同时并举。

（三）参加废止出版法这一类的运动。上海租界还有印刷附律，华人全体反对，我们亦应表同情并参加之。因为这些东西虽不为工人而定，然而于工人自由的剥夺，是与各界一样的。

（四）反对政府制定什么工会条例、工人协会法以及工会规程（湖南有）这一类束缚工人自由的法律。因为政府制定对

于工人的法律，不出两个大原则：一、根本不愿意纯粹工人的团体成立［如会员要劳资合组或工人与高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合组之条款］。二、成立的可以随意由政府取缔和解散。所以这种法律有不如无。

（五）政府如制定劳动法或保护劳工法时，须准全国各地总工会代表出席，共同订定，否则，绝对无效。

（六）如政府制定何项选举法时，我们工人应发起争选举的运动。因为争得选举可以使我们的代表出席，可以将我们取得自由及改善劳动条件的议案提出，可以揭破压迫阶级的黑幕并监督其行动。此次军阀的善后会议通过之国民会议条例，不依孙中山先生之职业选举，我们不能承认。

（四）参加国民革命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参加国民革命问题”，我们这次大会应加以详密的讨论，确定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态度。

“国民革命”亦叫做“民族革命”。各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目的各有不同：封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然而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却是为了要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之压迫。故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因为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总而言之，无产阶

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什么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

就国民革命要求的本身上说，他虽不过只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租界权……等），并不根本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一切经济机关（工厂、洋行、银行……等）；虽只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并不没收国内一切生产机关；虽只主张建设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对内的民族统一国家，并不主张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制”；然而我们无不参加在国民革命中去，推翻帝国主义之侵略，打倒封建军阀之压迫，固然已可得到一部分的利益与自由，若是我们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表现独多的力量，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特殊的利益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度工资的规定，以及取缔苛待，改善待遇，劳动保险等），不断的去奋斗，亦可一步紧一步的去取得。就目前国民革命的现象来看，他确有左倾的趋向，这就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而奋斗之故。所以我们可以大声说：殖民地半殖民地里国民运动如不顾及工人的利益要求，那便是假国民革命，不是真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是为了阶级利益而参加的。

复次，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发达而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都给他们把持了，垄断了。政府、国会、法庭是他们的；工厂、机器、铁路、矿山、田地、船舶也是他们的；军队、警察、侦探和一切军需用品枪械、大炮、飞机、军舰都是他们的。他们有了这些东西，所以能够对无产阶级施行横暴无比的压迫与残杀。中国的资产阶级虽因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阻碍而尚没有充分的得势，然而已经开

始了。假使我们不努力，听资产阶级安然去取得一切权力，那么我们将来的命运一定更要坏。所以我们此时固然要作目前的经济争斗，然而尤应要作目前的政治争斗，因为不如此，则无产阶级因无政权的原故，目前固踏践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下，将来必钳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其痛苦永不能够解除，幸福永不能够得到。现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争斗就是国民革命。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一）固可使我们目前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得到若干的自由与机会，能够更使之格外发展，格外稳固；（二）并可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而巩固，消极方面得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积极方面，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

复次，更放大眼光来观全世界，我们又知道自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直接的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与政治，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之统治成了整个的，我们无产阶级对付他们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随之而异，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运动。虽然这两种革命之性质不同，而革命之目的却有一共同点，就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中国还不是资本制度完全成熟的国家，同时

却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一）可对帝国主义施以最大的打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是维持帝国主义生命的源泉，国民革命把此源泉断绝了，帝国主义的江山去了一大半，不倒而自倒。（二）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势力更加扩大。各国无产阶级虽有国籍的不同，而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则一致。须得全世界联合起来，准对资本帝国主义进攻，并根本推翻之，然后才能得到全部的解放。（三）即从消极方面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他们的老板就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老板打倒，擒贼擒王，那么国内的资产阶级亦容易连带的推翻了。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又是为的实行世界革命得到全部解放而参加的。

总而言之，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他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自己阶级的目的，推翻目前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时他并不放弃阶级斗争，而且必要阶级斗争，打倒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从此把国民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完成他历史的使命。所以这次大会里，对于参加国民革命问题，应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决议，以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指导。

（五）工农联合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要在大会里讨论的，就是“工农联合问题”。中国自从资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

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一途。近年来如湖南、陕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已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运动而进入于经济组织与政治斗争，已表示他们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成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广东已有组织之十六万农民群众中可以看得出来。

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

我们工人固然不能忽略了城市劳动者之紧紧的团结，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中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其数量远超过我们数百倍以上。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本年五月一日与本会同在广州省城举行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本会应与开一联席会议，讨论共同奋斗的目标，以及彼此间结合之方法与互助之计划。

（六）国际联合问题

末了，我们这次大会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联合问题”了。

这里我们随便举出一二件极浅近的事实，可以证明国际联合之必要：

从经济斗争上说：比方这次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日本资本家破坏罢工之一手段，便是想从日本国内的纱厂中，调一批日本工人来华，替代中国工人；幸而日本工人深明大义，起而反对，于是资本家的诡计遂不得逞。现在中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还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日本国内纱厂亦举行同情罢工，不是更足以制资本家的死命吗？

从政治斗争上说：比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劳农政府成立，于是各资本家帝国主义国家，大惊失色，调遣军队去打，特别以英国政府为尤烈，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家起来反对，事遂终止。那时英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并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同时英国亦起革命，不是更给帝国主义一个致命伤吗？

由此可见国际联合之必要了。我们不仅是此一国与彼一国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而且扩而大之，全世界各国间的无产阶级要有总联合，因为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他们掠夺无产阶级的方法国际化了。在经济组织方面，他们有所谓“托拉斯”、“星迪加”；在政治组织方面，他们有所谓“国际联盟”。这些是他们集中力量压迫世界无产阶级的好工具；在这样组织的下面，这国的资本家与那国的资本家连成一气，不分彼此的共同对付工人阶级。假使我们工人阶级不越过国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资本家，我们真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欧美各国的国际联合，数十年前便已实行了，至一九〇二年更有进步，各国组成一个“国际工会书记部”，此外各种产业还组成一些产业国际（如纺织工人国际、五金工人国际等）。不过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的影响，被卖阶级的工会领袖们所破坏瓦解了。至一九一七年欧战告终，俄国大革命，于是国际运动又勃然而兴。

现在世界的工人国际有两个：一个在俄国之莫斯科，叫做

"赤色职工国际"；一个在荷兰之亚姆士丹，叫做"国际职工协会"。这两个国际，我们究竟应该加入哪一个呢？我们加入的标准，最好看他们哪一个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原来亚姆士丹的"国际职工协会"，现在尚在社会民主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良的，换句话说，主张维持资本制度，要工人忍耐着吃苦，好好替资本家作工，不要说话。社会民主党这种勾当，简直是资本家的走狗，出卖工人阶级的蟊贼。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却不然了，刚刚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反。他是主张工人要革命，因工人不革命，资本制度不倒，工人的幸福是绝对得不到一丝半缕的；工人如不欲解放则已，如要解放，除了革命，并且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革命，绝不可能。所以他只主张工人统一的联合战线，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打倒帝国主义。由此可看出谁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样显明的路途上，我们是毫不犹豫主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

我们这次大会固要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且对于与国际结成亲密的关系之种种方法，亦要有具体的规定。

根据一九二五年五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五期刊印。

PDG

工人阶级与政治争斗的决议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

一　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争斗

（一）工人阶级每个经济的争斗，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争斗。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倚靠在政治上优越的势力保障之上，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来压迫工人的行动。

（二）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争斗，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生活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

（三）我们敌人的力量很大，他们据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更握着国家的政权，军队、警察、监狱等有形的压迫机关，学校、宗教、报纸等无形压迫的麻醉方法，这都是资产阶级制服无产阶级的武器。而且在中国每个阶级争斗中，各国资产阶级总是相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阶级争斗就是一种战争，我们无

* 这个文件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制定的，收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行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PDG

产阶级在此战争中重要的武器，就是团结，不分国界、省界及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自争自由的政治争斗到夺取政权的政治争斗，都要倚靠这个武器。

二　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

（一）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生路。

（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要推翻资本制度，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更多受一层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要推翻这种压迫的，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运动。

（三）民族革命虽然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可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主要的买办阶级完全为外国资本所养成，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反革命的。其他一部分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固直接或间接受外国资本之支配，不能有革命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见到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发展之危险，反愿勾结帝国主义以阻碍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他的本身没有集中的战斗力，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

（四）在过去许多次罢工中，如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及开滦矿工罢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汉路罢工，本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无次不明显的表示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人主要的仇敌，军阀必是帝国主义的爪牙。所以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应努力于这个工作。

（五）民族革命既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所以无产阶级在

此革命运动中，一方面固然协力以反抗我们更大的仇敌帝国主义及军阀，一方面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和。这种混和，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人的危险。

（六）民族革命运动一切方面的进行，一定要不妨碍工人阶级的发展，而且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

三　工人阶级目前的争自由运动

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这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才能得到的。

（一）在这长期争斗中，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加资减时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运动，罢工自由运动，普选运动等，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要求；这些要求之实现，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的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长我们的争斗经验，树立我们的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

（二）同时我们不可把这些目前迫切的要求，当作最终目标，这些要求只是达到我们最终目标民族革命世界革命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更要明白如果帝国主义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不完全解放，这些目前的要求都不能达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经济斗争的决议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

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劳动的完全解放。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我们不否认为改良劳动待遇条件，增高工人生活程度，以及部分的要求，而实行最激烈最坚强的斗争。第一，因为现在的劳工条件，已经坏到极点。一千百万的工人，还未到他精力衰疲之时，而已衰弱不堪，失了他们的力量，失了他们的康健，同他们的生命；第二，因为每一部分劳动条件的改良，都可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为最后的目的争斗，并且促进资本主义的崩坏，及劳动解放的实现。

一、我们不否认经济斗争，不否认目前切近要求的改良运动，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运动的态度是：

（一）每个目前切近的改良运动，只是行向总解决的一部分，不可把他看作最终的目标去做。比如资产阶级不打倒，目前所要求增加工资，难保将来又被克扣。总之，工人阶级的根本解放，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

（二）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如工人的

* 这个文件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制定的，收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行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罢工，本是经济的斗争，但是资本家一利用军警来干涉，便转成政治的斗争了。

二、在中国现时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切近的要求是：

（一）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本来资本家发给工人工钱的标准，是按照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定。它应该要够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维持子嗣（即预备工人老后，再有小奴隶替资本家工作）之用。照这样发给工人工资，工人已经遭受了很大的剥削。因为工人每日所生产的，并不只值他所领得这点报酬。很多劳动是没有受报酬，这就是资本家所谓企业的利润，上了他们的荷包了。但是现在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中国的资本家，他们还不肯按这个生活必需标准发给工人工资，还要从这里面再加克扣，这样一来中国工人的生活，真是苦到万状了。我们试拿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工人的工资一相比较，两地的生活程度相差甚微，而工资竟为一与三之比，即中国工人每日所得，不过日本工人一日所得的三分之一。年来生活用品日见提高，而工资之所增极少，工人待遇，苦不堪言。因此要求按照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主要工作之一。

（二）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这个数目只有再往下少，不能再往上加，如矿山的窿内工人，则至多不能超过六小时；火车升火的工人不能超过四小时。欧西各国工人，数十年来为要求此制度的实现，不知经了几千百万次的运动，流了几千百万工人的血，但是中国工人可做十二点以至十八点钟的工，难道中国工人就不是一样的血肉构成的人么？我们现在应与各国的工人共同争这八小时的工作制的规定；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必须在工作时间缩短之下，不影响于工资的低落，而反应该增长或照

旧。不然资本家一面虽减少工作时间，一面却减少工资，迫使工人不得不因维持生存而愿继续加工，这样名至而实不至的手段，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反对一切虐待：在欧美各国的工人，资本家尚表面尊重他人格的独立，雇佣的自由；而在中国则资本家视工人直与牛马无异，动辄任意拳打脚踢，私刑拷打，杀死无罪。最近日商纱厂罢工，发出反对日本打人的口号，我们试想这是一种什么呼声；又加工作中屎便之限制，下工时遍体之搜索等，以及许多不可胜数的事实，无异对付盗贼囚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四）女工童工之生活改善：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欢喜女工童工，他们是看中了这两种人较为柔软，容易欺负，容易加他们以惨无人道的压迫，因而女工童工的生活遂愈苦不堪问了。女工的工资，是不能与男子相等的，她们的身体，是可以任意侮辱的。至于童工呢？许多六岁未满的小孩，终日站着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这还是人的生活么？最近上海工部局曾提议改良童工生活，但所有的条文，完全是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我们应当要求：（甲）禁止妇女与不满十三岁者以有损健康之特别困难与危险以及地穴下面的工作。（乙）绝对不准怀孕与哺乳的妇女作夜工及特度的工作。（丙）妇女在产前产后有八星期的休息与领工资。（丁）怀孕及哺乳之妇女，于普通规定的休息时间以外，并须补足其哺乳小孩的时间。哺乳相隔的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三小时半以上，且每次哺乳不得少于半小时。（戊）绝对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之童工女工。（己）绝对禁止使用童工作夜工。（庚）每日工作六小时，每周须有继续四十二小时之休息。（辛）不得克扣工钱。女工童工与成年工人做同样工作时，须得同样的工资。（壬）

为童工设立免费的平民学校。

（五）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中国内各种工厂的一切设备，是很少能顾及工人身体的健康的，因而危险之事常常发生。如去年上海祥经丝厂的大火，工人被烧死者数百人，平时因工厂之不洁，而得肺痨疫症以死者，更不可计其数；又在工人工作受伤或死亡失业后，亦无相当的保证。因此我们当努力要求：（甲）一切企业机关，应设法消除或减少于工人身体有害的工作及生产方法，并当预防不幸的事情之发生；极力注意工场卫生与防疫事宜。（乙）对于从事于有危险健康工作之工人，工厂须供给他以种种抵抗危险的服装用器消毒材料等。（丙）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于工作伤亡时，能得到赔偿；于疾病失业老年时，能得到救济。

（六）取消包工制：有许多工厂的资本家非常狡猾，他在他与工人间设立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就是包工制度。他利用他最忠实的走狗为工头，把工作包与工头，工人须向包工头请工做，这样一来，在资本家与工人间，更多一层工头的剥削，愈使工人的生活痛苦，而且在斗争时，资产阶级更可利用工头以破坏工人的组织。所以我们非打破这种制度不可。

三、为监督实行保护劳工的一切事件预防机器的不慎，在危险的生产中，要预备保险的服装及防毒的用品，工人有病，或在工作时受伤，须赔偿其损失。关于工厂的监督员，必须参加工人的代表，又保护童工女工的利益，亦必须有童工和女工的代表参加。

四、全国总工会在这次大会后，应具体的指导他所属各业工人，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取得这些权利，去从事为获得这些权利的斗争。在这阶级斗争中，去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五、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想得到胜利，必须注意下面的几点：

（一）当有统一的集中的便于斗争的组织。

（二）一地方的罢工，同时须得各地方的援助，切忌分立的行动。

（三）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发生罢工后，其他地方及其他企业，应做通电声援，或集资援助，若形势严重时，总工会应讨论对资本家经济封锁及宣布同情罢工问题。

（四）不可无组织的暴动，应善利用时机，善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力量向其最弱点进攻。

（五）全国总工会应附设工人救济会之组织，在罢工时，筹备罢工的基金。罢工后作失业及被禁同志之救济。

（六）应发展协作社的工作，一方面图减低工人的生活费，一方面这也是团结工人，及工人家族的一个武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组织问题的决议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

一、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宽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

二、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有时连工人阶级的习惯和特点都要注意）。

三、中国土地广阔，各处经济发达的情形不一样，各省政治的环境不一致，因此很难有统一的工会组织形式，至少须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四、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许多行会。这些行会是根据手工业的，已经是旧式而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奋斗。因为他们将有组织的工人势力分裂和消费了。最好的组织是产业工会。产业工会的至要原则，是在每个工厂或作坊内，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的职业是怎样，都要依照该工厂或作坊是哪种产业性质，就都组织那一种产业工会。比方一个纱厂，不论是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电灯间……的工人，都是纱厂工会的会员。又比方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处、工务处、车务处、养路处……的工人，都是铁路工会的会员。这种制度的益处，就是每个产业

* 这个文件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制定的，收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行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机关是整个的奋斗单位。当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只有一个工会包括该产业机关所有一切工人，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很快的得到决议，并且就可马上很坚决的起来奋斗。所以这种组织，对于工人是有极大的帮助。再有一种是职业工会。这种制度，是按照工人的职业加入工会。譬如，机器匠是一种职业，轮船上的机器匠，铁路上的机器匠，纱厂里的机器匠，自来水厂的机器匠……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做会员。这就是说一个大工厂内的电灯工人就加入电气工会，机器工人就加入机器工会，木工就加入木匠工会，一个大工厂内有各工会的会员。很明显的，这种组织对于阶级斗争是不及产业组织，因为当对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各工会的代表与会员有各自的利益与观点，所以要彼此同意，很难有一致行动之可能，即使可能，也必须消费时间，对于工人的奋斗力与精神是极有障碍的。还有最坏不过的，就是不特不是依产业组织，并且也不是依职业组织，而是以狭小的专门范围（如铜匠、铁匠、司机、翻砂等），这就是等于不善的旧式行会制度了。因此，很显明的，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及其他新式产业中是绝对须采取产业组织，若小铁厂、理发店、裁缝铺、泥水作等小工厂及手工业，亦可酌用职业组织。至于行会组织，务要设法改进到新式工会的形式。但我们亦须记着工会是广大群众的组织，亦须斟酌该处之实在情形决定他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

五、政治的环境应当特别注意，在中国目前还只是广东一省比较自由，工会可以公开的活动，其他各省因政治情形各有不同，工会或者半公开的存在，或者简直秘密的存在，至于公开的工会活动很少可能，或受限制，或被干禁。因此，要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学校、协作社等，去做职工运动的工作，这种公开的工作，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工作，

为工人组织的秘密发展。

六、工厂支部当为工会的基本，在小的企业内，特别是在不能公开工作的地方，首先工作只能委派工会的全权代表，由这工会的全权代表，按照工会上级机关的指令，在该企业内工作。在大的企业内，必须按照工作部分组织工厂支部，倘若工厂支部增加到几十或者几百的时候，工厂支部内或者小企业内，得按加入工会的会员十人、五十人或者一百人选出一代表，酌量情形组织办事机关。这部分代表即工会的中坚分子，与选举他的群众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并通知他们工会的一切情形。有可能时，还须召集大会，报告工作的经过，时常在工作的时候，工人的家庭里，与工人见面时，宣传工会利益，煽动工人加入工会。

在工会的中坚分子的大会上（倘若不能开大会时，则在代表会议上）选举职员，组织某一地方的机关，这地方的机关，又须经上级机关批准，至少年须召集该工会大会一次，在大会上，选举该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为统一当地工会组织及亲密互助起见，凡城市或省区应只组织一个工会联合总机关。如一城市或一省区有数个此项性质总机关者，应开联席会议，公决归并为一。

七、工会是为工人所有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当为改良劳动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争得星期日过节日不扣工资的休息，规定劳动法等而奋斗。工会必须储蓄基本金，罢工的基金，补助医药费的基金等，以备不虞。工会为关心自己会员的阶级教育，当开办学校，设短期演讲所。

八、为要实行上面所说的，因此工会每月要征收其会员的会费。每月至少为一小时平均工资，工会不宜收太高的入

会费。

九、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个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职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

但工会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工会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行动。

十、工会的建设须有经常的计划，能利用一切劳资的冲突和一切罢工，以及一切关于工人阶级有意义的事变，作普遍的宣传。

十一、目前因组织的力量缺乏，不能注意到所有的工作，须特别注意组织铁路、海员、内河及码头运输工人、矿山、纺绩缫丝、烟草、印刷，以及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大连、长沙、广州、香港、澳门等处各重要城市的工会工作。

十二、为加多职工运动的领导分子起见，大会完后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须多造就一些领导分子，职工运动才有稳固向前发展的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

一、无论在哪一国，农民总是占大多数，至少农民也是经济上一个主要势力。他们所受的压迫，不减于工人阶级，或且还有过之，因此他们在现存制度之下，也是一部分革命的势力。

二、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

三、我们知道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着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该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

四、过去许多国家内劳资两阶级的斗争，如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失败，其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得着农民帮助，或农民势力落在资产阶级手中。反过来说，俄国革命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得着农民的援助。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所受的

* 这个文件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制定的，收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行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PDG

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

六、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

七、工农联合，在目前应该实现下列几点：

（一）工人在其回乡时，或在其工作附近地之农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

（二）工会农会之间，得互派代表；工会应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

（三）农民如发生经济上或政治上的争斗，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一九二五年五月）

全国工友们！我们现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万状。不是生活程度日高，工资不够维持，便是工作时间太长，疲劳过度。不是工厂私定苛章，虐待工人，便是监工包工头等，殴辱剥削工人。不是横遭抢掠、欠薪和失业，便是忍受拉夫、封船、苛捐重税等痛苦。种种事实，数不胜数。我们受了这许多痛苦，自然不能低头忍受，而且不得不奋起图存。但是敌人却枪杀我们的战士，拘禁我们的代表，封闭我们的工会，摧残我们的罢工，开除我们的兄弟，监视我们的行动。为什么我们的命这么苦？非明白知道不可。

我们受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什么侵略中国？无非是想发财。发财就只有三个方法：（一）盗贼中国的财富，如占据矿山铁路收买原料等；（二）剥削劳苦人民，即是以低廉工资役使中国工人；（三）输入洋货。这三种发财的方法，都太不利于中国人民，尤其不利于中国工人。他们的勾当，既不利于中国人民，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各个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彼此之间，不免互相冲突。如是他们强迫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遣派

* 这个文件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制定的，收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行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PDG

战舰军队来华；并获得租界和领事裁判种种特权。所以他们能够在华开设工厂，奴隶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如有反抗，他们又能利用特权以压迫之。输入大宗洋货，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失业，如是一部分又变为他们利用的工银奴隶。大部分失业者便变为兵或匪。他们想在中国领土内和劳苦人民身上发财，自然是各国的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而且各人都想大发其财。如是首先就想瓜分中国，进于共同宰制中国，更进于分途侵略中国。他们各自都培植一派军阀，借图扩充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其大发财主义。如是他们培植的军阀，便是蹂躏中国人民的仇敌。军阀受帝国主义者的指使，特别摧残工人和民众势力。

帝国主义者不但用种种侵略的方法，以图发财，还用种种方法，愚弄中国人民，用意在制造一班洋奴，为其发财之走卒，如开设教堂、学校、报馆等方法是。最近帝国主义者和受其利用之军阀官僚，又收买一班工人败类和反革命分子；假借工人名义，破坏工人团体。这班工贼和反革命分子是与工人势不两立的仇敌，却是保障帝国主义者发财的走卒。

全国工友们！我们要睁开眼睛，看清我们受痛苦的原因。明了了受痛苦的原因，方能知道怎样解除痛苦。现在给我们种种痛苦的敌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其一切走狗，那么，只有打倒他们，才能解除我们的痛苦。有了这班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便没有工人的利益；有了工人的利益，便没有这班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这是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全国工友们非一致团结，与这班仇敌作一最后的死战不可。

全国工友们！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集会，参加者全国一百六十五个工人团体，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七

人，共代表全国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一致认定全国工人必须用自已的组织力量，解除自身的痛苦，获得自身的利益；并要力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全国工人所需要的组织工会和同盟罢工的自由。而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摧残工人自由的仇敌，又非首先打倒不可。

大会并代表全国工人与广东有组织的二十一万农民和数千革命军人联合，而且正式加入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队伍。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第一，要由进步的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第二，要与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共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工友们！大会为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起见，为统一战斗力起见，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

全国工友们！全国工人都觉悟起来了，都纷纷起来组织团体了，都知道为自身的利益奋斗了，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又组织起来了，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爪牙的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走卒的工贼和反革命派！

全国工人大团结万岁！

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军队的性质和组织*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

周　恩　来

今天讲军队中之政治工作的问题，第一部分，讲军队之组织。关于军队呢，我们要知道军队的本身完全在兵士，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成为一个军队。兵士群众是不是个阶级呢？这是需要弄明白的。我们常常说“工农商学兵”，看看兵士究竟能不能成为一个阶级？我们先来解答这个问题。

梁启超说过一句话：中国有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有枪阶级是压迫者，无枪阶级是被压迫者。这话说得对不对？如果兵士群众不能成为一个阶级，那么兵士在阶级中有种什么作用？

我们要明白军队能否成为一个阶级，须先了解阶级的意义。我们要知道阶级的意义，不是一群人生活相同就可以说他们是个阶级。比如学生群众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找出很多相同之点，就说他们是一个阶级。因此，我们说军阀掌握中的军队，资本家、帝国主义的军队，劳农政府之下的军队，他们的生活都有相同之点，这样也可以说军队是个阶级么？不是这样的！阶级的意义不是这样简单！

要明白阶级的意义，须看清楚生产的问题、阶级的来源、

---

* 这是周恩来在第一次东征军回师途中向黄埔军校学生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讲演的节选，原载《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同学纪念册》。

生产的分化。在原始人类的时候，生活的方式很简单，只用手与棍棒就可以得到野兽来饮它的血，吃它的肉。这时每人都有生产力，彼此都能满足他生活的需要。可是，因为人类生活的环境不同，如温带、寒带、山地、平原地方的不同，于是分出人类的强弱。强有力的便征服弱者。一部分人（强有力的）寄托在普通的生产者上，就是占有另一部分人的生产，造成一个压迫阶级出来。生产者成为被压迫阶级。原始社会，强有力的仗他的威力抢有较弱者生产的一部分，弱者受他的支配，于是强者就成为酋长，这是很明显的阶级造成的原因。

从渔猎社会进到封建社会的时候，成为天子、诸侯王的统治阶级，他有一切的统治权和支配生产权。土地全是他的。一般农人要在天子、诸侯、士大夫手里去请求田土来耕种，生产全是由他们统治阶级来支配，结果便把人类分出一部分是统治阶级，另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从封建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尽量地掠夺剩余、压迫农工，乡村里的农人受大地主的压迫，城市里的工人受资本家、工厂主的压迫。这样，便造成一个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社会。

封建社会破坏后，军阀掌握政权，中国或其他的殖民地的工农的生活品，受军阀或帝国主义者的支配和享用。凡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势力之下的民众，无论工农商学，都成了被压迫者。

在这个阶级的意义中，我们可以找出两个定义：第一，社会上的阶级不是生产的阶级，便是掠夺生产的阶级；不是压迫的统治阶级，便是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从上古酋长时代一直到现在，天子、诸侯、士大夫、军阀、资本家、地主都是掠夺生产的阶级，是压迫人民的阶级。第二，凡是压迫别人的阶级，至少于他们的本身都是很有利的。比方酋长压迫奴隶，而

酋长的生活一定要比较好。天子、诸侯、士大夫的封建社会，压迫乡村的农人及城市的商人、工人，而天子、诸侯、士大夫的生活一定比乡村的农人和城市的工人、商人好得多！至于现在的军阀、官僚、资本家、大地主的生活，那更不待说了！根据这两个定义，看看兵士成不成为一个阶级呢？

第一个定义应用到军队来，诚然军队是可以拿来压迫人的，可以拿来压迫群众的；可是军队的本身，不是生产的群众，而又不是掠夺别人生产成为自己所有，如酋长掠夺农奴，天子、诸侯掠夺臣民，地主、资本家掠夺农工一样。这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发生问题了，并且在被压迫者的本身组织起来的武力，也并不是压迫人的，而成为解放人的武力了。如中国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苏俄劳农政府的红军。这第一个定义是说不通的了。再看第二个定义怎样？就是说："兵士的生活是否压迫别人的生活于自己有利？"你们都是从军队中做过工作出来的，自然不待说也很知道。兵士的生活比农工的生活更坏！自然国家有时也给他们以优待，改良兵士的生活。但与其他的比较起来，还是赶不上被压迫的农工群众生活。这样说来，说军队是个阶级，对第二个定义推论起来也是不成立的了。然则说军队究竟是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军队是工具，不是一个阶级。"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如酋长以其工具去压迫奴隶，天子、诸侯王拿这工具去压迫乡村的农奴和城市的市民，又如现在的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利用这工具去压迫农工或其他的群众。但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酋长制度的社会，奴隶起来赶跑了压迫他的酋长；封建社会破裂，资产阶级起来赶跑压迫他的天子、诸侯王；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最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会起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和

支配之下的工农商学，也会起来利用武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军队不是一个阶级，乃是工具。

中国有句话，“知识阶级”。这也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也是工具，他不生产，同时也不是掠夺别人生产而成为自己的生产的。完全不是个阶级，只可说他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而没有知识阶级。压迫者利用知识分子来想法压迫人，被压迫者也可利用知识分子起来反抗压迫者。

资本主义自然有它的经济理论，但被压迫者也有他的经济理论。所以，西方有马克思的理论，东方就有我们的总理，因为不但压迫阶级要有经济理论来延长他的寿命，而被压迫阶级也需要有种理论去反抗他的压迫者。

从上面看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军队是一种工具，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阶级。”

第一步既懂得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谁也可用的。那么，第二步我们须知道这工具怎么拿来使用。普通的工具都是压迫者拿来用的。如像古时的酋长，他利用奴隶去打他们的兄弟，来造成他更大的势力；封建社会的天子、诸侯王，要同别个争土地，也用乡村的农奴或城市的民众，利用他们来打他们的兄弟，扩张他的权势；至于资本主义社会那更不用说了！资本家拿起军队去压迫工农，帝国主义者拿起军队去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逞他的声威，或压迫本国的革命运动。如英国工人罢工，政府拿起军队去威吓镇压；印度图谋独立，他也拿起军队去镇压屠杀。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压迫阶级利用这被压迫者造成的武力来打他的兄弟，造成他更大的势力。但不是永恒不变的。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这例子便冲破了！压迫阶级压迫过甚，即是说资本家、大地主压迫工农过甚，被压迫

的工农也会起来利用武力了。反过来说，工农受了过甚的压迫，必然会觉悟起来利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工农利用武力推翻了俄皇贵族。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们本身造出的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世界也进化到了压迫阶级利用武力打他的兄弟的时候了。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会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这世界革命成功，便进于世界大同。这样说来，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刚才说过，军队这工具压迫阶级可利用，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拿来造成他本身的武力，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从这两部分分析看来，军队的组织得到两个新的意义。军队的分子是怎样集成的呢？刚才知道军队里的兵士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分子。酋长要同他的仇敌作战，便指挥他的奴隶去拼命；封建社会的天子、诸侯王不能亲身去杀敌，也必利用兵士去替他打仗，去为他牺牲的；资本家、大地主不能亲自到战场去冲锋，也必利用兵士替他去挡炮子，替他去抛掷头颅。这是欧洲战争告诉我们的。军阀打仗，哪个亲自去上火线？通通的是兵士！由此，可知道军队通通是由被压迫的兵士集成出来的。中国有句话，“好人不当兵”。什么是好人？凡是一个社会都没有永远不变的道德，道德、宗教、文化、习惯，通通都是依着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变迁的。酋长时代一切风俗、习惯、道德都合意于酋长，而不合意于被压迫的奴隶。至于封建社会的一切风俗、习惯、文化、道德，当然是合意于天子、诸侯王、士大夫的。中国封建社会被破坏，军阀承继了这种残局，被军阀造成了骄奢淫逸的风俗，逢迎媚上的习惯，造成这种卑鄙堕落的社会。

由此知道，凡是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都是用来束缚和压制被压迫者。他们所谓“好人不当兵”，封建社会的“好人”，是天子、诸侯、士大夫，他们是瞧不起农人的，把农人看作不是人的。至于无产游民，那更不是人了。所以，天子、诸侯、士大夫的儿子是不拿去当兵的，只有读书做官。至于农人，因别的原因受了生活逼迫的原故，只有去当兵，不然便没饭吃了。因此，一般人都争跑到士大夫阶级去，不愿在受人蔑视的农人里，或军队的队伍里去当一个兵士。这种人给他一个名词，就叫做“阶级的叛徒”。他本身再受痛苦，饿死可也，却不愿当兵。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大地主，都把农工看做顽民、暴徒或叛贼。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军队，还是要这些所谓顽民、暴徒、叛贼去当兵的。从这点看来，军队中的兵士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农工，所谓不好的人去干的。但我们要认清什么是好人！

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简单说起来有“拘捕”、“招募”、“征兵”三种。什么时候需要拘捕？什么时候需要招募？什么时候需要征兵？则也要根据时代环境产生的。在古时游牧时代当兵的都是奴隶，这很明显的证明是拘捕的。为什么呢？我曾经讲过，那时生产自由，人人都有生活的能力，而且地土广大，人口稀少，这时要拉别个来替他打仗，是不容易的。于是强有力的打败了别的人，就捉他来指挥他去打仗，所以那时非拘捕不成功。到了封建时代就不同，天子、诸侯、士大夫都有生产分配一切的支配权。换句话说，那时所有臣民通是他们的奴隶；那时生产方法简单，一遇天灾水旱的时候，就有饥荒的事情发生，于是有失业工人、农人、手工业者，即成为“流匪”，甚至于酿成社会上极大的变动。中国所谓“天道百年必变”，这就是说遇了大的饥荒，常常有些游民没法生活而又不

愿饿死的，只有去当兵，或者起来造反。有了这个变动，而天子、诸侯王便招募兵去平乱，古来亡国之君不一定比开国者坏，不是天子、诸侯才能的问题，是社会上经济起了变动的结果。东汉末因有了大的饥荒，结果造出兵匪等。

明末张献忠、李自成造出很大的变动，由此可知道农业社会里遇到了灾的时候，常常会引起变的。还有好大喜功的君主，不但中国是这样，就是西方也是这样，俄国农民失业，大彼得扩充兵力到西伯利亚。要知道在农业社会里农人生活无保障，常常会迫着他去当兵的。中国现在还是农业社会破产、封建社会崩溃的时候，所以好招兵。他不当兵，便不能生活。

为什么工业社会不适宜招募的方式，而适用征兵的方式呢？因大工厂发展，农民和乡村中的手工业者，都跑到城市去当工钱奴隶，集中在城市的工厂里去了。兵士生活是很苦的，而且作工所得的报酬较多，如没有特别的原因，他一定不愿意牺牲他几毛钱一天的工资去找那不到两毛子一天、而且常常都有挡炮子的危险的事干的。所以，这样就须用征兵制了。资产阶级造出个口号，欺骗农、工说："人人平等，有当兵义务。"但资本家的儿子可以出钱去免除兵役，倒霉的还是农、工呵！这就是军队集成的三种方式，这方式是根据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在某时代他用某种的方法来集成他的军队，造成他的工具。

今天所解释的概括拢来是：

1. 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

2. 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3. 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

4. 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这是偶然的事么？不是的。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呵！

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欧美各国被压迫阶级，不是常常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杀么？我们中国民族的被屠杀亦非始于今日呵，自鸦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主义之第一页呵！

年来全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之普遍的觉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侵掠家的杀机。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工农阶级势力之形成，更坚决了各强国的强盗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阶级）对于中国的铁血镇压政策。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重新表示他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一七期。

隶，不准中国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隶”与“铁血”的两种惨境中有个选择！

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掠中国和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如英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如日本）。这次上海事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以及青岛纱厂工人积极的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向学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残杀。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的队伍之日，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一样的造谣，诬指这次运动为苏俄和共产党所主使，声言美国在华之三十余艘军舰将全部或大部分调向上海厮杀。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狡猾也摆在我们面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努力企图将此次事变的目标移嫁于英国，而法国驻沪领事亦向学生表示一种假仁假义的态度。

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镇压政策。所以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决不能由惩凶、赔偿、

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争斗。这争斗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惩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条件：第一，这争斗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争斗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

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争斗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组织，成功各阶级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力。

中国共产党请全国愤激的反抗帝国主义之屠杀的人民，注意四件事：

第一，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倚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段张[1]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卖国媚外是其特长，我们虽不必拒绝政府的交涉，却不可相信并倚赖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

第二，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外国大资本家、大商业家、大银行家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主人，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

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帝国主义对付我们只有奴隶地位与铁血政策，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有我们屈服他们或他们屈服我们之两条路。与其认贼为父，敷衍面子以了事，毋宁干脆的斗争、干脆的失败之光荣。

第三，在这如火如荼的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这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

第四，须谨防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第一是用种种方法捏造苏俄和共产党主使的谣言，第二是离间商界与工人学生的一致，并企图和缓商界领袖使与商人群众分离。

中国共产党敢告全国人民不要受帝国主义的暗示与欺骗。这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大运动，各阶级各党派都应当积极的参加，积极的鼓动或主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党，工农阶级既不是冷血动物，又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乃是帝国主义之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中国共产党哪有不参加运动的道理？假设这次运动真如帝国主义机关报之所说——是共产党所鼓动的，那末这不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前，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的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苏俄亦然。假如帝国主义机关报所说苏俄鼓动是真的，那末不仅不足使各阶级民众畏避苏俄停止运动，反而要使他们证实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是被压迫民族唯一的挚友；挚友的帮

助，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都要大大增加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与勇气。只可惜苏俄的力量现在还不能助中国民族一举打倒帝国主义，使他从野蛮残暴的列强中解放出来。然而中国全国民众正殷殷的望着苏俄及其领导的各强国无产阶级有帮助中国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呵！

中国共产党敢提醒全国民众的注意：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殒身饮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仆后继的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呵！务望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争斗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铩羽不振之打击呵！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起来，起来：

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

各阶级联合战线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张作霖。

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对于广东时局宣言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

革命的军士们！

一切被压迫的人民们！

反动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的武装已经解除了，他们三年祸粤的罪史摆在你们的面前，异常显明。他们自从入粤以来，假拥护广州革命政府之名，侵夺地盘，擅任官吏，占霸机关，私收赋税，私定苛捐杂税，开设杂赌，包办烟土，侵占民房，强拿夫役，封闭民船，摧残农会，屠杀工人，收容土匪，纵令兵士奸淫掳掠，勾结西南祸首唐继尧、卖国亲日的安福首领段祺瑞、背党叛国之陈炯明、林虎、屠杀中国人民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商团领袖陈廉伯、陈恭受、国民党反革命分子马素、冯自由等，积极图谋倾覆广州革命政府，其罪恶显著，其反革命行为昭彰，诚然人人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但是，这次广州政变，其意义不只于扫灭一刘震寰、杨希闵。这次战争，其范围不只于革命政府的军队与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队。这次政变有很重大的历史的意义。这次战争系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武装斗争，因为刘震寰、杨希闵等敢积极图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徒以有唐继尧、段祺瑞、陈廉伯、英帝国主义者、马素、冯自由

等积极的帮助、积极的怂恿。这是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的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的右派联合一致的向引导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谋中国民族解放的国民党进攻；换句话说是各种反革命的力量联合一致的向革命的力量进攻。幸而这次攻胜了，不幸而战败，则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必受一很大的打击。因此这次的战事，其范围不只于刘震寰、杨希闵等的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军队；这次的战争，明显点说，是反革命派与革命派很剧烈的武装斗争。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们，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被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与他们勾结的反动力量的压迫摧残，已经够了！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再不能忍受！按理说，刘、杨等反动力量必被打倒。刘、杨等有武装的力量，革命的国民党同样亦有武装的力量，并且比他们还强大些。按实力说，刘、杨等反动力量也必被打倒。何况还有粤汉、广九、广三三路的工人联合罢工，断绝刘、杨等的交通；电报工人罢工阻止刘、杨等的消息；海员阻止从远道运来之徒手兵及截击破坏铁路罢工之工贼；兵工厂工人罢工，停止供给刘、杨等的子弹；海陆丰及番禺珠村之农民自卫军均派队帮助革命政府的军队；及各种政治的宣传队猛烈的宣传，和各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传单，援助革命政府；痛诋刘、杨等反动军阀的罪恶，使一般被压迫的群众明了：刘、杨等反革命的力量哪有不被扑灭的道理。在刘、杨等被打倒的许多原因中，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公然表示如此伟大的力量，一方面固然可以看见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再不能忍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各种反革命力量的压迫的热情，但同时须知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所以如此的积极援助革命政府，对于革命政府有一定的希望——希望满足他们的要求。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们！反革命的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等已经打倒了，与他们勾结的各种反动力量受此打击，当然要敛迹起来，广州革命政府从此减去一层障碍。假若在此次胜利之后，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新的改革，在广东开一新纪元，减轻工农等被压迫群众的负担和满足他们的要求，则失掉了此次胜利的意义，等于平常间一派军阀与一派军阀的战争！

国民党广州革命政府诸领袖们！你们平常不是说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所作为，是由于反动的军阀盘踞之广东违抗革命政府的命令吗？刘、杨等反动的军阀现在已经打倒了，你们应当明白这次打倒他们的真意义，毅然决然的实现当他们未打倒之前你们自己提出的各种政见，如军事、行政、财政统一。你们尤当了解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所以积极援助革命政府的原因，满足他们所提出来的各种具体的要求。你们更当明了要实现你们的主张和满足工农等被压迫群众的各种要求，除须你们自己要有很大的决心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们当设法很坚决的排去。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们！好容易你们帮助革命政府把刘震寰、杨希闵打倒了，你们应有组织的继续的为革命政府的后盾，使革命政府实行有所改革。但同时你们须达到下列各种最小限度的要求：

甲、一般的：

（一）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绝对自由。

（二）统一行政，绝对禁止军人委县长，实行地方自治。

（三）统一财政，废除苛捐杂税，修改税则，绝对禁止军队霸占征收机关。

（四）统一军政，严禁军队扰害人民。

（五）实行禁绝烟赌。

（六）整理市政，开浚河道，建筑道路等。

（七）教育经费独立，增加义务及职业教育经费。

（八）切实办理剿匪清乡事宜。

（九）裁减驻防足额。

乙、工农兵方面的：

（一）绝对保障工农组织工会农会，及罢工抗租等权利。

（二）制定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保护童工、女工利益。

（三）实行劳动保险。

（四）规定保护农民利益之法律，取消田土业佃产保证局，禁止预征钱粮，规定最高限度租额等。

（五）严行取缔高利盘剥。

（六）严禁军队扰害农民。

（七）扶助工农经济合作事业之发展。

（八）改良兵士生活，给予职业及政治教育。

（九）保障退伍兵士生活。

（十）优待阵亡军人家族。

（十一）规定残废军人年金。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们！这是刘、杨等反动军阀肃清后，革命政府应当满足你们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你们应当自己积极起来争，扩充你们自己的组织，有组织的监督和迫使革命政府实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刊印。

PDG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瞿　秋　白

一

最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异常的惊惧，尤其是去年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党势力的向北部伸张，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有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之趋势。如北方铁路工人恢复工会的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青岛、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北京印刷工人及汉口烟厂工人的奋起，以至于五月间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及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之，从一九二五年年初起直到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逐步的斗争，树立总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新势力，当然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反攻的高压政策。他们知道这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怕的力量，决不能放任它尽量的发展。“五卅”以前帝国主义者早已逐步的防范，利用他们的种种工具，如工贼、买办、军阀、官僚等施以压迫。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国民革命的势力，尤其是它的先锋无产阶级；别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列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一九期。

强，尤其是现在占有政治权力的日本——相互之间的斗争，一天一天的激烈起来，直到五月三十日而大大的爆发。

我们应当知道，这“五卅”屠杀案，不但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世界革命运动，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一直在动摇崩溃的过程中，直到最近方才有略略稳定的趋势，这就因为列强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本国对无产阶级进攻不能得着称心如意的胜利，可是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近两年来，却能用着全力来经营。对于中国呢，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工业资本，进取得最为厉害。譬如这次世界纱业恐慌的期间，日本资本主义，首先便对于上海青岛的中国工人进攻。他们以为中国工人最落后，最没有组织，纱业里减少生产成本的计划，可以从这里实行起。原来英日两国，都已在中国设有多数工厂，尤其是纱厂；而日本又靠着有亲日派的中国政府，可以畅所欲为。这些资本家以巨大的投资和残酷的剥削，来和中国资产阶级竞争，已经并吞了不少中国纱厂。这次纱业恐慌，他们以为中国小资本家禁不起，他们可以一方面裁减工人，换用女工，以减低生产成本，一方面挤轧中国纱业，乘机投巨资来收买。殊不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已经觉悟自己的团结力——在上海及青岛两处居然举行很大的罢工，给日本资本家以重大的打击。虽然上海、青岛的工人都没有争到经济上的胜利（青岛第一次罢工，只加了一分钱一天的工资，非常有限的），然而工人的团结力已经表现出来，工会已经得了事实上的承认——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痛恨的。不但如此，这两地的第一次纱厂罢工，都还有一种政治的、民族的斗争的性质：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引起中国一般社会有意无意的同情，中国商会、学生会等大半都趁此鼓起一种

排日的运动。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国民革命运动，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极力造谣，说这是赤化，这是中国人排外的义和团的精神之复活，一面想尽种种方法与工会挑衅，要想扑灭它；青岛和上海两处，他们用同样的方法——闭厂罢业以拒绝“不安分的”工人，抵死不承认工会，以引起工人中的扰动。他们在青岛借助于张宗昌、温树德的兵力，残杀工人（死伤二三十，被逮七八十人，被堵在阴沟死者尚不计其数），并且停闭工厂；他们要摧残有组织的工人，所以趁此纱业恐慌期间，准备停歇生产若干时间后，再另招“驯服的”不敢要工会的工人。他们在上海也是如此扰动工人之后，就停闭工厂。工人要求发给薪资的时候，资本家竟开枪轰击，杀死工人顾正红，伤无数；他们更与英、美、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所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合作，以摧残这些工会。可是这决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斗争；工会运动，他们固然怕，而援助工会的学生，一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他们尤其怕。并且这已不仅是日本一国，而是各国帝国主义者所共同敌视的运动。这种运动随着他们的压迫而起于上海。所以日本在青岛虽然能指使军阀完全扑灭工会，而禁止中国一般人民的反抗；在上海他却不能了。

上海自从顾正红被日资本家亲自打杀之后，一般的学生及小商人的群众，早已跃跃欲试的忿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同时，工部局不但帮助日资本家压迫罢工工人，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又提出印刷附律、码头捐等于上海的纳税外人会议，想在上海更进一步的统治中国人。这两件事：日资本家及工部局摧残工会与纳税外人想剥夺上海中国市民的自由权——凑合在

一处，于是把斗争的阵势扩大了。当上海学生为顾正红被杀，工会被摧残，并且反对印刷附律、码头捐而出发演讲的时候——列强帝国主义者便大自惊扰起来。他们不想一想：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怎样扩大到各国帝国主义者共同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抗，共同压迫一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之自由；他们却只看见中国人民一致的从排日而进于排外，从阶级斗争扩大而为民族斗争，“奴隶都想要自由了”，他们便毅然决然施行屠杀政策。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响了，中国学生、工人、市民的血流了，帝国主义想用这枪声血泪巩固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统治！

二

虽然，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了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上海五月三十日南京路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英、美、日、意、法等国的军舰都开来了，海军陆战队都上岸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武装“打手”——所谓上海万国义勇队都出巡了；上海市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西捕、水兵、义勇队，通街大衢都放着机关枪、大炮、铁甲汽车。接着汉口、九江、镇江、天津、安东，凡是列强有驻军的地方，无处不实行这屠杀政策和炮舰政策——各地死者百余人，伤的无数，被殴辱的更不计其数。越界捕人，强占学校等的寇盗行为，更是时有所闻。这种强暴的政策，帝国主义以为可以镇压住中国民众的反抗，可是事实上适得其反，上海市民立刻便全体罢市、罢工，没有三天，反抗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城市的示威游行及市民大会，一致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各埠租界上外人工厂及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已经继

续起来，实行罢工反抗，天津、汉口、广州的工人已经发动。“假使五月三十日以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那么，五月三十日以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我们听说上海街头巷口无一处没有不反对外人的招贴，无一处不唱反对外人侵略的歌谣——便可以知道了。

五月三十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

可是这总的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立刻发现出内部的分化，这是不可免的。因为中国在列强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等受某一帝国主义者的驱使；有许多妥协软化的分子，不敢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却只想求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出来主持公道；亦有大多数的平民、小商人和劳动者，认清这种屠杀政策出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合谋，所以坚决的主张从此要开始中国民众的大组织，实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有这种分化，所以在这次国民革命开始急进的过程里，可以看出：一、对于帝国主义的要求，二、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三、反抗运动的范围，都有不同的主张。

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纯粹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或者替日本反对英国人，替英国反对日本人，表面上似乎投合一部分的思想潮流；实际上他们完全是反动而压迫民众的：譬如英国的萧耀南派兵保护外侨，出告示说“排外的格杀勿论”，禁止民众运动。他并且已经嫌英国人杀得不痛快，又帮着斩了七个“过激派”的头。日本的张宗昌严禁学生、市民、提及青岛的事，却也不得不准人民对沪案表同情。这种人我们只能当他就是帝国主义者，一致的反对。至于其余两部分同在反抗运动里的人，他们的主张很值得分析一下。

反抗五卅屠杀案的各地各界的要求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最正当和最彻底的主张，便是要求：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

三、收回海关及盐政管理权。

四、收回领事裁判权。

五、永久撤退驻华的一切外人的武装势力。

六、中国人民之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见另一派的主张，便是只要求：

一、收回上海的会审公堂。

二、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的参政权。

三、停止越界筑路，收回租界外之工部局马路。

四、道歉、惩凶、赔偿、罢业者不扣薪等。

前一种的要求是革命派的，后一种是妥协派的。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见妥协派的要求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争回外人在不平等条约以外所侵夺的东西；再则这种要求只是代表少数上海富商的利益——纳税人才有参政权，而且不敢剥夺外人在中国领土内的干预市政权；三则争一个空面子，速图了结上海"五卅"事件。革命派的要求呢，却是着眼在民族的利益，根本要中国的解放独立，脱离殖民地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自己的实业才能发达，中国平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即使说不能以罢市、罢工的手段达到，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中国可以立刻提议召集国际会议，重新审定一切条约。如果中国现在的政府不能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全国民众正在奋起，很可以自动的组织工商学农各界，推翻军阀的政府，而以革命政府来实行这种使命。再让一步说，我们即使现时还没有这种实力，那么，至少我们

应当力争中国平民的政治自由，力争撤退外国驻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使平民有组织自己力量的自由，以为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准备，以进行国民革命的运动。如今上海总商会的主张就是那妥协派的要求；而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民的主张，却是革命派的。尤其是上海的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如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很明显的要求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这种革命派的要求，实在代表全民族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因为帝国主义暴行的代价，决不是道歉赔偿等所能了事——平民群众在这次斗争再不能取得这最小限度的自由，日后帝国主义的屠杀还要肆无忌惮，而中国方面却绝没有组织团结的力量去抵抗。

至于反帝国主义的战线问题，亦有妥协派和革命派的分别。妥协派以为我们若只对一两国进攻，我们的力量还够，如果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合力压迫，说我们是排外，我们便抵拒不了。殊不知道：（一）现时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利益互相冲突，此次事变中，决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二）如果我们核定名实反抗公共租界的各国，他们之间，自然互相推诿，各求卸责而卖好，而后我们的交涉能得着胜算；否则我们自己先唱什么“中美亲善”，美国水兵杀了人，他们的领事反过来问：为什么在美国人那里做事的也罢起工来。（三）此次案件，事实上是各国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以求巩固其统治权，我们正应当指明出来，使民众一致起来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假使哪一国果真要“亲善”，他便应当抛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派的主张，亦并不是一定要扩张战线，反对一切外国人。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应当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无产阶级联合，要求他们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他们主张缩短战线，不但只反对英国日本等，并

且只反对英国日本等的军阀财阀。妥协派的缩短战线政策，却是向民众掩没了法国派军舰、美国水兵杀人等的事实，去说中法亲善或中美亲善，希图美法主持公道。这结果“公道”是没有人主持的，民众却受他们蒙蔽了！所以妥协派只想速了，如梁启超、江亢虎等，竟要蒙蔽民众，把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变成对英对日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甚至于变成反对工部局巡捕杀人的简单口号，这简直是代帝国主义想法，替他们巩固这种统治制度，把群众的目光只放到杀人问题上去，仿佛只要帝国主义不杀人，我们便无论什么都愿意容忍的。至于现在有一派人甚至于只主张反对英国而忘了日本，那就太明显了——日本是这次事件的正凶，是摧残工会、摧残中国平民自由的首犯，如何可以放过？除非是受日本人及段[1]政府的暗示——想把一切罪名脱卸在英国人身上，让日本仍旧实行他的压迫工会政策！

其次，关于反抗运动的范围，妥协派现在已经尽着叫：“这是地方问题，汉口、上海各自解决！”事实上枪杀市民和压迫工人是同样的形势，而且汉口是为援助上海而起的。全国的民众已经本能的自觉的起来一致奋斗，应当联合起来实行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运动。正因为帝国主义在汉口、安东等地方，到处实行屠杀政策，我们更可以提出总解决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然而妥协派却只是为帝国主义者想法，务求速了，就地解决。

总之，妥协派的主张：一、是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牺牲平民的自由；二、是缩短战线，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三、是缩小范围，只求就地解决。同时，他们尽着争一个表面上的妥协和面子，使“五卅”大屠杀案早日了结，只求“平平民愤”，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继长增高的起来；他们

违背民众利益，已经显然，而间接的帮助帝国主义者，蒙蔽民众的民族意识，消弥革命潮流的“功绩”也就不小了。“五卅”大屠杀案之后，国民革命是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政策不能镇压它，而妥协派的国民政策却想破坏它。妥协和革命派的分别，正在于：妥协派，看见国民革命开始，赶紧想法抑遏民众的自由，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这革命运动的进行；革命派呢，力争平民自由的保障，揭发各国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国的真相，联合全国奋起的民众，一致向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攻击，以发展这革命运动，而求达根本解放中国的目的。

妥协派虽然表面上似乎还站在人民一方面，实际上简直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因为中国民族假使不能觉悟革命的必要，假使只争着租界上些小的参政权，承认外人的统治，那么，以后的被屠杀还多着呢。我们不能立刻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要紧；最可怕的是我们忘记自己的目的，故意欺骗民众，阻止民众进行革命运动。革命派的要求和主张，才是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引导革命运动的进行。最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之中，我们应当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否则，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终要被他们破坏掉的。

最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指出，现时除萧耀南等反动的军阀直接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之外，段政府外交官僚的抗议交涉，也都是一时的装腔做势，妥协让步的端倪早已暴露；还有上海总商会内少数买办阶级及富商，亦是只看见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民众。我们真正的平民，不依靠他们，应当独立起来力争我们的自由，团结我们力量，至少要商人、学生、工人等各自团结起来，甚至于有武装的准备，有全国的联合——这是现时盛行的经济绝交口号之外的更重要更切实的工作。中国的国

民革命开始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快要崩溃了！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PDG

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

（一九二五年六月）

任　弼　时

一　上海屠杀案之经过

上海学生，因日商纱厂工人顾正红为要求入厂工作被日人用手枪毙命，及多数日厂中国工人同胞因罢工失业，乃组织学生讲演队演讲募捐，揭露日人的残暴，援助失业工人。学生这种举动，实为热心爱国，不忍同胞被外国人残害欺侮之正当行为，亦为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之所准许。而租界当局竟丢掉平日所谓和平亲善之主张，否认法律之效用，视中国领土之上海为自己属地，对中国国民如农奴时代及殖民地内的奴隶，竟敢逮捕演讲及募捐之文治大学和上海大学学生。

青年学生，较易感受外界刺激，代表社会先进思想，富有反抗能力，对于社会上种种无礼的虐待——何况是外国权力虐待中国学生，当然有所表示。此次上海学生，因为同学被捕以及工人同胞身死，发起在租界上露天讲演，唤醒民众。租界当局不究学生之本心，任意囚捕，并开枪对付几千手无寸铁之学生、工人、市民群众，而至酿成这次上海英租界之大惨杀案及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破天荒之绝大风潮。并且，从五卅

以后，又连日枪杀并捕捉无辜同胞，武装戒备，调遣兵舰到沪，陆战队上岸，封闭学校，越界行凶，任意搜查旅馆和住宅，俨如战胜国之对囚虏，以致中国民众愈益激昂，全国奋起，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此次蛮横的暴举，掀动了全世界的空气。

二　上海屠杀案发生的原因

自这次风潮发生，罢工、罢市、罢课日见扩充之际，社会上代表软弱人们思想的论调，以为这个事变是学生援助工人强要到租界上去演讲的结果，仿佛是怪学生肇此祸事。帝国主义在上海所办的报纸，则诬为“过激派”所主使，苏俄帮助之所致。这种对于此案发生之推测，离事实实在太远，尤以外人报纸之论调更令人奇异。我们很难相信“过激派”有这样伟大的神通，能指挥全上海工商学界，领导全中国唯一无二的大罢工、罢市、罢课，造成中国这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一段极光荣的历史。

然则这次风潮的主因安在呢？若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说：这次风潮是世界帝国主义者历年向中国国民进攻所引起的一种反应的爆发，是世界民族革命运动进步的表现，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阶段，是经济政治压迫下的自然结果。并非因学生援助工人而至于爆发这样的简单，也非少数“过激派”之所能鼓动成功，这不过是敌人想灭杀我们对他们的反抗力的狡计罢了！

现在且将事实分析，我们就可以明了这个解答的正确意义。这次学生援助工人，原由于日本纱厂之工人罢工，日人枪击工人顾正红身毙所致。查日本纱厂中国工人之所以罢工，乃

系工人平日饱受日人虐待压迫所激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领土设立工厂，雇用中国贱价劳力，已为侵略国权之不法行为，何况更加以奴隶对待中国工人，使之衣食不敷，饱受殴打和苛刻呢！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工厂中国工人之罢工，乃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压下的一种反抗的表现。上海学生演讲募捐援助工人，表面上为发动之直接原因，其实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已普遍到全国各地各阶级了，谁不感觉到这种半殖民地的痛苦！近来工部局又有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领照之提议，和在中国擅恣惨杀人民的种种狂妄和蛮横的举动，以及工部局选举权的不平等。这才是此次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大运动的主因呢！

从全国各地罢课和种种对于上海屠杀表同情的运动上，更明白地显示出是饱受帝国主义压迫所起反应的表现。

三　我们对于民众的希望

我们既已知道这次屠杀，是由帝国主义压迫（强订不平等条约、占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以后中国不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则这种屠杀的事变又将重现。上海为直接受帝国主义压迫最烈的中国领土，所以这次事变乃爆发于上海。如帝国主义仍继续其侵略和压迫的政策，或者还要施行更甚于现在压迫政策的时候，则这样屠杀的事实，不仅将重现于上海，极有发生于北京、武汉、天津、长沙、广东等帝国主义势力已侵入地之可能，而重现的惨剧必定比这次还严重、凶恶。

我们如望此种惨剧不再重现于上海及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中国各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

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这种理由当然为一部分中国国民所明见而深知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绝非部分的反抗力量所能做到，亦非现有的中国政府能以外交手段可解决的。能使帝国主义受打击，使其不能自由发展其侵略政策而至于退让者，就只有全民众一致的力量。但是中国现在的国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真相，并没有十分明了，尤以大多数农民，虽身受其害，然并不知道受害的原因，这是我们反帝运动中的大障碍。甚至二年以前的国民党以及现在的国家主义者，还不敢提出反帝的口号。因此，我们对于中国一班青年国民的希望，就是设法使这次上海屠杀的事实变成全国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平常我们向一班民众宣传，总难使他们明白反对帝国主义之必要，现在有了这次帝国主义残杀同胞的事实，当然容易唤起一班同胞的同情。同时须注意民众力量的组织，监督政府防止其妥协和卖国行为，以求达到这次风潮中所提出之各项条件，并扩充反帝同盟的团体变成全国的大联络，集中反帝运动的力量作为长久斗争的根基。遇难的上海国民，应坚持反抗的精神，极力防范上层阶级之妥协及利用，以待全国民众及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援助而求正当之解决。

四　反帝运动中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在这次反帝运动中，应当明白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对象，及我们主观对抗之力量。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侵略政策，绝无分别，且将更残酷地继续，因为他们在欧战之后的互相关系，已与欧战前的形势不同。美国已经占到国际最高经济统治地位，英法等为求恢复其旧有统治，就只有对于殖民地

政策更加厉行，美国为保存其现有势力也不会让英法日等国自由发展其殖民政策，使自己失掉现有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政策，是他们存亡所系的重要条件。他们对于我们被压迫民族的侵略，决不能以什么“人道”、“尊重国体”等的美名所能制止的。他们互相竞争，侵略手段必将更残酷。因此，我们应当明白自己的敌人——帝国主义也决不是仅限于某一国而已。我们若以某一国为反对的对象，则无异于帮助其他帝国主义者巩固其在华势力，认贼为父，将使自己更陷于自绝之境。我们要求中国解放的反帝运动，应认清所反对的目标是一切帝国主义者。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求得政治经济的独立，脱除帝国主义的一切限制和压迫。换言之，就是推倒帝国主义过去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内一切统治的地位和势力，以图民族独立和自由。但是我们要知道，求得这样的民族自由和经济政治独立，绝非以单纯被压迫民族本身的力量所能做到。尤以在各帝国主义国家誓死必争的市场，且为他们的工具——军阀所分据的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绝非中国民众主观力量能求得根本解放而达到国际平等地位的。这种单方面的进攻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注意联络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多方面进攻方能动摇其统治威力。我们应认清，结合反帝的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成功的唯一政策。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以刮削弱小民族殖民地及本国工人阶级为生存之必要条件，他们主要的敌人乃是弱小民族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只有这两种力量的联络，一方面在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使其殖民政策的经济根源不安，他方面各本国无产阶级加以政治上的进攻，这方

是屈服帝国主义统治地位的唯一要策，亦即为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得到民族革命成功的主要机会。因之，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应极力注意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势力联络，绝非国家主义者的清高理论所说的，只以中国民众力量就可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种清高的国家主义理论，无异于使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期限延长，实质上则等于援助帝国主义者施行殖民政策延长机会。我们要明白，统治阶级的国家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之环境和目标，完全是两样绝不相同的东西。统治阶级是要借国家主义的精神去实行殖民政策；被压迫民族乃是要从各统治国家势力之下去求得自由平等。我们不要忘记，联络被压迫势力，是我们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及推倒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主要条件。

五 长期反帝运动中学生的责任

这次上海屠杀所引起的全国反帝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上是含有极大意义的。我们对于这次运动的希望，就是使全国民众了解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同时使他们知道反对帝国主义应注意之点，简言之，就是注意民众中的宣传。学生在这次运动中主要的责任，也就在宣传上的工作；在做宣传工作之先，应认清现代中国学生界的使命。

欧洲学生界在资产阶级革命前，俄国学生在十月革命前，都是革命的先进分子，同情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因为学生中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亦受当时政治与经济的压迫，他们为自身生存条件之改良，所以为革命而牺牲者非常之多。如俄国学生在十月革命前牺牲学业到民间去向农民宣传，风盛一时。现在，中国学生界无论在经济或政治上无不受尽各种压迫和限制，全国人

民无不直接间接受尽帝国主义的压迫摧残，在这种环境下的中国学生，负有民族革命的绝大使命。现在的中国学生应不惜本身的牺牲去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务须将民族革命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肩上，要用这样的勇敢和毅力去执行革命的工作。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同时则须注意到民众力量的团结。综合言之，目前中国国民革命重要工作之一部即在于宣传与组织，这种工作也就是现在学生界应负的主要责任。

我们要知道，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宣传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亲自深入群众，与革命的群众接触而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导他们应进行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注意取得民众的大多数。遇到必要的时候，流血牺牲亦为革命中不可避免的。我们宣传与组织的对象应当预先认定清楚。现在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为最大多数的农民和社会地位最苦的工人，而这两种中间最有革命力量的还是产业工人，因为工人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比任何阶级残酷，同时因受资本主义化的产业发展之赐，使他们特别容易觉悟而进行组织，如最近半年来的上海、青岛、武汉之罢工及全国劳动大会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因此，现在的学生，应当打消宗法社会工学界限的观念，多注意与工人接洽，帮助工人的教育，开办平民义务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及工会，灌输工人政治常识，解释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等，使工人阶级能早日觉悟而团结。这是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凡在大城市及工业区域的学生尤应特别注意。农民在中国人民中约占百分之八十，大多数因经济落后和交通隔阂，所以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非常落后。然而我们应认定他们是革命中有力的军队，他们既占人口的最大多数，且在经济生产上占有极

重要的地位，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绝不能放松。在他们中间工作的环境当然较在工人中为难，其工作的主要点也不外是宣传与组织两项。这种普遍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学生界应负大半责任，因为学生多为四乡集中于城市的，每逢寒暑假时节，学生回到乡村的时候，应特别努力在农民中活动。这种活动的方法当以各地环境为转移，但其共同点，不外为联络本乡同学组织讲演队、新剧团，开办平民学校，组织贫农农会，进行反对地主、乡绅及减租等运动，提倡办协作社、习武团，联络一班先进农民及本乡小学教师组织国民党，作为永久活动的基础。这些都是每逢寒暑假期内可能做到的工作。

总之，我们要明白这次上海的屠杀和屠杀后所引起的罢工、罢课、罢市以致形成全国的运动，绝非偶然无因的事。这次遇害先烈的热血，在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上面有绝大的意义，亦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认为有价值的牺牲。帝国主义者所目视的"贱种"，现在也有了觉悟反抗的能力了，恐怕他们从此也将要改变其以前任意屠杀的手段了。前途事业之如何，还待一班中国青年的努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任弼时选集》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宣言*

——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此次民族运动已由局部的发展到全国的，并且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已非常明了。全中国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同时奋起，因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之援助及同情，而增其前进的勇气。同时，大商阶级之妥协，绅士学者之“速了运动”、“缩小范围”，与夫军阀勾结英日帝国主义者向民众进攻，不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而且简直是要破坏这个运动。所以一方面真为民族利益奋斗的，是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等所谓“下等华人”，别方面背叛民族利益的，是大商、绅士、学者、军阀等所谓“高等华人”。下等华人中，犹以“最下等”的工人为主力军，是以各处运动都以罢工为最后可靠的武器。高等华人中，犹以“最高等”的军阀为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以奉天、天津、山东、上海、武汉、长沙的民众运动，无不遇着军阀之摧残压抑，有的地方几至于完全停顿或消灭。

当此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的时候，中国内部居然分成两个营垒——这是现时民族运动里的特性，我们应当特别的注意。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一期。

帝国主义者因中国人民的奋起与其本国工人之反对，现时已想用种种狡猾政策，以求保存其在中国之特权及威力。譬如美国，现在主张在中国召集第二次“华盛顿会议”讨论取消领事裁判权，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在华特权比英日较少，英日未必赞成他的提议；他又明明知道他所提议的召集国际会议之先决条件，事实上中国一时不能办到，他不妨用这样口惠而实不至的方法，愚弄中国人心，以遂其垄断在华商业之欲。其实美国如果真是“对中国要求修正不平等条约及收回领事裁判权深表同情”，便应当步武苏俄自动的放弃此等特权，以身作则，为各国倡，何必一定要等什么国际会议？岂不是明知道国际会议结果难测，各国互相牵制，托辞延宕，即使有决议也可以不实行，所以送这一个空口人情的吗？华盛顿会议的决议怎样？议决后的实行又怎么样？我们受过一次骗，不受第二次骗了。中国民众只能信事实，决不能信空言的。不论哪一国，如果事实上能放弃在华特权，停止一切侵略行为，中国民众当然承受这种好意——可是骗人的狡猾政策，中国人民却不能信的！

英日帝国主义呢，很早他们便用武力侵略中国。一切割让的土地、租界、租借的港口（实际上也等于割让），以及其他种种特权，他们无不是以战争威胁等方法劫夺去的，中国因此所受的损失，所死丧的性命正已不计其数了。这次“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安东等处的屠杀，不过帝国主义的小试伎俩罢了。尤其是英国，素来总是自称为“文明民族”、“文化国家”、“基督教的国家”；然而实际上他对于中国的政策里，只有炮弹、鸦片、流血甚至于赂买中国官僚等等卑污不堪的手段——这本是他对于东方的根本政策。随后，日本以及其他各国，亦都学着了他这种“文明的”政策了。

最近英日帝国主义者亦仿佛表面上取和缓态度，实际上都

用“以华制华”政策，以高等华人来宰制下等华人，这又是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方法。

日本在欧战时候，对于中国曾经露骨的表现他那“新进的”帝国主义的贪狠；二十一条的要求，已经早成中国民众切骨痛恨的目标。此次上海事件，也正起于日商纱厂在上海与青岛摧残工会打死工人。然而他现在一方面鼓吹日厂事件单独调解，想把一切责任推卸到英国身上去，仿佛他和中国同文同种，极想亲善似的；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都和英国取一致政策。可是这种狡计，中国人民一眼便看透了，也和英外相张伯伦答复工党议员的演说词一样的。张伯伦的演说，虽然竭尽他那造谣诡辩的长技，但始终不能掩盖英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至于“赤化”、“过激”、“苏俄阴谋”等类的谣言诬蔑，也决不能骗着中国民众——不论他们造什么假证据，诬告什么苏俄宣传员，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最简单的理由便是：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及压迫，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远在苏俄及“赤化”出世之前！

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从外面侵略压迫中国，同时必定利用军阀，从中国内部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运动，破坏中国。去年秋天的北京政变以前，他们利用吴佩孚做工具，如今他们又挑着了张作霖了。张作霖本来因得日本的援助取得了半个中国，今后又加上英国援助，他以为不难消灭一切政敌，奄有全中国；所以他不踌躇的以武力镇压从奉天到上海的民众爱国运动，出卖祖国，以博得英日帝国主义者之欢心！

凡是奉系军阀所在之地，民众运动最受压迫，如奉天——张作霖的老家里，如天津——张作霖爪牙密布的地方，一切民众运动及平民组织都受压制，到处逮捕拘禁人民。奉军刚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严，要禁止游行、集会、出版等的自由，军队

占据工会机关……这种压迫和专制，并不比帝国主义势力下的租界差别到哪里去！

张作霖要执行帝国主义者的命令，他不但要镇压国民运动里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甚至于镇压工人的职业组织——工会；他还要摧残学生与中小商人一般的民众；再则，他并且要毁灭领导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与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国民军。

实际上的情形如此，民族运动的策略，便当依此而定。

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之“速了”、“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1]政府一纸哀求式的改约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

民众已经奋起抗争，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要达到胜利是不得不经过极大的困难。敌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外，还加上国内军阀，尤其是张作霖的力量，还有许多所谓高等华人也要加入中国人民敌人的伙里去. 假使我们能联合，能统一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因此，应当有全国集中势力的机关，统一那散处于各地方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紧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及农民等各界的联合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可以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的指导，而达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号召民众一致团结，以实力赞助国民党和国民军，同时，必须要极明白的在一致反抗的中国民众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之前并指出下列的要求——这是中国民众奋斗的目的，这应当是国民党和国民军的目的；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民众才能完全积极的参加斗争去力争自己切身的利益，亦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指导者才有实在的民众力量做后盾。这些要求是：

一、宣告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废除。

二、解除全国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武装。

三、保障平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四、废除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之不平等待遇。

五、废止厘金及一切苛税杂捐。

六、限定享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逾额之田地颁给贫农及无田地之农民，限定田租之最高额，佃户所出田租须尽量减低并禁止预征钱粮。

七、工会之绝对自由，承认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依生活程度规定最低工资，制定保护劳工法。

八、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

九、确定全国教育基金。

十、召集真正人民之国民会议。

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至少须实行这些办法，中国才能得到独立和自由。其速兴起为这些要求而奋斗！亦只有这些办法能保障劳动平民的发展——劳动平民负荷着全部运动的重任，用他们的精力，用他们的血，用他们不断的斗争，筑起自由统一的中国之基础！

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奋斗到底！

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

自由统一的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PDG

怎样做一个宣传家？*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恽 代 英

我们不靠用手枪炸弹，打死一个阿猫阿狗，以改造世界；我们不靠像买彩票一样的送几个人到军队中间去，以便逐渐变成督军、师旅长的所谓实力派，以改造世界；我们不靠练几队精兵去打天下，学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以改造世界。我们怎样改造世界呢？我们靠宣传的工作；靠一张嘴、一支笔，宣传那些应当要求改造世界的人起来学我们一同改造世界。我们要宣传到使勇敢的人起来帮着我们宣传，我们要宣传到使怯弱的人都了解而赞助我们的主张，我们要宣传到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联合起来，大多数向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效奔走的人们都对于统治阶级倒戈相向，于是统治阶级便土崩瓦解的倒下来了！

怎样做一个宣传家呢？

第一，你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要相信只要你能说明理由，解释疑惑，群众一定能够接受你的宣传。为甚么你能这样相信呢？因为你要改造世界，不是你爱捣乱，亦不是你放弃要提出这些高远不必要的理想；你们因为群众受压迫痛苦太利害了，所以为群众求解放而作此种主张。为甚么自己亲受压迫痛苦的群众反会不赞成你的主张呢？他们所以不赞成，总不出两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八十四期。

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地位，一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你主张的真相。这是很难怪他们的。统治阶级为要保障他自己的地位，设种种方法障蔽群众，使他们看不清自己的地位，更看不清自己地位的堕落与统治阶级之关系，他又为要使群众隔离你，对于你的主张，造出种种曲解的谣言，或消极破坏目为不可能的空论。这只要你能去同群众接近，把真的东西赤裸裸的指给他们看，他们自然易于恍悟。有时你不耐烦这样做，你看见这些被欺骗的群众说了几句不入耳的扫兴话，便以为这些人是天生的蠢牛，不愿意再去接近宣传，这却正中了统治阶级要使他们隔离你的诡计了。

第二，你要去宣传，须对于所要宣传的理论，自己先有充分的明了，而且对于一切反对理由要都能够答辩。倘若你自己都有些闹不清楚的地方，你怎样好去宣传人家呢？你在宣传的时候，不要避掉那些反对的理由，要自己提了出来，把那些反对理由自己充分的叙述出来，而且亦很诚恳的欢迎人家提出这种反对理由，然后加以指摘驳正，这最能使人加增注意力，而且为他们把疑团打破，最易使宣传生功效。你要避去人家怀疑的地方不加解释，任便你在别方面说得如何的天花乱坠，人家总要为了这一点疑团不肯接受你的话，所以你的宣传便收不了功效了。

第三，你对人家宣传的时候，要表示出来你自己很有把握的态度，但不可骄傲夸大，惹起被宣传人的反感。你既担负了宣传的责任，不要怯惧，无论你说得好与不好，胆子放大些，脸面放厚些，要表示从容不迫的样子。但你必须要谦和，对于被宣传人要有充分的好感，不要有一丝一毫藐视被宣传人，或自己刚愎武断的态度。你要像是一个来为他们的利益，告诉他们真的消息的人，你不是为你自己出风头，标榜你自己的学问

见解，你只是很诚恳的将你所知道的告诉他们，而且答复他们的疑问，那便他们自然心悦诚服了。你宣传得有不合宜的地方，在工作中你可以自己研究改进，不要在宣传的时候预先胆怯；丑媳妇想要见公婆，只要大着胆子去，在去的时间想些最好的应付的方法，反比那样张皇狼狈要少闹许多笑话。

第四，你要注意在说话的时候，每一句清楚，每一个字清楚；不要说得太快，不要在一句话要说完的时候，把尾音吞在肚子里去了。你说话要注意少用任何听众不容易找的名词，不要因为要表示你的学问，引用许多“主观”、“客观”、“积极”、“消极”等要人思索推敲的话；须知道听的人若要去思索推敲这些名词，便要少听你的几句话，他便不能把你的话上下文接了下去，便感觉无味了。你要极力避去一切专门名词，用极普通易懂的话传述你的意思。在应注意的一句或几个字，你要特别着力的引起大家注意；但不要乱着力，亦不要一开口便太着力了，使以后在要引人注意的地方没有法子引人注意。

第五，你要知道被宣传人的生活，从他的生活中找你说话的材料，找那些可以证明你所说理由的例子，而且利用他生活中常要听见的土话或其他流行的术语说明你的意思。人都希望听些新奇的道理，最不喜欢人云亦云的话；然而这个新奇的道理，若不用眼前的语句与例证来解释，却不能使他声入心通，不能使他听了全身爽快，丝毫不怀疑的相信你。

第六，不要问是不是有人反对你，或者是不是有人不怀好意的提出了反对你的理由，你仍旧要很和平的然而很有把握的从他们所疑惑反对的地方加以解释。若是疑惑反对你的人所说的话有一部分理由，你应当先把那一部分理由摘出来表示你的同意，若是还有些他自己没有说到的可以使他的话更有力的理由，你应当一并站在他的地位为他补充了出来；然后再很从容

的指正他的错误的地方。我们用不着狡辞强辩或一切诡诈的方术，我们只要自己有一番研究，尽可应付一切反对的理论。反对的理论所以会为人所相信，或者在群众中间有时亦能迷惑群众的，总有他的若干理由；不要一笔抹煞，令说的人与群众都疑惑这只是你的偏见，你尽管把他的理由完全提出来，然后就他的破绽或他的前提的错误，加一番批驳。在群众还不曾相信你的时候，你的态度要和平一些，把你的理由很委婉然而很有力的说出来，滑稽的指出反对理由的错误；待到群众相信你的时候，你要完全打倒反对的理由，应当指出这种反对理由的错误，是无意的、有时甚至是有意的帮助统治阶级欺骗群众的，对于那些显然的邪说，应当要求大家排斥拒绝他。在答复反对理由的时候，自然有时能用和平的态度，连反对者都可以使他接受你的宣传是最好的；但若遇见那种有意帮统治阶级说话，或遇见顽固偏见的人，在群众相信之后，还要严厉的驳斥他，这不是为要侮辱他，是因为要群众的观念更确定而清楚的原故。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恽代英文集》下卷刊印。

PDG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恽　代　英

此书系戴季陶先生所著，他自信这是相从孙先生十余年的成绩，他以为在今日国民党员中同时有老衰病和幼稚病两种，“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之统一无望。”所以他大发宏愿，著了这本小书，想统一国民党员的思想。

在这书中我相信戴先生注重建设人民的权力，尤其注重建设在政治上、经济地位上立于被压迫地位的农工阶级的权力，说明不为三万万七千万最困苦的人民的生活，便没有救国的意义，便没有革命的意义。有智识能力不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民效力，就完全与过去二千年一切堕落了的儒者丝毫没有两样，这种侧重农工阶级利益与权力的态度，是很值得钦佩的。但谈到中国固有文化问题与发展阶级势力问题，我却疑惑戴先生引申孙先生的学说，未免有过当之处。

孙先生有时亦讲到中国固有文化，这是不错的，但若因此便说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便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创造文化，那便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没有存在于世界的权利，甚至于说便在全世界社会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民族亦只有化为真正的弱小民族，以至于灭亡，这些话未免太过火而不近

情理了。戴先生痛心于一般人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排斥，他说，像这样下去，在思想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几乎变成中国的与非中国的区别，如果中国的一切真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还要做什么革命呢？我觉得戴先生的思想很奇怪！为什么不像戴先生一样赞美中国文化，便是认中国“一切”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呢？为什么那样便一定会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不能创造文化呢？固然我们要排斥“反科学的”中国文化，这亦犹如要排斥“反科学的”别国文化一样。我们认“中国的一切”亦不过与任何国的“一切”一样的有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犹如犹太文化、埃及文化一样，当然有存在的意义，但这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

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若说必须先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配谈革命，请问非洲里乎人中间并不曾产生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呢？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赞羡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留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蛮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愿屈服于人家而虚骄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举起来。而且戴先生所谓中国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如戴先生所说，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然而戴先生却要咬定二千年来无人理会的所谓“正统”思想是中国的文化，我真不懂这有什么意思。

戴先生以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有纠正的必要，以为我们要促起全国国民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我颇觉他不能自圆其说。戴先生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宣战，只是把一个刚受孕的资本主义堕了胎罢了，堕胎何曾是容易的事呢？中国虽不能有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然而一则外国资本家移殖资本于中国境内，财政资本有汇丰、花旗等银行，工业资本有内外棉纱厂、英美烟公司等工厂，津、汉、青、沪的工钱奴隶已数十万人，对此等资本主义不应宣战吗？再则中国资本家资力虽然薄弱，然心不在小，将来决不能很爽快的屈服于国民党节制资本的政策之下，对这种人不应当“预备”宣战吗？戴先生以为资产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真正站在利害敌对地位的不过百分之一，最没良心和知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其实站在利害敌对地位和没良心知识有何分别。即欧美资产阶级之反动，其酷待劳工又何尝不可说是没良心？其违背进化潮流何尝不可说是没知识？不过他们站在与劳工利害敌对的地位，使他们不易有良心有知识耳。戴先生知道要解决民生问题必定要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才是正确。但戴先生却又要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要各阶级的人抛弃他的阶级性，似乎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阶级性的发展亦是不好的。戴先生要治者阶级“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支配阶级的人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这若不是一个空想，自然是没有人反对的事情；但戴先生亦承认要农工阶级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那便可知无产阶级不应抛弃他自己的阶级性，而阻止无产阶级势力之扩大，绝对不是相信民生主义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了。戴先生又以为只有生活优裕的人才能得着革命的智识与觉悟，去“为”不觉悟的人革命。其实，倘若靠生活优裕的人去“为”人家革命，十余年的经验已证明是靠不住的了。孙先生说要多数不知

不觉的人实行革命，其实这些人决不是完全不知不觉，乃因受了革命的宣传从生活上得着觉悟，这种从生活上得着觉悟的人比那些从知识上得着觉悟的人要勇敢坚决得多。若真是愚民政策，想靠少数治者阶级的“士大夫”，来包办革命的事，而有意无意中似乎反对农工阶级势力的扩大与他们的阶级性的发展，这与戴先生自己所说要靠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正确之说根本矛盾，亦决不是孙先生的意思。

根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八十七期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告工人兵士学生*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工人、兵士、学生们：

沪港等处工人，为中华民族独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已经两个多月了。罢工工人不但力争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且奋斗打破帝国主义者束缚中国的种种条约。因为不平等条约，实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而上海、汉口、广州、重庆以及最近的南京、青岛等处惨杀事件，即由是酿成。上海方面，虽有驻沪奉军竭力威压，托言爱国须维持秩序，实际却摧残罢工运动与抵货运动，但是工人仍然坚持，丝毫没有畏惧退缩。

外国资本家向来以中国为其殖民地，认为他们已经征服了的，中国工人是他们任意蹂躏的奴隶，丝毫不准反抗的。在罢工开始的时候，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即以“暴动的奴隶”看待中国工人，采用最横暴的镇压政策。

迨至上海香港等处五十万工人，一致奋起反抗，组织之坚强，奋斗之勇猛，为前此所未有，举国沸腾，同情四起，尤以学生小商人等的赞助罢工，最为热烈。如是帝国主义者乃大起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五期。

恐慌，因不得不与中国政府及资产阶级开始谈判，声言愿意和平解决。罢工运动日趋扩大，帝国主义者亦更觉得非为相当让步不可。事态的严重，使他们觉得现在已非从前可比，不能一味压迫中国工人，使他们生活在极无人道的状况里，替外国资本家挣钱。

帝国主义者这才明白，中国已有工业的无产阶级，既能力争自己的阶级利益，又极努力于中国的解放，已成了全国解放运动的先锋。因此使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政府，不能不在国会中提起“中国问题”，不能不将两年来早已抛在脑后的华盛顿会议的决定，重新提起来。

可是，工人、学生、兵士们呵！除少数工贼买办，当此全国各界一致赞助罢工工人之际，而帝国主义者亦已不能不预备让步了，适于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竟遣其部将自告奋勇的来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

奉军南下的时候，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张作霖和帝国主义商量好了，奉军之来，即为压服罢工运动，恐吓学生和商人替那些帝国主义者解围罢了。邢士廉初到上海之时，所以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为张作霖或邢士廉不愿下手，却是因为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暴动而反抗奉军。

然而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帝国主义便兴高彩烈起来。英人报纸天天鼓吹杀人压迫，邢士廉便天天封闭团体，逮讯工人学生——这可把英国人和张作霖之间的秘密关系，完全暴露出来。

工人、学生、兵士们！邢士廉来到上海，华界马上就戒严，上海四处都布满了侦探汉奸，造作种种谣言来破坏工人及一般民众的团体。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罢工始终还是继续下

去，工人群众深知他们已经得着的胜利——是非常之可贵的。工人阶级因有种种团结的能力，已经使帝国主义者都不能不让步，至少口头上已经不敢强硬，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引起全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各地都起响应，然而现在这一潮流，还不能立刻形成全国的反抗运动——工人还必须有长期斗争的预备。而且军阀一天天的进逼；甚至于大资产阶级已经想中止罢工及抵货的运动。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

因此上海工人现时应当明白表示，对于自身的经济上及法律上的要求，当然继续以罢工方法力争；至于全国的总要求和工商学各界所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赞助南北政府，使一致的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奋斗。

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因此，工人得以更进一步的团结组织，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分子，继续斗争——在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阶级的目的。

工人们！罢工仍须继续坚持，先求达到经济上法律上的要求，团结在工会里面。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

学生们！对于工人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援助，此时更须努力。工人的胜利便是学生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

兵士们！你们也是中国的国民，也和工人阶级是一样的。你们从此不好反对工界同胞，不应听任何人的命令压迫工界同胞。工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是反抗帝国主义走狗的奉系军阀之胜利，所以亦就是你们的胜利。

工人兵士学生的胜利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国民自由万岁！

工人学生兵士以及一切劳动平民联合万岁！

反抗帝国主义之继续斗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

中国工人和学生的血流了不少了。自从五月三十日上海大马路大屠杀之后，中国各地接接连连的屠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中国工人阶级为着争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可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却始终想用屠杀政策压倒这种解放运动。两个半月以来，被杀的受伤的已经有几百几千——上海五卅屠杀之后，汉口、广州、重庆等处又继续着惨杀，甚至于九龙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被枪毙，他们不过因为不肯替英国人掘战壕，帮英国人预备打广州。

全中国的民众都已经因愤激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却还在预备更厉害的压迫，更残酷的屠杀。最近又有好几次大屠杀。第一是南京和记工人——他们罢工之后和记公司的老班已经答应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这些外国资本家不但悔约不肯履行并且开枪打人，又叫了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第二是青岛的纱厂工人——日资本家直接命令他们的奴才张宗昌枪毙《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将工人王伦斩首示众，并且四出拿人，捉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六期。

去工人四五十。第三是天津的纱厂工人——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轰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英国帝国主义者想用炮火政策镇服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想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贿买卖国军阀和工贼，一面压迫一面破坏，来强迫中国的人民仍旧做他们的驯服的奴隶牛马。他们永不用妄想罢！从此以后我们中国民众、工人学生一定永久不息的奋斗，反抗我们的仇敌。虽然我们的仇敌还在天天遣调海军上陆，天天命令军阀屠杀工人，天天贿买工贼破坏工会，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觉悟，已经奋起斗争，几十万几百万的中国工人，广州、上海、汉口、青岛、天津、开封等大都市里无产阶级，努力参加斗争的，也正一天天的增加呢！上海的五卅惨案激起汉口广州的工人，汉口广州的屠杀，又激起南京天津的工人……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日千里的发展；当然这种民众的力量同时亦便反抗帝国主义的奴才——张作霖手下的奉系军阀。“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处被杀的人，固然已经有几百几千，可是全国各地因此而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人，又何止几百万几千万！

帝国主义者现在还在兴高彩烈，他们的机关报拼命的颂扬李景林，感谢张作霖，他们指使邢士廉——教他照天津李景林的模范镇服上海的工人。

工人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奴才奉系军阀真会照着天津的“模范”来压迫上海的工人。我们应当及早的预防，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所已经签订的条件本来只是上海交涉员和日本

领事的谈判，我们工人是不能满意的——可是他们自己签字的条件，也未必肯诚意的履行，亦许也是帝国主义者诳骗工人的。帝国主义者在南京、青岛、天津已经屡次悔约，屡次指使军阀压迫——难道在上海他们不会如此吗？我们工人应当准备自己的力量，应当准备对付他们的阴谋。工人应当一致团结，以全力拥护工会，工会组织应当特别严密，使我们团体，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等怎样压迫破坏，始终能够存在而且工人还要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

学生们！努力的继续帮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罢！军阀的压迫和残杀决不会吓退你们，只会使全国的革命运动格外发展。赶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奋斗。

兵士们！不要向工人和学生开枪，他们为全国的解放而奋斗，亦就是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你们赶快组织兵士的革命机关，反对那些使你们变成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现在矿工铁路工人还没有直接加入斗争哩！还有许多地方的工人阶级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加入运动哩！这种准备正在进行，假使全国一致的团结成功，我们的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几千几万倍哩！群众里面的这种力量正在一天天的积聚起来，准备着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决死的斗争。这是很长期的工作，要组织得好，要有耐久的战斗力的，要有统一的政治上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政见是：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及其他一

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然后中国工人和一般民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帝国主义者固然还很利害，他们有兵舰，有飞机，有机关枪，有种种杀人的利器；他们还有军阀，有工贼，有侦探，有种种破坏中国民众内部的工具。可是中国的民众，并用不着害怕。列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一天天的奋起反抗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中国民众和各国工人的联合，便可以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万岁！

推翻列强帝国主义的强盗！

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领袖之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瞿　秋　白

“五卅”屠杀后，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勃兴起来，上海、香港、广州的工人，实行同盟罢工，各地的学生商人积极的抵制英日货——各阶级的斗争一天一天的革命化起来。最初的运动里，我们看见上海、青岛的工人，争工会的自由，争工资的增加，上海的商人反对码头捐、印刷附律等，还纯然是经济要求和地方问题；甚至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也偏重于上海的会审公堂及工部局华董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离去地方的性质。可是全国各地屠杀案重叠而起，各地民众运动日益发展，对外的要求便自然变成全国的性质和政治的性质——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换句话说，便是要根本推翻列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统治地位，具体的说来，便是要求收回一切租界，收回海关管理权，废除协定关税的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废止外人在华得自由设立工厂等等的特权。

这一中国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自然使反帝国主义运动里实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五期。

际上成立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五卅”以前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往往还有人说是赤化过激，其实这一要求是代表全国各阶级权利的要求，是代表全民族的要求。废止协定关税，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一切租界等，难道不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应有的权利？何以“五卅”以前一般社会提都不敢提，只有少数革命分子努力的宣传，还要被人指为过激？“五卅”以后情势便大不同了。不但工人阶级一致的提出这一要求，不但全国的学生群众努力的宣传和鼓吹，甚至于段[1]政府都不能不提出修正不平等条约的通牒，上海总商会等类的团体以及一般商人都赞助这一口号，而且参加运动。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五卅”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时期——实行国民革命的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为着抵御帝国主义的压迫，首先开始斗争，他们不但要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而且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除锁链而外，真是一无所有，他们不像资产阶级有患得患失的懦弱心理，而且他们知道中国民族处于列强统治之下的时候，工人阶级决不能独得着解放，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如果中国还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即使工人偶然得着外国资本家极小的让步，也仍旧是靠不住的。因此，上海、青岛日商纱厂里的工人，因为受压迫虐待到了极点而罢工反抗——这种局部的阶级的斗争，马上便使工人进一步而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而且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使帝国主义者暴露他们极残酷的剥削制度；随后“五卅”以来青、沪、汉、粤、渝、宁等处的屠杀——帝国主义所用以镇压“暴动的奴隶”的政策，尤其将平素大家所不大注意的列强统治中国的实状彻底的显露出来，于是全国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以反抗这种屠杀的事实实现出来，而推翻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

要求，从此便成了人人所彻底了解的口号。尤其是上海、香港的工人，罢工人数达四五十万，组织上非常团结，实际上予帝国主义者以很大的打击——表示中国民族的真实力量。汉口、青岛、南京等处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都是工人做先锋队。因有工人群众的奋起做实际的斗争，全国国民都觉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有组织的平民是有这样的力量的；于是上海便首先成立工商学联合会，学生商人也都能来参加，并且成立联合的组织和实际行动的机关。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的组织成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所以"五卅"以后反帝国主义运动确已进了革命行动的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已经不仅是宣传上的口号，而成了群群斗争的实际目标了。由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因为工人阶级最被压迫，因为帝国主义者实行露骨的残暴政策，所以全国一般民众都知道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因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行动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能代表全民族提出解放中国的要求，能以实力表示为全民族而牺牲的精神，所以全国一般民众都感到自身的力量，抛弃以前甘于奴属的懦弱心理而起来联合工人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如今全国各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得以实现，实在完全因为有工人阶级的勇猛斗争。反过来说，譬如"五卅"以前，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能集中，还没有表现，一般资产阶级连收回会审公堂等要求都不敢提出，何况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日日对外人罚咒"外崇国信"以求媚，还敢说修改条约！可见这次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工人阶级所引导的，全国人民敢于奋起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奋斗，敢于提出要求条件，也是全靠工人阶级做后盾。

"五卅"以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一日千里的扩大起

来，各阶级实际上共同斗争的联合战线也渐渐的巩固起来。帝国主义者剥削侵略了中国八九十年，向来没有遇见这样有力的反抗，现在自然异常的恐惧，千方百计的要求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夺回中国民众所已得的胜利。中国民众最近两月来斗争所得胜利是什么？就是各地，尤其是上海、香港的工人已经事实上组织起来；上海总工会及广州的罢工委员会已经成了群众的斗争的机关；各地的雪耻会、后援会、工商学联合会等民众的组织，也逐渐集中革命的民族运动的力量，而且全国各界的联合战线，一致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向来所没有的。所以帝国主义的政策，便是要摧残这些民众组织，破坏这一联合战线。第一，他们赶紧声言要召集关税会议，他们的目的是在拿这点小利引诱政府和军阀，使政府软化而帮助他们来压迫民众。帝国主义者（所谓十一国商会），在上海竟公然与总商会秘密谈判，口头答应交回会审公堂，工部局里准设华董等等，他们想借此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商人等退出国民运动的战线，置工人阶级的利益于不顾。第二，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和他们所发的华文传单《诚言》，拼命的宣传，颠倒是非，诬蔑工人学生，造作许多吞款暴乱等的谣言；雇用流氓打手，对于工会及工人领袖横加摧残，任意杀害。第三，帝国主义者更指使中国的军阀压迫工人，摧残国民运动。总之，他们的种种政策和手段，无非是要使工人阶级孤立无援；破坏了联合战线和工人的团体，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便自然解体，不足怕了。

对于中国人呢，却正要巩固我们的联合战线，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工人及民众的团体，才能有继续斗争的力量。而且应当更进一步，格外扩大联合战线，统一全国民众的力量，更加巩固工人及民众的组织。联合战线之中，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两个月来上海、香港工人的罢工，力

争民族的权利便是明证。然而资产阶级是否能同样的忠实呢？上海工部局停止供给中国工厂的电力——这是中国实业完全不能发展，中国完全没有主权，使电气厂等主要的市政实业都落在外人手里的结果，正是中国实业家所应当反抗的。可是中国这些实业家却只图小利，甘心屈服，反而来强逼工人去上工，反而帮着帝国主义者来破坏工会。罢工工人连身家性命都牺牲在民族斗争里，而这些资产阶级连停闭几天工厂的损失都舍不得牺牲——就此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至于中国的军阀、政客、工贼等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的急务，便是努力巩固联合战线和民众的组织——积极反对那些直接的间接的帝国主义工具。谁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破坏工人及民众的团体，谁便是卖国贼，便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全国应当一致的反对他。全国各阶级都应当积极的奋斗、联合，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

我们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各阶级都应当和工人阶级一样的决心牺牲和奋斗，那时我们最终的胜利才有希望。我们两月来困苦的斗争为什么至今还不能胜利？就是因为：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所以我们必须先使各界一致努力于全国联合大会的运动，这全国人民的大会，要以实力促成全国的统一，实现平民的政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等，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那时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得最大限度的集中和统一，向帝国主义者作战。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里，始终都是民族

解放运动的先锋，它督促各阶级一致前进，率领全国民众奋斗——一定要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PDG

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恽　代　英

人们对于一种秘密的革命党，每每不免发生许多猜疑与误会，何况有帝国主义者散布的毁议？何况有帝国主义的走狗编造的谣言？何况有浅见而狭隘的人帮助他们，发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以紊淆大家的耳目呢？不过我们脑筋更冷静清醒些，我相信这般猜疑与误会，没有什么不容易清楚明白的事情。

在这几年中间，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已经令全中国有知识的人都承认他们的勇敢与劳瘁了。但还有许多比较流行的怀疑之点，我可以列述解答如下：

（一）有人说，无论共产党怎样努力，中国现在总是不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然而谁看见共产党在“现在”要实行共产主义？在“现在”，共产党又有什么神奇的法子，能在这种大部分仍陷于封建的农业社会中间，来实行共产主义呢？苏俄在今天亦只能采用“向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甚至于连新经济政策都还不敢希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只希望先实现联合各阶级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将时局向前推进一步，然后再以无产阶级的实力谋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以渐进于共产主义。只有老顽固到“将来”亦不要实现共

产主义，只有大空想家在“现在”便居然要实现共产主义。

（二）有人说，共产党将来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是于“民治主义”有妨害的。然而一个真诚坦白的分子，为什么要怕“将来”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天呢？我假定你们提倡发达民权与保障民生等口号，都是真心为全民的利益说话的；你们敢断言在所谓全民之中，将来不会有阶级利益的冲突，使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的实力才能争夺自己的利益么？只要有大的或小的资产阶级，只要这些资产阶级有人不能真心接受你们的“民治主义”，他们的所谓发达民权，决不许农民、工人与缙绅之士有一样的选举或被选举权，以破坏了他们的体统；他们的所谓保障民生，决不许有人去节制他们的资本，或是平均他们的地权，以侵犯了他们的自由权利。所以这种“民治主义”，结果至多能给予农民、工人以投票权，使他们好为缙绅之士“抬轿子”凑票数；或是给予农民、工人些微的恩惠，使他们能享受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得利益万分之一的余沥，如是而已。谁应当禁止不满意于这种“民治主义”的人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以无产阶级的实力根本压倒资产阶级的这种反民治的行为呢？我再退一万步，假定真有把握能在那时不至于有资产阶级反民治的行为发生，假定你们真能发达民权保障民生至少像你们口中所说的那样好，那便无产阶级都会心满意足，不感觉有自己专政的必要，纵然共产党一天到黑喊叫无产阶级专政，亦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什么人怕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呢？只有在革命以前本无真心为全民利益说话的人，与革命以后甘愿纵容甚至帮助资产阶级反民治行动的人。

（三）有人说，共产党在今天主张阶级争斗，有妨害于各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各阶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以从事革命，只须他们认识为自己的利益非联合起来从事革命不

可，为什么怕他们因为阶级争斗而不肯联合起来呢？任何时的阶级争斗，都是为的工人反抗剥削的资本家，或是为的农民反抗剥削的地主；为什么因为要联合起来从事革命，便应当宽纵这种资本家或地主，便应当使农民、工人牺牲他们的反抗的正当权利呢？阶级之间的有争斗，是从古已然的，只要一天还有资本家、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的事，这种争斗亦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为这种资本家、地主做走狗的人应当反对这种争斗。你们只知反对这种争斗，为什么不肯负责纠正这种剥削工人、农民的地主、资本家？对于你们自己无法纠正的地主、资本家，怎样不能说出一个对付他们的切实办法呢？

（四）有人说，共产党既是有自己的主张，不应当都加到国民党里面，用国民党的名义作各种活动。倘若一定要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这便证明共产党的不光明磊落，或是共产党的运动不适合于中国的需要，所以不好把他们的名义拿出来。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连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亦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懂革命党是什么东西，否则至少亦是挟有客气偏见，所以才说出这种可笑的话来。共产党因为见到要渐进于共产主义，必须先联合各阶级打倒帝国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这是他们自己的主张，亦便是国民党的主张，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用国民党的名义作各种活动呢？不错，共产党现在只希望国民党能忠于为民族主义奋斗，对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不一定希望国民党能够切实做得到；然这只是因为共产党相信非有无产阶级的实力，压倒资产阶级，不能保证农民、工人政治经济上的安全，他们并不要根本反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国民党若真有把握不要无产阶级的实力而能□全实现三民主义，尽可以努力做出来给共产党看，用不着反对共产党这种更进一步为农民、工人利益而奋斗的主张，便

是在国民党内部亦没有理由不许有抱着共产党这种信念的党员。至于共产党的光明磊落、在于他的服从党的纪律，尽其全力钻到农民、工人乃至一般青年群众的深处，以扩大革命的宣传与组织。他们是帝国主义、军阀、绅士们所嫉恶的，他们是统治阶级舆论所污蔑的，他们决不能一天只顾到大庭广众中间拍拍胸膛，说明他们自己是共产党，好让侦探警察来拘捕，以博取这个光明磊落的美名。凡是比较秘密的革命党都是如此的，例如辛亥以前的同盟会员决不能到处公开的活动，亦决不能说他既是不能公开的活动，便一定是不合于中国的需要。有人说，共产党员今天是借国民党的屋躲雨，自然共产党是在风雨中间过日子的，便在国民党的屋下面，并不敢稍存苟且偷安的心理，不天天预备去同风雨奋斗。我便很奇怪国民党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为什么可以不到风雨中间去奋斗？为什么会有躲雨的屋？一般国民党员倘若不愿意将这个屋借给共产党躲雨，请问国民党员躲在屋里做什么？我们很希望统治阶级有一天要恐怖国民党像今天恐怖共产党一样，我们很希望国民党员都能够很勇敢的到风雨中过真正的革命生活，那时候国民党决没有屋子供人家躲雨，便自然知道革命党是什么东西，革命党能够光明磊落到什么地步了。

（五）有人说，共产党员既加入国民党，不应当在国民党中为共产党吸收党员，更不应在国民党中有挑拨的事情。这更是奇怪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吸收党员，犹如他们在任何地方吸收党员一样。假令共产党的理论与主张，敌不过国民党，为什么国民党员会被他们吸收去？假令共产党的理论与主张，确实比国民党要好些，有什么力量能够禁止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吸收党员呢？一般军阀、绅董与腐败教育家，生怕国民党到他们地方的中间去活动吸收党员，这种恐怖只令我们看成笑话。然

而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亦居然会有这一样的恐怖，这不更是一场大笑话吗？至于说到挑拨，请问指的什么事体？倘若指的共产党人有些攻击国民党右派与夫督促国民党中派，请问右派是否应该攻击，中派是否需要督促，经过这种攻击与督促之后，国民党究竟得着什么坏处或好处？国民党包含许多敷衍妥协的原素，这是十余年他所以不能完成民族革命之使命的原因。为什么不应当对于这种敷衍妥协的原素痛痛快快的加以打击，使国民党全部的精神都振刷起来？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原素，还要负挑拨的罪名呢？从前国民党被宋教仁等污损了，被糊涂的右派——一般政客官僚——败坏了，所谓好的（？）老党员只知道消极，只知道袖手悲叹，甚至只知道置之不闻不问，以醇酒妇人消磨自己的日子。等到人家把这些黑幕揭开了，国民党群众的判断力比较进步了，这些人又钻出头来一面承认宋教仁等右派确实是不好，然而一面又说人家是挑拨，想在这中间游移取巧，以取自己的地位。为什么不应当“挑拨”呢？我们还应当挑拨国民党员起来反对那种卖淫妇样的杨庶堪，我们还应当继续挑拨国民党员起来反对在广东妨害军政统一、财政统一的各军阀，我们还应当继续挑拨国民党员常时纠正中派领袖怯懦游移的态度！是真诚要求革命的人，应当嫌恶这种挑拨么？

根据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
《中国青年》第八十九期刊印。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信*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慧生[1]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十八日《向导》第一二九、一三〇期。

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和你谈一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

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知造因了。我们究竟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这在中国哪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2]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

以前，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

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于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抄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上、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

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不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哪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

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成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言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的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像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

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像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未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是以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根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

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比现在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 C. P. 或 C. Y. 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 C. P. 非 C. 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 P. 和 C. Y. 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像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 C. P. 和 C. Y. 。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 C. P. 的很少很少，比较 C. P. 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 C. P. 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 C. P. 发展，还是 C. P. 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 C. P. 非 C. 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 C. P. 非 C. Y. 的国民党员得着或失却训练工

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像要想一举便把非 C. P. 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种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 C. P. 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道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 C. P. 同受压迫，并且对于 C. P. 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3]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

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　　　　*　　　　*

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4]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成员的加入，第一要

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么？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什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谢持。
〔2〕指杨希闵、刘震寰。
〔3〕即许崇智。
〔4〕指康有为、梁启超。

PDG

中共中央为廖仲恺遇刺悼唁国民党中央*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广州传来廖仲恺先生被刺逝世的消息，使我们不胜悲痛。

廖仲恺先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健将，如今竟成了帝国主义者阴谋的牺牲品，这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本党敬代表中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表示极诚恳悲痛的唁意。

廖仲恺先生的死，正死在国民政府努力与英国帝国主义奋斗的时候，正死在国民政府努力整顿财政的时候，他被刺的原因，我们可以断定是帝国主义勾结反革命的军阀之阴谋。“五卅”以后，沙基惨案以后，沙面香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罢工和南方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已经使帝国主义者慄慄危惧；帝国主义者所赂使的杨刘[1]等反革命的军阀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得以努力进行财政的统一以及其他利于民众的政策，不但使反革命的军阀丧失他们保庇烟赌鱼肉人民的利薮，并且使帝国主义者觉到中国国民政府巩固起来的危险。何况，廖仲恺先生被刺的那几天，正是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宣传对粤宣战“使亲善的华人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七期。

政府代执广州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派的互相勾结而实行刺杀国民革命领袖的阴谋，实在再也用不着什么别的证据，已经明了到极点的了。当然更不用说，他们刺死廖仲恺先生的目的，决不单是要刺死他一个人而已，而是要推翻国民政府，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然而只要国民政府始终是拥护民族及民众利益的政府，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必定因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无耻的阴谋，而更加觉悟，更加积极的以全力来拥护这一政府。全国的革命民众都准备着赞助国民政府，赞助贵党，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

廖仲恺先生虽死，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没有死，赞助国民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决不会死！

廖仲恺先生万岁！

国民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八、三十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杨希闵、刘震寰。

PDG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

——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各级同学们：

本校[1]第四次大会所修正之章程第二条新生入学时，须有正式入学半年以上之同学二人介绍。当此本校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兹拟暂行变通办法：新生入学时介绍二人中只须有一人是正式同学，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惟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各地候补同学，凡在此次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规候补期，改为正式同学。

又关于校团[2]组织厘定如左：

一、校团之重要作用，系于各种社会团体机关而有本校同学参与之代表大会中临时组织之，以主张本校之政策。全国代表大会中之校团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省或地方代表大会中者由区或地委指挥，向区或地委负责。

二、工农学及其他联合团体（如工联、学联之类）总机关负责职员中有本校同学者，亦得组织某机关之校团：全国总机关之校团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省或地方机关中者由区或地委指挥，向区或地委负责。其各个团体机关（如一工会、一

学校之类）则不必常设校团，有特别会议发生时由支部书记召集该机关全体任职同学临时组织校团以应付之。

三、校团讨论该大会或该机关中本校应采行之重要策略，报告中央、区或地委，并接受与设法执行中央、区或地委对该大会或机关所议决本校应采行之策略。

四、上级机关之校团，于某事项须对同性质下级机关之校团或支部有所命令时，须先得中央、区或地委之同意。下级机关之校团或支部有事须呈请同性质上级机关之校团时，同样须得区或地委之同意。

五、校团书记由中央、区或地委指定之，或由参与该大会本校同学及该机关中本校同学推定而经中央、区或地委之允许。校团人数多时，则可指定数人组织干事会。

六、一切校团均应照第四次大会组织议决案第七条会同少校[3]同学合组之。

七、校团与支部之区别如下：支部为本校基础组织，在一固定机关内负发展本校及指导该机关内之本校政治工作两重职位；校团则在各种临时会议或各种联合机关内其中并不能组织支部者负指挥本校同学一致行动之责任。

中央总书记

一九二五、八、三十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中国共产党。

〔2〕指中国共产党党团。

〔3〕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一九二五年八月）

瞿　秋　白

一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 C.P. 的跨党，甚至于反对 C.P. 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戴季陶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1]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二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

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智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三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

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膨胀，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是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

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己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智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而他所谓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

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等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上经过李征五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选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赋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

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

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已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是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 P.。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

的资本主义，使它不至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面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北京的杨德甫、上海的王光辉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哪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P. 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P. 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P. 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

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 C. P.，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七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中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 C. P. 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要主张“中心思想”。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戴季陶还主张 C. P. 公开出来与国民党共同组织联立的中央委员会。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 C. P. 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 C. 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一，他说 C. P. 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事实上从一九二一年海员罢工，“二七”屠杀，广州的农民运动……一直到最近的五卅运动，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戴季陶说：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则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发展，还当

从民族中大多数之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上奋斗，而不是保留什么古文化。第二，他说C.P.自己的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也只是参加国民革命，那么C.P.用不着存在。其实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的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无地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独立的政党。C.P.的主义是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都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争中国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农工大多数民众的民权和“民生”，便是这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义及政策没有丝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救国的党，可是他又反对农工阶级的阶级斗争，试问农工阶级连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争，所谓“民族文化”、“孔孙道统”能使他们起来力争吗？农工阶级不来积极参加，而想国民革命成功，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第三，他说C.P.自己不能公开，“心里想着共产革命，口里说的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

国民革命"，不把C.P.的名义拿出来。这更错误。C.P.组织上的不公开，不过是因为军阀政府之压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会，此时在反动军阀势力之下的国民党，又何尝公开呢？至于政治上，三四年来，C.P.的政策，主义——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中农工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去努力参加，以此解放中国，同时亦就是进行世界的社会革命，以进于所谓"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都是彰明较著以C.P.的名义发表宣言政策的。就是C.P.加入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于说，不用唯物史观，不用进C.P.也可以为工农而奋斗，那么，不用说右派工贼的成绩已经斐然可观，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义，也就够受的了。第四，他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C.P.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自己主张起来。"共产主义的步骤及中国C.P.现时的主张"计划"既如上述，那么，中国C.P.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制度，已很明显；季陶现时所不肯苟同的，当然不是这一点，而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见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缘故，并不在于条件具备与否，却在于他自己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然怎会把C.P."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政府，以阶级斗争工农生活改善"的主张，认为揠苗助长的拙策！

八

以上四点都是关于理论上及政策上的问题。至于国民党组

织上的问题：第一，他以为“大团体内包含小团体”，C.P.“只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本身组织”。这句话是很错误的。事实上C.P.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自己的“躯壳”，何必借国民党的。两年来的事实，只是C.P.同志在国民党中工作，努力替国民党增加了不少真实党员，其中有许多是并没有进C.P.的。至于说C.P.及C.Y.不应吸收国民党的党员，那更是奇怪。国民党党员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人，他自然要进C.P.和C.Y.；没有阶级觉悟的人，C.P.及C.Y.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会进来。戴季陶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何必舍不得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进C.P.？第二，他说C.P.在国民党中主张上、选举上等都用“手段”。其实这所谓手段，不过是行动比较一致些。一则思想相同，一致是当然的事，二则C.P.既要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主张上、选举上当然以此为目标。戴季陶自己亦骂右派糊涂，主张要肃清他们。譬如现在这种分子还未肃清之前要有选举，季陶要使这些反革命的糊涂分子不能握住党里的事权，他一定不选他们，并且一定要教别人也不选他们。这算什么手段。戴季陶在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时候，说党员应走的道路是在党内“争决议”。这是很对；为什么一个人争决议便可以的，几个人一致争决议或选举便不可以？第三，他说C.P.对于国民党有二心，不忠实，因为另外有团体；又说同盟会时代也有“各种主义者”，可是因为没有团体，所以始终对党忠实。其实季陶自己说的，同盟会时代有种族革命派，有民主立宪派（政治革命派），后来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党了……“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可见，对党及革命忠实与否，并不在于有无另外团体，却在于主张合于革命的过程与否。第四，他说，C.P.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和经济维持力。这更是笑

话。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义，当然对于工农民众的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人的政党，应当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权。难道国民党主张民权，等到平民有了“权”，又可惜起来了吗！至于说经济维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P. 的组织决不能用国民党的钱。这简直是造谎。总之，季陶这些理论和组织问题上的攻击，其目的只在于打倒 C.P.，最后竟不惜用造谣的手段。季陶说，C.P. 当国民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其实季陶都已经当 C.P. 是自己现在的敌人了，所以不惜用这种手段。

九

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请看：一、他说，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内国民革命成功后，政权总还握在“三民主义的青年”手里。这就是说：“纯正的三民主义青年”是能握到政权的，不纯正的当然不准。这是一种权力的诱惑。其实，五十年内要想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能实现，完全是梦想；单只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闵的胜利，没有农工的赞助，没有 C.P. 的出力，决办不到。何况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压迫阶级的精神勉励党员，却以政权在握去诱惑。这真不知是何等的“团体道德”，革命道德。二、他说：“第三国际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所能”。

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三、他说，某某同志因是 C. P. 而使国民党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 C. P. 所以虽有大才亦不能开展，又说那都是“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一个人的主张，害了 C. P. 的青年。这岂不是纯粹的挑拨离间手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不是利诱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离间。他们造谣离间之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民众怀疑他们的指导者。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了！

（附注）：季陶挑拨离间 C. P. 与国民党的感情，还有几件事实问题：

一、谭平山的文章。平山那篇论文，即如季陶所举，说“国民党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为过。国民党及广州政府是否确有许多受右派的官僚军人所支配的反动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平山的论文指出来，正可以使群众的党员起而注意纠正，挽回民间的信用。季陶却一笔抹杀，只说平山“说国民党的坏话”。

二、所谓某区党部的一封信。事实上是广州有几处发生所谓“中山主义研究会”，实则是右派的结合，日以讨论反对 C. P. 为事，并非什么研究主义的团体。先有 C. P. 同志几人与廖仲恺谈及，廖遂禁止他们，究竟有无此信，虽不可知，然决不会像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

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据季陶说，此信已被毁掉，我们推想，那信至多只会说：“有人假借中山主义研究会名义，实则专事捣乱反对共产派……”或者信上措辞不好，然决不至如季陶所引的那样。其实我们决不反对理论上的讨论或对于共产主义之批评，可是在国民党党部中一味反对 C. P. 的人，做反动的右派宣传，我们当然要抵抗的。而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辞以挑动感情，明说左右派都不好，暗则完全帮右派。

三、《向导》上批评胡汉民等。这些都完全是事实；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分析是应当根据事实说的。我们的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季陶却以挑拨的罪名归之于《向导》，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 C. P. 。

十

总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量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他们都变成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大部分有力量的现在还只是买办阶级，他们真有反动的实力，所以纯粹右派倒是有社会基础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只能和无产阶级携手，方能进行革命运动。如今季陶却想代表民族的资产阶级，纯粹站在所谓“爱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季陶这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能有社会的基础，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开始攻

击左派，右派的买办阶级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实。现在在上海已经见了几件事实。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智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一九二五、八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沈定一。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

陈　独　秀

本报自民国十一年九月创刊以来，到现在刚刚三个周年。这三年中，中国政治经过了不少的变动，本报的革命政策之主张，如何应付这些政治的变动，现在需要一个有系统的历史的叙述，以贡读者。

本报创刊正当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一方面反动的奉天军阀虽然失败了，另一方面直系军阀有代兴之势，尤其是曹党阴谋夺政，黎元洪的政府又昏庸无力支持。因此，我们在本报未刊行以前，在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中，即已喊出“继续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三个口号，所以本报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张都根据在这三个口号之上。发刊宣言上：（一）指出须推倒为国内和平与统一障碍的军阀之理由；（二）指出须反抗为中国自由与独立障碍的国际帝国主义之理由；进行的方法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更具体些是主张集合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同时根据这个革命的政策之理论，反对当时一切非革命的理论，如“法统说”、“制宪说”、“武力统一说”、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八期。

"联省自治说"、"整理财政澄清选举说"等。在此时我们总的政治口号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第一，"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在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这口号一方面是继续着辛亥革命的观念而来，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军阀无论皖奉或直，无一不是武力专政的魔王，让他们统治中国，民主政治是丝毫没有希望的。随后，我们以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第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次年（民国十二年）"二七"京汉屠杀事件，这半年间，直系军阀的反动日甚一日，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各省直系军人及其附属品——政客之横暴，惹起各地进步分子不断的反抗，至"二七"京汉屠杀案发生，直系军阀之

反动已达最高度，正式与民众宣战。此时本报的主张是：统一国民运动的势力，打倒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这在统一的国民运动中：（一）须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以绝军阀后援；（二）武装平民；（三）须主张民主的统一，反对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四）须集合各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一切战略；（五）须各派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要有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六）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知识阶级、工商阶级，都应竭力赞助工人阶级的组织及运动，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在这一反对直系军阀时期，本报为鼓动积极的民族革命运动，遂不得不反对当时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和孙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携和平统一之主张。

从“二七”屠杀到去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年半间，是直系军阀全盛时代，中间经过黎元洪出走和曹锟贿选两次变故，中央政局现出向所未有的腐败与紊乱，各帝国主义者乘此局面，自临城案起，四方八面的向中国进攻。同时，中俄协定适在此时期成立，苏俄自动的放弃了种种特权，相形之下，愈加使中国民众看出帝国主义者对华政策之残暴无理，此为现在五卅运动的重大动因之一。黎元洪出走离“二七”屠杀只四个月，工人阶级尚未能恢复集中其势力，出来向直系军阀作战，拥黎的政学会，想联合安福、交通等系成为反曹同盟，我们公同的政策是运动国会议员南下，然而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政学会想国会南下拥黎，安福、交通意在拥段[1]再出，同床异梦，他们的反曹同盟计划自然有始无终。当时上海总商会也表示反对直系，尤其是反对曹锟，其所组织的民治委员会，因与民众隔离及内部冲突，随即无形消灭。此时我们反对那已经投降直系军阀背叛国民的国会议员们，有南下解决

国事的权能，更不信政学、安福等政蠹拥黎拥段能得民众的同情。我们乃向国民党提议，要它在上海号召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的国民会议，来取决国事。我们知道国民会议这个运动即令一时不能实现，亦须继续不断的宣传，于武装暴动外，给民众一个撇开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自己出来解决国事的一条和平道路，实际上是集中民众势力行向革命的道路。黎元洪出走后四个月，曹锟于双十节贿选登台，登台后立即承认临城案全部要求，以为各国公使觐见的交换条件。帝国主义者知道曹锟的贿选为中国舆论所不容，非假外力不能自存，于是乘机敲诈，无所不至。此时民众深恶曹锟与曹锟损害于民众利益的，还不在贿选之道德的法律的问题，乃是媚外卖国的实际问题。此时本报的主张，于“打倒国贼曹锟”之外，还要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承认苏俄；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扩大国民党。

其结果，乃发生国民党改组及反帝国主义同盟、废约同盟、反基督教同盟等组织和宣传运动。这两件事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开始之显著的表现，惹引了帝国主义者十分注意。适于此时，因广州政府向税务司索取关余事，帝国主义者大派军舰到广州示威，广州的工人阶级及革命学生异常愤激，主张收回海关，而各地资产阶级因关余和内债基金有关，反同情于把持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者。本报当时即向资产阶级指出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五件具体事实：（一）把持海关；（二）领事裁判；（三）驻扎海陆军；（四）外币直接使用；（五）强迫租借领土。五项之中，尤以把持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工业发展的死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应该加入工人学生的收回海关运动。

去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中国政治上生了一大变化，即是：（一）民权民族运动之勃兴（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几遍全国，每个促成会都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的要求）；（二）工人阶级之再起；（三）倾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之发现。直军失败，不过是这些变化之导火线，不是真正原因，其原因已潜伏在直系全盛之时，即是：（一）列强进攻和中俄协定，给民众以剧烈的刺激；（二）胶济路罢工胜利，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组织，上海电车工人要求成立工会，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在直系全盛之后半期，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在民族运动刚要开始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渐恢复其反攻的力量；（三）国民党改组和反帝废约收回教育权之宣传，引起北方一部分军阀之民族的感情。这些原因，适逢直系失败，一派强大军阀势力统一而高压的局面一破，社会上各种潜伏的意志，遂乘时表现出来，而形成各种运动。本报应付此次政变的策略是：一方面告诉民众，不可妄想此次战争中，依赖任何一派胜利的军阀可以解救中国；一方面指明各省督军的和平会议有使军阀势力分而复合之危险——只有召集全国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同时，国民党也主张由北京政府召集九种团体的国民会议。可是安福的段政府，并不但段政府，任何军阀政府，没有真正的人民武装，哪会让真正国民的会议出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都起来了，民众的意志既然不能由国民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遂郁积半年，一发而为五卅运动之怒潮。

我们这一次号召国民会议所得的效果，和黎元洪出走时大不相同，全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都有群众的组织和要求的内容，在各种要求中，大半都首列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有开始的基础了。然而盲目

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几乎日日向中国进攻（见本报《外患日志》)。尤其是在上海：自工部局私刑打伤乐志华案起，接连着美国轮船船主枪杀中国水手十六人；领事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工部局自由越界筑路；工部局提议增加码头捐、取缔印刷律及交易所注册；工部局派武装巡捕，为英商越界拆毁宜乐里房屋，驱逐房客，击伤二人，并拘捕房客联合会代表；领事团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美国人在华界组织三K党，工部局副捕头踢死工人叶乾章；哈尔滨路捕房西捕无故击伤某店伙；西人无故殴伤天寿里黄姓佣妇张月英；工部局搜查上海大学，逮捕《民国日报》记者，焚毁书籍；工部局因登载日本纱厂工人泣告书，控告《民国日报》、《商报》、《中华新报》，处以罚金之罪；日本纱厂无故枪杀工人顾正红——积这些怨愤，五卅事变因此遂在上海发生。在这个运动的开始，有一部分英美留学生，有意的或无意的说：大马路血案是西捕杀了人的法律问题，不必牵扯到对外的政治问题，本报乃大声疾呼，告诉民众，此次反抗屠杀案，乃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法律问题，并向民众解释屠杀案所给与我们的教训：（一）不分英美与日法，一切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一致的；（二）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事实，不是共产党人捏造的；（三）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等国，和非帝国主义的俄德奥等国之不同；（四）懂得了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可被“过激”、“赤化”这些头衔吓退；认清了只有工人学生是此次运动中的勇士，各国的工人学生都对于中国人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应该反抗践踏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者，不是拿国家主义来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本报当即主张：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国民革命政

府。随后全国民族运动的怒潮，因资产阶级之妥协和奉系军阀之高压，大受打击而陷于停顿状态。本报鉴于现状，遂主张改变此后民族争斗的新途径是：（一）改变上海、香港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二）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三）开始国内战争，合全国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天军阀。

我们相信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之更大的发展，须在打倒奉天军阀及中国工农阶级的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由之后。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PDG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

（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

贺　　昌

一　国际青年运动的意义

帝国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汇合而形成“财政资本”，银行托辣斯统治着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成为其统治下的奴隶。资本主义列强为要霸占垄断全球的市场，争先恐后的扩充军备，发展其势力，于是发生了“军国主义”与世界大战。在世界大战中间，各国资本家驱使青年无产阶级为其争夺市场的武器，死伤者每数百万，因此，“反对军国主义”是世界青年运动发生的第一个原因。

机器工业发达之结果，手工业的技术和腕力，渐归无用，男子的劳动，多被女子和童工占去。年龄的大小，男女的差别，到现在对于作工都不成什么问题了。资本家为榨取更多量的利润，都喜欢雇用童工以代替成年工人，降低成年工人的经济地位。因此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保护青年工人的经济利益，是世界青年运动发生的第二个原因。

青年人富于感情作用，容易接受环境的暗示。资本家利用这种弱点，施行愚弄的奴隶教育，以消磨工人阶级的意识，苟延其寿命。因此“要求共产主义的教育，打倒欺骗青年工人的

奴隶教育”，是世界青年运动发生的第三个原因。

除上以外，世界青年运动还有进一步的义务，即是随共产党的领导，用全力以参加全工人阶级的斗争。现在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青年，已团结在“少年共产国际”（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旗帜之下进行他的革命的工作！

二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及第一次全国大会

一九二〇年八月间，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大会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的分子，大都是五四后，脑子里充满了自由平等的思想，加上几分浪漫革命心理的智识阶级。那时分子非常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此外，莫名其妙的分子更多。因为分子复杂，遇有问题，各人所提出的方法和意见，不能一致，常常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的训练与纪律，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种，不能振作起来。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暂时宣告解散。

团体解散后，其中一部分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经过了许多次的努力，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又将团体重新恢复起来。

中国青年一面因为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暗示，一面因为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努力宣传的影响，于最短期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很多，许多地方都有了地方团。团体既如此发展，感觉到从前的组织和训练，不能应付目前的环境，于是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由临时中央局召集，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于广州，解决团的根本问题。

这次大会，在团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以后，团已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的组织，较以前的混沌状态进步了许多。

在大会上通过了团的纲领，其中将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说得十分清楚，并且决定了他们的目的和策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所组织，即完全为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

这次通过的纲领，完全是政党性质的。彼时中国共产党虽已组织，但尚在秘密状态中，关于党的工作，完全由团执行。这次大会虽规定了奋斗的目标，指出了目前的要求，但是达到这种要求和目标的活动方法，则因经验缺乏而付缺如。

加入这次大会上，还有一件值得特别记述的，就是在大会上全体通过加入“少年国际”——在少年国际旗帜之下，将西方青年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青年群众联合起来！

三　第一次全国大会后的工作

第一次大会后，因为当时团的分子，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团的组织和纪律，仍旧未能完善，有很多的缺陷。

大会后团站在共产党政治指导之下，共产党在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等所谓“法统重光”名义下，利用一个傀儡黎元洪出山时，所发表的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的主张完全赞成；并且提出下列

的各种口号，以号召青年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封建的军阀不铲除，废督裁兵是绝对不可能的！封建的军阀不铲除，民主政治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封建的军阀不铲除，人民是绝对不能安生乐业的！全国不甘屈服于北洋军阀铁拳之下的人民，你们应一律起来与共产党结成联合的战线，根本推翻武人政治呀！"

一九二三年七月间曹党驱逐黎元洪后，团亦站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主张排除一切黑暗势力，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在适宜地点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来解决时局。团并根据此种主张向民众宣传。

职工运动，团亦与党完全合作，在工人中建筑起相当基础；可是经过"二七"京汉路的流血，中国职工运动由进取变为保守的形势，有许多地方工会成为完全的秘密组织，有许多地方的组织无形消灭了。

统观这一年来的活动，团几乎没有做自己独立的青年工作，只不过在党的指导之下，做了一些普泛的政治宣传——这也的确有许多事实上不得已的原因所以致此。然而总看起来，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团员对于纪律、组织教育等，还没有十分注意，尚空谈而不切实际，亦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一年来组织上有极快的发展，团的势力确渐次推广到各方面去，这可说是一种进步。

四　第二次全国大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三年八月间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过去十五个月的工作，有一极详细

的报告，到会各地代表没有一点客气。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过去的工作，加以严格的批评，指出在组织上、训练上、工作上的缺点，使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能特别注意。

大会上对于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完全接受，决定努力协助党注意强烈的国民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实际运动。团与党的关系，亦在这次大会上明确的规定了。

青年工人运动议决案上，指出团以后应特别注意在青年工人中间的活动，多搜集实际经济状况的材料，反对基督教领导下的体育运动，引导青年工人向资本家行经济斗争，反对师傅对于学徒的剥削与虐待，并提出许多实际的经济要求。

学生运动议决案，说明学生运动是国民解放运动之一种，所以应扩大活动的范围；对外不应单独反对日本，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引导学生帮助劳动运动，矫正学生只读书不问社会事情的心理；促进学生会的组织，注意一般宣传工作。

农民运动议决案，说明农民运动的重要，规划了一些具体的方法：设法成立补习学校、通俗讲演所、消费合作社，以从事农民运动。

教育宣传议决案，指示出对内训练与对外宣传的方法。青年妇女运动议决案中，指出青年妇女运动应注意之点。章程上亦略加修改，使团的组织和纪律日臻完善。

五　第二次大会以后的工作

第二次大会到第三次大会中间经过了十七个月，在这十七个月中间，是中国民族革命势力发展的时期。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临城劫案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异常严重，那时民众还不甚

感觉需要反抗，何东所倡由外人监督的军阀和平会议，赞者尚不乏人；但到十月以后，帝国主义承认了中国全国诟病的贿选政府，十二月又发生粤海关事件，民众渐有觉悟；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五月间军阀逮捕工人学生，革命空气更形紧张；六月间中俄协定成功，中国民众更认识帝国主义的罪恶。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团的工作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在这时候，教育界发生了收回教育权，取缔教会教育的要求；一般民众发生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北京政变以后，各地促成国民会议之运动蜂起，更显明的证明中国民众已有政治的觉醒。

这十七个月中团的工作，比之以前的混沌状态，进步多了。

在青年化方面，年长的团员退出团而加入党的很多，同时团亦努力扩充了许多青年团员。

在群众方面，亦有相当的收获。一九二四年三月中央扩大委员会特别提出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团员全体都向这方面努力。对于“无产阶级化”的口号，亦由宣传进而为实行，青年工人入团的日渐增多；在这个口号之下，颇能使团员认识无产阶级化的重要。

六　第三次全国大会

第三次全国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间举行。这次会议上的报告，给我们很多的经验，各种议决，均较以前具体而切实，因为各种决议，不仅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而且包含着丰富的经验。

这次大会较从前增加了许多重要的决议案：经济斗争；一般被压迫的青年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战争；反基督教运动；组织问题等。这些决议，都是根据少年国际的指导。列宁主义的精神，按照实际环境而合当解决的。

这回会议表示完全赞成共产党对于民族运动的议决案，并领导青年群众，发展一般民族运动与职工运动。

大会指出团过去少注意青年工人特殊利益的经济斗争，以致至今尚未能与青年工人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不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失却了团成立的意义。大会为拥护无产阶级青年的利益，提出许多实际的经济要求，此等要求，设法在各工厂组织支部，以巩固团的基础。

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议决案，包含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青年妇女运动的工作。其中关于学生运动的决议，颇为重要。它说的学生运动有三种重要的意义：一、引导学生来帮助青年工农运动；二、领导学生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三、注意学生本身利益的要求。如此学生会才能成为群众的组织，引起学生的自觉与联合。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战争决议案，说明反对战争，是本团的重要责任，指出团以后应当处处宣传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战争的罪恶，披露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战争所宣传的和平口号之虚伪；利用各种机会，召集群众做反对战争的示威；在军队中设法组织秘密支部，进行革命宣传。

反基督教运动议决案，说明各地组织非基督教同盟的重要；规定耶稣圣诞日前后一星期为反基督教周；在青年群众中，宣布教会教育之黑暗，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可怕；在基督教学校，发展非基督教的组织，要求校务公开，财政公开，反对少数教职员包办垄断。

组织问题议决案，说明支部的重要，以后应厉行民主集权制，完成全团的“集权化”，在一切青年群众中，设法发展组织，如此才能到成铁的组织与铁的纪律，使团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其他议决案，都是五年来经验的结晶。

大会闭幕时发布了两种重要宣言，在团的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上说：

“我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无产阶级青年，以及一般被压迫青年的利益，决定要努力扶植扩大无产阶级的势力，以从事中国的革命运动。在我们的第三次全体大会中间，我们决议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合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不愿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的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中国的青年无产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们起来呵！一致团结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下，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的帝国主义去奋斗，以得着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根据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九十三、九十四期合刊刊印。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瞿　秋　白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上海方面日商纱厂的工人早已在二月间便开始斗争，因此而顾正红被杀，南京路发生屠杀——全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宣布总同盟罢工，甚至于英日各厂之外，各国的工厂企业以至于华商工厂的工人，都以同情罢工加入，这次罢工的性质，便从内外棉一公司内的经济罢工变成政治罢工。汉口的屠杀，也起因于码头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广州、香港的罢工，更是响应上海的极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经过英法帝国主义者残忍的大屠杀之后，工人民众的坚决勇猛的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青岛方面，同样是发生于日商纱厂的工人，虽然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经经过帝国主义走狗张宗昌的一次残杀，他们始终还能联合胶济路工等各业工人第二次的起来发难，如今他们艰苦的斗争又被张宗昌摧残了。南京方面英商和记工人响应上海的“五卅”惨剧，而引起社会上有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随后又遭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而压迫了。天津方面，到七月初海员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九期。

方首先加入罢工，日商报馆内的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陆续的参加；美商宝成纱厂及华商北洋纱厂罢工相继胜利；最后日商裕大纱厂罢工，外国资本家指令走狗李景林加以空前的屠杀和逮捕，方才把工人及一般民众运动镇压下去。河南方面，也到七月初焦作英商煤矿工人才能发动罢工。其他长沙、安源、水口山、汉口、厦门等处，凡是运动的范围及力量比较扩大的地方，无不是工人做先锋队。这次总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这次总运动的发展，从上海、青岛开始，而渐渐波及全国，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工人阶级最勇猛、最积极、最持久的阶级斗争，做一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骨干。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有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力量，又因为它的阶级地位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得最利害的，它的奋斗，自然而然一开始便在阶级争斗中含有极彻底的政治意义——它不但实行阶级斗争而已，而且它的阶级斗争亦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所以这一发难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立刻便结合革命的学生群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譬如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以结合二十余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为主干，一开始便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撤退驻华的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等。随后各地的民众，尤其是南方国民政府之下的工农群众，渐渐集中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总要求，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的呼声普遍全国。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努力，不但能结合一般革命的各阶级，甚至于使比较反动的资产阶级，也不能不加入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譬如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尚且敢于站出来主张关税自主、收回会审公堂等等。

中国这次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领导之下，如果没有卖国军阀的摧残而能充分的发展——那将不难结合全国平民的革命实力，国民党国民军等，集中于一真正人民的全国会议，建立统一的人民政府，统一的人民的国民革命军，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至少，这种运动应当使中国工人阶级及一般民众得着充分的政治自由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使中国的民众得以团结并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继续斗争以达根本解放的目的。

可是，中国现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遇见很大的阻碍。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使它在沪汉粤等处大屠杀之后，再在青岛与天津等处直接实行军阀的屠杀，在奉天、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或者严厉的压迫，或者示威的逼胁，禁止一般民众运动。这种反动势力，现时正在预备以武力并吞全国，以竟其媚侍帝国主义的全功。不但如此，“五卅”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从部分的反对外国资本家压迫的斗争，直接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然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想利用这全国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大多数民族的要求，间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它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求自己利益的满足，而赶紧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因为它的利益是与大多数民众相冲突的。便是小资产阶级，在这反帝国主义运动里，也是动摇不定，组织不固，斗争力量非常薄弱。于是帝国主义者便能利用中国民族运动中这些弱点，而逐渐反攻；他们利用军阀的帮助，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来摧折工人阶级的运动——如今他们竟想以关税会议等欺人的奸计，缓和资产阶级的“排外”情绪，而“结束”五卅运动了！

军阀摧残民族解放运动及工人阶级的事实以外，在五卅运动发展的前途上，还有种种障碍；这些障碍在这三个月的经过中，表示得非常明显。现时对于反抗奉系军阀，反对这帝国主义走狗的争斗，固然无论什么人也不能否认它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必需的。可是等到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学生群众再进而反抗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阴谋，那就我们可以听见许多“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的闲话。其实，这些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一，最早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件，抛弃撤退外国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承认工会等的要求。在工人阶级以全力来力争民族利益的时候，大资产阶级却先自妥协，并且竭力摧残工人阶级的利益。第二，在上海开市的时候，总商会便亟亟宣言，说对日问题限于上海纱厂，上海纱厂罢工解决，就可不必抵制日货。他们为日货商的利益起见，不惜抛弃全民族的利益——十余年来日本压迫中国的种种政策及事实，所谓“二十一条”、“五七”国耻……完全忘了。并且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于号称沪案后援会（如北京）也都到处高唱“单独对英”的论调。甚至于国民党的领袖戴季陶先生，不但表示同样的主张，并且认这种政策是“中山先生的策略”，“希望日本作‘回东方来’的运动”！这样的四方八面逼迫，使上海日厂工人竟不能不签字于极让步的条件上面而悲痛上工。第三，上海工部局电气处停止供给华厂电气的时候，中国资本家一致压迫工人不给津贴费；同时各方面逼迫利用军阀官僚势力，要使电气工人无条件的去上工。他们也和帝国主义者一致的不肯承认工会，也都要“等工会条例颁布”。甚至于与帝国主义一样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杀害工人（如穆藕初在河南），利用帝国主义捕捉工人（如上海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华厂）。第四，一般

的抵制英日货运动里，许多奸商私自偷运偷买，甚至于以罢市要挟，雇打手捣乱（如太原等处）。

中国的工人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这种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无一次不联合一般革命民众竭力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既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别方面同时亦是为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如今资产阶级的政策，一部分占着优势，已经使五卅运动的力量减少了不少，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得以反守为攻的开始在广州方面对中国进攻，并且在交涉上的态度日趋强硬——这种事实尤其证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不能不反抗，不能不实行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在五卅运动的经验里，可以的确的知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亦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

现时总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一方面直接受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所摧残，别方面又被大资产阶级及一切妥协派所遏抑，它的发展确有不能急转直下而达到多量胜利的形势。可是，这次运动里的主干——中国无产阶级，既然能持久到两三个月的总罢工运动，组织极大的群众的工会，从上海、青岛、香港、广州一直发展到全国各大都市，引导着全国几千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么，民族解放运动更广大的发展和胜利，当然还是要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并增高起来，要它的经济地位改良起来，才有希望。

事实上，中国的工人阶级也的确觉得它自己的这种责任。最近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期——一般的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罢工潮流。中国的工人群众在“五卅”以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一天天增加起来，民众的力量一天天膨胀起来。极普通的、不识字的工人，都亲身觉到团结的力量，深切的觉悟到反抗剥削者的必要，并且看到了反抗的方法。他们切身的经验到：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手段是一样的残忍狠毒狡诈，决不能等待戴季陶先生等去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也不能等戴季陶先生去运用“回东方来”的策略——劝日本对中国亲善；而只能坚决的实行斗争，得到一步胜利之后，立刻积极的预备第二步作战。他们也切身的经验到：这种运动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争解放自己和民族的斗争。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争不到，什么“民族”利益也不会有——不能争得中国资本家承认工会，便更不能争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工会——他们实在不能懂得为什么外国人的压迫和剥削要反对，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便不要反对，实在不能懂得戴季陶先生等的所谓“民生哲学”，所谓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抛弃了大多数中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不知还有什么“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的大潮流里，“以事实做基础”找着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了：便是实行斗争，实行阶级的斗争，以达到解放的目的。这种潮流一天天的发展出去——或者因为中国经济上交通上的条件，还不能有很集中很一致的组织和运动，不能立刻便打倒一切卖国的军阀和买办阶级，建立自由的独立的平民国家，推翻帝国主义束缚我们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个潮流正在汹涌着，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着呵！

上海邮差罢工、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华书局罢工、石印工

人罢工、河南豫丰纱厂罢工，以及上海总工会最近发表要求总的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现象，便是“五卅”后工人运动中的新时期的表现。五卅运动三个月的经过，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能不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已经不能容忍以前的牛马一般的劳动条件和困苦的经济状况。况且，政治上的情形也已经明白表现：卖国军阀和大资产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一般所谓中国小产业家，也大半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而不肯对工人让步，中国民众的利益都被他们所牺牲。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尤其要对他们斗争。现时工人中罢工运动、组织工会运动的进行，便是积聚更多的力量，要求工人阶级地位之一般的增高，以发展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是中国国民革命中很重要的阶段：现时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六大以前》刊印。

PDG

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罗　亦　农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廖仲恺遇刺，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其意义，也不只于死了一个寻常的伟人先生，因为他之死，足以表示中国此期革命运动的性质，至少也使中国南方革命运动发展史上划分一个阶段。

他之死，不但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

他为什么死？为中国民族谋解放而死。死在什么人的手里？死在国民党中的右派——国民党中之反动军阀、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里。

为什么呢？须将廖仲恺遇刺之前的广州政局说一说。

严格说起来，本来广州革命政府的基础，并不纯粹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身上，还有各种反动军阀临时凑合的势力，依赖着革命政府而生存。这样的一个革命政府，地势上又因为与控制中国南部经济的香港政府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所以时常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的恐吓之下。当中山在时，尚且

免不了被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扶植的商团事变，中山死后不久就发生刘杨[1]战争。这许多事实，本来都有右派从中鼓动，大显了一番神通，但是此地我们要说明的是：广州革命政府的基础不稳。

刘杨剿灭后，广州革命政府，依历史的眼光，到了一新时期。因为剿灭了两个侵夺地盘、擅任官吏、霸占机关、私收赋税、私定苛捐杂税、开设杂赌、包办烟土……使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所作为的强有力的军阀，使香港政府一时失了在广州内部的武装工具，使国民党的右派先生们一时敛迹。此时，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假若真能团结，有革命的决心，实在可以大有作为；在实际上，刘杨剿灭后建立了国民政府，改组了广东省政府，实行军财两政的统一，禁烟禁赌，确实也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自有国民党以来唯一盛举。但是这种利于民众的政策，与反动军阀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必须以严厉的手段处置或解散与刘杨类似的反动军队，才能实行。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一时不能下这样决心，所以自从实行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以来，到处发生障碍。在粤军中诚心悦意改组者只有李济深和许济，其他如梁鸿楷、李福林、林树巍、莫雄、郑润琦、杨坤如、罗翼群等，不仅不愿改组，且公然表示反对，占据财政机关，包烟包赌，干涉民政，毫无顾忌。在李济深一师确实有改组之可能，但因与其一部分部下不甚和睦，为改组事，时生龃龉，有妨碍工作进行。许济总算听话，但他的军队根基太坏，军官多不甚可靠，如不加以淘汰，前途希望仍甚少。这样看来，粤军大部分有五分之四，立于反革命地位以与革命政府相抗，其余之五分之一又多不甚可靠。在这样军队改组的重要时期里，所谓革命政府所在地的“主军”如此，此时国民政府所处的地位即可想见。至于谭延闿的湘军，因为回湘的欲望，军

饷不足，只有向左的倾向，朱培德之滇军与湘军抱同一态度。蒋介石的党军本由簇新的制度组织，无容改组。其余还有一些小军队如程潜之攻鄂军，何成浚之鄂军，陈青云之豫军，李明扬、周贯虹之赣军等，全因觅食之难，饷源之缺，都希望早日改组成功，他们好有一个着落。综合这许多愿意改组的军队，固然不能说他们没有改组的诚意，但将整个的赞成改组与反对改组的两大倾向中看，还是不革命的右派占实际优势。

赞成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改组军队者，以廖仲恺为最力。廖仲恺深知革命政府建筑在各个反动的军阀上面，假若不趁刘杨剿灭后国民党所处的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不根本改组革命政府下所统率的军队，则革命政府的前途没有希望；假若不禁烟禁赌，得到民众的同情，革命政府实在危险。因此他以财政总长、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政治委员会的委员等资格，雷厉风行的执行，因此大招右派的反革命军阀之忌，这就是廖仲恺被他们狙击的第一个原因。

右派的反动军阀自私自利甘心作反革命与刘震寰、杨希闵无二，所以凡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利于他们个人的行动，他们务必反对。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崛起，在在与他们割据地盘、独霸一方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凡属反革命的右派军队无不摧残农会，妨碍农民运动向前发展，这不仅郑润琦的第三师最近在广宁惨杀农民可以为例，花县、东莞、香山等处的事变，亦莫不如是。工人运动，表面上与他们关系较少，但最近省港罢工工人的伟大力量，足以使他们骇倒。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实行禁止粮食货品出口，与香港断绝营业关系，处处与割据式的反动军阀以实际上利害之打击，这些政策，这些运动，在他们看来，都以为属于共产派。总而言之，凡是与他们利害相冲突的政策，他们通以为过激，于是首当其冲为他们所瞩目的，

便是廖仲恺。因为廖仲恺的行动和思想在国民党之领袖中，平心静气说实是一个左派，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廖于革命政府改组后，主持工农运动外，又加上改组军队、统一军财两政的新责任。这个实际上名义上与反革命的右派军阀的利害冲突，非常的显明。此外，他们更记得推倒刘杨的时候，廖仲恺主谋之力居多。廖仲恺未死之前三四礼拜，所传党军解散不法军队的流言，他们更信廖仲恺又是主动之一。何况党军勇往直前的气概和不怕死的战斗力，更为他们所忌。在他们看来，处此情状，非狙击廖仲恺不可。要消灭党军，又非狙击蒋介石不可。此外，许崇智、汪精卫也是要被他们狙击的主要分子。许之所以被狙击，因为他在政府中曾主张军队改组，予他手下五分之四的军队以不利，又加上积怨，不就成为他们所要攻击的人物，甚至谓他庇护党军，摧残同类。实际上许氏与蒋介石之关系，正不必如戴季陶所说，须本报记者加以挑拨，他们可以自成水火，不过粤军中人因为利害的冲突，终承认为改组军队，黄埔党军是主谋，许氏投降黄埔。汪精卫所以要被狙击，因为他是改组政府后的一个中心人物，他对禁烟禁赌特别主张不遗余力，这当然要遭右派军阀之忌。于是右派军阀暗杀阴谋发生，汪、许、蒋、廖都在拟杀之列，已被狙击者就是廖仲恺。在此地我们可以说右派反革命的军阀大联合，是廖仲恺死的第二个原因。

有了右派军阀的大联合，自然而然会联到右派失意的官僚、无聊的政客和卖国的买办，因为军阀与反革命的官僚、政客、买办总是一致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许多右派的官僚、政客，得不到做官的欲望，并且还有许多被裁撤，如胡毅生、林直勉等都是赋闲，且胡毅生失了胡汉民执政时卖官鬻爵的大买卖，哪有不惹动他们的无名火积极的鼓吹煽动起来！因此胡

毅生等就在李福林等的军队里煽动，有许多靠革命吃饭的就在海外华侨宣传，说政府主张共产。买办商人周殿邦得了香港政府的大批金钱，在沙基设立了一个大的俱乐部，供给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的挥霍，一方面又以金钱接济赵士觐、胡毅生、林直勉创办反对革命派以反共产为口号的《国民新闻》，专门与政府为难。在这样的右派、官僚、政客和买办的活动情状之下，加上右派革命军人的大联合，自然要使广州的政治弄糟，处处与革命政府为难，广州的政局要急变，自然免不了的了。这种现象，还在八月初就看得非常之显明，而广州的革命群众在此时又有再不能忍受反动军阀的压迫和反革命的官僚、买办的造谣的表现。所以有八月十一日之广州大示威运动，要求政府解散不良的军队，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当时政府诸领袖有相当的决心，当然尤其是廖仲恺，这是廖仲恺死的第三个原因。

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都没有独立的力量，更加没有政治的知识，他们所以在社会上扰乱，做出许多滔天大祸出来，都有帝国主义者在后面发纵指使。廖仲恺之被狙击，最近广州之政局严重，英国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实负勾结主使之责。刘杨打倒后，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广州一时失掉了强有力的武装工具，不幸又发生五卅惨杀后之全国大反帝国主义运动，香港政府非常之恐惧香港的中国工人罢工，多方破坏。结果，香港的中国工人为爱国的热情所冲动，为香港政府积年无情的压迫所驱使，差不多都返广州大罢工了。此时香港几成一荒岛，香港政府第一次遇着了唯一的致命伤、空前未有的大对头——大罢工，因此香港政府想尽方法，以期消灭罢工。当罢工第三礼拜的时候，驻沙面的英国代理领事曾嘱日本领事探听罢工的目的和解决的条件，有要求解决罢工的表示。到后来知

道国民政府之下的一部分反革命的军阀和官僚、政客有捣乱的酝酿，因此积极的勾结他们，以期国民政府内部瓦解，达到解决罢工，同时又拼命供给洪兆麟、邓本殷等的枪械子弹，以期从东路、南路扑灭国民政府。

此外又在香港各处制造要求英国政府以武力干涉广州的空气，并发出大批的金钱宣传国民政府将实行共产，驱逐他们所谓广州及广东之布尔扎维克。香港政府的计划可谓精细周到，这也是他迫不得已的情形，因为现在香港与广州的问题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国民政府胜利，则香港的势力不能肆无忌惮的伸张至广州；香港政府胜利，则国民政府将被消灭，且使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受一很大的打击。这种意义，国民政府的首领如汪精卫、廖仲恺等当然非常之明白，所以积极的帮助省港罢工。省港罢工，在刘杨被打倒之后实成为广州政治的中心问题，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都在此问题上勾心斗角。但因为这个问题，又加上上面所说的许多情形，廖仲恺于是就不免一死了。这是廖仲恺死的第四个原因。

在上面所说的许多情形看来，我们可以得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廖仲恺是被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军阀、官僚、政客和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刺死的。廖仲恺不因简单的个人而死，而为中国国民革命而死，死在帝国主义者、反动的军阀、无聊的政客、卖国的买办互相勾结，想积极消灭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紧急时期，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二个结论是：现在广州的问题并不是共产与反共产的问题，而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所谓反共产这个口号，在反动的军阀、无聊的政客、卖国的买办一方面说，是他们想割据地盘，传达做官的欲望和保障发展买办阶级的力量的假面具；在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说，是香港政府想维持和发展他在南方的势力，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

运动，利用中国人从中世纪所遗留下的宗法社会的软弱心理的大阴谋。第三个结论是：国民党的右派总是反革命的，右派不根本痛快的肃清，国民党不能负引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群众实行国民革命的任务。

现在再看廖仲恺死后之广州的政治情形。

廖仲恺死后，当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会时即组织一特别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负责办理廖案时之一切政治的和军事的最高责任。此外，还组织一七人组织的特别法庭，这当然是革命的组织，应有必有的。要犯除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赵士觐外，余都被拘留。参加此次暗杀的军队如杨锦龙、梁士锋、林树巍等都已被解散，其他如梁鸿楷等的军队正在解散中，这当然是革命的行动。但是有意的无意的、自觉的不自觉的，参加此次暗杀的人实在太多，假若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廖案的人没有决心，不将他们最后的根本肃清，国民政府的前途还免不了危险，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凑合，弄成更凶险的事变。廖仲恺之死固然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但是国民党诸领袖假若乘此机会有肃清反革命的决心，未始不能使国民党开一新局面。即站在私人的感情一方面说，廖仲恺与国民党诸领袖共同奋斗几十年，不为他复仇，也无以慰他“在天之灵”！至于廖死后之各方面态度，右派当然非常的快意，胡汉民的态度当然最局促不安，因为有他的堂弟胡毅生参加主谋。据报载，他现在并软禁在长洲要塞司令部，有参加暗杀的嫌疑，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最愤慨的当然要算汪精卫、蒋介石及工农群众。许崇智自然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这次右派的联合实在太显露了。至于大商人，普通是不高兴廖仲恺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政府现在是否危险？可以肯定的答复：国民政府是不危险的，因为有大多数的

工农群众和比右派反革命军队数量较多的革命军队帮助国民政府，香港政府的阴谋此次无从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廖仲恺先生已经死了！国民党革命的诸领袖们！你们不要错过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很坚决的最后的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使国民政府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军队上面！错过这历史时期，广州就要发生第二次更凶险的事变！

国民党诸党员们！你们要更积极的前进，铁桶一般似的团结在革命旗帜之下，继续完成廖仲恺先生未竟之志！

广东的工农及全国的革命群众们！廖仲恺先生为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的力量而死，你们应当更加愤慨，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维持国民政府！

根据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〇期刊印。

注　释

〔1〕指刘震寰、杨希闵。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亲爱的上海工友们：

你们所受奉系军阀最近的摧残——封闭了你们的总工会及各业各厂工会，这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幸，并且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不幸，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的工人群众，已经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急先锋。

奉系军阀久已公然做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在山东，在天津，都为了替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封闭了许多工会，杀了许多工人，现在他们又在北方压迫唐山矿工罢工的工友，在上海压迫你们了！

你们此次被摧残的原因更是复杂：第一，英国帝国主义者看见日厂工人上工，他的势力孤了，更急于要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好叫你们无条件的上工；第二，日厂工人上工后，日本帝国主义要大批的开除工人，恐怕工会领导工人反抗，所以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第三，段[1]政府想在关税会议求外国帝国主义开恩多加点关税，恐怕人民坚持关税自主恼怒了洋大人，所以急于压迫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上海总工会是人民团体之最有力最急进的部分，更要解散他以见好于洋大人；第四，江浙战争又日见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一期。

紧迫，直奉两系军阀都急于各在杭州、上海封闭工会，肃清内部的障碍；第五，资产阶级不但嫉视工人阶级，并且向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不顾国家和民族的死活，所以五卅运动以来，全中国的资产阶级都厌恶工人阶级阻碍他们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的道路，尤其是上海自各中国厂罢工以来，纱厂联合会更公然请求军阀压迫工会，总商会也希图破坏现在工人的工会，再由他们出来组织归商会操纵的工会；第六，工团联合会及其变相的工团自治联合会这班工贼们，一方面用暴力打毁总工会及恒丰纱厂工会，威吓小沙渡各工会，一方面向戒严司令部造谣密控总工会，这也是军阀借口摧残工会之重要原因。

这些复杂的原因凑合起来，上海各工会遂至不免于奉系军阀的毒手了！上述六个原因之中，前四个都是外来的压迫，虽然一时能破坏工会这一形式，却不能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或反而使内部的团结更加坚固起来。真正能够破坏工人团结的乃是后二项。工会由商会操纵，这种工会是为资本家利益而存在的，不是为工人利益而存在的，有工会还不如无工会；替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资本家做走狗，破坏工人团结，这本是工贼的职务；工贼破坏工人团结，或者用硬的方法，打毁工会及工人，或者用软的方法，混在工人群众中，造谣诬蔑工人的领袖及最能帮助工人的共产党，使工人孤立无援，又或鼓吹地方主义，拆散工人阶级整个的产业组织，不但使工人不便罢工，并且使每个工厂每个产业的全体工人以籍贯不同而分裂，而竞争，为资本家所利用。

亲爱的上海工友们！你们已经组织成了伟大的力量，你们的工会虽然被封了，军阀们只能一时封闭你们的工会，不能永久封闭你们的工会，更不能封闭你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只要你们的内部团结不为商会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帝国主义者

军阀外面的压迫，都是不足惜的。

现在的中国工人已成了一种社会势力，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压服了。各省都有了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全国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代表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都要实力援助你们。你们已经不是孤立无援的了，不可因工会一时被封而灰心，应该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工人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PDG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告农民书*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我们人民自古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士是专门读书的人，他们是以知识擅长，可以称他们是知识阶级。商人是拿本钱做买卖，可以称他们是资本阶级。农工都是以劳力谋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劳动阶级。

从前只有读书的士人有知识，所以做官治民的都是士人。商人有钱即便有势：有钱可以在政府买得官做；有钱可以在城市雇工人开工厂做厂主，做资本家；有钱可以在乡间买田地雇佃户做地东。士人做官发了财，也要到乡间买置田地做起地东来。最苦的只有劳动阶级的工人和农民。

世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切东西，哪一样不是农民和工人劳力做出来的？然而工人农民自己的吃穿用却是很苦，完全为厂主地东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

工人农民在全国人数中，差不多要占十分之九，若说人民应该享幸福，便不该把工人农民除外。在实际上，全国享幸福的人，只有少数资本家和地东，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工农劳动阶级，不但为厂主地东做牛马，而且还要受其他各方面的压迫，

* 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

几乎不能活命，还说什么享幸福！现在单就农民说，你们所受各方面的逼迫，待我们一一讲来。

第一个逼迫农民的自然是地东。地东召佃耕田，只是供给他若干亩田地或者有几间茅屋，此外一无所有，所有耕牛、犁锄、稻麦、种子、肥料以及一切收获前所需食用，都须佃户自备，此外立约承租时，还要交地东若干银钱做羁庄。地东丝毫不费气力，到收获时，便向佃户收取租课。无论是照约收取额租或是临时分租，每亩地东所得约占收成之半，即少也要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如湖北汉川县）还要预收来年的租。非遇到水旱奇灾，佃户没得吃，地东的租课是不能减少的。佃户因为无力缴租或是因为缴了租后吃用无着，便不得不向自己的地东或别人的地东重利借贷，冬春借谷一把，秋收时便须归还两担，最客气的也要一担半。农民一经这样的盘剥，便永世不能翻身。现在许多军阀官僚到乡间去买置田地，这些地东也和别的地东一样是不耕不种的寄生阶级，土地由他们更集中了，集中的结果农业上并不能改良进步，只是使农村中佃农贫农增加，农业反而退步，地东绅董们所把持的民团局或团防局更是欺压农民的乡村军阀政府。

第二个逼迫农民的要算外国资本家。自古道男耕女织，自从外国资本家把他们的洋货潮水般的输入中国以来，乡间手工的纺纱织布生意，都被外洋机器制造的棉纱棉布夺去了。据海关报告，洋纱洋布入口，每年价值二三万万元就是每年中国种棉纺纱织布的农民工人之损失。此外洋油、洋火、洋钉、洋针、洋肥皂、洋头绳等都一一运到乡间，成了农民的日用品；就是农民日用所需的本国货，如油盐、纸张、茶叶、酱醋等，也因为厘金等捐税增加及别的洋货输入的影响，价钱日见高涨。尤其是盐税归外国人管理，因为偿还洋债，他们拼命增加

盐税，盐价日渐高涨，农民生活因此更加困苦不堪了。更可恶的是法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天主教，英国美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耶稣教，这些教士在乡村庇护教民欺压良懦，真是无法无天！

第三个逼迫农民的就是军阀。军阀们连年战争，一方面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如厘金盐税等，使一切物价无不高涨，又复巧立各种名目直接勒捐，加之预征钱粮，增加田亩捐，强迫公债，逼得农民非典田卖地、卖儿卖女无从活命。一方面军队经过的地方，抢掳焚烧，更是悲惨，往往整个的农村，都被这般野蛮的军队毁灭了。即在不受兵祸的地方，军阀们只顾筹款增兵，民间的水利农田，从来不暇过问，因此水旱灾荒遍于全国，最厉害的像淮河和洪泽湖一带，历年淹没田地，总在一二万万亩以上，直隶山东沿黄河一带，历年淹没田地一万万亩。其余若天津的白河，湖北的襄河，湖南的洞庭湖，都久未疏浚，河身淤塞，泄水蓄水都不灵，屡成水旱奇灾。这些地方农民的困苦便可想而知了。

第四个逼迫农民的是贪官和劣绅。各县征收的钱粮，除国家正项之外，另收陋规至少也在正项一倍以上，譬如地丁银一两，至少须缴纳银元三元以上，此项陋规，国家丝毫得不着，乃用“盈余”的名义归县官房班以及征收人员私分了。此外催钱粮的差役下乡，还要另外需索。印契税照地价收百分之九，也只有三分归国家，县官得三分，房班衙役共得三分。农民欠了钱粮欠了租课，都要到官办罪。乡间的劣绅多半是地东，他们往往勾结贪官鱼肉农民，农民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挑拨农民到官兴讼，于中取利，或者因欠税欠租，借官势威吓农民，甚至诬告农民抗粮抗租，禀请县官派兵究办闹出大乱子来。劣绅们不仅借官势威吓农民，并且还要摊派亩捐，办理什么民团局

或团防局，作威作福，直接的欺压农民。至于乡村自治机关和各县议会选举，更是劣绅包办的了。

农民受上述种种逼迫，不但生活艰难，有些并且不能在农村安居，只得弃农改业了。各地乡间充满了没田地耕种的农民和有田种而吃穿不够的农民，再加上水旱兵灾便不得不去当兵随匪，替军阀匪首充当炮灰，能跑到城市里做苦力的还算得法。

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种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这不但是农民自身的不幸，并且是国家的损失和危险。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东缴纳租课，此外，废止盐税和厘金，关系农民生计也非常之大。可是要达到废止盐税厘金和实行“耕地农有”这些目的，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因为军阀政府是断不肯把盐税和厘金废止的。至于“耕地农有”，更须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东的田地，归耕地的农民所有。为农民目前自救计，本党主张全国农民应该有左列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

（二）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

（三）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

（四）由各乡村自治机关动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

（五）各乡村须禁止私人积谷居奇；

（六）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应征之钱粮，无论地丁或糟米，均只按照实际市价缴纳，不得征收陋规；

（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须专设治河局，政府预算均须指定治河专款不移作别用；

（八）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

这些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但是要想达到这些要求，非农民自己大家结起团体来出力奋斗不可。

怎样的结团体呢？就是组织农民协会。或者有人以为农民一向这样涣散，恐怕不容易结成团体。其实不然。我们根据广东的经验，农民的团体是可以组织成功的。自从民国十二年六月本党第三次大会后，本党才起首在广东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经过不到二年，农民组成了协会的，有二十多县，各处协会会员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万人，并有几千的武装自卫军和地东开了好几次战，这二十几县的农民协会代表，于今年五一劳动节（每年五月一日是全世界的劳动节），在广东省城成立了广东全省农民协会。适逢这一天（五月一日）全国各工会代表也在广东省城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劳动大会的二百七十八个代表和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一百二十五个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喊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大家都十分亲密。在这些集会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可以组织协会和工人可以组织工会没有两样。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农人和工人同属一劳力谋生的劳动阶级，实有联合互助的必要；并且工人大半集中在大都会，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处，都站在政治争斗之重要地位。尤其是五卅运动以来的上海、广州工人，都有了二十万人以上的工会组织，他们不断的经济争斗及政治争斗，使中外资本家都心惊胆裂，这更可以看出农民有了城市工人做有力的领导

者。第三，我们可以看出一向被厂主地东当做牛马的工人农民，一向被绅士们看不起的工人农民，现在都结成团体，便渐渐有抬头之一日了。

或者有人以为广东农民有国民党政府的帮助，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他省恐怕不行。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广东国民党政府固然肯帮助农民，而同时广东各地方的地东商团勾结国民党中右派（国民党中官僚分子）的军队和县官，破坏农会，摧残农民的事，也不在少数，有时国民政府也无如之何，还是要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奋斗才行。现在除广东之外，湖南、湖北的农民，也渐渐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了。可见没有政府帮助，农民也能够团结起来。

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逼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各省各县现有的协会都是地东绅士们所组织的，他们的利益和真正农民的利益相反，非种地的真正农民自己另组织农民协会，决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本党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不用说应该帮助你们，就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革命分子）也必须帮助你们，因为他们的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你们参加是不会成功的。

农民协会应该怎样组织呢？各地的农民协会章程，按照各地情形，自然会有些小小的不同，至于主要的办法应一致如左：

一、农会会员以年满十六岁之佃农、雇农、自耕农及农村中手工业者、体力劳动者为限。凡不耕地之地东，重利放债者，不耕地之宗教家如神甫、牧师、僧道、尼巫等，均不得为会员。

二、凡会员须缴纳入会费与月费若干。

三、各省协会须分为四级：

（甲）村农民协会以一村或合数村组织之，会员人数须在二十以上，由会员互选三人组织村执行委员会；

（乙）乡或区农民协会以本乡或区内三个以上村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乡或区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乡或区执行委员会；

（丙）县农民协会以本县内三个以上乡或区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县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县执行委员会；

（丁）省农民协会以本省内五个以上县农民协会联合会组织之，由全省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全省执行委员会。

四、各村协会所收之会员费，百分之六十用于本村协会，百分之四十用于高级各协会。

五、非协会会员不得加入农民自卫军。

六、每年由省执行委员会召集全省会员代表大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县及乡或区会员代表大会，均每半年由该县及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全村会员大会，每月由村执行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

七、村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三次，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县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二次，省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

八、各级执行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为常务委员，驻会办事。

九、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会员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

办理自卫军、消费合作社、教育会、水利局、害虫检查会等公益事业。

十、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聘请非农民为顾问及各项技术人员，助理各种事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对反奉战争宣言*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全中国的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反奉战争已经开始了！此次战争现在虽只在江浙范围，马上会蔓延到全中部直系军阀及北方国民军对奉联合作战。从表面看来，此次战争自然是军阀间的循环报复战争，和以前的直皖、直奉几次战争相类，然而实际上此次战争的原因与性质不是这样简单。去年的直奉战争，交战者虽只是直系与奉皖两派军阀，而人民间因贿选而反直的空气，实与直方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而且南方的十余万国民政府的军队固然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反对奉军，北方四十万国民军，也同情于民众的爱国运动而反对奉军，帮助奉军的只有安福系和国外的帝国主义者。反奉运动是全国民众的，直系不过是导火线，江浙开战，尤其是导火线之导火线，决不是此次战争之具体内容，所以直系动兵的旗帜上，不得不染点民族运动的色彩，不得不自认是全国反奉大潮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四期。

中之一个波动，这就是此次战争和前几次纯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之要点。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的参加战争，不应该把此次反奉战争看做纯军阀战争，而自己站在旁观的地位，妄想军阀间的和平，其结果反使此次战争真成为直系复仇战争，失了民众反奉的意义。更应该集合全国所有反奉的力量，在帝国主义者助奉或助直的政策尚未确定以前，在直奉的关系尚未有新的变化以前，肃清奉系军阀的势力，确定革命的民主政府之局面，勿使倒奉后又形成别派军阀代兴，军阀专政的局面又重复巩固起来。现在的奉系军阀不但代表中国军阀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此次反奉战争虽搀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全国的民众反奉战争之目的，乃是从释放爱国运动中的政治犯，启封爱国机关，解除奉系及安福系的武装，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一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一）“五卅”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

“五卅”屠杀后的时局，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时机。四个月来革命潮流的膨胀，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

此次运动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真正是一般民众的运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开始便有极广泛的城市群众的参加：无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学生、各地的商会，甚至于教会及教会学校里的中国智识阶级——他们本来是直接处于帝国主义机关的影响之下的。

各大商埠及沿铁路各大城市里的革命运动，已经直接影响到几千万的农民——尤其是在南部中部诸省，他们也开始反抗军阀及土豪劣绅的斗争。

此次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却在于能使国内一部分的军队倾向到民众运动这方面来，譬如国民军。在别一方面，奉系军阀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背景里，格外明显的表现自己的反革命的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

性质，明目张胆的帮助帝国主义。

这一特点当然更明显的证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变更，到现在还是继续着辛亥革命而发展，向着完成这一国民革命的道路上走去。

广东在这国民革命里占着特别的地位，革命政府以全力帮助的罢工排货运动的范围，在这次确是全国的。

广东现在的政权在国民党左派手里，当然，他在这革命战线之中占着最革命的先锋地位。南方的工人农民群众以全力督促这革命政府，去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革命派。然而这种中国人民的仇敌进攻得也最厉害，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在南方独占着压迫中国的霸权，并没有别人和他竞争。

仅仅因为中国北部及中部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国范围内列强之间的互相冲突，所以英国帝国主义者还不能扑灭中国南部的革命运动。

（二）工人阶级与国民革命运动

此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才真明显的表现出来。香港及上海罢工的广大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使民主主义的各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般人民，都团结在这工人阶级斗争的旗帜之下。极大多数的城市民众，都利于这反对英日的罢工运动胜利。这就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

别一方面，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青岛、天津等处残暴的压迫屠杀工人，尤其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力争民权的急先锋，他们的运动在罢工潮流高涨的时候，确有变成全国总罢工的形势，引导城乡各阶级加入解放运动的一天天的多起来，对

于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很有形成全国平民大暴动的危险。

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起斗争，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香港上海的罢工，是全国工人阶级这种运动的主力军。最近一两个月工人群众起来力争改善经济地位，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承认工会——这种运动的广泛和力量是中国从来所没有过的。

这几个月来中国的经验，明显的证实中国资产阶级也和过去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可是处处只为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与资产阶级共同斗争的时候，同时对国内资本家要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国内资产阶级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

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化，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发展，已经一天天的明显出来。这种分化的结果，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可是几百万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为无产阶级斗争所引进这反帝国主义和力争平民政权的运动的，直到现在，还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格外集中积聚自己的力量，与城市里民主派的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引起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

（三）农民与国民革命运动

中国农民运动在南部及中部诸省也逐渐发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

民。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现时已经要使一般工人农民知道：到了建设国民革命政府的时候，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

我们的党应当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组织农民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可是我们的职任，不仅限于明白规定农民的要求和农民运动的前途，还要注意我们对于农民的指导的组织——我们自己的党在农民运动中之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四）军阀与革命的民众政权奋斗

最近的革命运动，当然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中国城市乡村的一般民众，都已经不能不参加政治斗争。不但是无产阶级，而且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也都积聚组织自己的力量来参加革命。甚至于一部分反奉系军队也转移到民众革命运动方面来。

同时别一方面，中国劳动平民的仇敌，中国平民政权的仇敌，也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以求保持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状况和横暴的军阀制度——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便是这主要的反动势力，是平民武装夺取政权时的最危险的反革命力量。

现时这一历史的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国内各派军队之间的斗争，不能处于旁观的地位。当这全国民众起来争中国解放和民众政权实现时候，中国军阀之间的互斗已经不仅是各派军阀争夺地盘的斗争了。

最近一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

所以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最近将来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要求战胜奉系军阀，必须国内一切革命势力有极大的结合，然后国民革命运动能得着新的发展道路，而要求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便成了当时的紧要问题了。

革命民众政权之建立和中国之统一，是全国各阶级共同的口号，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口号，可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是战胜一切卖国军阀的结果。国内革命运动愈发展，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愈巩固，那么，国内军阀之分化愈速，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成熟得也愈快，国内军力卷入这一斗争的也愈多。

当然，那些利于中国处于被侵略地位的帝国主义者，想使中国变成纯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必定以全力帮助反对国民革命的军阀，竭力破坏国民革命方面军力，压迫国内的一切革命运动，然而他们这种政策只会更加激起民众的反抗和斗争。

这种斗争里，革命力量的积聚更加伟大，而使推翻军阀后的革命更加容易发展和深入。

（五）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和国民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的列强政府，虽然都要压迫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可是他们不但遇见中国民众方面反抗的障碍，而且他们自己之间的在华利益既有剧烈的冲突，他们自己国内又有剧烈的阶级斗争。四个月来国民革命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出来：虽然各国帝国主义者极想联合一致的向中国劳动平民进攻，用武装的暴力压平一切民众运动，然而他们在事实上却始终做不到。

英国帝国主义最利于保存会审公堂、关税管理权等的对华特权，所以最公开的压迫中国民众，可是这种压迫的结果，只会使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特别注重于英国。日本的帝国主义政府，以前被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逼得不能不取消英日同盟——远东方面这几国的利益因此冲突得格外厉害起来，在这一次呢，他想利用中国排英的怒潮，把一切罪名推到英国身上去。

美国帝国主义者，在欧战终了时取得了在中国的经济侵略之特权，现在这一次更想利用民众运动的机会，削弱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进行自己的侵略计划，恢复华盛顿会议政策。

最近数月来的斗争，足见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潮愈高，帝国主义者愈觉得中国工人及一般民众力量的巩固，那么，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因为对于压迫中国民众运动的方法意见不一致，也就愈加厉害了。

帝国主义者现在对于中国某几种极小的让步，完全应当认为是最近四个月来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及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之结果。

只有继续和发展已经开始的斗争，能逼迫帝国主义者，使他们不得不对于以武力干涉中国或以其他方法进攻的问题，各自考虑起来。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尤其是日本与英国——对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极大的作用。英日最近失业者的增加，他们工人阶级重新开始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革命化（英国工会中少数革命派的增加，日本工会中革命派“劳动组合评议会”的组织，日本无产政党成立大会之筹备等）——都使帝国主义者有后顾之忧，不能轻易以武力干涉中国。

再则，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使他们不能使用武力对付中国的——便是苏联，因为苏联是利于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建立革命平民政权的。可是，因此帝国主义者也格外了解日益发展的中国几千万劳动平民的革命运动之意义，觉得这种运动的危险。

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应当知道：虽然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互相有冲突，虽然他们国内阶级冲突日益激烈，虽然苏联能帮助革命的中国，然而帝国主义也还有以武力镇压中国的可能，而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乱。

（六）中国的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

中国革命运动所已得的胜利之一，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能和世界工人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最近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得到西方革命无产阶级的极广泛的响应，西方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屡次对于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以及一切民权派的民众，表示团结和援助的呼声。

中国民众的斗争开辟了反帝国主义的新战线，同时亦就增加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现在帝国主义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遣调海陆军来侵犯中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别一方面，这些帝国主义者对于苏联及自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十分进攻，也是因为中国、摩洛哥、叙利亚等处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最近的运动，使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比以前重要得多。

第二国际与亚摩斯德丹职工国际的首领，对于中国现在的运动，公开帮助各国的帝国主义者，这些国际事实上是国际资本的工具——到现在格外显露出来了。当然这一次的新证据——证明第二国际及亚摩斯德丹国际背叛东方被压迫民众的利益——更加要使资本主义国际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化，而脱离这些“失节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七）中国共产党之职任

（一）现在这一中国民众革命的时期，使中国共产党负着历史上有极大意义的职任，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现在这革命斗争的时期，不但指示出运动的前途和民众斗争的政纲，而且还要极明显的对民众解释：革命民众政权，中国统一，工农商学兵代表的国民会议，国民

革命军的组织等口号的意义。

（二）根据上述口号组织工人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以集中积聚无产阶级力量——亦是中国共产党根本职任之一。同时，吸收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到自己党里来，也是最紧急的职任。结合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到共产党旗帜之下，根据共产主义给他们以阶级斗争的智识，这是现时共产党很重要的工作。共产党假使不能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发展和巩固，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往前发展，简直无从设想。

（三）由直接反帝国主义的罢工运动到经济要求争工会组织的罢工运动，在最近期间，工人阶级之中表现有隐晦政治斗争的危险，同时又有减少工人经济要求以提高工人政治奋斗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应当知道这两种危险，足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在总的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里，没有对于斗争前途中的很明显的概念。要免除这两种危险，我们应当使群众多多的参加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如示威集会等口头的文字的宣传，同时又须扩大工人重要的经济奋斗，这是我们目前重要工作，对于党的发展尤其有重要的意义。

（四）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人阶级斗争，经过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许多次的压迫，丧失了许多勇敢分子，在工人群众当中造成了从来所没有的革命的心理。中国共产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

（五）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于他应当继续合作的政策，竭力推引这一党进行革

命运动。最近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所代表的右派国民党思想的发现，可以说是四个月来民众的革命化的直接的结果。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

在政治上，力求公开我们的党也是达到这一目的重要方法之一。组织我们自己的同志发展巩固我们党的组织，一切运动及工作里有我们自己很明显的思想上的及策略上的主张——凡此一切，都是打击国民党右派和公开结合左派的保证。

（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引导广大的学生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同时须设法使革命的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学生在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曾经有不少的革命作用，尤其在最近这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各大城市里的学生差不多都与工人阶级合作，站在前线上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参加。当现时革命潮流正在继续不断发展的时候，无疑义的，学生当然还有更大作用。但因为资产阶级在现时民族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一天一天分化显明已经反映到学生群众，学生中已经有一部分改良派的分子在国民党右派指导之下，他们不与帝国主义者积极奋斗而集中力量反对共产党及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切左派。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学生运动目前的责任，

须设法得到学生群众的统一组织，攻破学生中右派的改良政策，因为从普遍一方面说，学生应该整个的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左派，要得到学生群众的统一组织，须在学生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使右派的群众压迫他们的领袖与我们公开的谈判和合作。

为着引导学生群众加入民族革命运动，同时须注意学生群众的日常工作问题，在指导学生群众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去得到我们的信仰，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为他们提出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切身要求，如各高级学校得组织自治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一）国内最近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中，有几十万上海、香港、广州的工人罢工参加，北部中部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部分也因此而奋起争斗，使全国好几百万的工人都有了政治经济斗争的觉悟——这种时期是向来所没有过的，使中国共产党特别要注重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指导和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二）这次民族革命的高潮和幼稚的无产阶级加入这次运动的热烈，其结果当然使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增加许多倍——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的革命运动现时所处的时期，是革命潮流在群众中日益高涨的时期，这是绝无疑义的。

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

（三）可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指导并且组织革命的工人手工业者和智识阶级——不但在于吸收他们进我们的党，而且在于我们的党有正当的好的组织。必须从下至上，从支部至中央都有集中的组织积极的分子，下层组织与上层组织要有极明确的密切的相互关系。

党员既然增加，下次大会必须相当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妇女及分配科、出版科等，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他们相互之关系也要明确的规定。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1]，他们都应經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应当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事实上能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最近几月的经验，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中央的指导太少，工作人员的分配对于各地也太不平均。革命高潮之后，我们党的发展更为重要；所以尤其要注意北部，因为北部工人还没有尽量的参加此次运动。天津、唐山两处的失败，尤其使我们不能不立刻在这一区域内加紧发展党的工作，因此，在北部应当巩固京区的组织管理直隶、山西及东三省，北京地委单独组织，不由京区兼。

（四）区及地方委员会，一方面应当真正完全执行中央命令，关于一切政治上及策略上的问题，都请中央的指示；别方面，应当指导地方的工作（支部、党团、俱乐部、工人研究会等），派人到所属各处监督日常的党的工作。像上海这种地方我们的党现在扩大了不少，现在已经要在区委之下按区域分划几“部”，组织“部委员会”。这一组织上的新办法非常之必要，一则因为指导上方便，二则因为更容易扩大党的组织。

各支部的职任，尤其是在工厂里，便是从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势力，经常不断的吸收革命的工人。

（五）现在在群众中巩固我们党的势力是组织上最重要的问题。现时革命潮流高涨，单是群众愿意接受我们的提议，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在群众之中真有势力，真能指导。必须利用这个革命潮流：

甲、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重形式，工人农民候补期一月，智识分子三个月。

乙、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我们的支部和党团。

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尤其大产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何况在此革命时期。现时各地方负责同志大半都有一种错误观念，以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因此，大半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

粤区在这革命运动高涨，香港工人热烈斗争的时期，竟没有能利用机会巩固并发展我们的党。粤区虽能在思想上影响工农群众而不在组织上把这种势力巩固起来——吸收工农分子进党及在各种团体里组织我们的党团，这是一种错误。广东的同志只是各自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协会、军队里工作；并没有能像一个强有力的党，有组织、有指导的站在自己党的利益上去工作，去领导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的斗争。

（六）我们的同志，各级委员（中央和地方）向来各自在工会、国民党、学生群众中工作，或者各自专门指导某种工

作，便仿佛对党内代表这各种运动，而不见在这各种工作里去实行党的总职任——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应当赶快改正。

这种习惯，可以说是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时一种现象。现在这种过渡时期应当在极短期间终了，应当使全党接近无产阶级农民智识分子的群众。

（七）现在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民权主义分子的联合战线问题，大部分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关系问题，所以在组织上我们应当在国民党有势力的地方（例如广东）特别注意形成我们党的组织，才能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巩固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

（八）最近各工业区军阀及资本家反动高压政策，一方面是经济斗争发展的不可免的结果，别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群众没有充分参加革命运动；这种反动既来，我们便要在某几处地方转入秘密工作。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回到以前的状况，这只在各部分工人阶级及智识分子中进行秘密工作。

我们应当预备秘密机关，同时竭全力去做公开的政治运动。我们应当牢牢的记着，在秘密工作里是不成为群众的党的。

（九）在党的组织与工作正在发展的时候，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与扩大深入青年工农与学生群众，对于党群众化及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有极大的意义与帮助，因此扩大会认为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与巩固及团员的教育与训练，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作。

过去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尚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有几处地方任意调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重要责任的同志而未得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意，是妨碍共产主义青年团组

织上发展的一错误。以后各地应注意纠正这种缺点，尽可能的不调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同志，并极力按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内关于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关系决议而整顿各地党与团的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对此作如下更正："组织问题决议案'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

PDG

宣传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一）现时革命高潮之中，我们党的职任是吸收工人及革命的智识分子的群众，巩固并且发展我们党的势力于全国工人阶级之中，开始在乡村农民中工作，建筑党在农民群众的基础。

必须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对于这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

要实行这种重大的职任，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

（二）我们的鼓动应当使群众了解，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才能有力，所以应当用极通俗的言语文字。

可是不但言语文字要接近群众，鼓动的内容也要接近群众。群众中的鼓动，第一是要具体，根据于工农群众眼前的事实。因此共产主义者便应当不但指导和训练群众，而且要能考察群众的言论，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口头上文字上的宣传表现他们的心理。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在群众中为党而宣传，最好是指出党的成绩，指出党已经为工人阶级及农民争到具体的利益。这种成绩，应当是取得群众的出发点。

（三）群众鼓动的第一种形式——便是某种“宣传动员”，这便是说集中全国各阶级（首先当然是党员及工人阶级）的注意于某一事件或问题。这种宣传动员必须要征调全党的力量及一切势力。所以这种宣传最好要预先定详细的计划。这可不是说，全党及各级组织便可因此而减少临时适应的力量，尤其是不可以使各地同志不会及时响应一切重大的运动风潮。

（四）群众鼓动的第二种形式——便是工人俱乐部。我们的党没有发生以前，工人俱乐部早已有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是要发展这种工作，利用这种俱乐部一切好的习惯，加以相当的变更，以适应我们党的职任。俱乐部中办种种“壁报”图画等，很可以使工作有很好的成绩，有时可以成为我们的宣传很有力的工具。俱乐部不但是一种宣传的地方，并且应当是工人团体生活的革命中心。

（五）对于党内的鼓动也要特别注意。这种鼓动应当使全体党员，从下至上都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这种工作是现时根本工作之一。工人支部便是实行这种工作的基本。

党的支部是实行党的职任的机关，正合我们整个儿的党是实行工人阶级争斗的机关一样。所以支部的鼓动工作，一刻都不应当离开这支部的实际环境，各支部的鼓动应当取材于各该支部日常生活中为党及工人阶级奋斗的问题。

（六）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不可分的一部分，共产党对于全体工人阶级的区别仅仅在于党是最有阶级觉悟的一部分，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他是站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地位，无论如何不退缩的。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应当不断的增

高，这是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每一党员不但自己应当能为党的政策而奋斗，而且应当会引导别人去奋斗，发展党的势力到群众中去。

群众的宣传（对于全党加以更深入的训练）便是实行上述两种职任的工作。

我们党的群众宣传的组织，便是支部的小组及俱乐部的自修研究会。尤其是人数多的支部应当分成若干小组以便进行工作。支部小组的职任，在于使工人同志对于自己所参加的日常斗争，对于种种琐碎的事实，都能明了，都能知道这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反映。

因此这类小组的宣传，应当与支部的工作有联络。在组织上应当竭力改良小组的形式，使化成为有计划的组织。尤其是应当注意过去的经验，除去许多弊病和缺点。

俱乐部中的“自修研究会”一定要吸收非党员进来。这种研究会的宣传，尤其要很有趣味的很切实的。俱乐部研究工作会的宣传工作，大致是共同读报、解释时局及阶级斗争的略史等。当然，这种宣传，应当注意工人政治智识的程度和他们自己的需要。宣传也和鼓动一样，应当使听讲的人容易了解，否则宣传的目的便达不到。

（七）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多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

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

（八）发展我们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文字上的宣传和鼓动的根本职任。同时还要收集整理种种材料，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做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上根据。因此，必须在中央设立相当的机关，指导和计划收集材料的工作。

只有这样竭力去执行我们党的工作，方能保证这些职任能真正实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职工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

自“五卅”民族运动低落以来，军阀及资产阶级乘势向工人阶级进攻，如天津、唐山、安源、上海均正在严重的压迫中，即比较自由的河南，总不免要受影响，在广东比较更自由一点，然而罢工工人一回到香港，也必然遇着压迫。

在这时期是中国工人运动很重要的时期，或者消沈下去，或者更要高涨起来？这是要看我们党的努力及环境的变化。

在客观上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在五卅运动的奋斗中得着一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并且已经比“五卅”以前有了更深的阶级觉悟及群众的组织和行动，又加上已经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开始接触，是不会因被压迫而消沉的了，军阀间的明争暗斗也决没有长久统一政权压迫工人的可能。因此，我们的努力，因为民族运动之低落更须加紧工人群众的组织与宣传，积累更雄厚的力量，准备更剧烈的争斗。

在此时期中，我们的职工运动，应该取左列的方针：

一、在此时期中所首要努力的是工会之发展及巩固，并力争工会公开之自由。

二、在工人群众中指明每个阶级争斗都是政治争斗，必须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

政治争斗得到一步胜利才能保障经济争斗得到一步胜利。以前的“二七”运动及现在的五卅运动，都是显例。每个的政治问题及政治争斗发生，工人阶级不可取消极的旁观态度，我们应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以取得工人阶级的利益。

三、工人运动不能离开政治争斗——全国的政治争斗，更不能苟安于保守局部的胜利与安全，作和平的幻想，忽视了全国的政治趋势与阶级争斗。

四、经济争斗是工会的日常生活，今后不但不能忽略此项争斗，并要增加争斗之深入的程度，即在政治争斗中亦不可忘了经济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争斗的奋进，才能增长政治争斗的力量。

五、中国的政治自由必须经过长期的争斗，所以中国的工人组织，我们固然在每个运动中都首先要求公开的组织之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的秘密组织之准备，决不可因一时的得着公开之自由，便忽略了秘密的训练及秘密的组织（秘密机关及指导者与交通人员）。尤其是要防御工贼暴力捣毁工会及工人领袖之“工人自卫团”须努力秘密进行，永久的存在及发展，一直到自卫军之成立。

六、在工人群众中指出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收买工头工贼，组织工会或向工人宣传工会及共产党不利于工人，这都比军阀压迫工人阶级还要利害。

七、我们的党和工会，现在虽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可能，却不能不努力经过工会中的党团及工厂中的支部，相机做党的宣传，使工会与党日渐有事实的接近。凡在比较自由的地方（如广东），我们的党部宜向工人群众公开和工会直接交换意见。每工会成立，党即须尽力活动，组织党团及支部，加以严密的组织与训练，使工会行动在党的指导之下。

八、依照我们力量，在工人运动中，我们宜选择活动范围，特别注重交通工人、大产业的工厂工人、矿工及市政工人，使我们活动能够深入群众。

九、我们在工人运动中宜特别注意下层群众，努力执行第四次大会工厂小组的议决案。我们要的是能争斗的群众组织，不是空招牌的工会或总工会。须特别注意工会下层群众中的宣传和切实工作——须尽可能的召集工厂工人的全体大会，各地方的工会代表会议等，须注重引起群众的建议与自动的力量。

十、在工人有组织的地方，必须帮助农民运动及组织。

十一、每次经济罢工的要求，须注意提出女工及童工的利益。

十二、在广州在香港均须注重工会统一的运动，而在广东则须排去反动的领袖，在香港则可与反动性稍次的领袖合作。援助国民政府的革命工作，省港必须一致，惟在各种争斗中，必须使工人群众认识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不同的主张。在中部仍须设法维持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作不断的政治争斗，以保持工会之事实的存在，但须防止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侵入工会，尤其在上海。在北方重要的工作是铁路与矿工，北方工人帮助国民军，只能以反奉及反帝国主义的战争为限。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一）

中国国民党自改组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孙中山死后，党内所有官僚买办阶级的分子，正式另立组织，即是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至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北京的俱乐部以冯自由、彭养光为领袖，宗旨在和军阀政府谋妥协，在北京发展势力；上海的俱乐部以章太炎、唐绍仪为领袖，宗旨在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军阀势力，在西南发展。这两个俱乐部对于北方军阀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政府则是一致的。他们不但希图发展自派的军事势力，推翻广州政府，并且希图发展己派的党部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抗，尤其是辛亥俱乐部已成为南方反革命势力的中心。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

（二）

中国最近四个月来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动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

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戴季陶等）在国民党内，假借“真正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及共产党。这一派人形成国民党的右派，一天天的明显出来；虽然他们竭力自别于买办军阀派的国民党俱乐部及辛亥俱乐部等类的分子，然而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客观上便同样的是帮助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

（三）

可是最近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仅使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更加深入，并且使国民党得以扩大，尤其是在南方真能成为群众的国民革命的政党了——有几万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的新党员加入。

（四）

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他的左派，使他进行发展革

命运动的工作；同时呢，努力反对右派的口号及策略。全党党员都应当知道，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

（五）

实行这种策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我们的党应当积极的跑到政治舞台上去，到处实行我们自己的思想斗争和策略——这是达到我们目的的第二个方法。具体说起来，应该：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

（二）工农群众之获得；

（三）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四）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的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的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争斗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

（六）

以前在我们的同志中，在国民党党员中，分析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把国民党的领袖们都列到中派，这不但在理论上不正确，而且在策略上也不适当。第一个缺点是我们的同志不知不觉的忽略了自己的地位，而完全成了一个左派的国民党党

员；第二个缺点是使国民党内左倾的分子误以为左派即共产党派之别名，凡未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人都以中派自居，把一切国民党应有的左倾政策，都看做共产党的政策，而不肯赞同；第三个缺点是使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如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同反动派为右派而以中派自居。并且在事实上从前的所谓右派已公然反动，已公然离开国民党了。从前的所谓中派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可是所谓左派，单是一时的论调左倾是不够的，必须是在行动上不违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实际的政治主张上，不但和反动派不同，并且确与右派不同，尤其是与共产派亲密结合这一点，是这一时期中国民党左派之特征。在我们的宣传中，国民党左右派及反动派各依他们的政治主张分别于左表：

左　派	右　派	反动派
1.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底	反对一派帝国主义且因工农奋进而与帝国主义妥协	勾结帝国主义
2. 为革命而赞助工农运动	主张劳资妥协	摧残工农运动
3. 为民主政治而反对军阀	为保育政治而反对军阀	勾结军阀
4. 联络苏俄与共产党	联络苏俄排斥共产党	反对苏俄与共产党
5. 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保存反动势力抵抗左派	自身即是反动势力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蒙古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中国边境农工群众中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

我们的党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

那地的蒙古农民，受蒙古王公的统治、喇嘛教的愚弄和中国商业资本的剥削；中国农民也受中蒙大地主的压迫，虽然这些民众政治上、文化上都很落后，可是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定要把蒙古民众卷人政治争斗。现在蒙古的农民已经有渐渐觉悟的趋势。那里的租税非常之重，还有收买田地的投机，无限制的苛捐，中国农民已经常常起来反抗当地的官僚。

蒙古人民之中也有了民族觉悟，起来争自己民族的权利。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应当知道蒙古的王公及喇嘛想利用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以扩大他们在蒙古民众中的势力。所以我们现时最重要的责任，便是使蒙古人中先进的民权主义分子，尤其是蒙古的智识阶级，归到革命这方面来。

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

同的仇敌——大地主王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等，同时却不应当淹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农工兵大同盟，要能联合内蒙古中蒙农民的斗争。

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

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这是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职任。可是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是中蒙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局报告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十月）

扩大会议听了中局报告以后，对于中局自第四次大会以来的工作有下列的批评：

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从国民会议、追悼中山、五卅运动、刘杨[1]之役以至最近反奉的宣传，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在每个政治运动中，中局不曾失去事前指导的机会，尤其是关于五卅运动，能够有发动并扩大的决心与努力，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这是扩大会议认为最满意的。

在组织方面，自第四次大会直到现在，仍然比从前无甚进步。今后中央组织部应增加负责人员，不由总书记兼任，以免事忙忽略了指导的职任。尤其是地方负组织责任的同志，务须一刻不懈的注意各地方在组织上的特殊困难，报告中央，对于中央所指令的调查报告，应该尽可能的答复。

在宣传方面，中央机关报——《向导》，虽然能够继续出版及发展销路，但《新青年》月刊只出过一期，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报》完全未出版一次，扩大会议不能不对于中央加以严重的责备。（1）对地方指导缺乏；（2）以后各地应答复各种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

报告。

党员数量上的发展，虽然比第四次大会时增加了两倍（一〇〇〇——三〇〇〇），在寻常状态中，我们很可乐观，但经过“五卅”这种大的运动，尤其在上海与广州，只能增加如此的数量，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刘震寰、杨希闵。

PDG

共青团本届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及其解释*

（一九二五年十月）

任　弼　时

这次中央扩大会议，对于本团工作前途上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以来，全团参加过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反帝运动自“五卅”以后已普遍于全国各地，工人阶级在反帝运动中已经表现了他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指导力量。在这次运动中各社会阶级也渐起了分化，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势力的扩大，已感觉到将来的危险而勾结帝国主义协同反动军阀向工人进攻。反映着社会阶级分化的反动思想，也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更加扩大其影响，党与团的组织亦于实际斗争中与极大的群众接近而发展。总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党与团所负革命指导的责任，异常重大。当此革命环境复杂，对于革命力量的估量，策略的审定，与全般运动前途的发展，有极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这次召集扩大会议的原因。

本团中央扩大会议，是在 C. P. 中央扩大会议之后召集的，在政治与策略方面之分析与规定，扩大会完全接受 C. P.

* 这是任弼时在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扩大会之决议，责令全团同志，在以后斗争过程中接受 C. P. 指导，努力进行工作。

这次扩大会议根据 C. P. 扩大会所指示的政治方针，审核客观主观的环境与力量，归纳过去八个月工作的成绩，认为本团目前唯一的使命，就是怎样使本团深入群众，使本团能适合现有环境，变成真正行动的青年群众组织。所以在目前任务决议案中说："根据共产党扩大会，对于时局问题决议案的内容，可以决定本团目前根本的责任，不外：在思想上与斗争中去获得青年工人群众，并在中扩大团的组织去指导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吸收先进的革命青年农民，在乡村中组织团的支部以求深入农村青年群众。引导学生群众在党及团指导之下去参加各种运动，在中发展团的组织。整个团的组织必须扩大并更加注意于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本团目前的任务就是：怎样使本团成为群众的组织，能指挥领导广大的青年工农及学生群众。"这段决议案，可以代表这次扩大会议的根本精神，各种决议案，都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而解决的。

同志们！"深入群众"的口号，并非这次扩大会所发明的，自本团成立以来，每次大会及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上，都曾提出这个口号。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次所重提出的旧口号，在革命过程中有他特别的历史意义。因为一年以前的革命环境，远不能与现在的环境相比较，要记着一年以前的团体，还不过是一种小组织的团结，我们的敌人——政治上、社会上及思想上的——都像我们那时的团体一样的幼稚，且我们那时，虽然感觉要深入群众，但是当时的客观环境还没有促成我们十分能明了深入群众的必要，同时也缺少与群众接近的可能。

现在重提这个口号有何特别新的意义呢？我们可以说，现在是革命运动高涨，民众需要指导的时期，我们就是指导群众

斗争的组织；若是不能深入群众领导他们斗争，则趋向于革命的群众，将为反动势力所领导，助长反动势力之发展，对于革命的前途不能不受一极大之打击，在革命者的本身看来，这种消极的应付，无异于是反革命的表示。反之如果趁着民众要求革命指导时，我们能在思想上、组织上去巩固自己的势力，取得其信仰，则我们可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缩短革命成功的期限，减少许多斗争中的牺牲。这就是革命者应取的道路，这也就是重提旧口号的新意义。

我们所谓深入群众，就是要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号召广大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奋斗。但是群众是感情的，在某种政治环境之下，经过有力的煽动，即可得其同情，因此这种感情的群众，容易为反动势力所利用的。我们要得到群众经常的信仰，必须将被煽动之群众，结合在我们指导之下，将其中觉悟的分子吸收到我们团体里面来，使我们经常能有组织的影响于他们。换言之，组织群众，扩大组织，就是本团深入群众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扩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内说："现在是民族革命运动最广大发展时期，……这种运动仍继续发展而扩大……，党与团主要的任务，就是怎样尽民族革命运动领导的责任，所谓领导不仅只于思想方面，而须使这种运动集中，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在这种客观环境之下，本团必须图谋坚固自己组织的基础，……极力扩大组织。"又说："尤其是关于本团组织的发展，认为是目前须特别重视而努力的工作。"对于扩大组织的工作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后，本团十分注意，中央屡次通告，督促各地执行，但有少数同志——甚至负责同志，仍未能明白扩大组织的意义，以为革命团体的人数，不在数量上求多，只要质量上优秀便可指挥群众，并以为数量上的增加，反妨碍质量上的进步——妨碍教育上有系统的进行——或者以为

数量上的扩大，必须以自己教育能力能足以应付为标准。甚至主张停止数量上的发展专注意于内部教育训练……。这些倾向，都足以妨碍本团深入群众工作的，因此扩大会批评这类观念说："最近团内有一种足以妨碍本团发展的不良倾向，这是因为由于一部分同志不了解本团是一青年群众斗争的组织，是要在工人阶级直接为自己利益而斗争之中去训练自己的。……要注意从数量上的扩充，去要质量与数量同时增善。而在群众中竖立自己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扩大会对于发展组织是十分注意的。

深入群众的第二种重要点，就是在我们的宣传与煽动工作去影响群众。换言之，就是在思想上我们能否战胜反动派的理论，以取得群众的信仰。自五卅运动以来，阶级分化作用日见明显，各地大商买办阶级，均已与帝国主义妥协，即是小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势力之膨胀，亦表示畏惧而日渐趋于消极或反动。因阶级分化所反应的阶级思想亦渐形成。他们不独不与革命势力合作而参加实际斗争，并且妨碍无产阶级斗争的行动，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这些思想的发展，对于我们的活动有极大的障碍，因此扩大会议十分注意在决议案上说："……国家主义戴季陶以及一般智识阶级的各种落后反动的思想，反映着各种程度资产阶级的心理，一天一天抬起头来了，所以本团团员的工作，最要是在宣传方面，采用文字图画及口头的宣传，煽动群众，使加入革命的斗争，并需用各种机会，用本团名义作公开宣传或活动，以坚固我们在群众中的指导地位。……"又说："党和团在理论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样使全国无产阶级具有纯粹的阶级思想，……本团应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一切妨碍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奋斗，在各种行动斗争中，去批评反动思想的错误。"

过去我们同志对于宣传煽动工作的方法与内容，往往不能得群众的了解，不是过于空泛，就是过于艰深，并且没有注意日常生活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解释，以作宣传煽动的资料，因此使接受宣传的群众不感觉兴趣，而失掉我们宣传的效能。譬如有许多同志，向群众宣传说："我们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反抗地主和资本家"，但是没有说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地主怎样压迫我们的事实，及我们应当怎样打倒的方法。还有些同志在工人大会上说十九世纪的法国革命怎样……，这都是使我们宣传不能深入群众的弊病。因为初觉悟的工人，思想是很简单的，他们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样解除切身的许多压迫，在群众大会上说十九世纪的历史，他们只认作是海外奇谈，不能使他们感觉切要。除此以外我们对于许多宣传机会不能敏捷应付，或是同志们在群众中，尤其是在反动思想浓厚的群众中，每每畏缩发表团体的主张，惟恐其受人批评失面子等，都是我们宣传工作的缺点。而这些缺点的根本原因是本团内部教育训练工作缺乏的结果。扩大会特指出宣传工作重要及进行方法说："客观环境已促起我们不能不从事于广大的宣传，我们应尽量使每个团员都能实际参加本团的宣传工作，所以非增加我们的训练工作，提高政治觉悟的程度不足以应付目前工作的需要，……对于全团团员须注意施以有系统的列宁主义教育。……务使每个同志均能利用机会，以扩大我们宣传的范围。"但所谓增加训练工作，注意列宁主义教育，并非是要同志们只顾房间的研究，因为本团是行动的组织，反对隔离实际生活的学院式的教育的，扩大会为防止这种倾向，特别重复指出说："本团正是在引导工人阶级奋斗而去训练自己的一种组织"，又说："一部分同志不了解本团是一领导青年群众斗争的组织，是要在工人阶级直接谋自己利益斗争中去训练自己

的……”

在反动势力发展情形之下，我们为防止反动的压迫及注意秘密组织，可是注意秘密组织工作，并不是说停止公开的宣传。在我们作秘密组织工作的目的，就是为要扩大公开宣传的机会，譬如处在某种军事戒严时期，当局对于我们的防范十分严密，绝对禁止群众集会游行，倘若我们能暗中秘密将各部分群众组织妥善，告诉群众怎样输送携带传单旗帜（用不使人注意的纸包好，或藏在身边衣服里面……），如何集合（在街上不要结队成群……），预备会务中的布置（如事先指定主席团及演讲人拟好通电文稿，预备纠察及交通队……），则在戒备极严的环境之下，亦可将群众召集而达到我们宣传的目的（上海屡次如此试行）。所以扩大会亦特别指明：“秘密组织工作的意义，并非是缩小工作范围，停止团务之进行，减少公开活动的机会，而是使我们的组织愈能隐秘能与军警侦探隔离愈远，则我们愈有扩大工作范围增厚指导力量与群众发生更密切关系之可能……，同时我们在秘密工作环境之下，须多利用各种大小的机会，尽是用本团名义作公开的宣传或活动。”

在政治宣传工作决议案之末段说：“以前各地同志，每多努力于宣传工作，然进行宣传时，不曾同时注意扩大组织，吸收同志，实为一大缺点，……每个宣传机会，便是扩大组织的机会，而每次扩大组织，亦便是扩大了宣传范围，要我们宣传普遍深入群众，我们的组织还须努力扩大。”

这段决议案就是要同志们明白宣传与组织的关系。关于这种批评和指示是每个同志需时刻勿忘的。

第三种深入群众的方法，就是我们是否可以领导群众为其本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团体而取得其信仰。

在五卅运动以来全国各地前后发生政治的和经济的罢工，正是我们领导青年工人群众为本身利益斗争的机会。但是事实上本团各地同志，未能努力进行此项工作，这可算是本团工作的一极大缺点。扩大会对于本团经济斗争工作有下列的批评："在过去经济罢工运动所提出之工人要求条件中，未能注意提出青年工人的特殊条件……，这证明本团对于自己中心基本工作很少注意。本团不能在青年工人发展组织，即为忽略青年工人经济斗争的结果。"又说："须知我们若是不能为青年工人的权利或保护他们的劳动而奋斗，我们永久不能接近青年工人取得其信仰的。"

同志们！扩大会这种批评，何等严重！若是在一年以前的大会或扩大会有这个批评，我们还可以说客观很难给我们做青年工人经济斗争的机会，可是在五卅运动的环境当中，我们尚未能注意到这种工作，这确是本团的遗憾。扩大会特指出整个工人运动趋向及我们应注意青年工人经济斗争如下："……至本年'五卅'惨案后，职工运动更进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工人处于中外资本家严苛压迫和剥削之下，物价日昂，工资低落，生活非常困苦，故经济的要求十分必要，且因此更能团结工人群众斗争的力量。最近反帝国主义的罢工，都提出经济的条件，本国产业下之各地工人，亦不断的举行经济的罢工运动，此实本团领导青年工人作经济斗争的极好时机……"青年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他的根本阶级利益与斗争的目标——参加民族革命推倒资本主义制度——是与成年工人相同的，不过青年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须受特殊压迫，所以自己有特殊的经济要求，但是这种特殊要求，须在整个阶级共同斗争之下，方能达到目的，且不致分化本阶级的力量。扩大会为防止青年工人单独行动的危险，特别指出："……此项要求，

青年工人不可离开成年工人的共同要求而单独提出，青年工人应加入工会，与成年工人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在共同的经济斗争中，青年工人提出其特殊要求条件，青年工人应与成年工人行动一致，不可发生歧异，以致破坏工会组织之统一与权力之集中。”这是本团在工人运动中作青年工人经济斗争的原则，各个同志都须深刻了解，尤其是亲身担任经济斗争工作的同志，应在行动中特别注意！同时我们应当明白一切经济斗争是与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家是在权的势力，工人一切斗争的行动，资本家都可借用政治势力压迫的，所以每次经济斗争，总含有政治作用，应将对于政治关系详加解释，并须说明完全达到经济条件之满足，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方有可能。

因为自五卅运动以来，学生运动渐形分裂，这种现象，固然是因为各种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但我们主观方面免不了有许多错误。扩大会对于本团学生运动工作，批评说：“过去我们在学生中的活动虽然得有相当成绩，正是在这种工作中发现我们做群众运动的极大缺点，就是只顾取得上级机关，而未能获得机关以内的群众。……”这种错误与缺点本来并不是“五卅”后的产物，可是在五卅运动中，也有这种现象，确实是我们不善于做群众运动的表现。我们的同志，无论在何种团体中，往往取包办的方式，殊不知包办极容易失掉群众，因为我们在群众中的力量尚小，同志数量亦不多，包办的结果，就是使我们不能注意下层的活动，同时极容易引起群众的怀疑，而失掉群众的信仰。因此扩大会又特别指出以后应注意之点：“我们在学生群众中的工作，应注意使学生更积极的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引导他们参加各种学生会的工作，……一切问题应使学生群众了解，使学生会成为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化，这

不仅不致减少我们的势力，反是以使我们作学生群众中的势力与基础更加扩大而巩固，更能取得学生群众的同情与信仰。”这种批评及所指各项，各同志尤其是负责同志应有深刻的了解。在明春开学各地学生团体改组时，须特别留意改变这种错误！

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学生群众，于民族革命未成功之前，他们要求自身得到相当政治经济的自由，贯彻其民主主义思想，总是趋向于革命一途的，这恰恰是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学生群众不同的一点。换言之，在革命的观点上，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学生，比宗主国学生要进步得多，因为各宗主国的学生已经经过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得到了相当的自由，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是反革命的成分。扩大会分析中国学生群众的将来，虽然有一部免不了要退缩，但是整个学生总还是趋向于革命的，决案上曾说：“在五卅运动中，全国学生都很努力参加反帝运动，在革命潮流高涨时期中，整个学生的作用，还能增大。”根据这个原则，扩大会又决定以后我们在学生运动中的任务：“就是多引导学生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在学生运动中，须努力求学生运动能统一……”为达到这些目的，扩大会认为可以采用上层联络的战略，与右派组织之各级执行机关谈判借以揭破右派领袖的黑幕，而取得其群众。同时须注意下层联络的工作。在右派势力强大的地方，我们可以将左倾的学生组织起来，在我们已能指导学生群众的地方，我们无需形成严密的左派组织，以防止学生运动之分裂。

由以上扩大会对于各种问题的批评与所决定的方法与策略看来，都证明本团过去对于群众化的工作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并证明这些错误，尤其是五卅运动以来在行动中表现得更多，这虽然是本团的不足处，然同时又是本团大进步的表现，

换言之，就是证明我们团体已经开始接近群众了，我们在接近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得了极富足的教训和经验。这些富足的教训和经验，就是这次扩大会解决问题的标准。再重复的说：这次扩大会的主要意义，就是怎样使本团在宣传上、组织上、实际斗争中，去深入群众，因此“深入群众”，是我们团体目前唯一的口号。各位同志在实际斗争中，处处不忘这口号的历史意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显微镜下之醒狮派

（一九二五年十月）

萧　楚　女

一　“国家主义的教育”！

《醒狮》第一期，平公论《内乱与教育的根本问题》，最后的结论说：“在无宗旨无气节之教育家之下无教育”。又，第二期，曾琦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说“国贼之种类”有“（卯）朝三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未）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以《醒狮》自己所说的去衡量东南大学底教育，衡量郭秉文、蒋维乔等之为人，我想至少也总要承认在东大之下无教育，承认郭、蒋等是“国贼”吧？谓予不信，请看左舜生君在《醒狮》第十八期上《论东大事答客问》中说：“照我们底观察，中国的政党并没有侵入教育界，但教育界自身却是已经有了党了！他们避党之名，居党之实，把持教育机关，操纵教育团体，进一步，利用报馆，联络银行；再进一步，勾结军阀，假借外力；虚名所在，不妨让之名流，实利所在，必暗中飞跃，决不放过。”然而今年暑假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开年会，正值黄炎培系以教阀势力迫胁郑谦，使蒋维乔攫得东大代理校长之时；蒋怕他们——曾琦、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捣乱，连忙请他们讲演，表示愿聘他们为“教授”。当时有人叫

他们审慎行动，以符《醒狮》二十七期上曾琦答复东大学生李众华等质问他们被东大教授陈逸凡收买的话。（那原文是说："本报（《醒狮》）根本企图，在'矫正学风、廓请学阀'；同人对于学阀素有研究（!），颇知实力所在，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同人正在静观变化，研究学阀操纵把持之术（注意!），究竟如何……"）左舜生却直劝李璜受聘，说"我们是受的东大的聘，与蒋维乔个人不相干!"（此语系他们同派的国家主义者穆济波先生当面告诉我的）于是九月十日《时事新报》"教育界"中在"东大教授除秉志、陆志韦……陈逸凡、徐则陵等数十人外，兹闻下期各科系又已聘得教授二十余人，均国内名硕……"之下，紧接着就有"余家菊"先生（教授教育概论等科）之名了；又《醒狮》第四十一期上载"国家教育协会"简章第八条说"本会会员对于本会有下列各种权利……（乙）于相当'机会'时介绍职业……"

鸣乎（这是曾琦先生的老调子)!"国家主义的教育"!

二 "有几个是实行家"?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八期上，解释他所主张的"国家主义的野战法"，并举出这些野战法底"屡屡生了效果的""先例"是："同盟会在光、宣之际，对于满清便取这个手段！当时只有几十个铁血男儿不安于现状，认定满清非倒，汉族必无翻身之日。他们便不惜头颅，每省分几个去做锄奸运动。诸君当然记得徐锡麟，诸君当然记得唐才常，诸君当然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今天恩铭被炸，明天李准被炸，从北京以至广东，无处不有炸弹之声……辛亥革命只是几个人一哄，各省总督便纷纷逃窜，满清便逊了位。这个功是要归之于做暗杀运动

的诸先烈，先把满清二百多年的天下弄成了个危局，满清多年豢养的走狗弄得‘谈虎色变’，所以一闻武昌起义，大家便跑了！”李璜先生这种野战法，在我们不但不敢赞成——并且还要反对。不过李璜先生既然“算来算去只有这一条路才打得通”，若他能自己就去做这“锄奸”运动，我们却亦不能不予以一种客气的赞成。在一切的革命方法中，只有“暗杀”方法，要算是最简单而又最容易随着个人的意志去实施的了。他既然不要大的群众组织，又无须乎多的金钱设备。所谓“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只要实行者有一个“决心”便够！但是，李璜先生——乃至国家主义派主张暗杀的一切先生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该有几多“奸”？不说别的，只说李璜先生现在武昌师大教书，国贼萧耀南不就在他底眼前么？李璜先生说：“我不相信同盟会诸烈的精神至于今日便一点儿也不存在！”是的，我也不相信！李璜先生正可以“自身”去“不惜头颅”，为我们证实这个“不相信”呀！李璜先生！我们当然记得徐锡麟，记得唐才常，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将来或许尤其要记得你这个“李璜先生”！不过我们却在单纯的记得之外，还记得徐锡麟、唐才常，以至七十二烈士们，在他们尚未实行暗杀之先，并没有像李璜先生这样大贴仁丹广告。李璜先生！革命是危险的，它不但要牺牲博士饭碗，而且还要牺牲学者底性命；他并不像“法国文学史”可以随便谈谈，由你提倡一个什么“未来派”、“达达派”就可算事的。呼喊革命呼喊暗杀的人，应该站在革命暗杀的尖兵地位！像李璜先生这样居在武昌，眼望着萧耀南摧残武汉爱国运动，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作伥——眼望着“强权”“国贼”张牙舞爪，却连攻击他们的文章都没有做过一篇在《醒狮》上发表，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拿出去与国贼一见！暗杀！锄奸！所谓“以知识阶级为中心

领导的全民革命”原来就是如此！《醒狮》第二期，李璜先生底同志灵光先生说得好：“中国目前不少新文化大家，乃至主张什么主义大家，说来都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结果一般青年都被他弄得一塌糊涂。我在各种诗文乃至演说中读过不少……‘推倒军阀、暗杀、手枪、炸弹’一类的话；但试问作过这些诗文，乃至于说过这些话的人，有几个是实行家？自己不去实行，只是空口说白话；那么他的主义，他的主张，再如何正大，他的方法，再如何良好，又谁肯听他的引导呢？”我们希望李璜先生，好好地接受灵光先生这个教训！我们“俄国走狗”静待李璜先生为我们排演他自己底拿手好戏——锄奸暗杀！我们晓得现在有许多安那其也正在那里闷气不做声的主张暗杀；所以我们又希望醒狮派尊重自己，不要待得人家做出来了，却引为是“‘醒狮’销数达到一万余份”的效力！

三　曾琦自己打耳刮子——干脆而且响亮！

《醒狮》第七期，曾琦在《评国民党对于时局之宣言及其态度》中说：“该党之所标甚是，而所行则非，手段往往与其目的相反，历来之失败在此；吾人实为惜之！窃以为该党果欲实践所言，则对内宜与一切军阀断绝关系，而专力于民众之组织；对外宜与一切列强断绝关系，而丝毫不假外援。换言之，即实行吾人（注意！）夙所主张之‘对内的非妥协主义’与‘对外的非亲善主义’是也。”但曾琦老先生却又在《醒狮》第三十五期《外抗强权之战略》中，列举抵抗强权之方法：

（甲）抵抗武力侵略
- ……………………………………
- （B）
  - （一）认定大敌，先排一国；
  - （二）联络与国，以夷制夷；
  - （三）帮助弱小民族以厚我声援；
  - （四）勾结敌国在野党以扰其内部。

然而曾琦先生在《醒狮》第三十七期《国人宜断绝两种无聊的希望》中，却又说“若夫希望外人仗义，尤为无聊之极……吾人只能冀各国因利害冲突而互相牵制，万不可呼将伯于列强，希望他人之仗义，而转自懈其同仇敌忾之心也！至于各国之‘劳动党’、‘社会党’与夫二三文人学士，偶有发表同情于我之言，亦不过‘秀才人情纸半张’，实际并无大效……断不能坐待敌国‘在野党’之援助……惟有努力从事于……‘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切无聊之希望，愿与国人共绝之也！”

四　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

《醒狮》第四期，陈启天先生的《醒狮运动发端》中说：“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何种职业的国民均可一致趋赴，协力图强；否则阶级划分，争斗益烈，国内混乱时局无由廓清，而国际干涉的惨祸终难幸免。”《醒狮》第二十三期，陈启天又说：“我以为对内应否和衷共济，当以国人是否破坏国家的统一为条件……不破坏国家统一的，就与他和衷共济；破坏国家统一的，就不应和他和衷共济；那就是说应‘内除国贼’……。”醒狮派以这么正大的理由反对他人主张阶级斗争——说他人主张阶级斗争，是分散了国内革命的力量——自然是对的！然而又岂奈那“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的各种职业

的阶级，却故意地要和醒狮派捣乱，要故意地不“一致趋赴”，不“和衷共济”何？请看醒狮派同志自己怎么样说：《醒狮》第十四期张介石先生说：“大商则不过于持筹握算以外，犹能交结官府，送旧迎新而已！至于对于外资之跋扈，政府之凶横，则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而已。”这已足证明在“国家”这个标的之下，各阶级并不能“一致趋赴”。而《醒狮》第四十三期，胡瑞荣先生致“慕韩[1]兄”的书中说：“中国人缺乏革命性，安于守旧而惮于破坏；可与乐成而难与图始；而尤以‘绅’‘商’阶级为甚！此两阶级在社会上颇具势力，常能指挥其他之各阶级而与军阀妥协。故人民虽痛恨军阀而不能与之反抗者，皆此辈在其间作缓冲也。故我辈今日欲‘除国贼’，宜先向两阶级劝导，使其向军阀绝缘。若不听命，则向其进攻，先去军阀之爪牙，然后易于打倒也……”则更是明明白白说绅商阶级底实质，是个“破坏国家统一”而不能“和衷共济”的东西——主张在他们不听劝而又不觉悟时，应该“向之进攻”了！然而曾琦先生却要说：“惟吾人所异于共产党者，即该党主张‘阶级斗争’，绝不容有绅商阶级存在，吾人主张‘阶级合作’，苟彼等而能觉悟，断不绝人为善耳！”原来醒狮派在绅商阶级不听醒狮派之命而与军阀妥协破坏统一之时所下的“进攻”，却不叫做“阶级斗争”而名为“阶级合作”！假使今后有人专来提倡醒狮派的这种“阶级合作”，不知醒狮派还骂他们是受了俄国的津贴——或者月给十七元（其实，月给十七元五角也未必不可，醒狮派乃调查得如此清白），或者岁支三十元——的作用否？好！这样的“阶级合作”，当然是可以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存在的，而且也是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必然应有必然不免的。原来醒狮派和“俄国走狗”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醒狮派不敢用“斗争”这两个骇人听闻的名词，而易以欺

己欺人的“合作”两字罢了！至于说共产党虽“绝对不许绅商阶级存在”，其实共产党也并不是不容许这样的人存在，正如醒狮派所谓苟彼而能觉悟，断不绝人为善一样。共产党之所以要以阶级斗争去消灭一切阶级的目的，也正是为的要把全人类弄成功这种的“人”呀！譬如俄国帝制时代的许多绅商阶级，有的自甘放弃了绅商阶级的生活（即破坏统一的阶级性），已经不是绅商阶级，所以现在都在俄国国内当着快活的共产社会之一分子；有的仍然尚不能有曾琦先生所要求的那种“而能觉悟”，依然还坚持着绅商阶级的人生观，所以就被俄国现政府仿效了曾琦先生底办法，所谓“在彼等未彻底觉悟，完全与军阀（帝制和外国帝国主义）绝缘以前，决不停止进攻”。所以就有许多“白党”流离在外，要惹得胡国伟先生远从巴黎写信者给《醒狮》第四十一期，说“有一俄国难民，携一幼妹，逃来巴黎作工，每见华人，便泣告以：‘其家九口被中国红军杀死者七’了！”（至于这难民底话是否属实，可以不问；好在他是反对赤俄的人，所以大概总是实在的！）

五　左手之矛直攻右手之盾的醒狮派（一）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八期中，主张“我们决心要革国内军阀的命，国外洋大人的命。……唯一的下手办法，便是靠群众力量，得着多数的分子，怀一致的理想，抱一样的精神，去与军阀和洋人‘野战’，先使他们应接不暇；以致他们内部造成了恐怖现象，然后我们才说得上夺取他们的政权。”他底“野战法”，便是像他所举的“先例”——那些徐锡麟、唐才常所行的手枪炸弹之“暗杀”。然而灵光先生却又在《醒狮》第十八期上说：“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

(那些保护洋人生命财产的神圣条约当然也包含在内),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之后,再来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一个国家主义者,要我们学暗杀家徐锡麟,去造成洋人的恐怖现象;一个国家主义者,又要我们学“外崇国信”的段祺瑞,谨守奴隶卖身契上所写着的死亡命运!但《醒狮》第五十期上,却又特载一篇《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告国人书》,对五卅案提出十二条件,内有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收回海关主权,撤废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与割让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灵光先生在《醒狮》二十三期上说:“我们所主张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对内,而不是即时主张什么反帝国主义。现在有许多人主张反帝国主义,谓一切军阀均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但我要问一句,我们现在即行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有得胜的希望没有……故我以为反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办法,是在于先剪帝国主义的爪牙;而且内政不清,未有能够对外的。”是的!“剪除帝国主义的爪牙”;“先清内政”!但曾琦先生却比我们看得清楚:“是故军阀只能害国……其背后往往(注意!)各有外人之势力在,方且(注意!)假外力以固地盘。”是的!“先清内政”!主张反帝国主义的,都是俄国的走狗,“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请看你们这些不愿“老等世界平民革命”的非俄国走狗,怎么样去剪除那“方且假外力以固地盘”的帝国主义的爪牙!

李璜在《醒狮》第一期释国家主义中,说马克思以唯物观念解释“国性”、否认国性的说法太简单了——所以他底结论就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地步。这是指马克思不该说国家是从人类经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为此一胜利阶级用以治服其他阶级的工具而言。诚然,马克思这种唯物的说法,在唯心的李璜先

生，当然是要痛恶的。然而李璜先生在同一文章中，却又说近代的“国性问题的显著，一半是由于拿破仑的压迫，一半还与当时的文化程度与交通的发达有关系，然后方才真正认识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在李璜先生，或者对于“拿破仑压迫”、“文化程度发达”、“交通发达”，都不认为是“生活”、是“物质环境”、是“经济”吧？其实，因为拿破仑压迫和文化交通之发达，使民族间产生了横的“分地而食”的国家观念，与因为资本生产制掠夺剩余价值之压迫，和文化交通及帝国主义争霸市场之纷扰的发展，使阶级间产生了直的“阶级革命”的必然事实——都是一样的一部无机的社会进化史之开展！

《醒狮》第二期曾琦说：“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但他却又在第三十五期上，主张“勾结敌国在野党以扰其内部。”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既是自保的而非侵入的，那便当然与欧美各国之国家主义不同。欧美各国之国家主义，是要在国家主义之上以军阀主义建立帝国主义的。所以刘文海就译帝国主义为“大国家主义”（他怕用帝国主义犯了俄国津贴的嫌疑）；所以就惹得余家菊先生急的面红筋涨汗流赶忙去骂刘文海，辩白说国家主义不是帝国主义。然而陈启天先生却在《醒狮》第四期上，偏偏要说：“我们深信现在的世界虽异说横流，而主要的思潮仍为国家主义。英、法、日（注意！）三国固是国家主义弥漫全国；即美国的国际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也都是国家主义在背后作主。”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四十六期“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势及中国问题”中说：“事实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无所谓‘国际的’

帝国主义，在他们利害冲突彼此吃醋之中，我们大可利用外交手腕，暂时联络法、美以抗英人……因此我们反对共产主义者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老等世界平民革命，否认外交的功效。”但他接着在下面却又说：“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全体一心自强自卫才能解决；亲日、亲美和亲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固非解决之道……”

曾琦在第七期《醒狮》上说：“对外宜与一切列强断绝关系，而丝毫不假外援……即实行吾人夙所主张之对外非亲善主义。”李璜却又反对共产党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要讲求“外交的功效”！

六 左手之矛直攻右手之盾的醒狮派（二）

陈启天在四十四期《醒狮》上说：“合全国国民力量去打倒军阀，摆脱外国的压迫尚恐不足，哪有余力从事于世界经济革命？空呼几声打倒帝国主义，不惟表示国民浮浅无知，对于国事没有相当的步骤，反足引起外人的嫉心一致谋我。”原来“摆脱外国的压迫”与“打倒帝国主义”不同。原来在现在的世界情势中，要求中国从列强压迫中解放出来，要求中国从欧洲资本主义共同经营的“市场”地位上得到民族独立，还不是一种对于世界资本主义而行的经济革命。原来列强之“协以谋我”，乃是自从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之后才有的。原来因为怕列强协以谋我，所以就要驯服承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所以就要甘让帝国主义者存在。“我们没有余力去打倒帝国主义”！但不知醒狮派所羡称的土耳其之革命，是否就是一种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但不知现在正在撑持中的里孚人，是否也是在那里打倒帝国主义？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因此引得列强协

以谋我！但不知“辛丑和约”是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结果？但不知华盛顿“九国公约”是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结果？

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人是浅浮无知，只有作那“初由小群合成大群，合大群而成部落，后渐扩为市府，再扩而成国家；国家者，乃讲自卫谋生存发展之较大的团体也！”的论文的人，才是真正深厚有知。

《醒狮》第十八期，灵光先生主张“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后，再来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于是他便断定：“我们的革命，只要不与他们所（?）一致的利害冲突，他们因为彼此的态度不能一致，对于我们的革命，绝对（注意!）不会伸手干涉，这实是我们肃清内政的好机会。”这是灵光先生底大发明，我们自然只有尊重。但请看！《醒狮》第七期郑伯奇先生由日本写回来的信：“这回奉军背后有多少日本人？奉军危急时日本浪人（都是参谋本部和陆海军省的御用走狗）怎样着急？东京的国民大会就是这些军阀和军阀走狗一种恐慌的表示……冯玉祥的内应，把山海关的胜仗弄得首尾颠倒，一百四十万元的本钱，可以使冯玉祥唱这幕戏，毕竟张作霖是老手；《大阪每日新闻》说价钱便宜，日本出一半，也值得……”“肃清内政的好机会”——“只要不与他们所一致的利害冲突”——“只要遵守一切既成条约”！灵光先生的新发明！

七　李璜在法螺中认亲戚

在每期的《醒狮》上，总少不了有一篇“呜呼！共产之祸也!”的“哭头”。依照他底说法，现在的俄国，是比十九层地

狱（?）的情形还要坏一万倍。“共产政治”在俄国已经差不多像杨梅疮要冲上顶了——谁一靠近它，便是谁当宣布“死”的到来了！然而李璜先生吹法螺，却又要去拉这个洪水猛兽不可向迩的共产主义俄国——即醒狮派朝朝夕夕孜孜汲汲生怕他用了阴谋以十七元一月买收青年赤化了中国的那个俄国——以为重。他说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承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必要，大声吆喝着：“总之，在这暂时，我们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已经取他们（俄国）的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代之了!”（见《醒狮》第十五期）我记得《阅微草堂笔记》上，说有一户人家，因为要旁人相信他的家世高贵，在他的母亲出丧时，写了一个长铭旌：大意是“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总督××等处××大臣隔壁豆腐店王奶奶之柩”。李先生硬要在一般素来没有留心到经济学，没有把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加过详细分析的《醒狮》读者之前，说列宁是李先生的“老表”，说俄国是醒狮派的“外家”，自然谁也无法干涉。不过俄国现在所行的，既然已是被你们“取而代之”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你们所朝夕梦祷祈其实现而不得的国家主义，那末，中国人就都去受了俄国的十七元的津贴，立时把全部中国弄得“俄国化”，又有什么不好呢?《醒狮》上正应该另辟一栏，专门宣传那由你们取而代之的俄国新经济政策，而题其名曰：“风起云涌之国家主义的团体”；再在下边系以注解，说：“方今之赤俄，亦吾国家主义之一团体也!”（此注解最好请曾琦先生做）李先生！你不要太夸奖俄国过度了！小心你们所不愿打倒的——不敢去打倒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在背后也把你们注入“红籍”；使得你们自从在巴黎和任卓宣们斗气到今，努力要把自己藏入“黑籍”的工作全部毁弃了！并且，一旦沾到了红的色彩，是最危险的——第一，恐

怕你就不能再在大学当教授支薪水了——因为在资本主义伦理观尚未改变的时代，是不容有和共产主义的俄国做亲戚的博士的。

李璜先生说现今的俄国就是行的他们底国家主义的国家，这是在拥护国家主义的方面，在要人相信国家主义的时候说的。曾琦先生在暨南学校讲演，说："故今日俄国所行，乃一种社会政策，非共产主义也"，这也是在要人相信国家主义和要人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时候说的。但在别的时候，俄国又变成了罗刹海市、夜叉之国。嘴是两块皮，只看资产阶级的工具们，喜欢如何说便如何说——只要有利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要拥护的阶级。

八　醒狮派的逻辑

曾琦在暨南学校讲演，说："则试问铁道国有制度，非共产党之所企图乎？而在中国则铁道国有之结果，乃为交通系所把持，无异于梁士诒之私有；此岂非道德不发达，不足以行共产之明证耶?"我现在谨效曾先生之方程式，为读者另说一段如下："德谟克拉西之议院政治，非醒狮派之所企图（者）乎?而在中国则议会政治之结果，乃为安福系及贿选猪仔所把持，无异于段祺瑞、曹锟之私家宅舍，此岂非道德不发达，不足以行国家主义而仍应度其原始的部落生活之明证耶?"

曾琦在同文中又说："盖欲试行共产主义，须（一）国防能力充足；（二）国际关系简单。"国际关系简单之国，却还需要国防能力充足；国防能力具备充足之国，却又能够使国际关系简单——这只好在柏拉图所著的书中去找。在眼前这个资本主义交互综错的世界上实在找不到——有之，或则在曾琦先生

之脑中。

曾先生又说："孔子圣人，当年未七十以前，固犹无资格以参与无政府之社会也；吾辈常人，更何望哉!"依曾先生，则是无政府社会者，一群斩斩齐齐的耳聋眼花七十以上之"圣人"集合所也！以此人世间绝对不会有之条件，驳倒无政府主义者；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宁有不心折而转入"吾之国家主义"者乎？

曾先生又说共产主义必须的精神条件有二："（一）共产观念普遍，必全国了解共产为何物，然后可以实行无阻；（二）公共道德发达，必人人奉公守法，然后分配可得其平。"难怪李璜先生向人说："我们以两年为理论时期，两年期满，再谈实行。"我初以他们必须两年为奇怪，为什么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不可以实行？原来他们是照他们在法国得学士的办法，是要有那多日子，才能毕业！可惜火星相隔太远，不能让我们遵着曾先生之教，将中国四万万同胞暂且搬到那上面去授课，待得人人了解共产，娴习法度之后，再回地球上来实行共产。但我也有一句话忠告曾先生，便是你们的国家主义理论时期，只定两年，恐怕太短。如果真要照曾先生所说先须使得人人都先明白国家主义，那末，虽然不必如孔子参加无政府社会，须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至少怕也必须至"四十而不惑"吧？我的《论语》没有曾先生记得熟，还是请曾先生自己酌量！

九　一半儿空想一半儿妄

沈怡先生在《醒狮》二十一期上，写信慕韩先生说："弟尝作空想，苟能组织一旅行团，尽捆载（小心这两字把人当了

‘物’，落了唯物主义的窠臼。）今日国内争斗不已之军阀以西，使之周游各国，略睹他人进步奋斗之状，则至少可以换新几个头脑；更组织一旅行团，尽载今日为‘共产’、‘大同’之说所惑之青年，使之周游各国殖民地，稍领略弱小民族之苦况，至少当有一半可以醒悟。惜哉，其不可能也！”我们对于沈先生提议的后一半，非常欢迎。假使能够实现，我相信沈先生底主张可以帮助中国赤化加速，比俄国“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力量要更大一百倍。对于前一半，我们只好忠告沈先生在那些游历各国的军阀归国之前，沈先生须先将家眷行李及祖宗坟墓搬出中国为妙——因为留学归来之武博士，比现在的将更会“爱身”——自然他们也很爱国，譬如游历欧洲的徐树铮，便时常有爱国的文章，而且有反对俄国的文章，在《申报》上发表；自然他底头脑是“换新”了不少！

十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问题”与醒狮派之原形

曾琦先生不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醒狮》第二期上说：“今世界亦但有‘英吉利资本帝国’，‘法兰西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日本资本帝国’；无所谓‘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何则，彼等之利害冲突，固无日不在暗斗之中也。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按曾琦先生在《醒狮》三十四期上说‘今日俄国所行，乃一种社会政策，非共产主义也。’）发出，彼以共产之眼光观察世界列强，根本制度相反，自宜视为一丘之貉……”原来现在的“列强”，在非共产主义者曾琦心目中，还不是“一丘之貉”。原来因为日、法、英、美时时冲突，所以就只有某某资本帝国，而没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但不知在临城案中，

提出一致要求的，是不是那些曾琦所说的非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亦但有某某资本帝国”的日、法、英、美？但不知“彼等之利害冲突”，有不有时候也可以“利害一致”？但不知我们所常用的什么“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政策”这些名词中的“国际”字样又如何解释？大概也是那“实行共产主义的苏俄”硬造出来，乱加上去的吧？有国际贸易而无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唯一的原因便是国际贸易的名词不是苏俄发出来的，所以就“有”；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名词是由苏俄发出来的，所以就“没有”。

醒狮派底唯一口号，是“外抗强权”。但《醒狮》第十八期上却说：“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之后，再来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一样的。“照旧遵守一切既成条约”！这便是醒狮派“大无畏”的外抗强权！难怪要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俄国用钱买了我们来作祟的了！十八期《醒狮》上又说：“我们现在即行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得不得与外国宣战？我们于实力未充足之前，我们即行如是，我们有得胜的希望没有？”原来醒狮派是“有”实力“外抗强权”而“没有”实力“打倒帝国主义”的。原来“打倒帝国主义”，并不是“外抗强权”之一种。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方法不同的——他们虽“抗”，却不至于像打倒帝国主义者那样要弄得与外国宣战的。原来凡一说到打倒帝国主义，那是就须与外国宣战——若不与外国宣战，就不能算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只说着玩而不实行的——因为他认为现在还是应当遵守一切既成条约的时代。原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得胜的希望，所以就只能说“外抗强权”，而不能说“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朋友！李璜说我们在中国提倡共产主义

是太早了！你们现在“于我们实力未行充足之前”，即在《醒狮》上大吹大擂的“外抗强权”，不也太嫌“早”了么？

曾琦先生说（《醒狮》第二期）：“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外国人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要去打倒他所用的这个“主义”，逼着他对待我们另换一个“主义”——何至于就是“干涉他国内部组织”？照曾琦的“宋襄公主义”说，那末，我们对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所行的“资本移植”政策，也不应当反对了！因为“资本移植”政策，就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具体表现得最露骨最厉害的一种侵略，我们若要去反对他，那便是去“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了！呜呼！醒狮派的“外抗强权”！外国这样来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把我们桎梏得连气也出不来——上海、广州、汉口、重庆、南京的同胞，让他们用了达伊尔主义任意屠杀，我们还不应当去“及汝偕亡”地向帝国主义进攻！就是去干涉他国内部组织——干涉这些压迫我们的仇敌的内部组织——譬如鼓动他们底下层阶级（平民）起来推翻他们现在的这种以侵略我们为目的的政府，又有什么在道德上不应该的处所？因为要避免干涉他国内部组织，遂并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也要反对！仁义哉！这大概便是余家菊所谓“无入而不自得”的“本国历史中的好东西”吧？这大概就是醒狮派说我们不应骂倒他的“东方文明”吧？呜呼！醒狮派的“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然而曾琦先生在《醒狮》三十五期上，却又叫我们抵抗强权要“运用外交”，而运用外交时，则可以“援助弱小民族厚我声援”，“勾结敌国在野党以扰其内部”！原来援助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以及“扰其内部”，都是和因要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而“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不同的！可怜的酒醉头脑！

曾琦又说："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何辞以对?"杞国的天要塌了！怎么禁得曾先生不如此担忧。然而试问曾先生，我们可不可以当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压迫我的国家出来之时，暂且说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等到有了那个国家出来时，再提什么别的口号呢？又试问曾先生，就是你自己承认的那些"英吉利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也应不应该打倒呢？依你的，纵然没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却已有了某某国家的资本帝国主义——现在我们就暂且将"国际"两字取下，单只留一个"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你还反不反对呢？外抗强权的醒狮派！你们不但拥护资本主义，而且拥护帝国主义！你们反对"打倒资本主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俄——一脉相承，都只是为了你们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的轿夫。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实现世界经济革命，都是从根本上铲灭资本主义的现制度的，所以你们要拼命的反对。什么国家主义，什么反对俄国赤化中国，什么"呜呼外蒙"，什么"外抗强权"，什么"实力尚未充足"，什么马克思学说并不真确，什么阶级斗争分散了革命力量，什么在国家主义之下，各种职业可以一致趋赴，什么"共产党人受俄国津贴"，什么俄国强捕中国使馆人员，什么"新俄祸"，俄夷马踏中原，什么俄国要把中国并为苏维埃联邦之一……拆穿西洋镜——只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一点"褊心"在那里作怪。更精粹一点说，只是拥护资本主义的那一片赤忱——那一片不可告人之隐在肚子里作"发条"，使得百代公司的唱片背出响亮的"哭灵牌"、"请宋灵"来。超麟[2]同志在《中国青年》七十二期上说：《醒狮》知道"有系

统地提出所谓绝对的国家主义来抵抗共产主义”。这话未免太恭维他们了！他们哪里能够有系统？我们只略微在这五十期《醒狮》中一加检查，便已找出他们无数的矛盾，简直千疮百孔。不过他们能够不顾前后，随口乱咬地始终作那拥护资本主义的工作罢了！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意国法西斯蒂……都还要去找一个一贯的逻辑；而他们却不顾这些，一个人说的话可以完全两样，可以前后完全相反，这是他们横绝宇宙的特殊精神！日本的贵族反对“相续税”，还能找出一个“歪”的理由，说：“家族是日本的特色，因为家族发达起来，所以今天日本才成世界无比的最良国体；若是想推翻家族，就是想和推翻日本国基一样。”（见小川乡太郎著《社会问题与财政》，译本第二百零四页）可怜他们连这种日本贵族都不如！然而他们之所以竟至以如此之意气，在那里背诵留音机的根本原因——还是要怪我们共产党人自己不好。李璜在武昌师大向一个四川人周君说：“我们所以要如此，都是由于他们硬逼出来的！”曾琦、李璜在巴黎时，办一《先声》周报，时发学者式的政治经济学说，尤以曾琦好谈天下大事。我们底任卓宣、伍豪[3]几位同志在《赤光》杂志上，偏要时时去指出他们的谬误，纠正他。尤其是显得曾琦底那支《新民丛报》式的文笔和他那两大传统思想——即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益发难堪。本来一切博士们都是要找一个幌子来谈一点“什么”的。譬如胡适谈白话文，黄炎培谈“职业教育”，陶知行谈“平民教育”，江亢虎谈“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乃至舒新城谈“道尔顿”写信给柏克赫斯特女士。任卓宣等硬要损伤曾琦先生们的这种“将来发展之伟业”，损伤他们的“自尊心”，自然他们就不能不纠合团体来专与共产党作对了！其实说他们本来就有心拥护资本主义，也是

冤枉。不过他们既与共产党有了生活上的仇恨（恕我对于唯心派的你们用了这种唯物史观的句子），遂不能不走人那一条路；遂不得不与一切反动势力（凡足以帮助他们而致共产主义以多少之打击，使他们可以出气的——譬如下至张德惠等之言，也不惜引以为重。）相联合罢了！可怜的怯懦者！有勇气的，尽管说："我拥护资本主义，我承认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应该存在——所以我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好了！可怜你们却又要在表面上承认寡妇应守贞节，而专门说些"俄国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话侮辱人类，同时也侮辱你们自己！其实，你们只单说共产党得俄国金钱还不得力；你们应该说共产党挖小孩的眼睛，把女人倒吊起来轮奸，吃死鼠，尿屎不揩屁股，以人血当酒饮……等等，像天主教神甫在欧洲募款时，在影片中形容中国人野蛮的那样。

十一　请看醒狮派之"诚实"！

李璜先生说："每逢国家有了外患，或被人凌辱，或被人侵犯，则欧洲人无论英、法、德、意哪一国的国民皆不能一日安于故常；很规律而且熨贴的一日三餐，很温柔而且美艳的少妻稚子，沙发椅何等舒适，比雅乐何等悦耳，皆一旦舍去而不顾，置身战壕，饱受炮弹，十人而九死！"（《醒狮》第二期）他这话是要用以证明爱国思想在人类界是普遍存在的本能。但我们要请读者想想那些旁边打有圈圈的字样中，到底含有多少的"诚实"！

又说："贵族阶级在今日欧洲，最穷而无实力，然在乡城则尚居各阶级之顶；其次始为所谓大绅士，即大农主大实业家；复次为……所谓小绅士……最后乃工人。以最末一级之工

人比最高一级之贵族，则工人之所入往往比贵族为多，以小商店伙比之官中执事人，则其经济生活亦前者远过后者。但贵族之女，无论如何不愿下嫁工人；而官中执事人虽终岁劳苦，无有存储，而总鄙小商店伙为贱业。并且不但同在军中奉职之士官，出自行间者与出自学校者，乃有阶级的蔑视；即在乡村共同作业之农家，出自旧家者与来自远地者亦有阶级的等差。同是工人，做细工者，每鄙粗工；同在工厂，为工头者，每鄙杂役。凡此事实，皆非一经济观念为之中心，而社会习惯与知识等差在在足以助成阶级的歧视。若果主张阶级斗争，则凡此等等皆足为战争之端，何独只取大绅士与工人之对立状况，而尽弃其他?”（《醒狮》第十七期）他这段话是要用以证明阶级之应当存在，为人间天然之事实。我们除了请读者注意字旁有圈的地方，含有多少诚实之外，还要请注意他：为什么不把工人的收入与次一级的大绅士——大农主大实业家相比？又为什么偏偏不用“大资本家”而故意要用“大绅士”的名词？贵女不嫁工人，官中人鄙小商店伙，是人间道德上应当认之为“对”而予以维持的么？所谓“社会习惯”，是不是由于人类之经济生活逐渐演变而成的呢？知识高下，足以助长阶级歧视——是不是凡是贵族大绅士都是“智”者，而凡是工人小商店伙都是“愚”者呢？因为细工鄙粗工，工头鄙杂役，遂连工人反抗资本家掠夺的阶级斗争也不应该有么？一般所谓“阶级斗争”，到底是指的经济上的平等要求，还是指的知识上的平等要求，李先生大概久已明白——为什么要故意地将知识问题扯来加在阶级斗争中，诬赖主张阶级斗争者是主张知识平等呢？是不是因为知识不平等，就当承认经济也应该不平等——愚者是应该受智者之剥削虐待而过牛马不如之生活么？阶级歧视之观念，如军中士官学校出身者鄙视行伍出身者，到底是那士官底先天

本能，还是由于社会的生活环境之暗示与资本主义化的教育之结果呢？打倒了经济上最不平等的资本家阶级，举一切社会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教育目的、文化制度而变更其根本之意义与鹄的，试问还有什么“尽弃其他”的足以使人受罪的阶级存在？（知识阶级和伦理的父子、兄弟、阶级之存在，是不要紧的，因为这些阶级本身并没有一种工具去掠夺他人，吸他人之血养肥自己。）

余家菊说：“共产党人受苏俄经济的援助，更以金钱收买学生……‘于是’强迫各校长予以宣传之自由，致送各教员以早行入党之威吓。偶拂其意，便下令各该校中之党员，鼓动风潮，伺机爆发，或则捏造谣言毁损对手方之人格，或则乘势掠取对手方之位置。此种现象，‘吾’于武昌目击而身历之，于各处又‘耳闻’之，其为全国之‘耻’而非一地方之‘羞’也必矣！”该有多少诚实？今后，凡一教员因无能，因与他人不和，因拙笨而不能战胜狡猾政客式之学阀，因不为学生所喜而被驱逐时——都可以说是“俄国津贴的共产党作祟”！大概北京女师大、南京东南大学以及一切的学校风潮，都与加拉罕有关——都是俄国使然。“吾……于各处又耳闻之”！二十一条之外，又有此“而非一地方之羞”的“全国之耻”——余博士的新发见！但李璜说：“我们绝不回骂你们共产党受了俄国人的金钱运动……”——该有多少诚实？

李璜说法国工人反对法国共产党主张国际公道，不许法国占领鲁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讲国际公道不是在今日，至少要等到德国赔款来把我们法国北方战区修复以后，说什么各国平民联合便有希望，如果德国老是这样赔款不送来，煤炭挖不来，我们生活便老是这样昂贵，工厂便要关门！”这个工人的口气，十分活像法国煤铁资本家，十分好像法国政府。可惜

李先生没有替我们记了姓名，告诉我们在哪一地哪一时说的！该有多少诚实？

又说：“请看上海的外国人，有几个是资本家？上海那些洋人在本国都是以劳力卖钱的；最多的是修理机器的工人和商店雇工。一到中国来，工资有加，红利有加，不几年他们便丰衣足食了！”这是要证明侵掠中国的，并不是洋资本家而是洋工人——证明在中国并没有洋资本家，也就没有资本帝国主义！该有多少诚实？

又说：“现在欧洲平民家里，比我们中国缙绅家庭还要阔绰得多；一个机器工人，平均一天有六七元进款，回家坐的是沙发椅，睡的是钢丝床，吃的是大酒大肉。他们天天在看日报，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所以能增进，便全靠他们的资本家、政治家能够在殖民地和中国找到了制造品的销场（李先生这句话可以作为教训曾琦使他了解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材料）。他们并且知道由某种机会，他们的资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国赚的钱是很多的时候，他们便用罢工的手段，去叫资本家增加工资与红利；所谓利益均沾，不肯放松一步的。”原来如此！该有多少诚实？“请看在上海的外国人有几个是资本家”和“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资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国……”这样的句子排在一篇文中——该有多少诚实？外国工人的罢工，原来也是侵略中国的——大概李先生是叫我们知道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须得先将各国工人阶级消灭；或是要使得各国工人阶级甘心驯服不向他们底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红利，然后才行吧？该有多少诚实——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掠夺者的辩护士！

又说：“生老病死苦这五个字，在我们中国谈起来，很是可虑可悲的；而在他们（李先生所认为已行国家主义的欧洲各国）国里，自从有了国家主义的社会政策，简直便不成问题

了!”该有多少诚实?

曾琦答复章书谦君说，反对共产党的文字，不必向外翻译，因为是“不足为外人道”。诚然，诚然!这样的反对共产党，当然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不翻为是，因为此乃“全国之耻，而非一地方之羞也!”

说谎为人生第一可耻事，而醒狮派恬然为之!

十二　谁是“以人当物”?

陈启天先生说(《醒狮》第四十四期):“共产党人过信唯物史观，只将人当物看，所以完全缺乏人味!”我们——共产党人——要求以阶级斗争，消灭一切的阶级——不许哪一个人利用哪一个人以为获得生活资料之资——反对资本家驱使工人，把劳动当商品，把工人当器械用。醒狮派反对我们主张阶级斗争，承认经济上的不平等阶级应当存在。到底谁是以人当物?到底在谁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是“缺乏人味”?陈启天说共产党所谓劳农专政，是“与尚贤的旧思想冲突”;《醒狮》上又主张“蒙贤治蒙”。在你们底“尚贤政治”下，试问又有多少“人”在你们心目中而不当做“物”看?

十三　什么是“本国文化”?

陈启天列出一个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表，说国家主义是“拣选本国文化”，共产主义是“推翻本国文化”。“醒狮”上又再三讥弹共产主义说“中国文化只有小脚与辫子”这句话为蔑视自己的文明。我们不懂所谓本国文化究是什么?所谓本国文化，当然是本国所特有的文化。我们在中国所有的文化

中，打起灯笼找遍了，也没见在小脚与辫子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我们引为光荣。列位不相信，就请听国家主义派的同志，恽震先生在第二十一期《醒狮》上说的："我不甚懂得所谓'东方文明'。若说忠孝节义这是人类（就是全地球上的每个人）宅心处世的态度，我们只要提倡忠孝节义的教育：服务尽忠，事亲尽孝，立身重节，处世论义，在工业发达的社会里何尝不可以提倡？若说文学美术，这也与国民生计有关，长此贫乏下去，大多数失业的人将何从而论文作画，文学美术终久不过是少数暇豫逸乐的人所享有。我们要使多些人享受到艺术的愉快，似乎应该增进国民的生计，使大家不偷不盗，然后才讲得到给民众以享受文艺的机会……若说东方文明是东方先哲的哲理学问，那更没有问题，工厂开得多，理工学校到处皆是，我们仍旧可以有若干大学，容纳有志的子弟去研究先哲的哲学。我所以说，只要尽量提倡工业，不必顾到精神方面的偏枯，就是这个道理。"恽君的话，简直是代表我们说的。请问仁义、道德、忠、孝、节、义、文学、美术，既都是人类同具的本能或倾向，则除了小脚和辫子之外，还有什么是东方文明——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还有什么是东方先哲的哲学之特质？我们共产党除了叫劳动者反抗掠夺自己的资本家，除了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反对寡妇守节，我们何尝推翻本国文化——又何尝有些什么本国文化让我们推翻过？我们叫人们现在"不必顾到精神方面之偏枯"——反对人们专门去讲精神文明的原故，乃正是因为有经济上的不平等阶级存在，"大多数失业的人将何从而论文作画，文学美术（乃至一切精神文明）终久不过是少数暇豫逸乐的人所享有。"我们所以不忘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两句"国民常识"（去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开会，左舜生君向余家菊君说此二语

是国民常识)，而被你们骂为以人当物看待，就是因为要“使大家不偷不盗”。朋友！且不论除了小脚和辫子，中国并没有特别的文化，即令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我们也只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史上，和犹太文化、埃及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一样看待。恽代英先生说得好：“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若说必须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能谈革命，请问里孚人中间并不曾产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羡慕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蛮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愿屈服于人家而虚骄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抬起来。中国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我们也不崇拜那“德国，德国，于兹独绝!”的侵略主义之象征物。然而陈启天先生却要控告我们推翻本国文化，以期诉诸人们的感情，好对我们激起愤怒来！

十四 难懂的新玄学

李璜先生说：“每个国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国家的人格；这种国家人格的缩小，便是每个国民的人格。”那末，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家人格，就是由于我们这些人的人格放大出来的了！李璜当然也在内——从五卅运动表现出来，是无耻、怯懦，甘为奴隶；然则，李先生的人格当然也是如此了！但中国

国家人格缩小的结果，为什么又都不像李璜，不像我；而又有袁世凯，又有张作霖，又有李彦青呢?

李璜先生说："爱的本体——或称良能——终有它的独立存在价值。所以我们谈感情生活，在在不能离却人的天性说话。认识了天性上本有这种爱，则爱国、爱乡或爱人，方有真实的源头，而不是虚浮的。于是方了然我们爱国并不是随声附和或有意铺张，是本乎天良而又缘于实际，有不得不然的意思。"为什么李璜先生又说："这个国家意识，国性问题的显著，一半虽由于拿破仑的压迫，一半还与当时文化的程度与交通的发达有关系，然后才真正能认识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呢?

十五　"苏俄走狗"的答复

第四十三期《醒狮》"笔枪墨剑"中，质问我们——"苏俄的走狗"（这诚然是一个可以出气的恶骂）——一些俄人在蒙古的事实。现在我们答复在此："当我民国十年夏间，外蒙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蒙境所受白党之蹂躏，诸务废弛，几不成国。国民政府，乃与俄缔结协约十二条，得俄种种援助，始克百废俱举。故与苏俄关系，异常密切。"这段答语久已写在《醒狮》第四十期中——是贵同志谢彬先生代表我们说的。但希望你们不要疑心谢君也是苏俄的走狗——因为他实在没有得到每月十七元的津贴。

沈怡君问："俄之于我外蒙，何故念念不忘，而必欲置诸苏联统辖之下。"这很容易明白：（一）是因为中国无力替他制止那些白党——谢米诺夫、霍尔瓦特等——去利用蒙古，图谋推翻他底共产政治，复辟皇政；（二）是要贯彻他底世界革命

主义，扶助弱小民族获得完全的独立；（三）是蒙古那块地方，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久欲利用其走狗——如前几年日本之于徐树铮——去建立甲必丹政治，以南进而侵略中国，北进而破坏俄国的反资本主义之建设！关于中东路，也无非是因为日、法、美诸国在旁边垂涎，一旦放手，即不免为他们攫去——攫去即与中俄两国不利，最危险的是可以供给白党作巢穴，用为反革命之利器。

中俄会议迟开的原因，是因为加拉罕要求遣散张作霖、张宗昌部下的成千成万的白党兵，革除中东路白党人员。因为他们都是足以给赤俄以政治上之危险的。只因中国可怜的中央政府，权力办不到，所以才至于迟延。最近加拉罕已经让步而先开会议之幕了！醒狮派放心！请你们还要记得去聚集精神以严防关税会议中帝国主义者之分赃罢（最要紧是监视日置益）！

李景林逮捕天津爱国运动者，“东方通讯社”即拍电报说：被捕者已在严刑下招认受俄国领事津贴，《醒狮》从而和之，也说“闻”天津方面亦有人受俄金钱运动。现在请看八月三十日（?）《京报》所载雷殷（反对共产主义之议员）谈话，说：“并无此事，此不过日人故造谣言，欲尽坑学生于赤化中耳!”

《醒狮》第四十五期，丑伦杰问俄国为什么逮捕华使馆人员。关于此事，赤塔中国领事耿匡先生（即耿济之）——即大家说他也是被捕人之一的——曾有一信登在专造此谣的研究系机关《时事新报》上（可惜我未能剪得），仿佛说他不但未被捕，而且中国所传之事，与他数年在俄所见，完全相反。自然，俄国的否认是不能算数的——因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譬如最近帝国主义者造谣，说俄蒙又订了什么铁路条约，加拉罕否认，《醒狮》说加拉罕是狡猾的，否认了也还是有的——一定要认为是有，谁也把你们无法。但别的帝国主义者如有什么

事而出以否认时，便再无人置疑——唯一的原因，便是因为俄国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不过有两点可以反证：（一）造谣者为什么不逼外交部抗议？（连对英对日都敢抗议五卅案，为什么既有这事而不向俄抗议？）（二）为什么外交部始终没有关于此事的正式公文宣布？稍危勿躁，不久外交部自有交代给你们！

我要声明我们并非完全与俄一体者，俄若真有什么侵略我们的事实，我们还是与对待帝国主义者一样的反对。只因《醒狮》既呼我们为苏俄的走狗，好像硬认定这些事就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只好尽我们的所知答复于此。

十六 “减杀对外的战斗力”？

醒狮派相信在他们底国家主义之下，各阶级是可以本了天然的爱国本能，“一致趋赴”着去对外的。所以李璜先生就以海外归客之资格，谈瀛说谎，说欧洲无论哪一国的人，每逢一有国家患难，便能舍了一切的沙发椅、比雅乐、美妻稚子而赴死不顾。（第二期《醒狮》）所以他们就要说共产党人在“国内鼓吹阶级斗争，以减杀对外之战斗力。”醒狮派实在太恭维我们了——我们鼓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可以由人去鼓吹的么？我们若有这么大的本事，岂不成了瞒天过海的八洞神仙？唯心的先生们太“从心所欲”了吧？我们暂且让一百步，暂且不拿我们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和醒狮派说——暂且请看醒狮派自己所说的话。《醒狮》第七期上，承认中国现在资本家多是军阀的化身和走狗底国家主义者郑伯奇先生，由日本写回来的信，告诉曾琦、李璜说：“你们要揭出最简单的口号，如辛亥革命以前‘排满’‘光复’的口号，把握住那最可爱的农工阶级的同胞的心！惟有这农工阶级才真是爱国的。你们看看俄国

革命，贵族跑到巴黎依然过贵族的生活；音乐家入了美国国籍，依然发挥世界大家的声誉。与祖国同命运共甘苦，始终死守着祖国的，只有农民和劳动者。德国怕也是一样，国民被赔款苦得要死，Hugo－stirnes 反成了世界第一等的大资本家。再看看咱们这可怜的祖国和同胞，好战的军阀和煽乱的政客都在租界构有堂堂的宅第，政变发生，租界上便充满了要人的车尘马迹；呻吟在枪刀水火之下，死不离祖国怀抱的，只有农人劳动者和卖命的兵士！——这是一种变态的劳动者。朋友们！祖国的生死存亡全在这些可怜的人们的双肩上，你们的国家主义，也只有这些人们才肯承受的。”郑先生不是得了十七元一月的苏俄走狗，他底话，当然比我们说的总有几分道理。“你们的国家主义，只有这些人才肯承受！”“爱祖国的，只有农人劳动者和兵士！”说我们减杀了对外战斗力的醒狮派怎么样为我们下一转语？我们说“劳动者无祖国”，便是说劳动者在现在这种史丁纳（Stirnes）所借以发财而有事时又跑去入美国国籍的“祖国”中，是不应当去“爱”它的。劳动者是最能爱国的，但他只爱他自己的“祖国”——消灭了贵族资本家以后，史丁纳也一样的同他们在生产界做工（劳心的或劳力的）的时候的那种“祖国”。所以德国劳动者不应当爱现在握在工业资本家手中的祖国，美国劳动者不应当爱现在握在银行资本家手中的祖国——因为你爱了它并无益处，你在这里爱国，资本家却在那里私通外国（法国占领鲁尔时，史丁纳实参加其协议）；有利，他们发财；有害，他们跑了！所以劳动者只应当拥护那已经成为劳动者“自己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劳动者如能在各个地方，把他们自己的祖国扩大，使全地球而成为一个苏维埃国，强迫一切资本家和贵族都变成了劳心劳力的工人时，便没有了“祖国”，而获得了整个的人道、正义、自由，获得

了“世界”！在正义之前，公理之下，资本家和贵族是不应当不受大多数劳动者之强制的——杀了他们也应该，他们都是已经犯罪的囚犯。不过从唯物史观上认识社会进展的“时代”，却也可怜他们是被已往的生产关系——无机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非人类意识所能支配的定律推着走，所以也允许他们放弃了罪恶而同劳动者一样的做工，我们是本于这样明显的事实，这样自然的客观律，促进（鼓吹提倡之名，太恭维我们了，不敢承受）阶级斗争——大呼郑伯奇先生所认识的“最简单”的、和“辛亥革命时一样”的工农兵联合的口号！

十七　专 政 问 题

醒狮派不相信“国家是统治者压服被统治者——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这句话。所以他们反对俄国的劳农专政。他们拾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硬相信俄国烧毁托尔斯泰的书籍，禁止萧伯讷的戏剧是事实。现在我们且不辩护这些事的没有；更不必和醒狮派空化时间谈理论。我们且说事实。第一我们要问：设若有一群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共产的共产党，在法国秘密结社，图谋实行社会革命，到处发行他们底书籍，扮演他们底戏剧时，这时法国政府对之应该如何？是不是逮捕、禁止、监禁、死刑、烧毁书籍、放逐外籍共产党员？史丁纳在德国，有造船厂，有森林，有钢铁厂，有银行，有报馆，有各种的矿，他能够使法国占领鲁尔时，不能不先和他商量。他可以垄断舆论，他可以收买国会中若干议席。他若运用他底金钱之力，便不难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和他发生密切关系。他不难指挥他的报馆说德国劳动者应该下死力替史丁纳作工——因为那是发展实业，挽回利权。他可以暗示着大学教授们拥护阶

级存在的伦理学说（自然不是每个大学教授都如此卑鄙）。他更可以利用海陆军和警察压迫工人对于他的罢工。假使法国的钢铁业在世界市场上和他的销路相抵触时，他的报馆，他的大学教授，他的国会中的议员，便会一致的说“德国，德国，于兹独绝！”；“我们要勇敢的赴前敌去发挥德国文明”；“我们要爱国”。千千万万的战费，则征之于人民；万万千千的死尸横在疆场上，则来自“有意识有系统有组织的国家主义的爱国教育”中——征兵制度中。胜则史丁纳获得钢铁市场，或获得足以辅助钢铁业发达的煤矿——一如法国战胜德国后之所为。（收回亚尔沙士、罗南，占领鲁尔）。败则从新又来爱国，作工，加税，还赔款，挽回利权，报仇——舆论、教育，一切如是。于是社会的风俗、道德、伦理、政治、法律乃至宗教（德国教士得罪了史丁纳时一定募款就受障碍）、科学（日夜研究如何发明俭省人力而生产力大的机器——必如此才可专利受奖）、美术——可以说一切都要史丁纳化。在这种史丁纳国家中，劳动者主张权利是反叛；说“工人无祖国”这话的人是犯了道德上的罪，是煽惑人心；共产党当然更应该“杀无赦”。请问：这不是资本家欺骗群众，剥削工人的工具是什么？现在的英、美、日、法、意、德……除了俄国，哪一国不是如此？哪一国不是在德谟克拉西面具之下，实行第三阶级——资本主义的专政？这种专政便是道德上之正体，而俄国的劳农专政便是罪恶！俄国专政便是违反了自由平等的原则，而英美则否！我们请问醒狮派，请问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应不应对于满清皇党专政呢？应不应该对于袁世凯的帝制党专政呢？将来醒狮派得了政权，曾琦先生坐在北京总统府中时，也能允许我们共产党肆行反对你们自己否——也还要保存你们所说的自由原则否？依你们的，是俄国现在应该让一般资本家和帝制派去自由

活动，好将俄国现在的政府推翻；让康有为、升允、金梁、江亢虎自由活动，抬了溥仪来把中华民国的共和招牌下了去么？拥护资本主义，原也可以；但应该光明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应该横行一世，俄国推翻资本主义而且实行禁止资本主义之图恢复——我们应当一致地去和他拼命。却不应该假借正义自由之名，说专政是罪恶，是不道德，以欺骗群众！朋友！只拿《醒狮》不及《向导》受摧残之甚和醒狮派人不及共产党人在在有生命的危险二事看，就已足够证明国家是“阶级的”了！私有财产制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不公之于社会而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出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专政，是用国家这个东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工具归之于社会公有——使阶级消灭。俄国劳农专政，不是反自由的，乃正是在走向自由之路的过程中——为正义之初步的累积工作。假使托尔斯泰、萧伯讷的著作中，含有破坏劳农专政，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张目之处，禁止、焚烧，是应该的。唉！专政！辛亥革命如能继以民主主义之专政，则今日之中国必不如是；将来醒狮派当国，如不专政，则北洋军阀一定会利用“自由”，鼓动军队，先将曾琦、李璜杀了再说（请读者参看《中国青年》第八十六期《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

十八 中国今日之劳资阶级

《醒狮》说：中国还没有劳资对立的阶级；又说：“中国劳

资阶级，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还是和醒狮派说事实。事实太多，我们苦于不能遍举，只好且举一二，以见其概况。据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就已经有：

类别		人数
制造工厂工人	染织	302，666 人
	机械及器具	16，361 人
	化学	119，789 人
	饮食物	151，677 人
	杂工厂	35，085 人
	特别工厂	13，063 人
	计	638，641 人
运输工人	铁道	71，811 人
	海员	约 150，000 人
	码头工	
	车辆劳动者	
	计	221，811 人
矿山工人		530，885 人
市政工人	邮差	约 12，000 人
	电灯	
	电话	
	电报	
	自来水	
	清洁夫	
	计	12，000 人
农业工人		
政府直辖工人		21，640 人
外国工厂工人		324，362 人
总计		1，749，339 人

在上表所列的工人之中，已有工会组织者，据一九二四年八月所调查计有：

铁路　四四、八〇〇人

海员　四五、〇〇〇人

矿工　二六、二〇〇人

湖南　二六、〇〇〇人

武汉　三二、三〇〇人

上海　一六、三〇〇人（按“五卅”时上海总工会所属已有二十万人以外）

粤港　五〇、〇〇〇人

其他各处　三〇、〇〇〇人

总计　二七〇、六〇〇人

我想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之有赁银劳动阶级之存在吧？这些劳动者所过的生活怎样呢？自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海员，是比较的稍好；然而且看我举一例，如：山东博山煤矿轻便铁路工人的生活是：工人住处，上搭芦席棚的土洞，每一间大长方形的棚洞，住三四十人。夜间三四十人同排在地窖中。每日工作从早五点到晚八点——十五小时。推煤出洞下山，每次车钱六十个铜元，每人要每天推两次，才可得一百二十个铜元。一百二十个铜元之中，要送十五个给“工头”。每日须买公司自卖的贵面，五十余个铜元，咸菜四个铜元，烟卷六个铜元，每四五日要费一双布鞋，所余还有几何？铁路经过偏僻地方，没有女人，夏天工人还可随便不穿裤，冬天简直要命。铁路由山上倾斜而下，推车飞跑，偶一不慎，便连人带车血肉横飞，每礼拜必有三四次惨剧发生。死了还要公司考究原因，有时侥幸可以得着二十元恤金，考究不出原因，就算你是白死！再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上海共有童工总数十七万三千二百七

十二人。其中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女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四千四百七十五；女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共在二百七十五个工厂中作工；内属日本者三十二，英国二十四，美国十二，意大利七，法国五，葡萄牙、瑞典、比利时各一，英美合办者二；其余一百九十厂，均为中国资本家所办。很多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中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而且是终日站立。分日夜两班，直到星期日才停一班。工钱按日，至多不过小洋两角。那些童工多由包工者（Contractor）在四乡招来。每月不过给其父母两块银洋——包工者可以向工厂得到四元上腰。在棉厂中的童工，大多数工作时间是十三小时十五小时。许多工厂中，当夜工时，儿童们都因太疲乏而滚在棉堆里睡着了——工头看见，便加毒打。丝厂中以女童工及青年女工为多——成语说"一个小孩当两个成人"。小女孩站在地下，向沸水盆中捞丝头——十指见骨。早六时至晚六时——间或还要作夜工，并须先十五分或二十分到厂。一气要站五六点钟。厂中温度，常为湿气所包孕，久在炎湿蒸气中，尤易疲倦；工资由二角至二角五分。尤苦者为火柴工厂——九枚铜元一天。工厂内又无防火设备。作火柴盒的外工是母子同作工，每千个盒的内部，九个铜元。每千个盒的外部，七个铜元。一个妇人，两个小孩，一天可成二千至三千个部分——精疲力竭。又据他们调查，上海的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收入，算比中国任何地方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每月得十五元，人力车夫得八元，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也须十六元，方能过活。上海小沙渡日本内外棉厂，作工十二小时，而最低工资且有少至每日二百文的。时常毒打工人，连大小便都要先领"厕牌"——三四千工人，只有两块厕牌。在这种生活中的工人，共计九公司二十二厂，三万五千余

人。照以上所举的事实，请问醒狮派，到底中国有没有了劳资阶级？这些劳动者倘若要向资本家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到底应不应该？值不值得同情？资本家对于此等劳动者，动加高压——像青岛五月二十九日的屠杀，上海顾正红的屠杀且不说，只说郑州豫丰纱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厂主穆藕初竟不惜用三四百流氓，殴打罢工者，诬调解工潮的京汉路工人为赤化，打死韩玉山、王长保两人——这是国家主义的同志恽震先生所亲见的（闻恽先生现在该厂当工程师）。劳资斗争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么？绝大的流血惨剧——阶级斗争，如京汉路"二七"惨杀，广东商团事件中商团和工团军、农团军苦战的事实，已经写在历史上明明白白。《中国青年》八十六期中所举的资产阶级的自利性，反国家性，也已经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鼻尖上！醒狮派却还要说中国没有劳资阶级；说各阶级可以合作；说阶级斗争是减杀对外之战斗力。当中山收回粤海关时，电请安格联抗议，保护他们底内债基金的，不是上海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么？当去年江浙战争发生时，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便通电主张"租界未收回以前可不顾主权，而于法典约章之外，都可委曲就商。"——以托庇于洋人，而保护他们的财产！醒狮派昧良说谎，袒护资产阶级，还要说我们硬把五卅运动强扯成阶级斗争，举"南洋烟草公司"和"招商"、"宁绍"等公司捐款之事，证明劳资合作。朋友！"南洋公司"捐款，是要劳动者替他做工具，延长对外罢工，好让他战胜"英美烟草公司"呀！"招商"、"宁绍"是要乘机在长江沿海抢钱呀！虞和德与纺织业无直接关系，所以他就说海员罢工好而纱厂罢工不对（参看《中国青年》第八十四期）——无非是"三北公司"有几只船可以抢"怡和"、"太古"之利，而又希望着多有棉纱包装运罢了！事实在这里，每个妇孺都会知道它是哲

学的真实。醒狮派故意装做不见，硬不承认劳动者——被压迫阶级有自我意识要求好的生活，硬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所鼓吹的。告诉朋友们！北京外交部久已就行文各省，说："俄党女子，潜入内地，乔装卖笑，宣传共产共妻主义，事关风化治安，希即严行取缔"了！用不着醒狮派再来表现中国国民之无常识！资产阶级的轿夫！依你们，天天向劳动者去唱那"不要动气"的歌："我们耕田，人家吃大米；我们织布，人家穿新衣。我们自己，为什么受冻忍饥？咳！你若是不胡乱用钱，就没有这个道理——劝你不要动气！"使得每个被压迫者，都成为很驯服的甘被剥削者；像娼妓仰卧在大路上，摆着阴户让人随意轮奸那样——是不是？

我要请你们答复我，你们到底反不反对资本主义？

十九 世界的平民不能联合么？

李璜在第四十六期《醒狮》上说："共产党只见着欧洲各强国在国内资本家与平民的利害冲突，而便未见着在国外他们的资本家与平民一致了！"李先生举的事实是欧洲各国的工人生活都极好，他们都知道他们底生活之好，是由于资本家、政治家在殖民地和中国侵掠半截的国家主义得来的——所以他们很赞成资本家侵略殖民地和中国；很赞成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占领德国的鲁尔。并且说欧洲工人，一知道资本家在中国赚了多钱时，他们便以罢工要求加薪。所以不但欧洲工人是侵略我们的同谋者，并且他们底罢工就是直接刺杀我们的利刃。李先生在这样的自己谎言之下，遂断定我们不能希望联合世界平民，"老等世界的平民革命"！我们没有见着欧洲各国资本家和平民在国外的一致合作！醒狮派的同志是见着了的！《醒狮》第五

十期上，就载有一封由巴黎寄回来的信——报告他们所见着的欧洲资本家和平民一致对外的事实，他说："此时英国已陷于孤立的地位（指其因上海五卅案），而其内部政潮复烈，工党极端反对与中国开战，欲借此问题为倒阁之资。最近英政府由澳洲调两舰赴中国，该两舰不独不应命，反自动的开回伦敦。"做这个报告的，是"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系以"青年党"（曾琦在法时所组织，专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的）为中心；由那向法政府告密说：六月二十一日要求陈箓签字抗议五卅案的学生都是共产党，以致许多旅法爱国者被逐的——何鲁之（青年党书记）先生所指挥而组织的。这报告当然可以靠得住。李璜先生！世界的平民联合不可能么？广州现有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内含有印度、安南、朝鲜的革命团体和我们的"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五卅运动中，有印度共产党、朝鲜革命者所组织的五百余团体联合会、安南革命党、土耳其青年国民党、蒙古国民党、波斯和埃及底国民——都曾特派代表，在中国共产党本部所在地参加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路透社"曾电传印度代表在香港活动的结果，使香港印人大愤，英帝国恐慌，一夜中遣散三百余印人——并枪毙数人（当时上海各报载香港电云枪毙三百人）。柏林无党派五百万知识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通电慰问，说："黄白种的资本家压迫你们的民族，同时也压迫我们的阶级；你们之敌，即我们之敌（六月六日）。""伦敦国际职工联合会"电祝我们战胜一切反动的势力（六月六日）。第三国际通令四十二国共产党及工团，一致动员高倡"从中国放开手"，"勿干涉中国"；并于必要时以罢工援助中国。"全俄职工会"首先汇十万元接济上海罢工（六月十七日）。"莫斯科国际平民大会"，檄告全世界平民援助东方民族独立运动（六月十二日）。第三国际和赤色职

工国际电商第二国际及黄色职工国际以实力援助中国（六月十七日）。“莫斯科华侨大会”，三十九国共产党代表莅会，议决阻止列强军火运入中国（六月十五日）。“苏联无产阶级学生会”，电称“愿与中国学生、国民、工人携手并进”（六月十六日）。曾服务于巴尔干半岛之俄兵，宣言反抗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七日莫斯科电，全俄各地均因中国事件，有示威及募捐之事，全俄农民亦一致奋起。苏联职工会于六月四日电中国工人请其坚持到底。莫斯科纺织工人，特为五卅案开“反抗压迫中国大会”。海参崴工人定出数小时作为援助中国工人而做之工（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二日莫斯科举行五十万人之大示威游行，援助中国。法国“劳动总同盟”捐款二万五千金卢布（六月十五日）。“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与大阪各劳动团体联合会合派代表，调查日本资本家虐待中国工人之真相（六月六日）。日本劳动总同盟，欢迎上海罢市（六月八日）。东京市内三十六劳动团体，领袖人四百余名，为五卅事件开会，被警察干涉，逮捕多人（六月九日）。英船行至神户，华籍海员罢工；雇用日本海员，日本海员拒绝，反醵款欢送华籍海员归国。英国“独立劳工党”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完全承认中国人管理中国（六月十日）。英国“职工联合会”电北京“中国劳工委员会”，相信五卅运动足以促进东西工团主义，成为有力之团结。六月十八日英国劳工党分电各支部，反抗英政府压迫上海群众。英国矿工首领电首相，反对利用英国舰队帮助厂主压迫华工。柏林“国际工人后援会”召集“勿干涉中国会”，到代表八百余人。捷克斯拉夫“国际工人救济会”为五卅事件开会，到者二万人；丹麦、挪威、荷兰均有此等大会。六百万工人所组织之“英国劳动同盟大会”声称欢迎中国工人所起之叛乱。英国共产党提出“勿侵掠中国”的口

号，迫英政府容纳下列条件：（一）赔偿被英兵击毙或受伤中国人家属之损失，取消司法调查沪案之办法；（二）取消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及不平等条约问题，应召集一特别国际会议，俄国亦须加入讨论；（三）中国关税问题，列强无须干预；（四）中国境内之英国海陆军队及战舰须立即撤退，各国政府必须担保不破坏中国之主权。英国少数派工人，正在煤矿罢工中，尚汇一百三十金镑给上海总工会。以上这些事实，都明明白白在最反动的研究系报纸中和帝国主义通讯机关“路透社”、“东方社”电稿中写着。说现在还未到时，世界被压迫者之联合尚无大力，尚不足以一举而歼灭资本主义，是可以的。说世界平民联合简直不可能，无望；说欧洲资本家和平民（劳动者）对外是一致；则明明是《醒狮》在那里出力替资本主义蒙蔽群众！

二十　半截的国家主义

李璜说：“有些人说，现在一些人在中国提倡国家主义去图自强自卫，难免将来不流为帝国主义去侵略别人。”这本是对于醒狮派的一个绝大疑问。李璜答复，是背诵了一段“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说我们祖先就是和平的，以证明他们不会流为帝国主义。并没有说出一点可以制止他“不流”为帝国主义的切实方法。

张介石说：“西洋的罢市罢工，都是积极的罢市罢工。换言之，罢市以外，还有其他准备；罢工以外，还有其他动作。至于中国式的罢市罢工，则仅限于罢市罢工而止。试问如此简单而和平，怎能使租界上有凶器的洋人向你屈服呢?”一点也不错！然而张先生却没有对于应该怎么样去准备“其他”的

话，说出一字。

曾琦叫我们勿希望军阀救国，勿希望外人仗义，真是千真万确。然而曾先生指给我们应走的路，却只是“要之，时至今日，我已处于背水之阵，非有项羽破釜沉舟之志，难收韩信出奇制胜之功！吾人鉴于军阀之不足恃，友邦之不可靠，亦惟有努力于民众之组织，以期成一大势力，实行‘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切无聊之希望，愿国人共绝之也！”除了“排句”和“故典”之外，只有“组织民众”一句空话。对于如何“期成一大势力”，却一字未说。我们钻到各处去组织民众，醒狮派又说我们是苏俄走狗，赤化中国。醒狮派却又尽管“云腾雾驾，终究是滴雨不落。”

陈启天叫我们预备国民实力——也是一样的“且听下回分解”，没有结论。

灵光君说：“什么是国家的抵抗？即以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对外防守的目的物，以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其目的在将此国家弄到文明地位，而后更进一步，再将此文明为全世界人类谋其幸福。”却对于如何才能“弄到”的切实方法一字未说，只是在结论上说：“翻开《大学》第一页，我们的精神，更已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我们现在实行国家的抵抗，不外实行着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啊”！啊！

二十一　《醒狮》小心赤化

依《醒狮》的理论，凡是由《向导》周报或《中国青年》喊出来的口号，凡是与苏俄有关系的口号，便都是“共产主义的”。所以他要浩叹：“呜呼！吾中华民国全国学生总会，竟以苏俄共产党之口号为口号！”而要“为我全国青年学生扼腕太

息”了！其实，《醒狮》出世太迟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在《醒狮》出世之前两个多月，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久已就发表了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依《醒狮》和右派的造谣，学生会是共产党把持了！难道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底脑筋也是受了共产党人的操纵么？并且，就是《醒狮》自己也受了共产党人的嗾使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反对基督教教育，联合被压迫阶级及弱小民族，哪一个口号不是在这两年中由《向导》周报站在民众面前，作“向导”喊出来的？《醒狮》第三十五期，不也随声附和主张“援助弱小民族”，“勾结敌国在野党”，“收回海关主权”，“严禁学校传教”么？在巴黎的青年党（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不是也一样的对于五卅案提了十二条：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么？小心哪！赤化要紧！

《醒狮》根本上发生于“投机”心理，没有中心的信仰——什么时髦，便也赶着什么后面打号子。国际妇女日（三月八日）是一个纯粹红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那以反对共产为职志的《醒狮》（第二十五期），却也把旧酒灌入新瓶——扯些什么花木兰、韩世忠夫人、沈云英、秦良玉的腐败不堪的英雄思想附会其上，以装点它是“近代”青年的读物。它又再三佩服土耳其国民党——却不知土耳其国民党是和蒙古国民党一样的，是受有苏俄的实力帮助的。它歌颂广州的学生军，却又不怕研究系所指为红党的蒋介石沾染了它！我们不是说这些不许它称道——它肯帮着宣传，正是好现象；我们只觉得在在看见它底投机性罢了！

二十二　民族主义问题

《醒狮》说共产党既加入以民族主义而革命的国民党，而又承认蒙古独立，“使我之领土分裂”，是矛盾。它底理由，是蒙古乃五族之一，所以应该受中国管辖。但我们不知道曾琦先生还欢不欢迎五族之一的满州人溥仪做中国皇帝？如其不欢迎，而且要为文问段祺瑞“何以不杀溥仪”，则曾先生所服膺的孔子已有遗教在曾先生肚子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侵掠的保卫的国家主义，似乎也应该让蒙古人自己去讲一下。国家主义不流为帝国主义么？对于蒙古问题，业已开始在“流”了！告诉朋友，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在党纲上是：“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在宣言中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原来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民族，这是矛盾的民族主义；醒狮派奉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是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蒙古人自己底自决权。我们并没有去鼓动他们，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的自决权而已！

二十三　国民党与阶级斗争

《醒狮》又不懂共产党既加入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而又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解释民生主义

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左舜生先生在第三十二期《醒狮》上，引我在重庆所作文驳恽代英君，不知那文乃是站在一个谨守国民党党纲的地位上立言。

我们很奇怪醒狮派反对阶级斗争的动机。曾琦先生说："革命之对象，为军阀官僚，则被捣乱者乃军阀官僚而非人民也。革命之动机为反抗不良之政府，则陷于恐怖者，乃少数之当局而非多数之良民也。即令革命时期，人民不免稍受惊恐，然此乃一劳永逸必不可免之举也。今且假定革命手段为危险而不宜取，则试问不革命果能保守秩序之安宁乎？不革命果能免恐怖现象之发生乎？"在曾先生这一段话中，将"革命"换成"阶级斗争"，将"军阀官僚"换成"资本家"或"压迫者"，用以转询醒狮派，不知醒狮派又将何以下一转语？且醒狮派既言国内尚没有阶级，则又何畏他人之主张阶级斗争？既言尚无资本家，则又何劳醒狮派为资本家阶级着急？

二十四　新儒林外史

《醒狮》说："本报读者万余人"，"《醒狮》以大无畏之精神，宣传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举该党（共产党）一切似是而非之邪说，摧陷而廓清之，使之在理论上直无立足之余地。未及一年，而国内信仰国家主义之分子，日益加多，爱国团体之成立，如雨后春笋。"又说："因为《醒狮》受国人欢迎，妒嫉心的无明之火，烧得共产党忍不住了！"又说："迩来'吃洋教派'、'拥军阀派'、'亲俄派'、'亲美派'、闻《醒狮》之声，而内不自安，时复发为反攻之论。"我们记得江亢虎在《南游

回想记》上，也曾说：“此间大资本家，首推闽人黄仲涵君……闻名请见，言资本主义首领愿与社会主义首领接洽也!”肉麻!

二十五　上海的尼姑庵

我们常常看见上海尼姑庵，因为要使那些迷信菩萨的太太们便于来进香，就在庵中装起雪亮的电灯，风凉的电扇，灵便的电话，并且还预备有自备的包车，预备有停汽车的场所。马克思说：“不是人类底意识规定物质生活，乃是物质生活的条件，规定人类意识。”李璜先生不服，却要说：“英人以其机器进据印度已及百年，而机器之力乃不能动印度人改良之念，即名加斯特（宗教）的信仰有以阻碍之。”而归其“机械不改良、工业不进步”之原因于唯心的精神生活。真正善为帝国主义者辩护。印度人若能承英人底恩典，把一切机械应用的机会都肯给与了他们，则大英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可以剥削回去?

二十六　首阳山上的李璜

李璜夸张东方的精神生活，说他在巴黎时有一位教授，指着中国文化史问他：“我在你们中国古史上常常看见这个‘让’字，并且主张以让为国本，我很不解这个道理。或是让与攘通，不然便是挑手往往错成言字旁了。请你替我查查看，如果古训有让之为言攘也，那末我的疑团便大解释了!”这一段用小说文笔描写出来的“内台喝采”，自然足以投合素好夸大的中国人性。但我们对于此说，却觉得只有两途可信——不是李先生故意说谎，便是那位教授特作“挖苦”。好一个东方特有

的让德！或者醒狮派相信孤竹二子让国是实事吧？然而醒狮派人为什么又不肯将蒙古“让”与蒙人？

二十七　曾愚公先生文集

编《醒狮》周报迄感赋一绝

“浮海归来念愈痴，士夫依旧叹无为，拼将热血临风洒，唤醒人间老睡狮！”（予于民国七年夏，因中日军事协定问题由日本辍学归国，执笔上海《救国日报》……）——《醒狮》第一期。

海寇吟

“……窃我宝藏据我地！贻我毒药腐我神。……”——《醒狮》第六期。

勖“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

“……当民国七年夏，予因反对‘中日军事协约’，偕‘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志二千余人由日本罢课归国时，即极力主张全国学生应有组织。曾在天津发起‘学生爱国会’……”——《醒狮》第二十六期。

扶病编《醒狮》周报讫口占一绝

“书生报国无他道，手把毛锥作宝刀，心血未完终欲呕，病中握笔敢辞劳！”——同上。

记船上一英妇

“……有一英妇，貌丑而肥，年五十许，隐椅而卧，跣其两足，臭气逼人，众皆恶之，恬不为耻……会食之时，状尤可怪……则效非洲野人之行，以手拾菜，人于口大嚼焉……予曰：此真英人之代表也！彼英人者，世界自私之民族也……据他人之椅而无所于歉，食他人之食而无所于惭，非英人传统之

经济侵略政策耶？……闻者皆笑应曰：然！遂书之以为记。”（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三日作于印度洋舟次，时方风浪大作，据椅书此，愚公自识。）——《醒狮》第三十五期。

感事书怀偶成数绝

“普恩加赉是吾师，克烈门梭更不疑，他日政权如在手，要当横海制倭夷。

“六却英夷百战功，髫龄读史慕文忠，当年一炬焚鸦片，民族精神万古雄。

“华胄千年文化古，楚歌四面国基危，从今教养兼生聚，霸越亡吴事可期。”——同上。

国防与外交序言

“……去秋，归自法京……爰与友人创办《醒狮》周报，揭国家主义之旗帜，日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义，强聒于国人之前，盖犹是八年前参加‘国防会’，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执笔《救国日报》，著《国体与青年》时之素志也……”——《醒狮》第四十三期。

辑者按：愚公之诗，殆可以使“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矣！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即曾琦。

〔2〕即郑超麟。

〔3〕即周恩来。

PDG

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

——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的地位。

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尤其要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在民众中宣传。在组织上有时应联合国民党右派打倒国家主义派。

和国民党右派的争斗，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解释三民主义时，不可多涉理论，最重要的是用如何方法，如何力量，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要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

---

* 本文是共青团中央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告第一一〇号》转发的。

PDG

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更进一步非到共产社会，民生主义不能算完满成功。各地民校的出版品，各地委的宣传部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切实管理之。

在组织上，各地应迅速在学生中，在自由职业者中，在农民中，在手工业工人中，发展民校的区分部，但必须是左派的。右派领袖们已宣告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他们的用意不但要推翻北京之执行部的政治委员会及江苏省党部，而且要进而攻击国民政府，民校各级党部应即通电全国党部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其理由是：（一）开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之通知召集，手续不合；（二）开会地点不在革命根据地，而在段[1]政府之势力之下；（三）发启通知开会者有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茅祖权等，未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脱离关系。通电中并应说明此时革命工作南北俱在发展中，全国同志均应同心协力，努力工作，即有不同之意见，亦可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发表，以图解决，倘舍此不图。正当革命工作吃紧之时，竟站在广州中央最高党部以外，站在国民政府以外，标榜异议，迹近阻挠革命工作，而为全国同志所不取。同时亦应严促广州中央迅速定期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毛　泽　东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

* 本文原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编印的《革命》第四期。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1]，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

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

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2]，（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3]，（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

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

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这里是指中农。

〔2〕这里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

〔3〕店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生活来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是店员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下层店员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陈　独　秀

我们要明白国民党中的左右派是什么，这不但是国民党之重要问题，并且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重要问题。我们若是把国民党看做整个的而无左右派的分别，便无由判定国民党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了；我们若是懂得国民党中有左右派之区别，左派是革命的，右派不是革命的，然后拥护国民党的人才不致受人指摘，非难国民党的人才不致一概抹杀。

有些人不相信国民党有什么左右派之分别，可是在事实上，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另自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黄[1]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2]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同时，左派的思想亦因之明了而正确了。

有人以为共产党是国民党左派，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行动上，固然站在左派的政策上面，然而共产党是共产党，国民党是国民党，国民党自

有他自己的左派，如何能以共产党做国民党的左派呢？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与政策，无论如何左倾如何急进，终究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就现有的事实而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程潜、于右任、徐谦、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丁惟汾、王励斋等一班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党员。

国民党的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些什么呢？在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前后，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左派，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右派；现在的左右派，都不是这样简单的分别了。以前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信仰三民主义的右派，已公然反革命，而实际上脱离了国民党了；现在新的右派，虽然口头上也说主张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高高的挂起信仰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自重，可是实际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理想与策略，他们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之方法，都完全与左派不同。

在理想上：左派之反对帝国主义，乃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之本身为压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扰乱人类和平的怪物，右派之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乃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同时他们并企图中国民族也发展到帝国主义；左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民主政治，右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仁爱的保育政治，即古代所谓仁政现代所谓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懂得要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右派则反对联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阶级之阶级利益的争斗而失其同情，所以右派虽然口里也说要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口里也说要国民革命，然而实际上只能口里说

说，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之实际工作，一步也不能动手去做。他们口中所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说的“国民革命”，都和不能兑现的支票一般。他们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争斗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饭睡觉，至多只能闲暇无事时做几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颂圣文。他们虽然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可是不会为革命流一滴血，不会为革命坐一次牢监，并且不曾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举行过一次示威运动，散过一次传单；他们不但自己不去做这些革命工作，并且还极力向广东、上海、北京正在革命战线上拼命的左派加以不断的攻击，袖着手不革命的，还算是右派的好分子。

右派所谓“真正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的信徒”，也只是一块骗人的招牌，他们并不曾想过如何才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他们极力排斥国外最反对帝国主义的苏俄，极力排斥国内最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党，极力排斥反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人农民之阶级争斗，试问他们还有什么方法实行民族主义？他们轻视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之阶级的利益，试问他们所要实行的是什么一种民权主义？他们反对阶级争斗，试问在资产阶级争斗之下，有何方法可得保证农工平民之民权？倘若不让工农阶级由阶级争斗而形成他们的势力，足以挟制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节制资本与大产业国有，足以挟制地主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平均地权，试问国民革命政府另有何种力量可以实行民生主义？不实行的三民主义，岂不是骗人的招牌？左派知道三民主义不是一个宗教，单单信仰主义是不够的，单单信仰主义，只是一个主义者，一个信徒，不是革命家；左派知道单单宣传三民主义，而不能指陈其实行政策，也便是胡适之所讥诮的“名词运动”；左派为了要实行三民主义，

便不得不采用“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不反对阶级争斗”这些实际需要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中现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在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

左派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信仰三民主义，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其右派。

根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七期刊印。

注　释

〔1〕指孙中山、黄兴。
〔2〕指孙中山、陈炯明。

PDG

共青团中央告孤军社醒狮社诸君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我们自信都是为被压迫的中国人的利益奋斗的。虽然我们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彼此不能相互谅解，然而我们都是一样希望中国早日达到独立自由的地位，早日组织人民的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刻无条件的收回海关主权，撤销租界、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等。所以我们相信，若是我们的实际行动与表面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在许多时候与地方，还是可以有一致的动作。

现在，北方奉系军阀的内变，这不仅是军阀间势力之转移，自“五卅”以来，全国民众反对奉系军阀媚外卖国压迫爱国运动的空气，实在影响政治与军事方面不小。在这种时局大变化的中间，提高了全国民众对于政治的兴趣；而军阀势力之崩坏与动摇，又恰使民众势力有发展的可能。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中国脱离列强及军阀压迫宰制，组织人民政府的千载一时的机会。我们知道反奉势力虽然打倒了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但他们本身仍旧很富于与各种恶势力妥协的原素，我们应当在这个时候，唤起民众，监督挟持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又腐败堕落下来。中国屡次政治的变化，无论是直皖战争，奉直战争，以及去年的北京政变，军阀间的胜败，无一不是因为受了民众势力

的影响；但每次都因为民众藐视自己的力量，不肯自己起来干预政治，而且每每将自己应负的责任完全期望战胜的军阀代为担负，结果使战胜的军阀又逐渐凝固成为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使军阀的嬗递代兴，成为永远循环的现象。现在，我们不应当再失了这一次的机会！在现在情况之下，军阀势力虽然还未根本铲除，可是因为民众已渐渐觉悟起来，他们已经不能不顾虑民众的意思，以决定他们的行动。我们在这一次应当更进一步把民众在政治上的权威树立起来，防止奉系军阀失败以后，又产生出别的反动势力，使中国永远不能达到独立自由的地位。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决不可以把一切政治的变化，又视为只是军阀间私人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应当只是拘泥执着，只知道做平常的宣传教育工作，让这一次机会又错过去。我们应当在全国各地有广大的群众集会与示威，应当有极普遍而有力的宣传煽动，使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都一致的起来，督促全国各种反奉势力，立刻与人民团结组织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府，驱逐盗窃政权的段祺瑞及其走狗安福系政客官僚，解散欺骗分赃的特别关税会议，召集代表全国民众的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回复到一个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我们相信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近两年的群众运动，已经在政治上发生了不少的影响：北京政府的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虽然因为民众力量尚未十分雄厚，他们处处表示出很浓厚的妥协倾向。然而在列强及军阀久已自由宰割蹂躏的中国还能够这样，无一不是因为受了群众运动的刺激与鼓动的功效。我们不是空谈爱国便能拔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我们必须拿群众的力量，继续不断的督促引进各种比较接近人民的武装势力，而且与他们中间妥协反动的倾向奋斗，

才能一天天使民众在政治上的权威树立起来。

在这个时候，每个中国人民都应当努力，尤其是高唱“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你们，尤其是高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我们。现在不应当有一分钟一秒钟的犹豫，我们大家应当为中国民族的利益，立刻捉住这个机会，用全国人民的力量，逼迫今天各种反奉势力，使他们没有妥协回旋的余地；他们若不服从人民的公意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他们便会与奉系军阀一样，为人民的势力所打倒。

起来！我们希望你们放开眼光，捐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的意见，与我们协力一致的参加这个人人应当赞同的民众运动。我们愿意与你们共同负起救中国的大责任，我们愿意与你们共同准备与一切压迫破坏这个民众运动的反动势力奋斗。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在实际行动中间将你们素所高叫的救国主义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十二月四号

根据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〇七期刊印。

PDG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毛　泽　东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1]，肃清郑、莫[2]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讳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

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

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杨希闵、刘震寰。

〔2〕指郑润琦、莫雄。

PDG

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

——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各级同学们：

民校[1]的新右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谢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在北京西山开会，其所议决之开除共派中央及候补委员党籍及惩戒汪精卫二案，最为荒谬，望各地民校党部一致发电痛驳。其理由：（一）根据广州中央感电，西山会议当然根本无效；（二）除公然叛党外，中央委员会不能开除中央委员，因为中央委员是全国大会所举；（三）共派跨党，是第一次全国大会所许，孙总理所许。反动派冯自由，当时在大会会场曾有“奉旨跨党”之讥，此时开除共派党籍，是明白违背大会及孙总理；（四）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并未声明理由，停止汪精卫在政府机关服务，更是显然破坏国民政府，为被惩办的反动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熊克武等复仇。各地民校党部所有拥护广州中央及反对北京西山会议之文电，均望设法寄一份至本校中局，寄一份至上海沈雁冰同学转交中国国民周刊发表。

钟　英[2]　白

一九二五、十二、九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释

〔1〕指国民党。

〔2〕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陈 独 秀

一个党内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较之词，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一个党里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则以前的左派会比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脱离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倾分子，也会形成新的右派。

中国国民党早已有过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历史，我们已常常说过自去年正月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中山先生死后，党内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正式另立组织：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前者投降段[1]政府，谋在北方发展势力；后者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谋在西南发展势力；这两个俱乐部对于段政府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国民政府，则是一致的。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因为一个党中的左右派，虽然有政策的左右倾及行动缓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国民党，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离开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前的右派既

然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来破坏国民政府，已明明不但离开而是背叛了国民革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国民党，还算得什么国民党右派呢？右派毕竟还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之国民党啊！

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那国民党中有没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在具体事实所表现的就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极力和反动的总商会结合起来，反对工人及学生，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国民党党员，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党，并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反对国民政府。一个党，总不免有比较右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可是现在国民革命的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这都凡是忠于中国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们加以不客气的警告。这一新右派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他们虽然竭力自别于代表官僚买办的反动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实他们当中仍然包含着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如谢持、居正、周颂西、孙镜亚）等。

季陶[2]先生对我说：他们并不反对阶级争斗，只是在国民党的立场不便鼓吹阶级争斗；然而事实上近几天的《民国日报》上反对阶级争斗之论调都非常之高。

他们暂为顾全中山先生遗嘱计，尚未公然反对苏俄，然而他们在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上，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以维持苏俄”；又说“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所谓任何属性，不用说所谓“赤色帝国主义”也包含在内。

他们反对共产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说共产党只要民族主义，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唾弃而且加以攻击。其实共产党不但努力民权运动（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之要求），并且他的民生运动（工农解放）比任何党派的政纲都彻底。他们说共产党是反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实不幸此时各处国民革命的工作几乎是共产派在包办。他们说共产党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其实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各种机关报各种印刷品，宣传他们的主义与政策，从来不会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在事实上又何能够在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都不会作此惊人之谈，他们口里虽说不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其实他们公然著书通电（例如最近广东孙文主义学会的通电及孙镜亚告国民党同志书等），捏造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无稽之谈，诬蔑得共产党人简直阴贼险狠不成人境。最近为广大问题，不但说共产党早已开除的陈公博是共产党人，并且硬指顾梦渔[3]先生也是共产党人，借以证明共产党夺取广大的阴谋。他们口中虽说承认共产党和他们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党（孙镜亚都说是：“貌为同舟，实类敌国”呵!），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其实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无论民族运动民权运动民生运动，他们都表示不和共产党合作，并且他们自己也不独作。他们虽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会，他们竟不肯参加，在北京的反段国民大会，他们虽然参加了，而他们的首领邹鲁，都硬逼鹿钟麟下令

压迫国民大会，说这次国民大会是赤化运动。

自讨伐杨刘[4]以来，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致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仿佛汪精卫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见他们致各级党部电，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国日报》论文，孙镜亚致汪精卫书等）。他们不但这样攻击汪精卫，并且在西山开会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不许他任国民政府职务，他们这样的举动，简直是有意动摇国民政府，为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桢、熊克武等复仇。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对共产派，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

他们说共产党惯以反革命反动等罪名加诸异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实，他们应自问和冯自由、邓家彦、马素相去几何？即客气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说是反动的倾向罢！

他们这反动倾向的根本，是不识中国的国民革命乃整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们口中虽然不赞成国家主义，其实他们的根本思想和国家主义者一样，同是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因此，他们遂至对外反对苏俄，对内反对阶级争斗，反对主张阶级争斗的共产党；因为左派联合苏俄及共产党，他们遂至反对左派；因为国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们遂致反对国民政府；他们的反封倾向就是这样相因而至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至于反动派，则在于联合战线外了，因为他们

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站在敌人那边了。此时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也非常严重，这倾向若继续发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毕竟是一家眷属，则所谓“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

根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九期刊印。

注　释

〔1〕指段祺瑞。

〔2〕即戴季陶。

〔3〕即顾孟余。

〔4〕指杨希闵、刘震寰。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兵士、小商人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一向做日本帝国主义工具的奉张及安福政府，现在已经公然跪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援了！一向替奉张、安福保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也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1]军了！

公开出发的日军已有二千五百人，继续出发的尚不知有多少，同时在奉天的日军已占领省城兵工厂及子药库。日本政府宣称，据朴资茅斯条约，日本有权在南满驻兵一万五千。南满洲明明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者有何权利可以派兵干涉中国内战？有何权利可以占领中国兵工厂？他和前俄所订条约现在如何能责中国遵守？

张作霖兵败早应出亡，他现在仍留奉天不走，已经不是为自己作战，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日本出兵奉天，也已经不是利用张作霖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而是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了。

五卅事件本起源于日厂惨杀中国工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九期。

五卅运动中提出“撇开日本单独对英”的口号，本来非常错误。后来五卅运动的形式，一变而为反奉，反奉的意义，乃是要除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用的有力工具。反奉运动一发展到郭军倒戈，奉张势力完全崩溃，一切帝国主义者之中，仍旧是和奉张有最深关系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法维持中立假面，悍然亲自出马，直接用武力来压服中国反奉运动。

是中国人民反奉运动胜利呢，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援奉运动胜利，这是中国全民族目前的一个生死问题。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此次由反奉而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

叙利亚人及里孚人，均以百数十万的小民族，血战法兰西及西班牙帝国主义而不屈，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人，竟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者?!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其速起：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满洲干涉中国内战!

督促全国反奉军队速灭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的势力，并驱逐日本在满洲所有武力!!

推倒亲日卖国的段祺瑞政府!!!

中 国 共 产 党 中 央 执 行 委 员 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郭松龄。

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恽　代　英

这个题目是不容易讲的，现在不过就我自信的意见，分别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的异同，供大家作一研究的参考材料罢了！

一、中山主义是甚么？

中山主义重要的当然是三民主义，然而不仅是三民主义。现在所说的是从孙先生一生的言行中，归纳出几点，拿这几点代表中山主义，比仅说三民主义似乎还赅括些。孙先生一生的思想行为有两句话可以赅括的：

（一）绝对平等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的确是希望世界上绝对平等的，我可以拿绝对平等的思想来解说三民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A）民族主义，简单的说是要使中国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平等，不受别的民族的压迫。但是在孙先生的民族主义里，亦没有要中国民族将来压迫别人的意思。虽然孙先生曾在留声机片里说什么“千邦进贡，万国来朝”的话，以及在《民族主义》中有些以汉族为主的思想，可是要汉族驾凌别的民

* 本文原载上海大学中山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中山主义》周刊第二期。

PDG

族，压迫别的民族的思想是没有的。《民族主义》中曾经提到“这回我们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旧用帝国主义。他们代表到了之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见《民族主义》第二讲三三页）这很明显的可见孙先生是不主张以帝国主义待国内的弱小民族的。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上更明显的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革命获得胜利以后，与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先生绝对不是说，对外则应该平等，对内就不要平等，是要完全平等的！(B) 民权主义，是要使人民在政治上平等，甚么人在政治上都平等。政治是全体人民的，是不许资产阶级垄断私有的。孙先生的民权主义要采取直接民权，他要人民可以有直接选举、创罢官制与复决等权，要政治不被资产阶级一阶级拿去，要人人平等。(C) 民生主义，是要使人民在经济上平等。他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使地主、资本家自由的发展，以至于做到消灭阶级，成功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经济上地位高的人，也没有给别人剥削的人。三民主义完全是要平等。平等也就是孙先生所谓王道，孙先生曾说，俄国所行的王道公理，帝国主义者所行的是霸道。所谓王道公理是要平等，要没有一个民族压迫别个民族，要没有一个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压迫别一个人。在《民权主义》演讲里，孙先生曾大发挥平等的理论，充分表现反对任何人压迫任何人的思想。

（二）革命的精神　孙先生的革命精神是很容易的看出。(A) 他勇于为主义而造党，不顾一切。孙先生要一个党——

一个为他的主义而奋斗的党来救中国。但是孙先生造一个党是十分费力的，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他的党始终没有造好，他的主义被人漠视，他外面受种种的压迫，种种的谣言，种种的危险，党内又散漫而没有团结，虽说有几十万党员，但是不信主义，不守纪律，真正的主义者还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而他无论怎样，还是设法要达到他的理想，实行他的理想。所以他勇于淘汰不明主义的党员。民国二年改组中国国民党，在前去两年又把党改组了两次，都是因为他的党员不明了他的主义的原故。他很勇敢的当面骂那些不明了主义的党员。有一次演说，骂他的党员为升官发财而跟他的，不是为要实行主义而跟的。他又在许多反动军阀包围之中，办黄埔军官学校，他在校演说："你们是革命的军人，和别的军队是不同的。"这时候他丝毫不怕刘震寰、杨希闵等听了要叛变。去年改组的时候，他决定要老党员接受宣言重新登记，他把一切老党员反对的意见置之不问。这样的勇敢是难得的。但可惜因党内旧同志不免妥协，所以改来改去终没有把党改好。他亦是勇于和反对党义的黑暗势力奋斗的。他排满、反袁等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排满一事大家知道是孙中山先生做首领。反袁呢，孙先生在宋教仁被刺时就首先主张的。孙先生对于妨害实现他的主义的人是要打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呢，孙先生确是仁慈。一个人肯改悔，他总可以宽容他。但是妨碍主义，他就要打，不怕任何危险的。再则他亦勇于联合符合于党义的友邦和友军。如苏俄和共产党，现在都有些人怕，在一两年前更是大家所怕的，但孙先生见到要中国革命非与他们联合不可，便主张要他们联合。他明知这样下去要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明知要给别人造谣言。但是他不管这些！孙先生在陈炯明打他以前就想联俄的。那时便派廖仲恺先生出国进行中、俄、德联盟。他只要以为应

当做的便做，他不怕联俄容纳共产党，反而还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统是表现他的革命精神，不是别人所能及到的。(B) 反对与违反主义者妥协。孙先生是不赞成和反动势力妥协的，他反对袁世凯，反对一切军阀官僚。虽然别人说他和陆荣廷、杨希闵以及段祺瑞、张作霖等有时有些妥协意味，不过他的意思实在是想利用机会，扩张人民势力。如去年他北上提倡国民会议去和军阀奋斗一样，他并没有与军阀妥协的意思。我们尽管听见什么孙、段、张三个联合等话，但是段、张决不要孙到北京当执政！便是因为他到军阀队伍中去是为要用人民的力量去和军阀奋斗。所以军阀决不放心与他一同做事。不过可惜以前人民太不觉悟，不知拥护着他以与军阀抗斗，只让他一个人孤军深入，所以不免失败了。但这两层，(A) 为主义而造党不顾一切的奋斗，(B) 反对与违反主义者妥协，都是孙先生革命精神的表现。

孙先生的主义，可包括在“绝对的平等的思想”与“革命的精神”之中。但有平等的思想一定要有革命的精神，不然那平等的思想会变成空想。孙先生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去达到三民主义的。虽然他是仁慈大量，同时他又很富于革命精神，并且他勇于为主义而奋斗。

二、中山主义的背景

孙先生何以有这样的主义呢？孙先生的为人，思想是很高尚的（平等思想是孔子及释氏的最高思想），感情是很浓厚的（他确乎很爱人，时常喜写“博爱”、“天下为公”等句子）。但是孙先生不仅仅如此，若仅是思想高尚、感情浓厚，那他更变成了孔子或者释迦，变了一个教主，而不是一个革命领袖了。

他同时是富于革命的进取的态度的人。他是用主义用各种方法为人类奋斗，他的方法是由于他自己时时刻刻接受世界上最新的潮流而制定的。我们可以说他的学识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学识的集合。他是革命的，进取的，他是不怕一切困难，不丝毫犹豫疑虑，他用革命手段来达到他的理想的。他用各种最进步的方法来实现他的平等的理想。这些方法无论是普通的人所不懂或害怕的，他都是一样可以采用。因此我们看孙先生应从两方面看：一是他的革命进取的精神，一是他的仁爱平等的思想。只从一方面看，是不会能了解孙先生真正的人格与思想的。

孙先生生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所以他实在是有些封建社会的思想。他不忘东方道德，他叫人注意东方道德，他讲王道、讲公理，这都是东方人的思想。孙先生在封建社会学说教义之中，把其中最好的部分便是仁爱、平等的理想接收了，我们说孙先生恭维东方文化，这是不错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孙先生绝对不是和那些腐儒一样。他是要将封建社会中仁爱、平等的空谈，用近代的各种方法实现出来。孙先生东方思想是有的，但不仅是东方思想。他在三十岁左右，便受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当他到欧美的时候，正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时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时候。所以孙先生赞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时他反对资产阶级的垄断把持政权。他接受了直接民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学说。在那时，确是很进步的了。孙先生在晚年又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便是列宁主义的影响，相信世界革命势力的联合，工人和小农的联合，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所以主张联俄及容纳共产党。孙先生一生都能在各种环境里，接受各种进步的思想。所以他有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各种思想。他主张用欧美民主革命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来实现他

的中国的（自然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仁爱平等的理想。孙先生的思想不完全同于马克思或列宁，因为他有他的复杂背景。所以他的思想是不能完全合于根据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共产党的。不过他虽不说无产阶级革命，他却是要消灭阶级。他要世界上没有资本家压迫工人，没有地主压迫农民，换句话说，他仍旧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说孙先生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有许多人——尤其是不信共产主义的人，一定很怀疑的，但这只由于他们不懂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所以孙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孙先生的学说虽然不能纯粹的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但是一样要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过孙先生对于资产阶级不一定认他是革命的仇敌，孙先生以为只要他不妨碍三民主义的实现，就不是仇人。这点是和马克斯主义者似乎不同的。马克斯主义者从经济的观点上认定资本家、地主一定是剥削工农，所以他一定反对消灭阶级的各种企图，因而肯定他一定是工人的仇敌。然而这与孙先生的话是不冲突的么？孙先生以为在不妨碍三民主义实现之时，他不是仇敌，在妨碍时才是仇敌。马克斯主义者说他一定妨害消灭阶级的企图，那便是说他一定要妨害三民主义实现的。若使马克斯主义者的话证明是对的，那么孙先生也会当资产阶级是仇人。这中间有甚么冲突可言呢？

孙先生到临死时，他的学说大概是这样，假设孙先生不死或者迟五年十年以后才死，他的学说是不是还有重要进步的地方，我们不敢断言；但是总有若干变动的余地，这是可以断言的。他是时时接受各种进步思想的。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不会便止于现在所成就的。但是就以孙先生现在的学说而论，我们仍可以说是引导各阶级联合进行革命运动的很合宜的工作。现在我们不问资产阶级是否一定要反动的，我们应该联

合他们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以资产阶级只要在不压迫农工的时候，在国民革命的运动上总是友军。这一点，共产党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有人说共产党不要联络资产阶级来实行国民革命，然而过去的事实证明最努力联合资产阶级的，还是共产党。不过共产党是认定了资产阶级是反动的，国民党则在平日不把他们看做仇人，只要在反对或妨碍三民主义实现的时候方才当他们是仇人；所以国民党比较容易号召他们。孙先生的学说一面是便于去联络各阶级以实行国民革命的；一面又因为不许资产阶级妨害三民主义的实现，所以又是不妨碍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这里国家主义就万万不能和三民主义相比拟，因为他们要把农工解放事业完全听之于资产阶级自由处置的。）列宁和孙先生可以并称：因为列宁以为工农应该联合，而且以为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被压迫民族；孙先生以为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平等，所以要联络世界无产阶级。这两个要求互相联合的思想，就是促进革命成功。若世界上各国都有列宁和孙先生，世界革命就很容易成功了。中山主义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但是他一方面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来革命，一方面若是在中国国内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他依旧不妨碍无产阶级的革命。

我并不说孙先生是一个神圣，一个菩萨。他一生也有吃亏的地方，所以他几十年革命不能成功。他吃亏的地方便是因为他太好了，太仁慈。他实在是大量、仁慈，无论什么人他都容易相信，所以有许多人把他当招牌用，去图谋自己的利益，而他自己上了人家的当。譬如他本来是反对临时约法的（主张军政、训政），后来被人利用着去闹了几年护法，便是一例。再则，他以前不很注意宣传，也是失败原因之一。他完全是一个东方伟人的模型。不过这些小事不足为他的大毛病，他仍旧不

失是一个革命领袖，因为他勇于改革，见到应做的，马上便做，见到应改的，马上便改。因为他能用革命手段改正他自己的错误，他要用革命手段达到他自己的理想，所以他不失为一个革命领袖。

三、戴季陶主义

要说戴季陶主义，亦须说到他的生活情形。他是一个爱读书而且读书很多的人，他无论什么书都读过一点，同时他是富于情感的。但是他缺少革命进取的精神，他胆小懦弱，有了一点纠纷麻烦，他便跑回湖州去。他很容易受刺激，他一时热心，过一下便灰了心，在他热心的时候，听得几句冷言冷语，他又灰心跑回去了。他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里，把右派的糊涂说得很明白，但是他没有和左派奋斗的决心，把右派赶出去。他说在民国二三年他就想叫国民党起来提倡白话文，若国民党听了他的话，哪里有陈独秀、胡适之出风头的机会？但是他却不能在民国三年的时候像胡适之、陈独秀努力的一样促他的主张实现。我们恭维他一点，可以说他是一个道理很明白的人，然而因为胆子小了，有时感情作用太强，所以便有些道理也有不能很明白的时候。他对孙先生很佩服的，而且他很想做孙先生学说的传布者，可是他有许多地方因为胆子小了，所以便不能彻底明了孙先生的主义。中山主义有两面：（一）是平等的思想；（二）是革命的精神。戴季陶先生因为革命的精神差一些，所以连平等的思想也不能看得完全正确了。他的坏处，他的受人反对完全在此。丢了革命的精神，平等的思想，就是空想；所以我们不能不反对他。戴先生的学说，本来大半是本于孙先生的，不过有四点可以说是他独创：

第一点是限制党员以最高原则。所谓最高原则，就不许别人再比孙先生进一步。他的意思：退一步固然不可，进一步也是不能够。这种办法，把孙先生的书看成了宗教经典；就是孙先生活着他自己也不会这样呆滞限定自己不许前进。假若孙先生书上所没有的话就不能做，这不是从前定孔子为一尊一样的么？我们亦可以说最高原则是承认的，但是所谓最高原则只能指孙先生的平等思想、革命精神，不能很具体的列举出来。孙先生没有叫人划定了一个地方不许再前进。而且我们因为孙中山先生的话是救中国的，我们要救中国，所以信孙先生主义，我们不是信宗教。所以像戴先生这样要限制党员以最高原则的办法是不好的，这是违反孙先生的进取精神。

第二点是专发挥仁慈感化之说。孙先生虽有时也说几句仁爱的话，但是不像戴先生那样专门发挥仁爱感化之说。他这样的做，是抛了革命精神而把孙先生弄成菩萨一样。人家问戴先生："若地主资本家不受感化，不讲仁爱，则怎样呢？"他便被人家问倒。因为他不预备用革命手段打倒那个压迫人的阶级，所以若是有一阶级压迫别一阶级，他就没有办法了。国民党若只知发挥仁爱感化的话而反对罢工及农民的减租暴动，将失却农工的同情。这是与革命的意义完全悖谬的。

第三点是借人口问题为侵略主义的基础。他以为世界上经济问题解决了，还不能算安稳，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他说马克思不对，只有孙先生的主义可以解决人口问题。但是孙先生虽说了许多人口发展不发展的话，没有一句提到人口问题的方法。戴季陶却说帝国主义的发达，是由于人口问题不能解决，而不是由于经济问题不能解决。他这种理论，就太可笑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很少是为的人口问题，试看外国人在中国的很少，然而他们要陷中国于次殖民地；这不明明可以

知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由于经济问题而不是由于人口问题么？他既认帝国主义的产生一半是由于人口问题，而他所谓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却是要使中国人的血统普及世界，这不是解决人口问题，只是要中国将来强盛之时借这句蕃殖人口的话而变成帝国主义。他只说怎样发达中国的人口，他没有说怎样解决人口问题，使中国不成功一个帝国主义。这明明是给中国将来侵略压迫其他民族的一个借口。这借人口问题而为帝国主义的起点是违反民族平等道理的，所以亦就是不仁的。

第四点是不愿与中国及世界的共产党及苏俄联合。他虽然因为政策的关系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联俄，但是他对于中外的共产党都是有些怕的。在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上，实在看不出是为什么要怕共产党的理由。他一面说共产党是高尚勇敢的，一面又说共产党弄坏了国民党，挑拨党里的恶感。试问商团事件及刘杨事件是不是共产党挑出来的呢？广州哪一件事是共产党弄坏或挑拨出来的呢？就令他书上所举的例，有二三个例是真实的，国民党内共产党有少数人做了不对的事，是不是非共产党便没有这一类的事情呢？孙先生曾说，个人的不好，不好便说这共产党的不好的，我们应该看在革命运动中应该不应该联合共产党，不能说共产党中某一个人不好就不去联合他。他以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使国民党内部常常的闹，假如去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冯自由、马素及同志俱乐部的人物都在党里，这样好不好呢？假令今天共产派退了出去，邹鲁和汪精卫先生是不是便不大闹了呢？共产党出去了，国民党太平了，但是若因为太平又还了从前的原形，那都是大失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本意了。右派糊涂，戴先生早便应当将他们闹出去，自己不闹，要等到共产党员来闹，已经很不应该了；现在反怪共产党员闹得不好，难道一定要叫汪精卫、戴

季陶诸先生和冯自由、邹鲁等反革命党永远和和气气过几十年才好么？全国的青年希望国民党成功一个革命的党，广州成功革命的中心，但国民党自己怕改良，说右派糊涂自己亦不去打，别人去打了，倒说打的人应该出去，有这样的道理么？共产党加入了，每一件事他们都上前，结果国民党信用大大的进步，然而国民党的人偏要将一切好事归给共产党，反因为这样不愿与共产党合作。这是违反孙先生政策的，而且亦是不勇。

这四点都是戴先生所独创的，他何以会有这样四点呢？完全因为他的胆小，怕奋斗，心里虽明白，而怕去干，因之他常在消极的方面说话。而且总要避免革命。为了这样，他这四点所以差不多完全是反革命的。

四、戴季陶主义的必然结果

戴季陶主义的结果，第一是使中山主义改良化宗教化。他常说平等、王道、公理及消灭阶级，然而没有革命精神，这一切都是徒托空言，永远不会成功的。孔子感化别人，到现在二三千年，还没有成效；戴先生怕革命，把孙先生比做孔子，所以亦便把孙先生平等思想化为空想，同孔子的学说一样了。而且戴先生学说的弊病还会使中山主义完全被反动派利用。反动派有时可以引用他几句话来抵制革命的人。现在所谓戴季陶派，讲反共产以及一切反革命的话，都欺骗人家说是根据戴先生的意思，他们亦说几句好的话，然这不过是一种敷衍手段而已。反动派这样利用他，他也没有勇气出来否认，因此他只有两条路：（一）是因感情作用投入反动派；（二）是不问不闻的躲回湖州去。现在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他先为了怄气不管合法与否和他们（反动派）去开西山会议，后来一看事情不对就跑

回湖州去了。但他对北京一切的事情，终究不敢表示意见。他的话一定还有很多时间给反动派所利用，而妨碍革命！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结论：

没有平等思想的，不配称中山主义的信徒；所以一切资本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走开！

没有革命精神的，不配称中山主义的信徒；所以一切戴季陶主义者走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恽代英文集》下卷刊印。

PDG

土地与农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李　大　钊

一　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迄今，不断的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关于井田制度，虽尚有人抱是否曾经实行的怀疑，然自周秦以来，为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则确为事实；而原始经济的状态，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亦确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井田制的根本要旨，乃在收天下土地为公有，而均分之于各家，使他们收益使用，是一种比较完满的土地国有，平均的授与农民耕种使用的制度。中国古代，似亦经过此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时，土地私有制才渐次确定。

汉时，土地兼并的风潮盛，贫富日趋悬绝，故武帝时，有一种行限田制的建议，而迄未能实行。至王莽时，依据《周礼》名天下的田地为王田，作为公有，而禁止买卖，规定一家占有额不得过一井九百亩，有余田者，分与九族乡党，犯法者处死刑。不久反动起，故当时的土地问题，终于未能解决。

---

* 本文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七期上连载。

晋代的占地制度，乃在应人民的男女年龄，课以一定额的土地，使他们耕作。无主的土地，亦使人们工作，同时且限制王公官吏的占有额，此其目的，乃在增加税源，故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后魏孝文帝容纳李安世的建议，设均田法，要把天下的田地，均分给人民。均田法的大要，是把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二类。民达十五岁，男子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给露田二十亩，奴婢准于良丁牛，给露田三十亩。露田，即种谷的田。民年及七十，或身死，则归还于官府。桑田，是种桑榆的田，身死不必归还于官，许为其家的世业。土地的还受，在每年正月调查人时举行。此等土地政策，皆因大乱以后，人民离散，土地荒芜，豪强跋扈，税制紊乱，乃谋所以安插游民，奖励稼穑，以荒闲的土地给与贫民，以图增加税源的方策，而非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

唐武德七年，立租庸调税法。依此法则，男子达十八岁，每人给田百亩，其中以八十亩为口分田，以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以迄老死，给口分田的一半，即四十亩；笃疾废疾者，给四十亩。女子在原则上不给土地；但寡妻妾，给三十亩。其为一户者，更增给二十亩；皆以其中的二十亩为永业田，余为口分田，奴婢与牛不给田，口分田同于露田，种谷，永业田同于桑田，植桑、榆、枣等树。田地的授受在每岁十月农闲的时候举行，是为班田法。班田法又谓集晋以来田制的大成，但其目的，并不在没收富者的田地以给贫民，而在整理租税，故许民迁徙，所分田均得买卖。而其给予亲王郡王以下的永业田，乃至百顷六十顷五十顷之多，形成一种阶级制度，故农民仍多失产流亡者。豪强乘之，乃行兼并，至安禄山乱，班田制遂废。此种土地阶级制

的根萌，后来流衍而为庄田制，形成一种封建的大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兼并贫民土地；既夺其土地，复以重大负担，加于贫民。

宋代谋行限田制，以图稍加制止而终未著效果。金元崛起，挟侵入民族的威力，夺田甚多，致启民族的重大的恶感。明代庄田滥设，引起豪强兼并土地的事实。至武宗时，皇庄达三百余处，勋戚庄田，尚不在此数，一庄有达二万顷者。富农多献地于王公，借庄田之名，以避赋役。管庄官及庄头，假威以雪民。清代因之，除将一部还于故主外，悉以之分给于满蒙汉军各八旗兵，更用跑马行圈的方法，圈地甚多，是皆谓之旗地。雍正年间，又于京兆固安县行八旗井田制，将官有地均分给八旗贫民。此不过为一部分征服民族，立一种保障特权的土地制度，而非解决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太平运动兴，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观于首事诸人，多为烧山种田的农夫，农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即宣布一种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足以证明。此种土地政策，自然亦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归于消灭了。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

二　中国今日农民破产的趋势

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

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

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

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看第一、二、三表）。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据农商部第九、第十次农商统计，因有兵乱省份未报不能得有完全的统计比较。但就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十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由六年至九年间的统计比较以观，则知十亩未满及十亩以上、三十亩以下的户数，著见增加；三十亩以上、五十亩以下的户数，略见增加；而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则著见减少。由此现象，可以看出中农破产的趋势。盖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即其间有些破产而流为小农者，而小农户数的增加以此。由此趋势以推，则由小农完全丧失或弃去其土地，而或流于都市，投身于工厂，投身于人力车夫，或流为兵匪者，更不知凡几了。但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一方面是中农破产而为小农的验征，在另一方面，亦为豪强兼并土地集中的意义。因为百亩以上者，可以自含至千亩、万亩乃至百万亩，而此百亩以上的各级户数在统计上并未分别等差为之表出，此其中必有连阡连陌新兴的大地主阶级，吸收多数中农而集中其土地者等户数不必加多，而土地之量可以增至甚巨，此不可不注意者（看第四、甲乙二表）。且此统计完全的十省区，尚为秩序未大破坏的省份，其趋势犹且如此，其他西南各省，兵战连年的地方，农民困苦流离，其度更不知倍益几许啊！我们再把九、十

两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起身的农家户数及农田亩数统计表比较以观，可以看出十年的自耕农、佃农，以及自耕农兼佃农户数，并自耕田、租种田亩数，逐渐减少，此殆由于十年以来，内战区域已扩至北方各省，故北方农民亦骤受与南方农民同样的影响，由此更可证明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看第二、三表）。

附 统计表[1]

一、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中国全国农家户数表：

农户总数	自耕户数	佃农户数	自种兼佃
43,935,478	23,381,200	11,307,432	9,246,843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甚差极微。此统计表不包涵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二、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家户数统计比较表：

	农户总数	自耕户数	佃农户数	自种兼佃
九年	43,966,632	25,178,773	10,514,915	8,272,944
十年	16,887,751	3,050,603	4,538,798	3,298,350

因九年、十年农商部统计只此六省可以完全比较，故只就此六省区统计比较而概观其倾向。

三、民国九年、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田亩数统计比较表：

	农田总数	自耕田数	租种田亩
九年	138,639,358	929,255,093	457,124,265
十年	566,625,293	380,256,864	186,368,429

园圃亩数不在此内，兼涵水旱两种田地。

四、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各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累年比较表：

	十亩未满	十亩以上	三十亩以上	五十亩以上	百亩以上	计
六年	10,014,232	2,507,719	4,978,728	3,052,774	1,855,960	22,409,413
七年	9,829,771	7,088,663	4,506,783	2,770,266	1,514,617	25,710,100
八年	10,689,877	7,610,145	4,673,203	2,997,940	1,375,054	27,346,219
九年	10,387,275	7,758,652	4,716,276	2,951,564	1,402,048	27,215,815

三　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自耕农与佃农

在小农中，以自耕农为最多，据金陵大学《农业丛刊》第八号芜湖一百零二农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按农场面积而分组如次表：

农场面积分组	十亩以下	十一亩以上	二十一亩以上	三十一亩以上	总数或平均
各组在全数中所占之百分率	13.7%	50.0%	16.7%	19.6%	100%
农场数目	14.0	51.0	17.0	20.0	102
平均面积	7.9	15.9	25.1	59.8	24.9

（佃户十三家）（农场甚小）

据上表则知此一百零二家中以十一亩以上者为最多的户数，几占户数的一半。又据某机关在河南荥阳等县的调查，八个农村中的农民，亦以小自耕农占多数（看第五表）。由芜湖百零二农家生活调查，可以看出农场大小与场主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有十亩或十亩以下之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仅居百分之七；而那些有三十一亩以上的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竟占百分之五十。就田产权方面说，田主的农场平均每家二十亩，半田主平均每家三十八亩，佃户的农场平均每家十五亩，此三者中以半田主一类的农民为最有利。盖因他们除自有的田地以外，尚租种他人的田地，故其农场面积较其他二类农人为大。而其工作进款的数目，在此三类农人中，居于最高。平均为每人一百五十六元，故其生活状况亦较自耕农佃户为享乐，其原因则由于农场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联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其率如下：

大农场男工的效率，等于小农场男工效率的二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中，每人仅能做五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中，则每人能做十亩。大农场畜工的效率，几等于小农场者的三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每畜仅做十点六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则每畜可做二十八点八亩，其他农具设备之用于大农场者，其效率等于用于小农场者的二倍，准此则知此组农民之需要土地，需要较大的农场，为最迫切，因为农具设备效率增大的结果，可以增大场主的利益，可以稍舒此级农民的痛苦（看第六表）。

五、河南荥阳五村、密县二村、汲县一村农民生活要项调查表：

所在地		河南荥阳 周沟村	河南荥阳 王庄	河南荥阳 鹿村	河南荥阳 水磨村
户数		35	20	110	200（又一调查为 250 户）
亩地		600 亩（大略）	250 亩	1,600 亩	2,000 亩
人口		150 男：80 女：70 壮丁：50	170 男：90 女：80 壮丁：40	800 壮丁：200	800 男：450 女：350 壮丁：200
农民种类	富农	150 亩（一户）	100 亩（一户） 家口二十人	100 亩以上 （一户）	100 亩以上 （四户或云五户）
	中农	70 亩以上 （三户） 50 亩以上 （二户）	50 亩以上 （二户） 20 亩以下 （五户）	50 亩以上 （五户）	70 亩以上 （十二户） 50 亩以上 （八户）
	小自耕农	10 亩以上 （十户）	20 亩以上 （四户）	50 亩以下 （六十户左右）	10 亩以上 百余户
	佃农	二户其租地十亩，无地者二户	四户 无地者五户	三十余户， 无地者十余户	佃农四户，无地者二十五户，雇工三十人
税额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八百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约六百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本年二千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本年二千文
地主与佃户		佃户须向地主纳每亩夏二斗、秋二斗	每亩须纳一斗半，有减让	佃租每亩须纳二斗	与周沟村同
雇工工银	每日平均		约三百文		约四百文
	每年平均		约二十八串		平均工资二十串
	备考	河南每串核银三毛八分三			

续表

所在地		河南荥阳贾峪镇	河南密县柳沟村	河南密县赵庄	河南汲县塔岗村
户数		200	100	65	80
亩地		2,000 亩	1,300 亩	830 亩	700 亩
人口		1,600	500	330 男：161 女：169 壮丁：50	1,200
农民种类	富农	100 亩以上（四户）	上富百亩户数未详	无	占全人口十分之一（120）
	中农	70 亩以上（三户）50 亩以上（二户）	中富五、七十亩间户数未详	90 亩者二户，61 亩者一户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360）
	小自耕农	50 亩以下约百户以上	下富三、五十亩共八户	自耕农三十五户，亩数未详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360）
	佃农	佃农八户，雇工约五十人，租地百余亩	佃农三户，雇工六人，租地约十余亩	佃农十七户，约五百十余人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360）
税额		正税占全收获百分之三（每亩），杂税占百分十一，合计占百分之十四	纳税约需岁收百分之十二	正税每亩二百五十文，杂税今年每亩五千	每粮三亩纳税六百文，近则附加捐征大约每亩即出税一串四百文
地主与佃户		未详	未详	佃户每亩三斗，不减让。佃户多赔，不敢抗租，放债利息三分	村中土地多与佃户分种，秋收后地主与佃户各分一半
雇工工银	每日平均				三五百文或一串左右
	每年平均	七十串左右			七十串左右
	备考				

六、佃户、自耕农、自耕兼佃周年进款比较表：

（甲）农家周年现款收入的比较

半田主	267.15元
田主 (即自耕农)	120.05元
佃户	63.43元

（乙）农家自用农产品价值的比较

半田主	269.55元
田主	171.81元
佃户	125.19元

（丙）合农家现款收入及自用产品价值而成的农家周年进款

半田主	536.70元
田主	291.86元
佃户	188.62元

四　耕地农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怎样能耕地农有致之实行呢？每一农夫或含有一定人口的农户应有多少耕地？倒是一个极需讨论的问题。据前清乾、嘉、道、同诸朝的官家册簿，中国本部的耕地，大体以由七百四十万顷至八百万顷计，而欧人中推定中国耕地地积者有说是四十亿亩的，有说是二十四亿亩的。日本酒匂农学博士

曾推定中国本部的耕地地积是一亿四千万町步。此等推算皆不能认为精确足信。夫全国总耕地地积及人口总数并其分布既不得正确的统计，则欲知农耕地对全国版图总面积的比例，与对一农民耕地亩数的比例，无从推算而得有确准。一九一一年日人所出的《支那调查报告书》曾就长江沿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个比较明了之省份试为考核，其结果如次：江苏对农民一人的耕作亩数为三亩强，安徽为二亩余，江西及湖北为三亩欠，湖南亦为三亩强。长江流域地沃人众，此比率虽未见足为全中国的准则，然大体固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又从距今八九十年前清廷钦定的户部则例所载，十八省的耕作地积，分配于按民国十一年邮政总局所调查十八省的农民（按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计），每人平均只得耕地二亩四分四厘有奇。若分省计算，则除甘肃每人仅得耕地八分，贵州每人仅得耕地三分，福建每人仅得耕地四分外，余则由一亩至四亩不等（看第七第八表）。至于多少亩足供若干人口的农户生活，则又因地质的良否而异。兹就一九二三年十月至一九二四年三月间华洋义赈会调查概算起来，较沃的田地每五口之家需十五亩至二十亩始能生活，较劣者则需三十亩乃至四十亩。这样算来，平均每一人口所必需的耕地应为四亩至五亩。若以上述长江沿岸五个较为明了省份的调查为标准，则耕地实觉不足，而对每一农民的耕地为量亦不为多。可是现今的中国农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却有退步，实在有复振或改进的余地。如果水利稍加整理，则农民生活必较今宽裕数倍，而且沿边省份待垦的田地以及内地各省为豪强所兼并或为兵匪所蹂躏而荒芜废弃的土地尚多。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

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

五　农民的要求及我们怎样在农村工作

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入民国来，苛捐杂税，负担日重，各省田赋，有预征至数年后者。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凡有大地主地方的佃农，处境尤其苦痛而艰窘。有些地方的雇工工银极低，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活，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试一考河南之农民生活调查，及华洋义赈会在直隶、山东、安徽、江浙等省之调查，均可看出农民常有移徙，生活变动日益转下，遇有婚嫁，即须负债之不安现象。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

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例如直隶、热河等处的保卫团及民团运动，均甚普遍。虽是等地域，前曾在奉天军阀支配之下，民间枪械多为奉军所搜去，而是等事实愈足引起一般农民组织民团之兴趣与希望。奉系军阀崩溃以后，各处民团运动一时呈出极盛的现象。此外如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

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年来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陈、洪、杨、刘[2]之败灭，以及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助力不少。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成效。直、鲁一带农民自卫运动亦方在萌发中。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附　统计表[3]

七、中国本部十八省地亩及人口表

省名	地　　亩	人　　口
直隶	688,410 顷 64 亩	34,186,711
山西	532,845 顷 01	11,174,951
山东	984,729 顷 46	30,803,245
河南	718,208 顷 64	30,831,909
江苏	647,547 顷 27	33,786,064
安徽	340,786 顷 33	19,832,665
江西	462,187 顷 27	24,466,800
福建	128,626 顷 64	13,157,791
浙江	464,120 顷 26	22,043,300
湖北	594,439 顷 44	27,167,244

PDG

续表

省名	地　　亩	人　　口
湖南	313,042 顷 73	28,443,279
甘肃	335,366 顷 21	5,927,997
陕西	258,420 顷 12	9,465,558
四川	463,819 顷 39	49,782,810
广东	343,939 顷 09	37,167,701
广西	89,601 顷 79	12,258,335
云南	93,177 顷 09	9,839,180
贵州	26,854 顷 00	11,216,400
共计	7,486,121 顷 38 亩	421,551,940

全国农民数目（以全国人口十分之七计算）二亿九千五百零八万六千三百五十八人，每人平均能耕之田二亩五分五厘，此表共计本部十八省之数目。

八、各省对于每一农民耕作地积表（以农民占人口总额百分之七十计）

直隶　每人平均二亩八分有余

湖北　三亩一分……

山西　一亩四分六……

湖南　一亩五分七……

甘肃　八分……

山东　四亩五分……

陕西　三亩八分……

河南　三亩三分……

四川　一亩〇分四……

江苏　每人平均二亩七分……

广东　一亩三分……

PDG

安徽　二亩四分……

广西　一亩〇分八……

云南　一亩三分……

江西　二亩六分……

贵州　〇亩三分三……

福建　〇亩四分一……

浙江　三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下卷刊印。

注　释

〔1〕表一至表三数字有误。

〔2〕指陈炯明、洪兆麟、杨希闵、刘震寰。

〔3〕表七数字有误。

PDG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瞿　秋　白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这个题目，现在已为全国人们所注意，成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是学理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问题。有人说：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联合的，这是不是事实？现在我们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赞成阶级斗争与反对阶级斗争的两派？这就不单是学理的问题，而是实际斗争的问题了。

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个问题尤其很明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广东二三十万的工人、农民与帝国主义者利害冲突，国民政府领导他们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我们在商团事件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商团所要推翻的不仅是革命政府，不仅是孙中山先生，而是要推倒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所谓商团，就是中国买办阶级陈廉伯与英帝国主义者的香港政府互相勾结的一个攻打革命政府的工具。其次，我们从五卅运动以来，更可以很明显地看：当我们一般学生、工人在南京路上大流血以后，上海总商会不肯立即罢市，好容易磕头礼拜的哀求到罢市了，又不肯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到六国委员到上海的时候，又私自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修改了。

这几点都是明白给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中国的高等华

人，还很愿意受租界上领事的裁判，受武装海陆军的保护，更使帝国主义者大着胆子屠杀不止，横行无忌，甚至开空前未有之恶例——公然在上海开什么国际法庭。照以上的事实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联合各阶级去做国民革命，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从总商会宣布开市，一直到总工会被封以后，学生会为查货的事，不知同他们闹了好久。总商会所豢养的保卫团，天天在压迫工人运动，禁止工人的集会，这是不是国民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有人说国民革命中，是不应有阶级争斗的，那末我们便要问譬如前次闸北开市民反段大会，保卫团以马队冲散游行队伍，甚至开枪伤人；从前外国巡捕打死我们的工人、学生，我们就罢课、罢工、罢市反抗，现在保卫团来打我们了，难道我们可不反对，还要进一步说这是对的吗？

国民革命是什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什么，我们国民党有很鲜明的三个目标：

一、要把全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

二、要从横暴的军阀、官僚手里夺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

三、要使全国十分之八以上的农工群众得到生活的改良。

这三个目标，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得很明白，就是根据着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一、民族主义。我们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像国家主义封建时代落伍的幻想所可完成的，也不是像法兰西的革命只是第三阶级把他们的贵族僧侣赶跑就算了。

我们要知道现在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没有不受国际的影响，所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不期然而然的要反对世界上一切的资产阶

级。孙中山先生说："现在世界经济状况中所发生的战争不是人种间的战争，不是黄种人和白种人或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与强权的战争。"所以我们国民党虽然主张收回海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表面上看来是仅仅我们中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如果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胜利就是我们全国民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帝国主义者决不能以其失却市场或其他剥夺殖民地之权利，而不根本动摇。譬如英国若失去香港及印度、中国的市场，还能安然立足吗？还有一点，我们国民党的民族问题，是要全国各种小民族一律平等、自由，联合成中华民国，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是站在全民众的观点上去反抗外国资本主义，而国民革命第一个目标——民族主义——就是代表全中国的民众与外国资本主义去实行阶级斗争。

二、民权主义。我们国民党是反对军阀政治，是要用全国人民的力量，造成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但这并不是党纲上这样写了一条就算了事，一定要从实际上争斗的。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想一想，到底是我们同哪个去争，因为军阀不肯给我们政权，所以我们要反对军阀，试问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当然是的，因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商团都一样的要摧残我们爱国运动。若说我们要抛弃争斗，那就是抛弃民权。譬如以工会法的事体来说：广州已争到了可以获得工人自己的利益，而上海、天津、汉口等处还在争斗之中。一般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压迫工农阶级，我们就非去实行阶级争斗不可。若说这是共产党过激派的话，那我们就要问广州国民党政府之下，究竟能不能允许工会的存在？许不许罢工的自由？若允许的，是不是允许阶级斗争？若是不允许的，岂不是违反民权？所以国民革命第二个目标也就是阶级争斗。

三、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两大纲要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更明显更纯粹是一个阶级斗争了。孙中山先生说：资本主义之下，一定有阶级斗争，这斗争若要消灭，除非实行新共产主义。虽然中山先生也曾说中国患在贫而不患不均，但这是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消除阶级斗争，就要实现民生主义。若说中国没有不均，孙先生又何必提倡平均呢？我们深一层说：国民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代表哪一阶级的利益？当然是代表农工阶级的。那般资本家、大地主一见要平均他们的地权，节制他们的资本，他们一定要反对国民党，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

在这一方面看来，国民党只有反对资本家、大地主及一切特殊阶级，只有替农工阶级去实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民生主义。所以国民革命第三个目标，本身就是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国民革命是要站在阶级的地位上去实行阶级争斗的，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三方面的表现。我们再举一二事实来证明。譬如辛亥革命是反抗满清贵族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失败了。他何以失败呢？就是没有推倒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士大夫阶级。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时没有无产阶级参加。当时虽有无产阶级存在，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党，农民也不知为自身利益而革命，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到了五四运动，因为这几年来中国稍有工业的发展，所以也就有工人运动的发生，而国民革命就有新的发展。自从二七事件以至五卅运动，中间经过广州商团之役，沙面的罢工，上海、汉口、青岛等处的罢工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不是破坏国民革命？绝对不是的。譬如青岛的罢工，引起了上海的五卅事件，有了五卅事件，国民革命的力量就有充分的表现。因为五卅的要求条件中，一方面要

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等，是反抗帝国主义，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一方面要求工人有集会、罢工之自由，这当然是阶级斗争，更是国民革命。因为没有工会，工人就不能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斗争。

近来工人都明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农民也有好几处同大地主争斗。这许多阶级争斗在辛亥革命时没有的，现在有了。在这种种阶级斗争中明白了他们自己与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大地主相对的利害关系，使国民革命中工农阶级成为重要基础。所以中国国民党真正要实行三民主义，非领他们去实行阶级争斗不可。在实际上看起来，阶级争斗不但不破坏国民革命，而且使国民革命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如果反对阶级斗争，就无异抛弃三民主义，而又反对国民革命。只有是以国民革命作口头禅的政客，才会说不要阶级斗争。

我们国民党中为什么会分出两种现象？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先要知道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方法：他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用外交手段召集什么华盛顿会议、关税会议；但是这些方法太明显了，还有很巧妙的利用中国军阀供给军火，或利用研究系及国家主义者，天天高唱反对赤化的论调。但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依旧高涨，显见得这些方法没用了，所以现在又想了一个最新最厉害的方法出来。这个方法，就是使国民党内部分裂，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的争执。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左派革命的力量分散，要用一部分力量来对付右派的反动行为。这是五卅运动的结果，也是国民革命发展的结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因为这也是阶级斗争。

我们国民党是主张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及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打破这联合战线呢？最好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论调。因为这一来就可以反对联俄，反对一切外国

人，不管他是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一概拒绝，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减少力量而不至于完成。虽然党中有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曾有这样明白的表示，提出什么骗人的民族国际，而一样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阶级斗争是妨碍国民革命的。但我们试看广州国民政府，允许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人民入党的自由，共产党可以存在，因革命的手段相同，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因阶级斗争使国民革命有长足的起步，这自然是帝国主义者很嫌恶的。而在上海就不然了，帝国主义者命令戒严司令部把工会一概查封，雇潘冬林这些人去做工人御用的领袖，使这个热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就很容易的解决了。我们在这一个观点上来看，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除了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张作霖以外，还有谁得着利益呢？并且这些右派所谓反对阶级斗争，不但在理论上站在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而在事实上又完全是帮助帝国主义与军阀。他们虽然在北京开了他们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且不就纪律上说：如中央执行委员会须由秘书处召集，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开会等等；即在政治的意义上说，在开会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这不是表示反革命是什么？后来他们通电开除共产派中央执行委员的党籍，以中央执行委员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这未免太笑话了！他们又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且不准在国民政府范围内，行施职权。我们试问汪精卫哪一点违背党纲？哪一点对不起广东人民？他们都不曾说出。我敢说广东的工农群众，没有一个要汪精卫走；要汪精卫走的是谁呢？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照他们这种举动，事实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工农群众进攻。他们虽然

说反对阶级斗争，却不知他们自身在实行阶级争斗。

现在国民党的发展与国民革命之伸张猛进，更加使我们明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我们试看五卅事件之阶级斗争中，国民党在广州增加了二三十万工农党员。戴季陶说共产党破坏国民党，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岂非笑话！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要三民主义的实现，只有实行阶级斗争，领导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民族主义）；在军阀、官僚及特权阶级的手里，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民权主义）；领导工农群众，为工农阶级保障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向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实行阶级斗争（民生主义）。

有组织的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主要的力量。在五卅事件中，我们已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要把主义变成事实，如果没有这主要的力量，国民革命永不能发展而至完成。我们要做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革命的国民党员，除了担负以上三种责任以外，又要加上一种攻击右派反动分子的责任。因为右派这种反对阶级斗争，开除汪精卫，开除共产派，一件件都是要使国民党失了工农群众的信仰。

我们只简单的说，工农群众是否需要阶级斗争，改善他们生活的状况；现在的阶级斗争，还只是加资减租等运动，国民党若反对阶级斗争，若像戴季陶所说去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心，结果就会使工农群众完全失了同情。若以反对阶级斗争开除共产派党员，那共产派党员一出外去宣传国民党反对阶级斗争的主张，抹杀农工的利益，国民党哪里还有农工阶级的存在？失去了农工阶级的同情，国民党还有什么力量；所以为国民革命计，为国民党前途计，不得不对右派反动分子宣战。我们应该认定这也是国民党工作之一部，是国民革命之第一步。

我们若分析右派的政策，就可以知道他们完全是代表中国

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的理论，尽管怎样高妙，说什么哲学基础，孙中山先生是继孔子之道统的；因为仁爱，所以不主张阶级斗争。但我们试问孙先生革命，是不是斗争？创设同盟会，是不是要争斗；我们再问什么人可以施仁爱？对资本家、地主、军阀可以施仁爱吗？这是对压迫者可以施仁爱吗？在这些地方，右派显然把革命的中山主义与贤人政治相混淆，把中山先生做封建时代的孔徒，使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变成劝圣主行仁政的保皇党。这是何等荒谬！中山先生个人确有高尚的道德，可是他是一个革命的领袖，绝不是希望他去行仁政。譬如上海小沙渡或杨树浦罢工的时候，国民党如果反对阶级斗争，应该站在哪一边呢？工人一边吗？赞成阶级斗争了；不然，那就被资本家利用去欺骗工人，做了工贼。所以，我们如果是站在革命的地位，讲仁爱是讲不通的。

总之，我们要研究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应当去实行阶级斗争；使全国的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对于党中右派，我们就不能不取革命的行动，施以严厉的攻击。因为主张国民革命而却反对阶级斗争，这不但自己不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希望每个中山主义者，革命的国民党员，去实行阶级斗争而发展国民革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刊印。

PDG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冬）

毛　泽　东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政治周报》第四期。

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

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

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

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

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1]，扫平郑、莫[2]，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

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杨希闵、刘震寰。

〔2〕指郑润琦、莫雄。

PDG